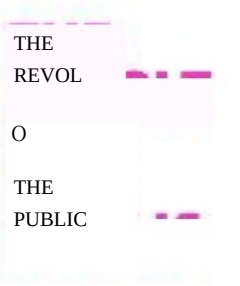
THE REVOLT OF THE PUBLIC





进步的想法，加州旧金山

press.stripe.com


THE
REVOL
O
THE
PUBLIC

起义O公众和hf危机

对权威的反抗

THF新千年

BV

MARTIN

GURRI

作者简介

马丁·古里，地缘政治分析家，新媒体和信息效应研究学者。他在CIA的角落里工作多年，致力于开放媒体的分析。离开政府部门后，Gurri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推动变革的动力上，并就此主题撰写了无数文章、研究和博客文章，其中包括与人合著的《*我们的视觉说服差距*》(Parameters, 2010年春季)。他的博客《*第五次浪潮*》(*The Fifth* Wave)延续了《公众起义》(The *Revolt of* The *Public*)*一书中首次阐述的主题*。

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作序

Martin gurri预见到了它的到来

2016年1月初，在弗吉尼亚·波斯特雷尔(Virginia Postrel)在她的专栏中引用了《公众起义》之后，我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版。[†]从那以后，每当我在谈话中谈到特朗普现象或整个令人不安的政治状态时，我都会推荐这本书。

因为马丁·古里预见到了。2014年6月，他在没有大张旗鼓的情况下，以电子书的形式自行出版了第一版，他没有*特别点名*唐纳德·特朗普，也没有点名英国脱欧，也没有点名欧洲各地涌现的古怪政治人物和新的边缘政党。但他看到了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政治格局。

拉特门的例子

第一版讲述了一个精英们失去控制叙事和保护自己声誉的能力的故事。我想用一个他*没有*提到的例子来说明——一个被称为“拉瑟门”的事件。

† “Democracy’s Destabilizer: TMI,” *Bloomberg View*, December 28, 2015.

前言

2004年，备受尊敬的新闻记者丹·拉瑟(Dan Rather)在CBS的《*60分钟*》节目中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要展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政治关系逃避真正的兵役。但是，极右翼网络讨论组“自由共和国”的一名化名“巴克海德”的参与者声称，CBS使用的一份文件是欺诈性的。他指出，该文件使用了一种按比例间隔的字体，而这种字体在据说撰写备忘录时通常是不可用的。相反，它很可能是用微软的文字处理软件在电脑上输入的，而微软的文字处理软件在几十年后才问世。他的分析迅速传播开来，抹黑了CBS的报道，也抹黑了丹·拉瑟记者的身份。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普通人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猜测一家大型新闻机构进行的调查。没有任何正式资格证书的人也不可能像拉瑟门丑闻那样广泛而迅速地传播他的发现。万维网使一个匿名的人有能力羞辱一个强大的媒体集团及其最著名的记者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能够隐藏其参与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失败尝试(1961年的“猪湾入侵”)以及在越南面临的困难等重要信息。今天，类似的尴尬可能会通过YouTube或维基解密(WikiLeaks)曝光。公众可以获得50年前没有的信息，从警察枪击事件到飓风救援工作，再到名人性行为不端的耸人听闻的细节。

马丁·古里(Martin Gurri)注视着这个改变了的媒体空间，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看到，精英们会越来越被鄙视，因为他们犯了更多的错误

而不完美也暴露了出来。他看到，精英们会以防御和蔑视的态度回应公众，但这只会让公众对权威更加敌视和蔑视。他看到，公众新获得的权力并没有带来任何精心设计的方案或计划，因此它构成了虚无主义的威胁。如果现有的秩序只是被推翻，而不是被取代，那么结果可能是混乱和冲突。

前言

马丁·古里(Martin Gurri)注视着这个改变了的媒体空间，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看到，随着精英们更多的错误和不完美被暴露出来，他们将越来越受到鄙视。他看到，精英们会以防御和蔑视的态度回应公众，但这只会让公众对权威更加敌视和蔑视。他看到，公众新获得的权力并没有带来任何精心设计的方案或计划，因此它构成了虚无主义的威胁。如果现有的秩序只是被推翻，而不是被取代，那么结果可能是混乱和冲突。

重要的新篇章

这一版的《公众*起义*》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新章节，叫做“重新考虑”，它涵盖了自第一版发行以来发生的事件。我建议你把这一章读两遍，一次是在你开始阅读本书其余部分之前，一次是在阅读之后。马丁·古里在《重新考虑》一书中以更大的自信、激情、口才和紧迫感，阐述了这些事件的教训，并对未来发出了重要的警告。

如今，尽管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唐纳德·特朗普会把美国政治搞得天翻地覆，但许多权威人士都声称自己找到了解释。但马丁·古里(Martin Gurri)的分析是最可信的，因为他把它定位在一个影响美国不止一次选举的趋势中。他能够将特朗普现象与其他许多国家建制派的崩溃联系起来。仅仅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就看到公众的反抗在希腊、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匈牙利、菲律宾……你能想到的都有。

让我再说一遍，这本书对特朗普现象的分析之所以特别可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马丁·古里(Martin Gurri)预见到了它的到来。

民主化的信息

阅读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民主化的信息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个困境。如果公众对政府失去耐心和尊重，其结果将是解体。如果精英们选择固步自封，他们很可能会诉诸镇压。

为了避免这些极端的结果，精英和公众都必须做出改变。精英们将不得不放弃权威，允许更多的地方变化和实验。公众将不得不更加宽容。不完美和糟糕的结果不应被视为阴谋或邪恶意图的证据。我们应该少去理会那些只会谴责和指责的人。我们应该更多地欣赏那些进行建设性尝试和改进的人。

新千年的公众起义与权威危机©2018马丁·古里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电子或机械方式复制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包括复印、录音或任何其他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

由美国条纹出版社/条纹物质公司出版。
电子书作者:Bright Wing Books (brighwing .
ca)
条纹出版社进步的想法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pr
ess.stripe.com

加拿大Hemlock印刷ISBN:
978-1-7322651-4-1

第一版

目录

1 动荡时代的前奏

2 霍德和瓦伊尔·高尼姆

3 我的论文

4 公众不是什么

5 相变 2011

6 权威危机

7 政府的失败

8 虚无主义和民主

9 选择与制度

10 怀疑论者的结局

-特朗普，英国脱欧，告别这一切



动荡时代的前奏

1

网络大学与以媒体喧嚣和人血震撼阿拉伯中东的连环叛乱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认为是有的。而且不太可能的联系很容易扩大。其中包括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成分股公司的快速更替、新闻和报纸的消亡、老牌政党的失败、Facebook和bb0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式扩张，以及手机的近乎普遍普及。

有人应该关心这一团奇怪的联系吗?只有当你关心你是如何被治理的时候:我将要讲述的故事首先关注的是现代政府这个可怕的救世主机器的危机。也只有当你关心民主的时候:因为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政府的危机不能不牵涉到这个制度。

你已经听到了带着某种喜悦预言世界末日的声音。

我自己不是先知。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主张之一是，未来

即使对最聪明的观察者来说，未来是，也必须是不透明的。想想美国中央情报局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或者美联储和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吧。明天不再像昨天的那一刻，我们感到震惊和困惑。我们赖以导航的指南针破裂了。我们在海上迷失了方向。

但我们可以谈论现在。我认为很明显，就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一种古老的、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正在消失，这种秩序植根于工业生活的等级制度和习俗。既然没有替代品出现在地平线上，作为飞向未知的游客，我们应该系好安全带，做好颠簸的准备。

信息很酷，那为什么会爆炸呢?

我拐弯抹角地谈到了这个话题。我对信息感兴趣。诚然，这个词是模糊的，概念是难以捉摸的。信息论在异常、偏差、差异——任何能将信号与噪声区分开来的东西——中发现“信息”。但这不是我所关心的。

媒体为我提供了参照点。作为一名全球事件的分析师，我的原始资料来自分析世界各地的报纸和电视报道。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信息。我还信仰报纸和电视报道中的信息就是知识——所以信息越多越好。这是我的天真，但如果我这么说，是可以理解的。当这个世界和我还年轻的时候，信息是稀缺的，因此很有价值。任何人，只要能在俄古关系上投下一束光，都是价值连城的黄金。在这种背景下，渴望更多也就说得通了。

在稀缺的条件下，信息来源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它们变得具有权威性。一个世纪以前，如果一个学者想要研究美国公众讨论的话题，他会在《纽约时报》的页面上找到其中的大部分。它并不完全是“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但它提供了足够大比例的已发表话题，作为一个实用的命题，几乎没有动机去进一步研究。因为《纽约时报》几乎垄断了当前的信息，它看起来很有权威。

四十年前，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结束了他对CBS晚间节目的播报

新闻节目的结束语是:“事情就是这样。”他的观众中几乎没有人觉得,生活在数千个城市、被组织成几十个国家的数十亿人的生活中的冲突和动荡，可以用三到四篇主要是视觉的报道来捕捉，总共不到30分钟。他们无法看到缺失的东西——另外两家电视台也报道了同样的新闻,只是没有那么庄严。克朗凯特被选为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人，我怀疑是因为他的外表和声音都像一个有钱的叔叔，家里的孩子们被迫听他讲赚钱的人生课程。当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摇摆不定时，冲击波震撼了华盛顿的大理石宫殿。克朗凯特散发着权威。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我的教育和训练中解脱出来，但最终我明白了，信息不仅仅是用来分析的原材料，它有自己的生命和力量。信息是有影响的。我察觉到的第一个重要影响与信息来源有关:随着公众可获得的信息量增加,任何一个信息来源的权威性都会下降。

信息爆炸或信息过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尖锐。这些担忧表达了对进步推进的一种新的焦虑，并使我最初分享的天真信念——数据和知识是相同的——受到质疑。即使在那时，这个问题也被不安的精英们框定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发表报告逃脱了权威来源的控制,我们如何分辨真伪?或者，用一种更险恶的方式，从操纵中分辨出诚实的研究?

信息真正开始爆炸是在20世纪90年代，最初是因为电视而不是互联网。在少数发达国家，固定电话TV多年来被限制在一两个频道，成为文明的象征,并被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尽职尽责地宣传。然后是有线电视和更具侵入性的卫星TV:CNN(成立于1980年)和半岛电视台(1996年)每天24小时播放新闻。在20世纪80年代，开罗的一个居民只能呆呆地盯着两个国有频道中的一个，一直播放穆巴拉克的全部内容，到21世纪初，他已经可以收看400多个国内和国际电视台了。描绘好莱坞性爱方式的美国电影涌入沙特阿拉伯等清教徒国家的家中。

电子邮件的商业应用程序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开发出来。第一个

万维网的服务器在1990年圣诞节开通。音乐产业的mp3破坏者于1993年问世。1997年出现了博客，1999年第一个免费博客软件Blogger面世。2001年，维基百科开始了它引人注目的演变。社交网络Friendster于2002年推出，MySpace和LinkedIn紧随其后于2003年推出，*社交网络*的巨龙Facebook于2004年问世。到2003年苹果公司推出iTunes时，网络上的页面已经超过了30亿个。

在新千年之初，任何有眼睛的人都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秩序。

我可以量化最后这句话。我们中的一些事件分析人士被新信息格局的规模所震惊，并想知道是否有人想过衡量它。我的朋友兼同事托尼·奥尔科特(Tony Olcott)偶然发现(当然是在网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些非常聪明的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研究。简而言之，这些聪明的人试图用数据位来衡量2001年和2002年产生的信息量，并将结果与更早时期积累的信息进行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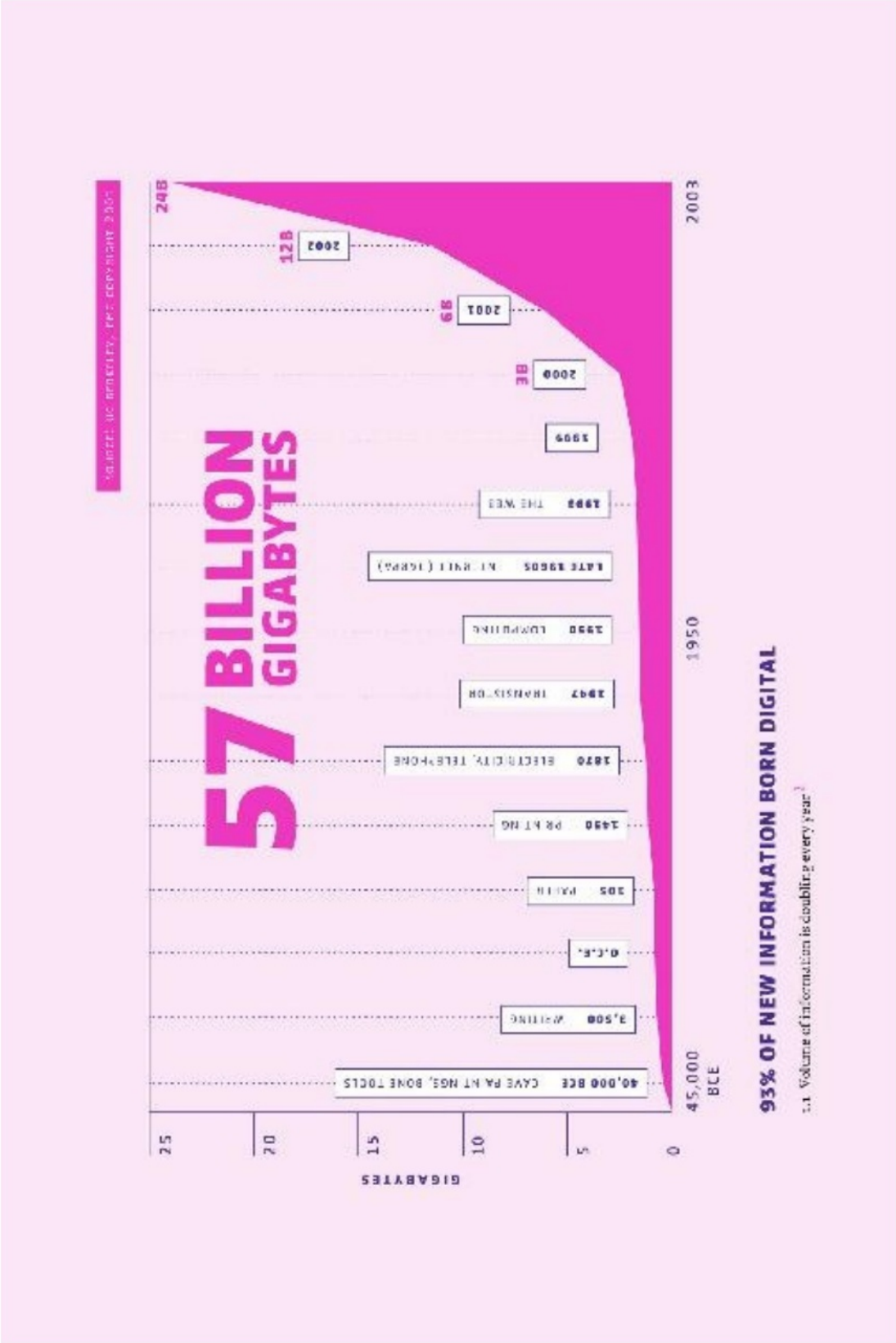
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2001年产生的信息比人类之前在地球上存在的所有信息都要多。事实上，2001年的信息总量是之前的*两倍*。2002年的数据量是2001年的两倍，增加了大约23“艾字节”的新信息——大致相当于14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信息的增长在历史上一直是缓慢的，而且是累加的。现在是指数级增长。

富有诗意的人试图为这种奇怪的转变想出一个合适的比喻。“*爆炸*”传达了这种变化的剧烈突然性。*超负荷*表达的是我们茫然的心理反应。然后是微不足道的显而易见的*洪水*和最不吸引人的*消防水带*。但只要看一眼上面的图表，我们就会想到一个恰当的比喻。这是一场巨大的浪潮:海啸。

walter cronkite如何变成Katie couric，观众如何变成大众

这种灾难性的力量所带来的变化的特征是什么

海啸，席卷了我们的文化和生活?这是摆在我们这些对媒体、研究和分析感兴趣的人面前的问题。在我真正掌握全局之前，一些不完整的答案就出现了。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意识到我不能限制自己的搜索

证据只局限于熟悉的权威来源，而不忽视几乎无穷无尽的新来源，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为我的结论提供决定性的材料。然而，尽管谷歌和算法搜索的出现，我发现人类不可能以最肤浅的方式探索这一近乎无限的新来源。无论我如何进行我的研究，无论我选择什么来源，我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这是在新的分配下进行分析的永久条件。

不确定性是一种腐蚀剂，对权威具有腐蚀性。一旦失去了对信息的垄断，我们的信任也随之丧失。总统的每一份声明，中央情报局的每一份评估，一家大报的每一份调查报告，都突然变得武断起来，似乎是基于道德上的偏爱，而不是理智上的严谨。当支持和*反对*的证据接近无限时，对精选数据的怀疑就会笼罩在每一个权威判断之上。

怀疑是有利有弊的。大众媒体的捍卫者指责他们消失的受众为了隐藏在一个相投的信息泡沫中，即一个“日常的我”而挑选消息来源。

在这场游戏的早期，一波又一波的新鲜信息暴露了既定安排的贫穷和人为。例如，公众讨论仅限于能言善辩的精英们感兴趣的极少数话题。政治专制地统治着公共领域——不仅是政治，还有*联邦*政治，对行政部门有着特殊的迷恋。科学、技术、宗教、哲学、视觉艺术——除了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外，这些塑造人生的关注往往遭到沉默。同样，一部只有几千人观看的平庸戏剧，却得到了自命不凡的评论家的评论，而一款技术精湛、有数百万人玩的电脑游戏却无人问津。



1.2*摘自《纽约时报》2013年6月3日©2013《纽约时报》版权所有。经许可使用,受美国版权法保护。未经明确书面许可,禁止印刷、复制、再分发或转发本内容*

以公众关注度衡量的重要性反映了精英品位。随着来自数字前沿的新来者开始排挤精英，我们对什么是重要的感知沿着无数小众兴趣的边缘断裂。

来自这些意想不到的、非权威人士的竞争冲击，让新闻业陷入了一种终极迷失的状态。我提到了针对流失客户的公民不负责任的指控。我们将再次遇到这种修辞上的翻跟头:被逼到灭绝不仅是一件坏事，而且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有时——就像音乐行业起诉其客户一样——是犯罪行为。然而，新闻媒体并不反对与敌人同床共枕。例如，如今最受欢迎的博客与报纸网站有关，而*《纽约时报》*的付费墙则谨慎地展示了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渗透的孔洞。

这样的联系引出了一个问题:“新闻”到底是什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新闻就是新闻行业出售的任何东西。在当前紧紧抓住一些残余受众的恐慌中，这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在灰色的旧*《泰晤士报》的头版*，我很容易看到一篇关于用丙烷煎炸的闲谈文章

天然气。CNN花了好几个小时来报道一个落跑新娘。美国富二代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那种威严的腔调被历史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那种啦啦队长妈妈式的腔调。

“公民新闻”这一概念从未起步的一个原因是，除了像挤牛奶一样挤出内容之外，人们对*职业*记者应该做些什么存在根本性的困惑。

在海啸中，没有哪个新闻行业比日报经受的打击更羞辱人，一个世纪前，日报曾是通过向公众出售新闻来盈利的原始形式。真情告白:我是看报纸长大的。在我的大半生里，这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但这是一种基于垄断条件的错觉。报纸是老式的工业企业。出版社像工厂一样组织起来。“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实际上指的是“所有适合预定版面的内容”。

在实体上，日报是一堆奇怪的东西——从政府声明、政治报告到给不快乐的妻子的建议、球赛比分、连环画、大量广告和明天的星座运势。报纸在信息海啸的压力下，心照不宣地发表声明，而这些声明都崩溃了。例如，他们假装权威和确定。但致命的缺陷是捆绑，因为很明显，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解体的阶段，数字革命的浪潮沸腾和搅动着，反对这种人为的信息捆绑，并“分解”:也就是说，把它们撕成碎片。

(我93岁的母亲一直坚持订阅《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因为她喜欢填字游戏。我给她看了很多填字游戏的网站，但她不为所动。我母亲想要她的包裹，她属于最后一代这样做的人。)

信息寻求一种不那么浮夸、不那么工业化的流通方式。问题是*谁*或*什*么决定了这个水平。每一个可能的答案都给这份日报带来了痛苦，但我认为，所涉及的病态远不止一种特定的兜售信息的模式，它还牵涉到精英与非精英、权威与服从之间的关系。那么多政治和经济机构所依赖的那些被动的大众受众，本身就被拆散了，分解了，碎片化了

我称之为“*重要社区*”:规模迥异的群体围绕一个共同的兴趣或主题有机地聚集在一起。

这些社区依靠数字平台进行自我表达。它们很重要，*而且*大多是虚拟的。他们痴迷的话题包括圣战和萌猫，科技和经济，但总数只受人类想象力范围的限制。充满活力的社群发出的声音是一种新的声音:业余爱好者的声音，受过教育的非精英的声音，不满和不守规矩的公众的声音。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绝大多数的新信息才得以产生和传播。推动海啸的知识地震就在这里诞生。

兴趣社区反映了公众真实而持久的品味。温顺的大众受众很容易被广告商和政客所说服，曾经是垄断者的幻想，但一接触到其他选择就瓦解了。当数字魔法将信息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时，一个既定的秩序——权力、金钱和知识的巨大等级制度——陷入了危机。

我已经谈到了人们的反应方式:不是对失去影响力的担忧或遗憾，而是道德上的愤怒和谴责，有时还伴随着要求镇压的呼声。与此同时，新近能言善语的公众踩着沾满泥土的靴子，踏入了精英们的神圣领地，推翻了这个或那个珍贵的传家宝。随之而来的冲突推翻了独裁者，摧毁了大公司，但它才刚刚开始。

我一直被信息量的天文数字般的增长所吸引，但事实证明，真正划时代的变化，是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中，公众与*权威*之间关系的革命。

我给新时代和其他定义上的幻象命名

这本书不是革命史，因为现在写革命还太早。Yochai Benkler、Clay Shirky和Glenn Reynolds等人对这场变革的起源和本质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解读。如果你想了解你窗外正在形成的世界，让我向你介绍这一日益增长的作品，然后让开。

我也不是在提出支持或反对新秩序的世界历史论据。使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创造的分析风格术语，以及约瑟夫·泰特洛克(Joseph Tetlock)在其著名的专家政治判断研究中借用的术语，恐怕我是一只“狐狸”，而不是一只“刺猬”。无论我相信什么是真的，问题似乎总有另一面。如果你要折磨我，我可能会承认，这是我的分析理想:从大脑所能容纳的尽可能多的相关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对分析者来说，从基地组织的角度来理解9/11，会带来“入土从安”、失去道德平衡的风险。在学术界，甚至在政府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令人痛心。但是，假装只有一种观点，甚至会使分析的可能性落空。为此，你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原始的偏见和一个足够狭隘的头脑。

我想讲的故事很简单，但却有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它涉及两种组织生活模式的慢动作碰撞:一种是等级的、工业化的、自上而下的，另一种是网络化的、平等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我称它为碰撞，因为已经有了残骸，而且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残骸。不久前还听命于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国家，现在将在解体的边缘颤抖。我把它描述为慢动作，因为新旧两种存在模式似乎无法达成一种解决方案，也无法取得任何形式的胜利。两者都在进行*否定*——这是一种毫无结果的反反复复的否定，斗争一直在进行。

所以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担心，许多我从旧方式中看重的结构，包括自由民主，以及许多在新方式中闪闪发光的可能性，如扩大个人自由的圈子，可能会在这种无果而终的反反复复中化为尘土。

这本书的脾性是反思的。写这本书是出于对理解的渴望。结构应该是直观的，至少我热切希望如此。章节是独立的，但主题是相互联系的。在这场最神秘的冲突中，每一章都代表着一个有待破解的谜团。英雄和反派都会出现，因为生活本来就是用来生活的，而不是用来分析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出我认为谁是谁。圣人将会少之又少，而殉道者将会多之又多。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式。

为了讲述我的故事，我必须使用我自己的语言，但如果我要成功地与你，读者交流，你必须理解我的意思。像公众和权威这样的术语并不简单，需要深思熟虑。本书的一个目标是充实这些术语所代表的现实——然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能像笑话的妙语一样，在最后突然提出它们的含义。相反，让我提供一些快速而肮脏的人物描述来开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随着故事的发展看看这些描述是如何成立的。

首先是公众。它是复数宾语的单数名词。我通常用“it”来指代公众，但有时，在特定的语境中，也会用“them”。至于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我会留给语法学家来决定。两者都是正确的。

我们稍后会探讨什么是公众*不适合的*。我对公众的理解完全借鉴于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分析家、编辑和评论员。他在自上而下的信息工业时代的巅峰时期写作，他对普通人在他们直接的感知圈之外与世界现实联系的能力感到绝望。这些人根据“头脑中的画面”做出决定——从政治家、广告商和媒体那里吸收的粗糙刻板印象——然而在民主国家，他们被期望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李普曼沉思道，“多数统治没有内在的道德和智力上的美德”。

李普曼对民主的觉醒预示了今天精英们的情绪。从上层看，公众和舆论的波动，显得非理性和无知。构成公众的人类材料，即“普通公民”，是政治上的业余爱好者，是一只需要牧羊人的羊，然而，由于他拥有主权，他很容易受到政治和企业狼群的操纵。到1927年出版《*公众幻影*》时，李普曼的主题在他看来是一个支离破碎、单一问题驱动的东西。

> *公众,在我看来*(他写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个体体。公众只是对一件事感兴趣的人,他们只能通过支持或反对行动者来影响这件事。*[4]

今天，公众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演员，但除此之外，李普曼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描述了其当前的结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个体体。

它是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它已经分裂成重要的社区，每个社区都围绕着一个群体的“兴趣事件”聚集在一起。

这就是我使用“公众”这个词的意思。

现在来说说权威，它有点像美: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就知道了。权威属于源头。我们相信一个报告，服从一个命令，或接受一个判决，因为发起人的地位。在个人层面，这种地位是通过职业化来实现的。掌权的人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他是能接触到隐藏知识的专家。他位于一些专业等级制度的顶端，管理官僚机构，或者进行研究。而且，几乎无一例外，他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认证过程才能获得职位，通常需要接受多年的高等教育。

当权者为了达到他们崇高的职位，不得不经历重重困难，因此他们不愿意去关注那些没有经历过同样过程的人。

然而，持久的权威存在于制度*中*，而不存在于代表制度行事和发言的人身上。人来人往——甚至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也适时隐退，谈论琐事——而像CBS新闻这样的机构却超越了几代人。他们能够囤积金钱和专有数据，并进化出一种神谕的语言，旨在让普通公民感到敬畏和困惑。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制度权威和垄断条件之间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联系:一个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控制它的游戏领域，它的话就会不受挑战。这一点，而不是声音调制的明显不对称，解释了克朗凯特和凯蒂库里克之间的差异。

有了这个粗略的草图，我就可以开始指名道姓了。我说的“权威”，指的是政府官员、监管机构、官僚机构、军队、警察。但我也指企业、金融机构、大学、大众媒体、政治家、科研行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捐赠基金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视觉和表演艺术行业。这些机构中的每一个都在某一领域以权威的身份发言。每个机构都在自己的领域中保持着日益缩小的垄断地位。

* * *

我还有一个特征要提出来。

我们所进入的新时代需要一个名字。虽然许多作家经常谈论这个时代的新颖性，而且到现在几乎成了陈词滥调，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花精力给它命名。托尼·奥尔科特(Tony Olcott)写了一个“网络时代”，但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描述而不是名义上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充分的。“数字时代”是蹩脚的，“数字革命”更好，我将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它，但它意味着通过一个决定性的插曲来改变，并且未能传达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特征的否定的艰苦斗争。我之前的一个候选词，“公众时代”，我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放弃了。旧的等级制度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我们同在。

所以让我回到我最初的出发点:信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信息并不是逐渐增长的，而是以巨大的脉冲或浪潮的形式扩展，席卷了人类的景观，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未被触及。例如，文字的发明就是这样一波浪潮。它导致了一种依赖于官吏或祭司种姓的政府形式。字母表的发展是另一个原因:如果没有识字的公民，古典世界的共和国就无法运转。第三次浪潮是印刷机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这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一次。如果没有印刷书籍和小册子，宗教改革、现代科学以及美国和法国革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出生在下一波大众传媒浪潮的衰落年代——那种工业化的、我说你听的信息模式，我已经很荣幸地描述过了。

现在还为时尚早。转型才刚刚开始，旧秩序的抵制会让后果变得非线性、不确定。但我想我已经确定，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站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可能发生灾难性扩张的第一个时刻。

朋友们，欢迎来到第五次浪潮。

章节注释

1彼得·莱曼、哈尔·r·瓦里安:《2003年有多少信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与系统学院，2003年，http://www2.sims.berkeley.edu/research/projects/howmuch-info-2003

研究数据由哈尔·r·瓦里安提供。
–

3参见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2006);舍基，《*大家来了*》(2008)和《*认知盈余*》(2010);雷诺兹,《*大卫之军*》(2006)。我还推荐托尼·奥尔科特*的《网络时代的开源智能*》(2011)、杰夫·贾维斯*的《公共部分*》(2011)和约翰·巴特尔*的《搜索*》(2005)。
4 Lippman, The *Phantom Public*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年第九版)，67页。
–

保温箱
和
wael
古尼姆

2

我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个博客大会上遇到了Hossein Derakhshan，他的博客名“霍德”更为人所知。我们和其他与会者围坐在一张午餐桌旁，吃着巨大的烧烤三明治。霍德年仅30岁，但看上去更年轻，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黑眼睛闪闪发光，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媒体总是称他为伊朗的“博客之父”，所以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互联网、博客和伊朗。我问他用波斯语和英语写的博客，*编辑:我自己*，是否被伊朗政府封锁。他笑着向我保证，他有办法把他的信息传递到母国。

霍德精通技术，这是他成名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个伊朗人，一个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我意外地发现他在政治事务上naïve。他对美国和布什政府感到非常愤怒。其中一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他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如果你的名字是“Hossein Derakhshan”，而且你在年龄和性别上符合错误的侧写，那在当时是一个耻辱的过程。但对于新保守主义者与其他他不喜欢的伊朗流亡者合谋，他满脑子都是奇怪的想法。

霍德刚刚开始了他奇怪而又困惑的人生轨迹，从反政府异见者到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核立场的狂热支持者。我对这个人残酷而诚实的评价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拥有非常普通的智力。

那是在2005年，离他访问以色列还有一年半，离他进入私人的各各他还有三年，原因值得考虑。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在多伦多，为伊朗人打开了一个新的表达大陆

霍德确实是一个普通人，在他一生中困扰他的国家和世界的重大事件中，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天才，不是一个学者——不是任何权威。他代表了一种我们在这个大等级制度与公众斗争的故事中经常遇到的类型: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被新的信息技术推向了意想不到的地方。

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和伊斯兰革命在德黑兰掌权时，他才四岁。这是他在流亡之前唯一知道的政府，它决定了他的一生，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既然那个政府在这个具体的故事中扮演了恶棍的角色，那么我们不妨花点时间来细说一下它的特点。

从理论上讲，伊朗政权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共和国，有明智的监护人保护所有人的道德和物质福利。实际上，它就像是苏联共产党在黑手党身上生出的一个不育的混血儿。掌权者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权力和大部分财富。他们声称自己是革命者，而且曾经确实是革命者，只不过是以最糟糕的方式。然而，几十年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进了豪宅，买了昂贵的汽车，在国内成为了根深蒂固的统治阶级，同时在该地区和世界上追求着古代波斯的野心。

他们控制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资源——根据中央情报局*(CIA)*的*facebook数据,这个国家有8000万人口,而且*石油储量丰富。伊朗是大中东地区的大男孩，尽管由于种族和宗教原因，它的影响力从未与其规模和实力成正比:一堵相互敌对和蔑视的墙将波斯和阿拉伯分隔开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者认为

全球现状对伊朗来说是赤裸裸的不公。他们渴望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

近代史上出现了这样的循环:为了开放体制而进行的表面改革，随后是强硬的镇压。政权的内部核心，也就是真正掌握伊朗权力杠杆的人和机构——神职人员、民兵、革命法庭——仍然没有改革，也无法改革。但正是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年轻的霍德开始了他作为数字宇宙观察者的职业生涯，为一家改革派报纸撰稿，这家报纸不久就被法院关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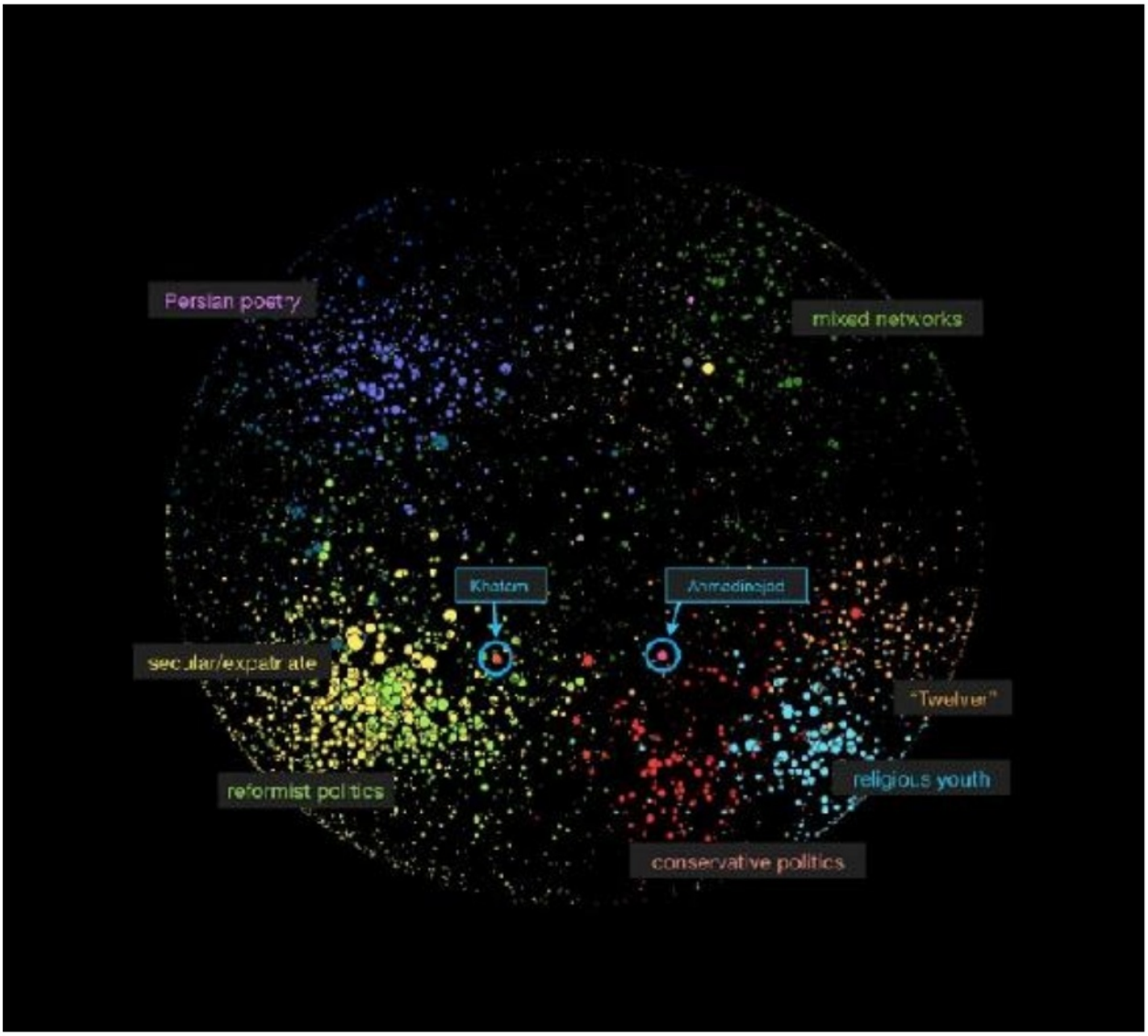
2000年，他来到了加拿大。因为他想开一个博客，他修改了代码，并在2001年9月成功地使博客软件适应了波斯语脚本的要求。这个二十来岁的普通年轻人的小小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了霍德的生活，也影响了伊朗的公众表达。伊朗人开始疯狂地写博客。当时阿拉伯国家的博客寥寥无几，而且几乎都是英文的，而伊朗的“博客圈”迅速发展到数万个活跃网站，并持续增长至今。大多数伊朗人的博客都是琐碎的个人日记。这恰好是地球上每个国家的情况。然而，许多博客评论政治新闻，倡导女权主义，或批评政权官员明显的腐败。

伊朗博客圈的惊人扩张是一个非线性事件，只有在第五次浪潮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一个不受审查者绝对控制的表达空间突然打开。网络上形成了重要的社区，它们因通常的利益分歧而分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捍卫和扩大虚拟的公共空间，反对政权的掠夺。

结果，统治阶级面临着所谓的“独裁者的困境”——在新环境中，权威经常受到折磨。这种困境是这样发生的。出于安全考虑，独裁者必须将通信控制和限制到最低限度。然而，为了使他们的统治合法，他们需要繁荣，而繁荣只能通过公开交换信息来实现。选择吧。

例如，在一系列可能的选择中，朝鲜处于限制性的极端。三代朝鲜独裁者都押下了重注

用饥荒和贫困换取沉默和控制。我们将看到，埃及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之所以失去权力，部分原因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他想在沟通和控制之间切换，但却背叛了自己的恐慌和一个老人对信息领域的无知。



2.1伊朗博客世界“博客圈”地图

伊朗的统治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至少在形式上，他们接受了博客和互联网。他们促进了连通性(尽管人为地保持低带宽)，并鼓励政权支持者上网——试图消除网络社区中反政权的团结。整个博客圈都是如此

致力于“保守”的政治和宗教观点。预计政府高官会在网上交流。伊朗最著名的博客是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当然，这个政权也封锁了很多网站，目前还保持着被关进监狱博主的世界纪录。其中至少有一人死于他那睿智的柏拉图式监护人的训诫。

以一种非常非线性但我相信是真实的方式，所有这些扭曲都是由一个在加拿大多伦多摆弄代码的微不足道的年轻人强加给残酷的伊朗独裁者的。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威胁着一个大国的神圣

西方对伊朗博客圈的意外发现，让霍德成为小名人。他被邀请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谈论那个阴暗的领域——互联网，他以某种热情和技巧做到了这一点。当我在纳什维尔遇到他时，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孤独的科技吉普赛人，从一个会议漂泊到另一个会议。2007年1月，他参加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个会议。他非常清楚这将阻止他重返伊朗，但他给出了这次访问的理想主义理由。然后，在2008年秋天，霍德前往德黑兰。于是，在11月的第一天，伊朗当局终于抓住了这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在霍德父亲的家中逮捕了他，并把他送进了伊文监狱，这是伊斯兰共和国无情的刑罚体系中一个不友好的地方。

两年过去了，对他的审判才开始。又过了8个月，*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判决才宣布:他因写博客罪被监禁19年半。

猜测霍德为什么回到伊朗是多余的:正如我所指出的，他是一个naïve和不现实的气质。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更有用、更诚实、更中肯的方法是，把我们对这种肆无忌惮的不公正行为的问题对准犯下这种行为的人。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霍德?为什么要施以无度的惩罚?大权在握的他们，对这个普通人又有什么恐惧呢?什么

难道他们希望把他活埋在伊文监狱里得到好处吗?

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可能不亚于naïve霍德本人。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专制政府。专制者会惩罚那些表达非正统政治观点或从事冒犯行为的人。霍德在这两方面都符合。

此外，针对互联网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将博客作者投入监狱似乎是这个世界的常态:这不是新闻。例如，2007年2月，埃及法院以“侮辱总统”和“诋毁伊斯兰教”的罪名，判处当时年仅22岁的博主Abdel Kareem Nabil Suleiman 4年监禁。那是在穆巴拉克的旧政权下。2013年6月，埃及另一家法院判处博主艾哈迈德·杜马(Ahmed Douma) 6个月监禁，罪名也是侮辱总统。这是在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新民选政府下发生的。我引用这两个人作为随机对照:其他埃及博主在此期间遭到迫害和监禁。[2]

中国拥有一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审查大军，是唯一一个与伊朗在博客入狱人数上有激烈竞争的国家。在古巴，持不同政见的博主Yoani Sánchez被政府特工扔进汽车后座殴打。在越南，博主阮黄维(Nguyen Hoang Vi)被从摩托车上撞下来，车窗被砸碎，并被警察脱光衣服搜身，最后被逮捕。在伊朗，霍德只是近年来政权强硬期间被虐待和监禁的众多博主之一。[3]

如果你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博主，生活是糟糕的。这就是霍德的私人髑髅地的简单故事。他在错误的国家激怒了错误的人，然后，莫名其妙地，他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中。

这种说法足够准确，但很肤浅。它要求我们接受许多我们完全可以质疑的事情:例如，强大的威权主义者对信息感到愤怒或恐惧。然而，权力政治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透明的。因此，我认为，一个具有巨大物质权威的人在面对一般的信息——*把信息当作*信息——时，产生愤怒或恐惧的原因从来不是既定的，而是一个需要分析和解释的谜。情况正是如此

当“信息”被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博客上发表自己的想法所代表时。

除了无数琐碎的话题，霍德还发表了他对伊朗政权的看法，支持和反对。但他在伊朗政坛没有地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政治地位。从这个词的任何意义上来说，他都算不上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唯一的影响力是在技术上:几乎是偶然的，他打开了一个公众讨论的空间，让普通伊朗人也可以使用。而且，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已经成为了博客和自我表达的代言人。

因此，探究这个谜团的一个方法就是假设，对于伊朗的统治者来说，“博客之父”“博客之父”代表着比自己更大、更有威胁性的东西。事实上，他代表的是失去对信息的垄断，失去对公共传播的绝对控制。

我以前说过，我更喜欢的分析方法是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来审视一个故事。可以理解的是，新闻媒体和人权活动家总是从年轻受害者的角度来呈现霍德的故事。但是，要深入到这个特殊谜团的核心，要理解大国与纯粹信息之间不对称斗争的条款，我们必须将视角转移到那些坐在伊朗政治金字塔顶端的不起眼的杂种——一半是黑帮，一半是空想家。



2.2霍德在永恒会议上[4] Hossein Derakhshan©2004

从对霍德的正式指控开始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些指控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大杂烩，包括宣传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和“与敌国合作”，指的是访问以色列。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控是“侮辱了伊朗民族的神圣性”。毫无疑问，这句话是指宗教，但这些话表达了当局更为深刻和普遍的关切，并向我们展示了进入他们视角的途径。

博主，以及所有数字通信的涉水者，经常被指控侮辱神圣的东西:总统、宗教、属性，甚至是民主多数的特权。他们在该沉默的时候说话，说出不该说的话。一个半世纪以来，伟大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地权威地控制着每一次公共谈话的内容，在这些制度的判断中，他们践踏着神圣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一些被禁止的观点或其他观点已经被禁止了

说。*说话*是禁忌。业余爱好者、普通人、公众发出的陌生声音，是权威人士所憎恶的。

因此，为了达到我们的假设所描绘的目标，我们必须抛开德黑兰掌权者的显著特征。重要的*不是*他们是暴徒，也不是他们压迫自己的同胞。这只是说明了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范围。有意义的一点是，他们属于一个更大的阶级或类别的人，在每个国家和大多数各行各业都有发现，他们很久以前就说服自己，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和合法性在自己的领域内说话和行动。这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不，一点也不是，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世界的道德秩序之上。任何挑战，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不仅是对*他们*的潜在威胁，而且是对这种秩序的违反，这种歪曲必须以一切美好和真实的名义彻底粉碎。

至于霍德和他19年半的刑期，重要的不是他的政治异见，而是伊朗当权者认为这位年轻博客是一个道德怪物的感知。

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该国几代人中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他轻松赢得了几次全国选举。他和他的政党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对大众媒体的温和但有效的控制。埃尔多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在一个权威的回音室里进行的——按照民主标准，这是合法的。

当伊斯坦布尔爆发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在公园原址上修建购物中心的计划时，抗议活动随后蔓延到整个土耳其，并明显带有反埃尔多安的倾向，但土耳其新闻媒体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部分归土耳其利益集团所有的CNN土耳其频道播出了一部关于企鹅的纪录片，这是出了名的。(抗议企鹅的视觉笑话以惊人的速度在网上传播开来。)当局下令保持沉默。反政府力量——抗议公众——转向推特交换信息，他们更喜欢展示示威规模的生动照片，更重要的是，展示警察镇压他们时的暴力行为。这些图片很有说服力。西方对土耳其作为一个温和的穆斯林民主国家的感知遭受了剧烈的冲击。

埃尔多安领导了一个民选政府。他在推特上的存在吸引了250万粉丝。但当他谈到2013年6月的抗议活动时，他并不是作为一名民主人士或社交媒体的参与者。他是权威的声音，在道德愤怒的控制下，与德黑兰的暴君们没有什么不同:“有一个诅咒，叫做推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谎言。这个叫做社交媒体的东西是对社会的诅咒。”土耳其的推特用户侮辱了这些神圣的东西。数十人被捕。几天后，埃尔多安的内政部长宣布，“社交媒体上的挑衅行为”将成为刑事调查的目标。[5]

这种对公众侵入权威领域发自内心的反感，几乎达到恶心的程度，绝不仅仅局限于政府。我注意到，从事新闻业务的人已经把日报的经济失败转变为一种危险，不仅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生计，而且威胁到民主生活的结构。例如，当尼古拉斯·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沉思着为他支付薪水的“传统新闻媒体的衰落”时，他唤起了一个“两极分化和不宽容”的惨淡未来。5 .

亵渎*企业*神圣的经典案例涉及文件共享程序纳普斯特。纳普斯特的故事是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的故事，他是许多像霍德这样的年轻人的原型，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利用信息技术威胁现有秩序的方式。范宁在1999年6月发布了纳普斯特的第一个版本。当时他18岁，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没有钱，也没有商业关系，然而测试版的发布带来的冲击却让这个强大的行业的利润螺旋式下降，再也无法恢复。

纳普斯特邀请范宁的青少年同伴交换歌曲文件，而不是先在收银台停下来付钱给唱片公司。

音乐和相关产业的捍卫者发出的谴责之声是埃尔多安所应得的。在2001年起诉纳普斯特一案的法庭之友声明中，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将他所代表的公司利益描述为“美国创意社区的支柱”，将纳普斯特的商业模式描述为“盗窃”。“如果法院允许纳普斯特和类似的服务继续为大规模侵犯版权提供便利，”他尖锐地补充说，“公众将会有很大的风险。

开始意识到并相信他们有权免费获得受版权保护的材料。”

美国唱片业协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主席希拉里·罗森(Hilary Rosen)给出了最好的总结:“Napster正在做的事情……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错误的。”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个不道德的行为是由青少年交换音乐文件组成的。[7]

很少有事件能更好地说明权威的普遍性，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它膏抹了少数被拣选的人，或者被膏抹的人对非法侵入的公众的不可调和的愤怒。如果杰克·瓦伦蒂有权力判定肖恩·范宁在联邦监狱服刑19年半，我相当肯定他会这么做的。

facebook上的火人为突尼斯的政治变革照亮了道路

你可能会反对说，这是一个悲剧故事，没有任何意义。即使霍德在道德层面上威胁伊朗当局，地球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前进，一如既往地独裁，仍然由令人不快的人统治。霍德在埃文监狱中煎熬了4年，直到2014年11月被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赦免。他19年半的刑期仍然是伊朗有史以来对博主判处的最长刑期。

网络自由与政治变革之间的鸿沟从未跨越，也可能永远*无法*跨越，因为虚拟与现实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匹配。

这些反对意见又循环回到了政治权力与信息之间的神秘关系。用来形容权力的词是“硬的”，而信息应该是“软的”——所以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场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剪刀永远在剪纸，不可能有其他结构性的结果。蛮力永远打败聪明的话语。某些学者已经提出了对第五波的这种*无效*解释，而我们这些观察到数字活动家多年来被虐待和监禁的人只能怀疑这些反对者是否正确。

我很快会更深入地回到权力-信息方程，

当我讲述*信息人*的故事时。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些真实的事件，*艰难*的事件，它们以各种方式——是的，神秘地——纠缠在信息的网络中，供你们考虑。
第一个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但它涉及到霍德的国家伊朗，因此值得一提。2009年6月伊朗总统选举后，在德黑兰和该国其他地方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很快发展成为反政府的绿色运动，并立即被媒体誉为“推特革命”。在一个难得的科技兴奋时刻，国务院的白领们用推特进行干预，推迟了计划中的关闭，表面上是为了让革命性的推文继续下去。

然而，最可靠的信息表明，在伊朗国内可以找到的推特用户相对较少——抗议期间的巨大流量高峰是由伊朗以外的人造成的。几乎可以肯定，绿色运动*不是*推特革命，也不是依赖社交媒体，尽管它肯定是一场数字辅助的反抗:抗议者使用手机短信和视频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但这里的主要教训是政权民兵对绿色运动的暴力镇压。剪刀剪纸。虽然不可能像我对霍德的监禁所说的那样，说一切都没有改变，但伊朗的政治事实基本保持不变: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内贾德和他的派系统治着伊朗。

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突尼斯发生了起义，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第一次反政府抗议活动后不到三周，该国长期执政的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逃往沙特阿拉伯。对我们来说，问题是第五波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结果。

突尼斯起义的催化剂以一个真正微不足道的人的形式出现: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他是省城西迪布齐德(Sidi Bouzid)的街头小贩，他因在政权官员手中忍受的羞辱而绝望地自焚，后来因烧伤而死亡。你会注意到，我写的是“催化剂”而不是“原因”:即使是最简单的人类事件，也构成了由非线性支配的复杂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梳理出一个

一集就宣称它是原动力，就像捡起一粒沙子说它是“海滩”一样有道理。



2.3着火的人:Mohamed Bouazizi, 2010年12月16日8图片©2011 ievolve.org /ZUMA Press

这种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正是那些拿着高薪扮演这一角色的分析师的原因

预言家们总是对未来的预测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在明天与昨天不一样的时候。

布阿齐兹成为一项*事业的轨迹*——在这个词的两种意义上——都值得我们深思。在他死亡的九个月前，另一名来自省城镇莫纳斯提尔的街头小贩阿卜杜勒塞勒姆·特里梅克(Abdesslem Trimech)因受到政府虐待而自焚，后来死亡。随后没有出现任何抗议活动。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我想，特里梅克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哀悼，但除此之外，他一直默默无闻，无足轻重。

与布阿齐兹相比，特里梅克是一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表演。千真万确。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为什么这两个相似的死亡会产生如此不同的影响，另一个显著的差异就会显现出来。布阿齐兹在镜头前被烧死。只要数码影像还存在，我们就会看到他在一个毫无特色的公共广场上，燃烧成火焰，仍然在行走。这种形象是不可能不感受到痛苦和恐惧而被吸收的。没有言语，似乎没有被特别的恳求所玷污，它讲述了一个人在统治者的驱使下，超越了最后一丝绝望的故事。布阿齐兹自焚的照片被发布在脸书上，在突尼斯境内外激起了强烈的情绪。相比之下，未被拍摄的特里梅克死于一个没有面孔的阴影。

突尼斯革命展示了新旧信息分配之间的一个决定性变化。工业时代依赖于大块的文本来影响政府和舆论。新的数字世界更喜欢视觉的力量。通常所说的新媒体实际上意味着图像对印刷文字的胜利。

但从突尼斯事件中得出的另一个观察结果是，新旧媒体之间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谈论互联网或社交媒体并将其与大众媒体进行对比可能是有用的，但现实中存在的是一个单一的、深度矩阵化的*信息领域*。

例如，半岛电视台是一个面向大众的数字卫星电视频道。它既新又老。突尼斯冲突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半岛电视台在其报道中偏袒叛乱分子，从而影响了结果。这可以被认为是大媒体“设定议程”的一个例子。但半岛电视台拍摄的突尼斯画面大多来自手机视频，

由公众在现场拍摄，并通过脸书进行交流。然后它们被重新发布到网上——在半岛电视台的网站上，在YouTube上，以及成千上万的小众网站上。所以这也是新媒体推动新闻报道的一个例子。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现在信息的传播存在大量的冗余。这是另一个与旧方式不同的变化。你可以干扰半岛电视台的信号，但你不能干扰YouTube。你可以关闭互联网——就像埃及当局在面对自己的起义时所做的那样——但你不能关闭信息领域。

谷歌在迪拜的一名员工将埃及革命安排为facebook活动

突尼斯起义的成功扭转了我们迄今所观察到的权力两极分化。一个基本无组织的公众推翻了一个无可置疑地统治了23年的政权。不知何故，布战胜了剪刀。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有很多，但我想大胆地说，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信息领域的影响——对全球公众、对突尼斯公众、对突尼斯当局本身的影响。抗议期间从突尼斯传出的许多信息反映了公众的工作和意愿。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动乱是自发地在街头开始的。我要考虑的最后一个事件并非如此。它起源于网上，作为脸书活动上安排的虚拟革命邀请。

如果你要我说出自苏联解体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革，那么紧随突尼斯之后、并重复同样模式的2011年埃及起义将非常接近榜首。埃及是阿拉伯语世界中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那里旧政权的倒台给该地区带来了冲击和余震，其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从西方和埃及的角度来看，关于这个命运转折的突然转折，已经写了许多精彩的报道——我不想再增加一个。

这就是我想做的:触及起义的三个短暂时刻，它们反映了所谓的“硬”政治事件是如何被软塑造的

信息。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时刻，阿尔法和欧米茄，都有同一个主角:瓦埃尔·高尼姆，一个年轻的埃及人，他的才华在一代人之前甚至没有名字。高尼姆是b谷歌的中东市场营销主管，为了工作，他搬到了迪拜——阿联酋的迪斯尼世界。他29岁时创建了自己的Facebook页面，30岁时在开罗街头被政府的匿名特工绑架。我不愿像对待霍德等人那样，称他为普通或无足轻重。即使在他为起义提供火花之前，他的生活也不是典型的埃及人。

然而，高尼姆本人对这件事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帖称，他无意“发动革命或政变”，也不认为自己是“任何形式的政治领袖”。然后，他继续说道:

> *……我是一个普通的埃及人,为阿赫利队加油,坐在当地的咖啡馆里,吃南瓜子…当我们的国家队输掉一场比赛时,我变得很痛苦……最重要的是,我只想为我是埃及人而感到骄傲……*[9]

的确，在他获释后接受的决定性电视采访中，他被许多普通埃及人视为他们中的一员:一个体面的年轻人，举止谦逊，明显不同于傲慢的官员，愤怒的革命者，以及在埃及政治中盛行的其他特殊人物。

因此，让我们承认，瓦埃尔·高尼姆是一个*非凡*的普通人。他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社区，在2011年1月至2月事件的早期阶段帮助领导了这场冲锋。他自己讲述这些事件的自传《*革命2.0》(Revolution 2.0)*，我推荐给任何想从非常人性化的角度理解新信息对僵化的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的人。高尼姆可能是最接近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数字版本:一个完全不同的虚拟公众的调解人，他的权威每天都是从下面获得的，而不是从上面获得的。

他称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人、一件事和一幅图像。哈立德·赛义德是一个年轻的亚历山大人

被穆巴拉克政权雇佣的暴徒残忍地殴打致死，原因尚不清楚。这种虐待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引起公众的沉默。然而，哈立德·赛义德却不同。首先，他是一个相貌不错的埃及中产阶级青年。更重要的是，赛义德躺在停尸间时，他的家人用手机拍照，偷偷拍下了他血肉模糊的脸。这张照片与之前这位英俊、微笑的年轻人的照片大相径庭，令人震惊。在埃及和突尼斯，一个强大而令人不安的形象站在革命的起点。

高尼姆利用这些照片和哈立德·赛义德的故事，在他的网站上推动了一场本质上反对政权不公正的营销活动。

那时，胡斯尼·穆巴拉克已经执政30多年——比突尼斯的本·阿里还要长，比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要长得多。他的统治获得了不朽的必然性，有传言说法老的王冠将传给他的儿子贾迈勒。埃及的政治体系建立在纯粹的黑帮主义之上，除了当权者的*权威*之外，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正当化:他们声称，只有当权者才拥有维护安全、发展经济和管理现代政府复杂性的专业知识。

事实上，埃及政府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无能，但这对埃及人来说没什么分量，大多数人憎恨这个政权，因为它每天都在侮辱他们，偶尔也会对他们施以暴行。问题在于惯性。政治变革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未发生过;在如此缺乏希望的情况下，恐惧很容易占据上风。

我将介绍高尼姆用来帮助社区成员克服恐惧障碍的营销技巧。这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可以在*《革命2.0》中找到*。相反，我想直接转到一个特定的时刻:2011年1月14日，高尼姆受到突尼斯事件的启发，在“哈立德·赛义德”网页上张贴呼吁在1月25日(埃及的“警察日”)举行抗议活动的帖子。高尼姆给这次活动起了个名字:“反对酷刑、贫穷、腐败和失业的革命”。他为此创建了一个脸书活动。

高尼姆将他的革命号召与其他反政府网站和活动人士联系起来。他的目标非常雄心勃勃:不外乎弥合虚拟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并在硬政治领域实现这一目标。在脸书页面上，他试图动员埃及公众反对他们的政府。

想想其中的含义吧。如果这种飞跃成为可能，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流行的群众运动的组织模式将被取代——攻击权力和权威可能成为业余爱好者、普通人和未受过教育的公众的工作。

不久前，革命者还是专职的专业人士。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需要一个*组织*来进行指挥和控制，需要一个公开的*纲领*来解释激进变革的必要性，纲领建立在一种能够说服和吸引大量公众的意识形态之上——这些公众随后会通过*指挥*和*控制的方式形成一场群众运动*。组织、程序、印刷机、意识形态、大众指挥和控制:如果瓦埃尔·高尼姆赢了他的赌注，那么只要点击一下鼠标，这些昂贵而缓慢的机器，以及对等级和服从的需求，就可以被超越。

虽然高尼姆策划了一场革命，但他明确否认自己是一名革命者。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埃及人。

* * *

除了政权镇压的明显危险之外，两个技术障碍可能阻碍了他实现目标的道路。由于这些被至今仍怀疑网络政治能否转移到现实世界的作家们所引用，我想简单地谈一谈。一个障碍是高尼姆通过脸书可以接触到多少埃及人。另一个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否太大而无法跨越?

数字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埃及在互联网普及方面落后，不仅落后于西方，还落后于伊朗和海湾地区较富裕的阿拉伯国家。2005年7月24日，网上曾号召举行“反恐”示威活动，吸引了少数受过大学教育的富裕埃及人，他们很快就被当局和平地驱散了。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喜剧剧。当时的互联网普及率大概徘徊在7%到10%之间。

到2011年1月，埃及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了20%。你可能会问，在这个层面上，高尼姆的信息是否能传达给足够多的公众——更普遍地说，我们是否有任何想法

一条信息要进入公众的意识，传播的最低限度必须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可以。

议程设置理论的杰出商业实践者罗兰·沙茨(Roland Schatz)已经确定了一个媒体传播水平，在这个水平以下，信息会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下沉，但在这个水平以上，信息会迅速引起公众的注意。沙茨称这一界限为*意识阈值*，并估计临界点为扩散的15%。学者们对每一种创新(包括新的政治信仰)的采用都绘制了类似的轨迹。“临界质量”发生在被采纳的10%到20%之间——在这个水平上，足够多的传播网络被变革的病毒“感染”，使后者能够自我维持。[10]

埃及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普及率与突破意识门槛的潜力是一致的。在2011年的起义中，这种潜力得到了实现。我相信韦尔·高尼姆赢了。根据他自己的数据，到1月25日，抗议当天，超过一百万人观看了他的Facebook活动邀请，大约有十万人宣布他们打算参加。有人认为，大多数1月25日的示威者不是因为Facebook而去的。就最终动机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从更接近的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正确的。但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示威者在那里是因为他们在网上了解了抗议活动。他们从软信息切换到开罗街头的硬路面，从虚拟切换到真实，从聪明的谈话切换到与防暴警察的激烈战斗。几乎偶然的是，在政治变革的道路上，他们对埃及的信息权力平衡进行了一场革命。

我要补充一点，当局显然相信“我们都是哈立德说”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议者也是如此，他们在解放广场给高尼姆一个荣誉的位置。高尼姆本人也是如此，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当他向解放广场的抗议者询问他们是如何得知这一事件的，许多人回答“来自‘我们都是哈立德说’”或其他反政府Facebook组织。

如果是这样的话，心理距离的问题就得到了经验主义的回答。要说公众无法在虚拟政治和现实政治之间实现飞跃，那简直是大错特错。这个问题是在网络上的“弱纽带”与现实生活中的“强纽带”之间提出的——我将在后面探讨这个命题

更深入。关于与埃及起义有关的“强纽带”反对意见，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只适用于形成群众运动的旧模式。如果抗议者试图用一组特定的人、计划和原则来取代现政权，那么数字世界的弱纽带将是不够的。

但这并不是导致形形色色的埃及公众走上街头的原因。他们只是想除掉胡斯尼·穆巴拉克。

一个非常老的人关闭了网络，然后掉进了信息领域的活板门

我想说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没有说什么。我并不是说高尼姆和互联网导致了埃及的革命。因为人类不是台球，将牛顿力学应用于政治事件总是以混乱告终，而且往往是错误的。高尼姆和互联网是众多原因之一。如果你有眼睛，那就足够了不起了。

Hd LA93
NE AND WEB ACCESS (MILLIONS)
AWARENESS THRESHOLD
WEB ACCESS
MOBILE PHONES
2005
2000
1995
990
0861



2.5 韦尔·高尼姆在梦想电视

我也不是在断言互联网的首要地位，即使是在新信息海啸所创造的条件下。首要地位是指大量冗余的信息领域，它吸收了新媒体和旧媒体。在信息领域，在图像时代，我认为最受欢迎和最有说服力的媒体仍然是电视。

我的第二个时刻——按时间顺序是最后一个时刻——是关于2011年2月7日韦尔·高尼姆对梦想电视的莫娜·阿尔·沙兹利的采访。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因素。

高尼姆在一个秘密的国家安全监狱被关押了11天后刚刚被当局释放。他看上去面容憔悴，脸色苍白。梦想电视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埃及频道，本质上是独裁者困境的产物。胡斯尼·穆巴拉克希望使埃及现代化。现代国家拥有丰富的电视频道和内容。穆巴拉克赌他的政权可以控制新渠道流出的信息。媒体所有者对此心存感激

对该政权来说，内容受到严格审查。然而，与国有电视台相比，这是间接控制。就显得更加脆弱了。在最近的政治动荡中，私人渠道可能会偏离政权对事件的解释。采访者Al-Shazly明确表达了她对抗议者的同情。

这是一种只有在信息领域才有可能出现的融合:旧媒体将属于革命中心人物的新媒体声音主流化。梦想电视不是半岛电视台:它的观众是有娱乐头脑的、非政治的埃及人。

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埃及的起义已经到了危机关头。六天前，穆巴拉克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自己对国家的贡献，并承诺在六个月后的总统任期结束时辞职。许多抗议者认为，应该允许这位老人体面地离开。其他人则摇摆不定。解放广场上的人群越来越少。

高尼姆在梦想电视上的原始、情绪化的表演被认为是决定性地扭转了局势，有利于抗议者。这证明了电视捕捉和传达真诚的力量:当他面对死去示威者的照片时，他的悲伤既令人信服，又令人痛苦。在大众面前，瓦埃尔高尼姆，这位非凡的普通人，给了革命者一张普通埃及人能认同的面孔。他具身的信息改变了他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方向。他的采访在YouTube上疯传，新媒体加剧了旧媒体的影响。解放广场的人群规模越来越大。四天后，胡斯尼·穆巴拉克辞职。

* * *

新环境的现实是，几乎每一场政治冲突都是由全球信息领域，而不是任何一种媒介或平台爆发的，而且往往有助于决定结果。与电视或Facebook不同，信息领域不能被政府封锁。它太冗余了。无论如何，信息都会泄露到冲突中。

2011年1月28日，周五，在埃及，这在几乎实验室的条件下得到了证明:那一刻，政府关闭了其人民的大门

接入互联网。移动电话服务也中断了。处于悬崖边缘的穆巴拉克想要在独裁者的困境中改变立场，撤回他在现代化上的赌注。他想象他可以把埃及推回到过去，回到第五次浪潮之前的舒适日子。

穆巴拉克的仆从们关闭网络的原因并不神秘。他们害怕互联网。造成这种恐惧的原因——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过，甚至也没有承认过——暗示着一场比任何纯粹的政治动荡更深刻、更能破坏现有人际关系的革命。从80多岁的穆巴拉克开始，执掌政权的人是在信息工业时代上台的。他们一直是报纸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电视上能播什么不能播什么的领主和主人。他们模糊地理解这种垄断的不可挽回的侵蚀，对埃及人讲述他们统治者的故事失去控制。

埃及许多城市在周五祈祷后计划的示威活动，是政府停摆的直接原因。但让我们以1月28日统治埃及的老人们的身份来感受一下吧。他们在想什么呢?很有可能，他们正在从不守规矩的公众手中夺走沟通和组织的手段:他们拨动了一个开关，切断了公众的声音。互联网代表了敌人。

然而，信息流仍然包围和入侵埃及，超出了政治权力的控制能力。

关闭网络以最糟糕的方式创造了历史。在埃及和国外，这一举动传达了现政权的危机感和恐慌。为了换取政治上的安慰，政府付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代价，疏离了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但关闭最重要的影响是让半岛电视台立即陷入沉默，在其众多议程中，它一直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以使埃及的统治集团失去合法性。这是一种复仇式的冗余。



INTERNET TRAFFIC TO AND FROM EGYPT (JANUARY 27–28)

2.6 Renesys tsunami: Egypt shuts down the web[13]

半岛电视台对埃及起义报道的主导地位和影响

可能被夸大了，但毫无疑问，这个频道向许多观察者展示了信息领域的力量。朝鲜政权当然是这么想的。它的特工从尼罗河卫星上撤下了半岛电视台的信号，并精心策划了对埃及半岛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人身恐吓。这些努力与冗余因素发生了冲突，最终无功而返。其他阿拉伯频道在其卫星上为半岛电视台提供空间，而半岛电视台的许多镜头都来自业余爱好者，他们不能被关闭或恐吓。

该频道通过流媒体向全球每个角落播放起义的故事，让起义的故事保持鲜活。在下雪的瑞士达沃斯，我参加了一个会议，我通过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用英语在笔记本电脑上目睹了开罗的街头暴力。在场的许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我猜想，半岛电视台在向世界宣传这一事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其描述为理想主义青年与邪恶的专制政府之间的斗争。它使西方公众舆论——可能包括白宫——走向了赞成结束穆巴拉克统治的转折点，尽管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摇篮不稳定的后果感到担忧。

YouTube放大了这种情绪，重新托管来自半岛电视台和其他广播公司的视频，以及手机摄像头的原始镜头，这些镜头不知怎么找到了通往网络的途径。与TV或直播不同，YouTube可以选择最具视觉戏剧性的时刻，并使其可搜索。它记录了自发性:一个挑衅的年轻人突然被安全部队枪杀，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骑着一匹奇怪的马和骆驼冲进解放广场的人群。

几乎所有YouTube视频都支持抗议者。总的来说，结果是地缘政治说服的一次出色练习，完全不协调，但因此更真实、更有效。

那些切断网络的人一定知道，他们无法阻止普通埃及人了解事件。数百个TV频道充斥着这个国家的电波。可能，他们想象他们可以重新控制图像的构图。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代人的错误。围绕着这场起义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是支持民主的弱者，是这场斗争的英雄。公众从未失去强大的声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尼姆在梦想TV上的出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打击了穆巴拉克继续掌权的希望。

我以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的故事开始这一章——伊朗博客之父霍德。事后看来，考虑到埃及的革命和“我们都是哈立德所说的”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对霍德的迫害中，伊朗当局的动机不仅仅是出于道德上的愤怒，而是出于自我保护。他们担心，给予普通人公开表达的手段，会带来实际的政治后果。像所有的暴君一样，他们懂得控制的细微之处。

在这一章的结尾，我再次观察了信息与权力之间的奇怪结合，现在以埃及戏剧中的对立人物为代表:Wael高尼姆(Wael Ghonim)，从bb0营销人员变成Facebook的煽动者，以及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从空军飞行员变成强硬的威权主义者。他们一起吹走了我们的石头剪刀布理论，以及它naïve对硬政治至高无上的信仰，并重申了信息是如何以开放、不可预测、神秘的方式与权力互动的。

30年前，当他的对手穆巴拉克首次担任总统时，高尼姆在错综复杂的埃及起义中所取得的每一步进步都是不可能的。从信息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成长于不同的国家。因此，双方都不理解对方，但高尼姆是第五次浪潮的传播者，是一个聚合者和连接者，是全球风暴中的一滴雨，而穆巴拉克在危机时刻只能摸索开关关掉灯。

你不需要接受Facebook页面可以击败坦克和子弹的观点，就能隐约感受到——就像埃及事件上的苍白阴影——人类权力关系的灾难性转变。

CHAPTER NOTES

1 图片由晨兴分析公司提供

2 .关于苏莱曼，见《埃及博主因“侮辱”入狱》，BBC, 2007年2月22日。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6385849.stm;关于杜马，请参阅“埃及活动家艾哈迈德·杜马”因侮辱穆尔西而被定罪，”BBC，2013年6月3日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22758415

3在Sánchez上，见Andrew Hamilton，“Yoani Sánchez，古巴受欢迎的博主，被殴打。描述生活，*《每日电讯报》*2009年11月28日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centralamericaandthecaribbean/cuba/6678937/Yoani-sanchez - cubas-popul-bloggers -has- be- up-for-describing-life.html;on Nguyen Hoang Vi，见 艾米丽·阿尔珀特，“数十人因镇压越南博客被捕入狱”，*洛杉矶时报*，2月12日，2013年，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3/feb/12/world la-fg- win -report-vietnam-bloggers- jail-20130212

4 图片来源:Joi，知识共享

5乔·帕金森，《土耳其动荡，社交媒体成为战场》，*《华尔街日报》*2013年6月3日，http://blogs.wsj.com/middleeast/2013/06/03/amid-turkey-unrest-social-media-becomes-abattleground/?mod=e2tw

6 Nicholas Kristof，“The Daily Me”，*《纽约时报》*，2009年3月18日，*https://www.nytimes.com/2009/03/19/opinion/19kristof.html*

7《音乐产业对纳普斯特提出初步禁令动议》，*RIAA Gold & Platinum News*，无日期，http://riaa.com/newsitem.php?news_year_filter=&resultpage=106&id=FBD85765-00D7-2B2D-1D29-74FDD0F0826B;James Nicolai，“创意团体在法庭简报中抨击纳普斯特”，PC World, 2000年9月11日，http://www.pcworld.idg.com.au/article/80045/creative_groups_slam_ napster_court_brief/

8没有已知的来源网站，通常被认定为“网络照片”。

9 Wael Ghonim,*《革命2.0:人民的力量大于掌权的人》,回忆录*(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2), 90页。

10参见Roland Schatz，“如何定义意识阈值”，媒体男高音，第六届国际议程设置会议，卢加诺，2005年10月27日，http://www.agendasetting.com/2005/speakers_ppt/Schatz.pdf。沙茨是媒体男高音国际的创始人和总裁;我是媒体男高音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关于采用创新，见Everett M. Rogers，*《创新的扩散》*，第五版(Free Press, 2003)。

11我的图表。

12梦TV在YouTube上播出的截屏，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V690GO7YzgA

13图片由Arbor Networks提供。

我的论文

3

把这本书当作一张画布。我的工作将是描绘这个随着新千年而诞生的奇怪而混乱的世界，我确信，它还将与我们同在一段时间。然而，我不是一个预言末日的幻想家，也不是一个预测未来事物形态的科学巫师。我不知道未来，我很确定他们也不知道。如果我准确地描述了现在，我就实现了我的目标。

我要说的东西很少是原创的:也许只有作文。

如果，在所有这些承认之后，你问我为什么你应该继续读下去，我会回答:因为我将要描述的世界可能与你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非常不同。问题是，信息海啸有很多表面上让人眼花缭乱的方面。当我坐在弗吉尼亚州维也纳的书房里，和黎巴嫩贝鲁特的某个人通过Skype聊天时——那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即使在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了不起。因此，很自然地，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Skype、Facebook和b谷歌等数字平台的功能上，集中在全球范围内通信和协作的扩散上，或者集中在信息量的空前增长上。我理解这种迷恋——我自己的人生旅程就是从这些担忧开始的。
但事实证明，对表面闪光的迷恋掩盖了我们对深处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在那里，人类与平台和信息互动，并被互动和积累所改变

从公司、大学到政府、宗教，变化动摇和冲击着既有机构。从深层次来看，这是一场巨大的多方冲突，其结果是好是坏，仍不确定。事实上，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而且因为我们仍然按照工业时代形成的分类来思考，比如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或者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我们的头脑对这种地下斗争的许多冲突和伤亡是视而不见的。

这就是我想要讲述的故事——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准确地描述现实。

一场世界大战，由魔鬼的排泄物演绎而成

我的论点很简单。我们被夹在一个旧世界和一个尚未诞生的新世界之间，旧世界在智力和精神上，甚至在物质上都越来越不能支持我们。鉴于变革力量的特性，我们可能会在这种笨拙的状态中停滞数十年。你们今天还年轻，可能无法活着看到它的解决。

旧政权的著名地标，如日报和政党，在这种慢动作碰撞的压力下，已经开始瓦解。我们珍视旧世界的许多特征也受到了威胁:比如自由民主和经济稳定。其中一些将因压力而永久扭曲。另一些则会消失。新制度的许多属性，比如一个更大的公众讨论空间，也可能会扭曲或脱离现有秩序的不可动摇的抵抗。

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我担心的是，我们不会以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糟糕的世界告终。

这场斗争的每一方都有一个旗手:*权威*代表着统治全球一个半世纪的旧工业体系，公众代表着努力变得清晰的不确定的分配。除了人性之外，这两位主角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而且双方可能都怀疑对方的人性。他们把自己安排在相反的组织模式中，这需要相互敌对的正确行为理想。这种冲突是如此不对称，以至于双方似乎不可能真正进行接触。但他们确实会交战，而且战场无处不在。

当局和公众之间的干扰代理人是*信息*。为了使我对现在的描述有意义，我必须说明这样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是如何在世界大战中被当作武器来使用的。

新旧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可以在命名惯例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中找到。工业时代坚持使用听起来非常严肃和正式的不祥的名字，以证实那些具有权威声音的组织:“美国银行”、“国家广播公司”、“*纽约时报*”。这三个名字都代表着一种声称垄断专业知识的专业等级制度。它们象征着一种硬领式的精通，意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即使是这些组织中级别最低的人，地位也远高于群众。

数字时代喜欢自嘲的名字，这是打破既定秩序的一种方式:“雅虎!“谷歌 ”、“Twitter”、“Reddit”、“Flickr”、“Photobucket”、“ 比特币”。虽然没有问过这些人，但我有理由相信b谷歌的创始人从未考虑过将他们的公司命名为“国家搜索引擎公司”，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也从未对“美国社会联系中心”感兴趣。这不是它的风格。

格伦·雷诺兹(Glenn Reynolds)的*Instapundit*和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的*Daily Dish这两个早期流行的政治博客的名字*，都在嘲笑新闻行业的矫饰。而在国外用英语发帖的桥式博主*则*倾向于更吸引眼球的名字:比如《*沙猴*的狂言》和《埃及的*大法老*》，*还有*我最喜欢的《委内瑞拉的*魔鬼屎*》。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客的名字往往变得不那么离谱了，但数字文化的吸引力仍然倾向于愚蠢和非正式。这些名字强调了它们的非权威性。它们有意识地在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



3.1 在权威和公众之间，名字是一个战场

试想一下，当被问及委内瑞拉危机的消息来源时，CIA的一名简报员告诉总统，他的反应是:“这是*魔鬼*的*粪便*，总统先生。”不管错过信息的代价有多大，简报员都会避免使用任何名字如此尴尬的消息来源。他的职业尊严——更不用说他的职业成功了——要求他使用禁忌。

我不想把命名风格上的冲突说得太大。这是一场小冲突，是我们内心深处斗争的表面表现。我之所以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它以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澄清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结构中隐含的不可协商的同一性主张:双方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任职者结构是等*级制度*，它代表着既定的和认可的权威——首先是政府，但也包括公司、大学，以及工业时代以来的所有机构。等级制度

自从人类达到有意义的数量就统治着世界。工业思维只是让它变得更大、更陡、更有效率。从拉美西斯(Rameses)时代到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时代，它展现出了可预测的行为模式:自上而下、集权化、在行动中痛苦地深思熟虑、沉迷于流程、痴迷于宏伟战略和五年计划、尊重等级和秩序，但蔑视局外人、业余者。

在这个现状的堡垒之上，第五次浪潮建立起了*网络*:即反抗的公众，那些被鄙视的业余*爱*好者现在通过数字设备相互连接。在人性的范围内，没有什么比等级制度更不像的了。后者是缓慢而乏味的，而网络化的行动则是闪电般迅速，但目的不稳定。在等级制度进化出坚硬的外骨骼来保持每一个部分的位置的地方，网络是松散而柔韧的——它可以膨胀成数百万个，也可以瞬间消散。

数字网络将平等主义推向了功能失调的边缘。大多数人宁愿在企业中失败，也不愿承认任何形式的等级或领导。Wael Ghonim热情地坚持做一个普通的埃及人，而不是一个政治领袖，这是数字文化的一种表现。当网络被一个单一的有力的参考点——一个问题、一个人或一个事件——连接在一起时，网络就会成功，这个参考点充当了行动的重心和组织原则。

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反对*。如果等级制度崇拜既定秩序，那么网络就会孕育出一种虚无主义。

中心无法维持，边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描述两个世界碰撞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其作为*中心与边界之间原始竞赛的一个插曲*。早在信息海啸到来之前，玛丽·道格拉斯和亚伦·威尔达夫斯基就在另一种情况下使用了这些术语，但它们特别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1]

“中心”和“边界”可以应用于包含特定结构、理想和对未来的信仰的组织。这两种原型相互之间是相对的，并且表演了一种决定社会行动方向的舞蹈。

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写道，该中心由大型等级组织主导。

> *坦率地说,它相信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它对自己严格的程序感到沾沾自喜。它太慢,对新信息太盲目。它不相信有新的危险,而且常常会措手不及。*[2]

该中心设想未来是现状的延续，并炮制出一个又一个项目来保护这一愿景。

相比之下，边境是由“教派”——我们会说“网络”——组成的，这些“教派”是平等的自愿联合。教派的存在是为了反对中心:他们坚决反对。然而，他们“无意治理”，也没有发展出“行使权力的能力”。等级意味着不平等，等级意味着对边境的阴谋。教派的目标不是将计划作为中心计划的替代方案，而是模仿“敬虔或良好的社会”所要求的行为。

> *制定计划是一种中心策略;代表自然、上帝或世界攻击中心程序是边界战略。*[3]

为了保持团结，教派需要“一种宇宙尺度上威胁邪恶的形象”:未来总是世界末日。《边境》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对人类完美性的信念与对毁灭指日可待的平静确信。

教派通过分裂来解决内部争端。他们的人数必须保持在很小的范围内。正如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所描述的那样，这可能是面对面教派与数字网络之间的一个战略区别:后者可以以光速膨胀到数百万人。

从这个方案的内部来看，最后一章的故事以一种新的视角出现。霍德、高尼姆和肖恩·范宁成为数字边界的宗派英雄，打击垄断和集权的力量。艾哈迈迪内贾德、穆巴拉克和杰克·瓦伦蒂各自代表着传统中间派的强大等级，缓慢而无情，完全愿意粉碎个人以维护制度。两个年轻的宗派主义分子，霍德和

范宁受到了不相称的惩罚。第三个人，高尼姆，在中心的地牢里呆了十一个晚上。但最终，两大等级制度——穆巴拉克政权和唱片业——被推翻了。

这种对抗遵循着一种可预见的模式。每当一个中心组织认为自己拥有一份文件、文件或信息领域时，边境的网络就会蜂拥而至并接管，留下的是这种游击式袭击造成的伤亡。就这样，音乐产业崩溃了，报纸失去了订户和广告商，政党数量萎缩了。美国政府失去了对自己机密文件的控制。图书出版商、电视和电影行业如今仍然非常赚钱，它们依赖于随时可能被破坏的技术和版权制度。

由于权力不是一份可以复制或共享的文件，政治战场更倾向于等级制度。我们看到，伊朗囚禁了霍德，并残酷镇压了2009年的抗议活动。中国人训练出了他们著名的“网络警察”。古巴和越南虐待和监禁持不同政见的博主。在此期间，甚至美国政府也被允许在假设公众是敌人的情况下运作-例如，在机场和联邦大楼。

中间派在政治领域占有优势，但不是绝对的——不是像剪刀永远在剪纸一样。网络利用它们的速度、近隐身性和对信息领域的控制，给中央造成痛苦和混乱。在9/11事件中，一个由暴力分子组成的小网络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而政府却袖手旁观，盲目而无助。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在网上网络的推动下，筹集了资金，志愿者和有效的反中心信息，粉碎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机构。我们也看到了高尼姆(Wael Ghonim)在Facebook上发出的革命邀请是如何通过一个复杂而非线性的迷宫导致穆巴拉克被推翻的。

然而在下一阶段，宗派的进步被逆转了。我的怀疑是，如果宗派——反叛的公众——真的对执政没有兴趣，也没有行使权力的能力，那么它们*必须*被逆转。以基地组织为例:它没能实现“9·11”事件的目标，即恐吓美国，迫使其离开中东。奥巴马总统的命运更加模棱两可，我想推迟一点考虑他在这场斗争中的独特地位

在中心和边界之间。目前只能说，总统在2010年选举后失去了执政联盟。在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的世俗抗议者几乎立即被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和埃及军方的等级制势力横扫。

而这正是这场冲突更深层次的格局。该中心的项目已经失败了，而且已经被*视为*失败，超出了援引保密或宣传的可能性。让评级和监督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灾难性表现，以及情报机构在伊拉克的灾难性表现，成为中心失败的更多例子。与此同时，公众在小众利益上的分裂，释放了大量的网络，反对每一个神圣的权威领域。失败被批评、被嘲笑、被放大。

结果是因不信任而瘫痪。已经很清楚的是，边界可以中和中心，但不能取代中心。网络可以抗议和推翻，但永远无法统治。官僚惰性面对的是数字虚无主义。二者之和为零。

我想描绘的世界并不是僵局。竞争的力量太不一样，太不对称，无法达到任何平衡。我的论文描述了一个被困在社会政治战区的世界，在这里，每一种生活原则、每一种制度，我想说的是，每一件*事*——选择什么在时间上是有意义的——都被争夺过，并在交火中被烧焦。期待一方最终获胜是很自然的，但我也有自己的怀疑。我无法想象在目前的条件下，华兹华斯1789年的幸福黎明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像1848年那样被迫向现状前进。中心不可能把工业时代带回来。网络无法产生另一种选择。

历史上与我们这个时代最相似的可能是17世纪的宗教战争。我这么说，并不一*定*是因为那个时期的混乱和流血，而是因为每一个原则都受到了质疑。如果把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人搬到现在，他的第一个问题会是:“谁赢了——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双方都忍了。双方都没有获胜。一些不同的东西进化了。我猜想，等级和网络之争也会发生大致相同的情况。

* * *

在这种冲突中，我作为分析人士关心的是关注正确的主体

正确的描述层次。我接受的训练，就像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人一样，是按照旧的分类来思考问题:比如，认为美国政治的方向取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平衡。然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两党都是中间派的组织。两党都在既定秩序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同样的一小部分问题上为公众提供了观点上的微小差异。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交替不太可能给美国的政治轨迹带来惊喜。

寻找*不连续性的分析家*——*寻找*激进变革的可能性——必须把他的思想从旧的分类中解放出来，转向等级和网络的地下冲突:在政党中，一方是“网络根”活动家和各种茶党网络，另一方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组织。在那里，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可以发现潜在的矛盾。

作为一个公民，我最关心的是自由民主的未来。

民主作为一种*理想*，可以从每一次实施它的尝试中抽象出来——事实上，民主经常被用来谴责那些不够完美的民主制度。然而，代议制民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演变，是一项程序性的业务，必然与当时的统治结构相结合。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代议制民主的程序反映了对中央集权的不信任，以及对财富和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独立的信念。到了工业时代，程序变得高度集中、自上而下、受规则约束，面向大众而非个人。

民主变成了等级化的、组织化的、中心的一种制度，与其说是一个悖论或阴谋论，不如说是一个历史偶然。其后果是毋庸置疑的。代议制民主的许多方面已经变得不那么民主了，而且被公众如此感知。公民从投票站和政党成员中叛逃，证明了人们对既定结构的不满情绪。许多人转而从宗派角度谴责整个体制是不敬虔和不公正的。今天，更加自信的政治网络宣称我们目前的程序是大政府的暴政，或者是大企业操纵的闹剧。

在新旧世界的碰撞中，民主并没有免受伤害。它也像日报一样，是一个战场。它可能会幸存下来，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而且几乎肯定会发生变化。它*如何*改变可能取决于每个公民的集体决定——换句话说，取决于我们——不仅仅取决于程序改革。这是我论文的一部分，也是我将脱离对世界的纯粹描述，来思考应该做些什么的地方。

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网络怀疑论者，网络悲观主义者，以及他们所有的声音和愤怒都没有什么意义

在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之前，我们发现由权威精英管理的等级制度。一直以来，社会金字塔的底部都存在，或多或少处于惰性状态。这个初生的疙瘩是如何变成大众的，这是后面一章的故事。然而，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公众要想存在，就必须实现*自我意识——需要一些*愤怒或不满，才能将其与精英阶层区分开来。为了让公众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从而潜在地将自己转变为政治行动者，需要*一种沟通手段*。只有在印刷术普及之后，这才成为可能。

我的论文认为，一场传播性质和内容的革命——第五次信息浪潮——结束了工业时代精英对公众自上而下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展示扰乱的代理人信息是如何影响权力安排的。信息必须被视为具有现实生活中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必须足够有意义，足以解释权威危机。

一个世纪以来，对媒体和信息影响的研究得出了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分析师面临的问题又是一个复杂性和非线性问题。直观地说，建立信息的效应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举个例子，我看到一辆卡车正向我驶来:那就是信息。我闪开:这是由信息引起的行为。或者我看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电视新闻:那是信息。我形成赞成或反对的观点，并据此进行政治鼓动:这是媒体信息引起的行为。

然而，现代国家的政治是超越眼前的

公众的感知。因此，政治信息是中介的，而不是直接的——几乎总是类似于伊拉克战争的例子，而不是我亲眼看到的卡车。这在个人、调解者和信息之间的互动中设置了大量的变量。

作为公众的一员，我是否接受*所有*调解员的信息，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观点最初是由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思想家提出的，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给他们的智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普曼认为，通过使用有说服力的刻板印象和其他技巧，那些控制信息的人——当权者、精英——也控制了“我们脑海中的画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宣传将新的观点和行动直接注入易受骗的公众的大脑中。[4]

还是我*不接受调解人的任何*信息，因为我的道德和政治信仰是由教堂和家庭等“强大”的社会纽带形成的，而不是像阅读报纸这样的“薄弱”联系?这一点也有人提出过，最近由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提出，用以贬低社交媒体“革命”的可能性。或者，我可能不会受到中介信息的伤害，因为我被偏见的盔甲包裹着，舒适地生活在信息泡沫中，或者日常的我。

或者，我是否参与了一个“两步”的过程，首先吸收一个强大的个人关系的意见，比如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或牧师，然后才接受某些中介信息?这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提出了，并被发现适用于Twitter用户“关注”信息的方式。[5]

或者是调解人没有能力控制我的想法和行为，但可以指挥我注意我*想到的那些公共问题和事件*?这是议程设置研究的前提，它在市场上的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罗兰·沙茨(Roland Schatz)就将公众的救灾捐款与某一事件所获得的媒体关注程度联系起来。[6]

所有的信息效应发现和理论都是暗示性的。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确凿的。在*信息人*的故事中，这

在完成这一章的时候，我的目标是立即弄清楚那辆卡车向我压过来的影响。在这里，我建议跳过一个层次，停下来看一眼关于新媒体影响的断断续续的争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好是坏，还是无所谓。

* * *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21世纪初社交媒体的全球扩散，引发了同等程度的掌声和警告，同时也留下了一丝怀疑。一些作家在数字媒体中看到了对人类合作和民主的推动。批评者称这个部落为网络乌托邦。其他人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弊病——例如，我们文化的腐败，或者邀请政府监视他们的公民。这些都是网络悲观主义者。第三个，人数少得多的群体怀疑是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变化:称他们为*网络怀疑论者*。

这场争论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让最后的先来吧。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恰如其分地将20世纪60年代民权活动人士之间牢固的个人联系与拯救达尔富尔联盟(Save Darfur Coalition)等网络活动参与者之间的薄弱联系进行了比较。格拉德威尔认为，只有牢固的关系，才有可能使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静坐抗议者进行非正式的协调。只有由牢固的关系所诱导的相互支持，才能使一个群体勇敢地面对“高风险”局面，实现政治变革。至于“Facebook战士”，格拉德威尔承认，他们可能会完成一些小的合作壮举——例如，为骨髓移植找到捐赠者。但真正的政治发生在同志之间，也发生在肉体上。[7]

克莱·舍基(Clay Shirky)指出，一个与他人有密切个人联系的坚定的活动家*也*可以通过成为Facebook战士来扩大他的影响力。这其中不存在矛盾。但我想超越这个论点。格拉德威尔的论点只是被事件证伪了。埃及最初的抗议活动是普通人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有的话，也是通过数字方式联系起来的。b谷歌的营销人员瓦埃尔·高尼姆(Wael Ghonim)在迪拜用假名管理他的Facebook页面。将他召集起来采取行动的抗议者团结在一起的牢固纽带是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厌恶。

格拉德威尔是中心思想的思想家，是工业时代的思想家。这并不能证明或反驳他的观点——但它把这些观点置于一定的背景中。他明确地将强联系与等级联系联系起来，弱联系与网络联系起来，他无法想象其中一个可能会被另一个推翻:“如果你要与一个强大而有组织的机构进行较量，你必须是一个等级组织。”对格拉德威尔来说，政治变革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工作，需要用新的制度、新的计划和意识形态来取代旧的制度。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公式是如何与第五次浪潮的宗派逻辑相矛盾的。主张变革，现在就意味着反体制、反纲领、反意识形态。

格拉德威尔至少把他的怀疑建立在一个传统的权力概念上:硬胜过软，剪刀总是能剪破纸。我觉得更难以理解网络悲观主义者的警告。他们在屋顶上大声疾呼，独裁政权利用数字工具监视持不同政见者，操纵公众舆论。这当然是真的。我们在伊朗看到了一个例子，该政权将不受欢迎的博主投入监狱，同时让自己的傀儡充斥博客圈。在网络间谍和操纵方面，中国人应该更聪明。

作为分析，悲观主义者的劝告徘徊在毫无意义和微不足道的真实之间。当然，独裁政权希望监视持不同政见者，就像持不同政见者试图避免被发现一样——由于数字藏身地的激增，这一游戏对当权者来说变得更加困难。当然，独裁政权希望操纵各种媒体来影响舆论。然而，在工业时代，他们这样做是大胆而正式的，来自权威，而在新的制度下，专制者必须试图*冒充*公众，才能有影响公众的希望。他们不再通过*《人民*日报》上的横幅标题或电视上的*最高领导人演讲向群众的大脑中注入口号*，而是被迫骑上真实舆论的老虎，如果舆论转而反对他们，他们将面临后果。

悲观主义往往是幻想破灭的理想主义者和虚伪的世故者的领地。当涉及到网络悲观主义最响亮的声音时，情况似乎非常如此。我注意到了他们的警告。让我们继续吧。

网络怀疑论者和网络悲观主义者最喜欢的对象是克莱·舍基，他在2008年出版的《人人来了》一书被格拉德威尔称为“社交媒体运动的圣经”——也就是网络乌托邦人群的圣经。

舍基走在街道向阳的一面，但他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更喜欢乐观的轶事，这激怒了脾气乖戾的人，但在这本令人反感的书中，他把社交媒体的*分享——比如Flickr上的照片*——和维基百科模式上的*合作*归功于社交媒体，同时承认，由数字工具激发的集体行动的例子“仍然相对罕见”。2008年的情况确实如此。[8]

他传达的信息是，新的数字平台使群体“自我集结”变得容易，而这种自发群体的兴起迟早必然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变革。与格拉德威尔非常不同的是，舍基预见到了2011年事件的可能性，以及与信息领域相连的网络化公众在革命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就在突尼斯起义爆发之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 *事实上,认为社交媒体可以帮助带来政治变革的最佳现实理由是,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都认为自己可以。在世界各地,活动人士都相信这些工具的效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使用它们。而与他们对抗的政府也认为社交媒体工具很强大,并愿意骚扰、逮捕、流放或杀害用户作为回应。*[9]

今天，我们知道这首政治小步舞曲中的双方都是正确的。数字媒体可以被自我组装的网络所利用，用来集结力量，宣传自己的事业，对抗掌握权力杠杆的人的抵抗。

但这低估了新旧之间的距离。一个翻腾的、高度冗余的信息领域已经在普通人身边形成，而现代政府却无法触及。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深层构造中，权力的平衡已经在权威与服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英与公众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每一方都可以对另一方造成损害，但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优势。这就是本书的非乌托邦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通过对克莱·舍基(Clay Shirky)首先提出的新媒体的性质和后果的分析线索而得出的。

HOMO INFORMATICUS, OR HOW CHOICE CAN BRING DOWN

政府

信息是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这是我论文的核心问题。答案并不是凭直觉得出的。信息是柔软而抽象的。权力就像警察的子弹一样坚硬而真实。然而，正如舍基对新媒体所观察到的那样，权力的掌权者总是与信息保持着密切而警惕的关系。政府一直在努力控制关于现状的报道——也就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报道。

在那些已经控制枪支的人身上，这种控制信息的焦虑应该提醒我们，政治权力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坚硬”，而且更加无形。

在我们看来，权力是精英的意志与公众的行动和意见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结盟:一种信任、信仰和恐惧的问题，虽然分配方式不同，但双方都参与其中。蛮力发挥了作用，但正如残暴的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倒台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仅仅依靠杀死对手而长久存在。一定有相当一部分公众认为现状是可以接受的，真正相信现状的人越多，一个政权的基础就越牢固。因此，信息对政治权力的潜在影响更多地来自于它与*合法性故事*的契合，而不是来自调查性报道或实用知识的传授。

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集中在一种不安分的、破坏性的有机体的崛起上，我大胆地将其命名为信息人属(*Homo informaticus*)，即信息人。你和我，可能还有今天的大多数人类，都是他:一个进化过程的最终产物，这个过程涉及到教育的普及、财富和安全水平的提高，以及通信手段的改进。我们的特征只能用祖先的环境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干涸的信息景观。这就是进化的逻辑。所以在我介绍*信息人*之前，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下他不幸的前辈，我将用通俗的英语称他为，无中介人。

顾名思义，无中介人缺乏接触任何媒体的途径。他很可能是文盲，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兴趣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他唯一的信息渠道就是身边的人。虽然他可能听起来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说，无中介人描述了典型的

1980年的埃及人，代表了大多数人与信息的关系，从我们这个物种的黎明到最近。

在事物的本质上，无中介人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生存和死亡的: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拥有强大但不是绝对的权力来控制信息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面临的问题是沟通问题，而不是控制问题。为了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无中介人，它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在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故事的背景下，向他传达细节。



3.2问题:一个政权面对一个未经调解的人[10]

当然，在现实中，*所有的信息都*是经过中介的。问题是，中介是直接、面对面地进行，还是通过印刷品和电子来源间接进行。无中介人依赖于他的社区获取信息:大家庭、朋友、邻居、当地宗教和政治当局、老板、下属、同事、屠夫、理发师、“街道”。这种信息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几乎没有什么是新的。兴趣范围很窄，信息源也很少。无中介人每天早上醒来，期待着一个与一天完全不同的世界

之前。

因此，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要与无中介人进行有利于其合法性的交流和互动，它只需要控制社区——当然，它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政权任命地方当局，包括政治首领、警察、军队、税务和土地评估员、营业执照颁发者、卫生检查员、人口普查员、教师等。每个接触过《无中介人》的人都知道他对该政权合法性的描述，而那些做得不够出色的人则被驱逐并噤声。

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无中介人没有办法想象出另一个故事来证明他目前的生活方式是合理的。他可能会抗议，甚至是暴力地抗议当地的条件，但他永远不会试图推翻政治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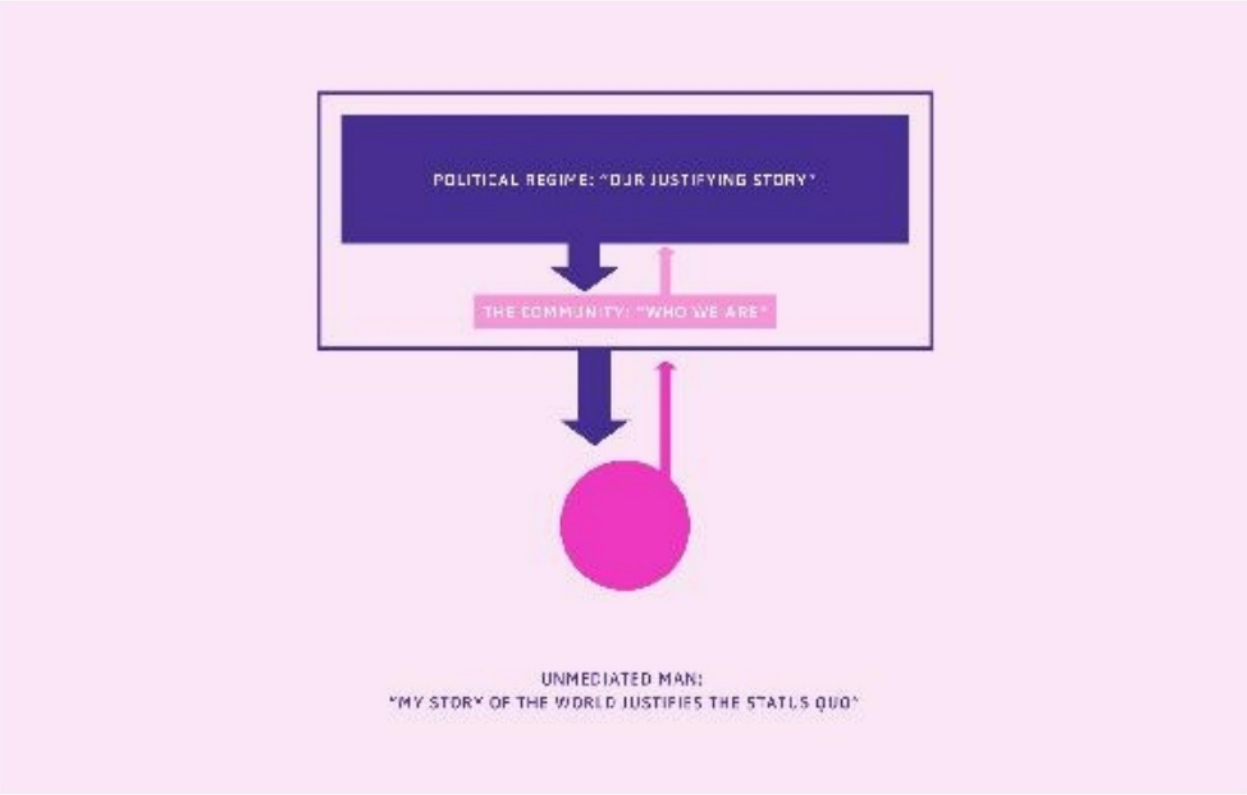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约束下，来自下层的反馈极其有限。“无中介人”的个人恐惧和沮丧可能没有传到政府的耳朵里。这意味着政府可以(事实上也必须)表现得好像公众不存在。出于政治目的，公众变成了政府让他们成为的任何样子。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新进化的英雄登场了。*信息*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公众群体:他有文化，可以接触报纸、广播、电影和TV。他接触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超越了眼前的社区。

他的到来给这个政权带来了新的威胁: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公众可能会获得颠覆其合法性故事的信息。在该政权最可怕的噩梦中，公众实际上设想了另一种政府形式，并采取行动实现它。

为了掩盖这种威胁，该政权必须部署一个昂贵而精心设计的国家媒体机构。它积极拥有或至少控制大众传播手段:报纸、广播、TV、书籍、电影等。国家媒体的内容和谐地播放着该政权正当性故事的主题和变体。

该政权的理想是在受控制的媒体中重建类似于当地社区的声音，通过这些声音来处理无中介人。在许多方面，大众媒体的结构很好地适应了政权的控制方案:它是自上而下的、一对多的、垄断的，它需要一种无差别的、被动的大众受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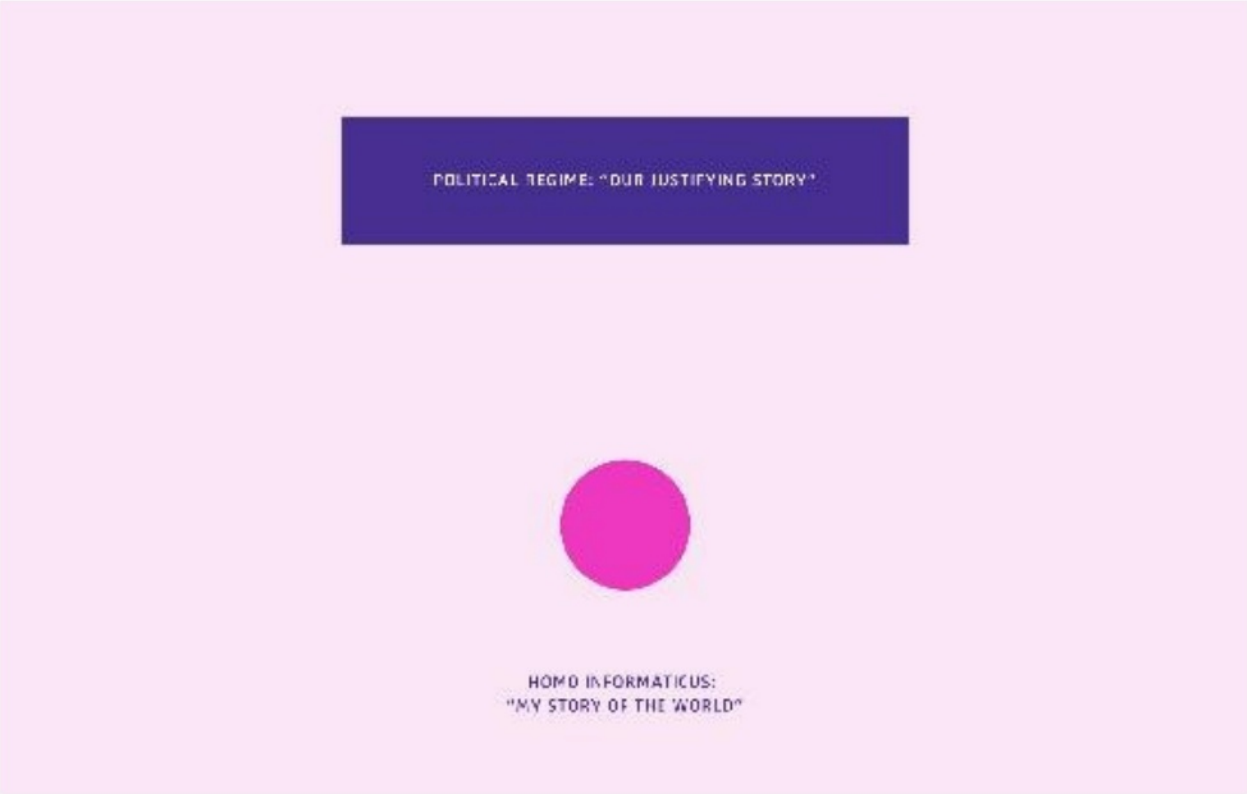


3.3控制了社区，你就控制了无中介人的信息视界

然而，纯粹的体积使得小世界的重建变得不可能。即使在最受控制的媒体中，信息的数量也远远大于无中介人的村庄所能获得的信息。太多的内容是新鲜而令人不安的，太多的内容涵盖了遥远而陌生的情况。随着信息和图像的激增，人们越来越难以确切地确定它们与该政权辩解的故事之间的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介被使用，不和谐被引入信息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公众对世界的感知与该政权的合法性故事之间那种简单而完美的契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些条件下，对政权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公众接受世界也是如此

复杂得难以理解，但又太危险，不能放任不管，必须交给那些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来处理。通过调解接受现状的例子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今天的朝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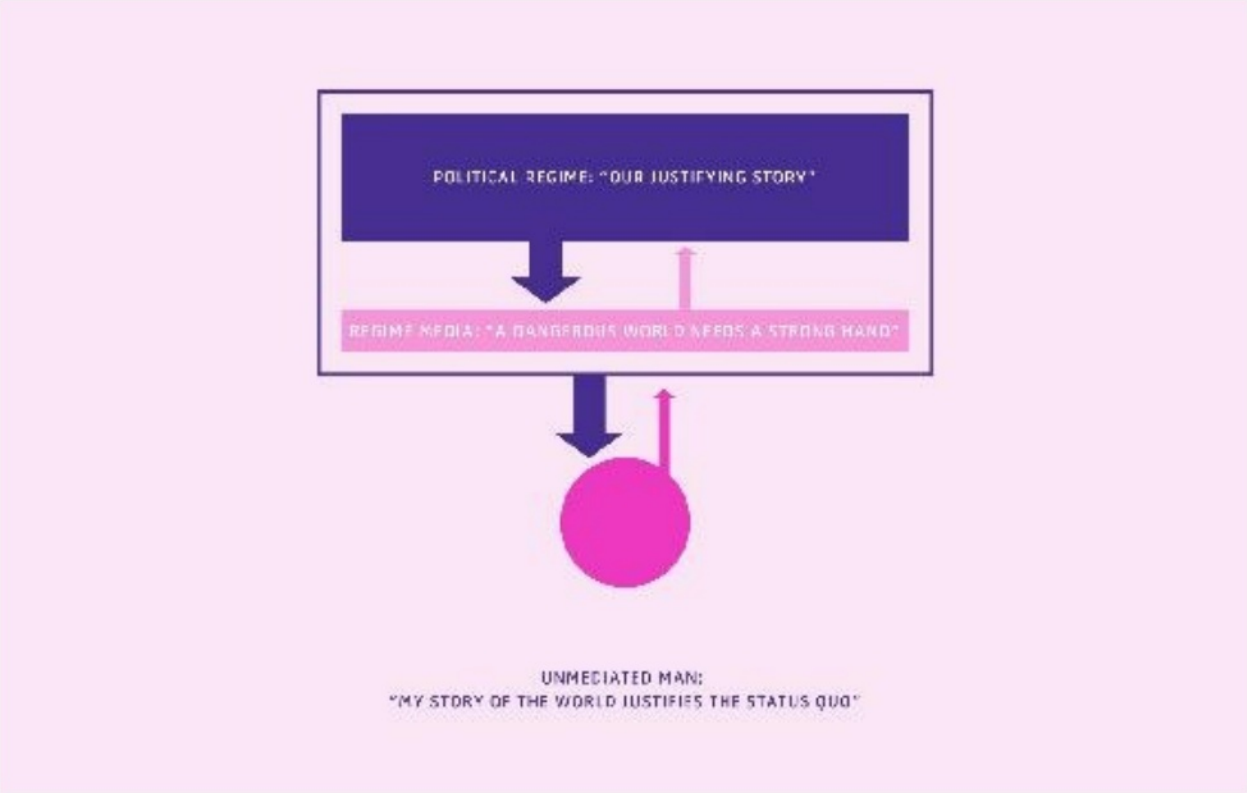
3.4新问题:政权*面临信息人*

从其结构和构成来看，国家大众传媒所允许的反馈路径比“无中介人”(unintermediaticus Man)的地方社群更为狭窄。中介人的存在增加了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距离。

随着独立信息渠道的引入，*H. informaticus*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一个这样的频道——比如一家私人拥有的报纸，或者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卫星电视台——就能极大地改变公众对世界的感知。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回到信息效应这个棘手的话题上来。回想一下，信息要么是直接感知的，要么是由他人中介的。再回想一下，复杂性造就了中介信息的积极效应

无法确定。我不能说“我们都是哈立德说”的Facebook页面引起了埃及的革命。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证明这样一个命题。



3.5国家媒体是实现有限控制的昂贵方式

但就*负面*影响而言，我们站在坚实的分析基础上。如果公众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都表明，政治制度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样，永远是固定不变的，那么革命就变成了一种荒谬。如果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使我相信除了现状之外没有其他选择，那么我可能会绝望，甚至诉诸暴力，但我不能寻求我不知道的东西——政治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就像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站在街上，迎面驶来一辆卡车。负面影响引导人类的信仰，并以这种方式塑造人类的行为。它们是直观而强大的。

因此，这一单一的独立信息渠道具有彻底改变的潜力。它拓宽了*信息人*的视野，使其涵盖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最重要的是，它粉碎了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可避免和注定的错觉，这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革命最终是否会发生，当然要看一个

许多因素，其中许多与信息关系不大。从负面影响到正面影响的转变必然以非线性结束，但我们可以自信地说，除非向公众展示一个不同秩序的世界:一种选择，否则它不会被触发。

信息可以通过揭示一些迄今为止不知道或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影响行动。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示范效应*。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是一种新型改良洗碗机洗涤剂的电视广告。一个政治上的例子是，突尼斯本阿里倒台后，埃及反对派经历了希望的冲击。阿拉伯独裁者总是死在权力和床上。他们的统治似乎是不可改变的，直到第一个独裁者垮台。在本阿里逃跑后不久，Wael高尼姆在他的网站上写道，我们可以从他的话中感受到新的可能性带来的兴奋:

> *在突尼斯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的立场改变了。现在,埃及发生真正政治变革的希望要高得多。我们所需要的是大量准备为之奋斗的人。我们的声音不仅要响亮,而且要震耳欲聋。*[11]

事实上，埃及没有任何改变。高尼姆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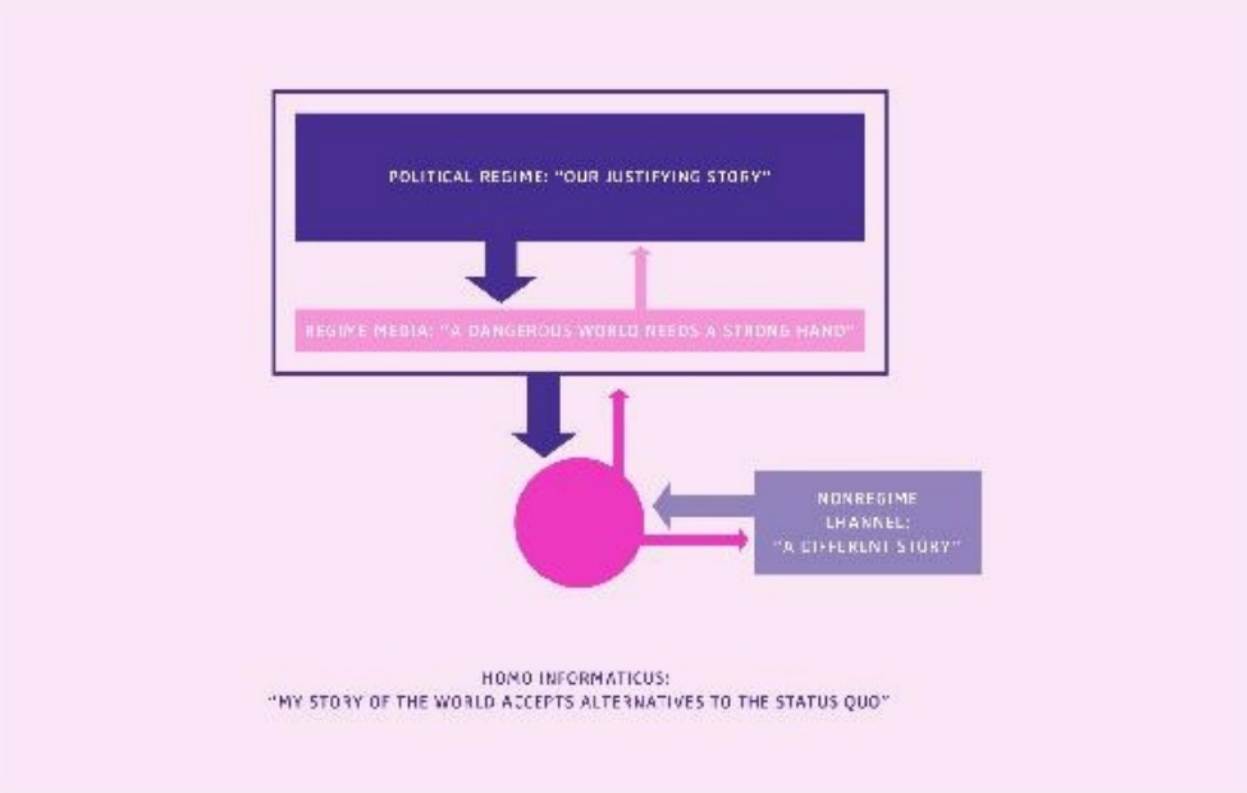
大量的信息颠覆了任何叙述:替代方案被展示出来。国家控制的媒体产生了太多的信息，太多的新信息，但当它有效时，它使*信息人*相信，除了目前的状况，没有其他安全的选择。

必要时，一个独立的渠道将以同样合理的解释，传递与政权的正当故事相矛盾的示范效应。

当判断他的政府时，*H. informaticus*可以根据不同的可能性来判断——对同一政策或事件的不同看法，对某一行动或不作为所援引的不同价值观，其他政府的不同表现，真实的或想象的。走向怀疑主义的第一步是*怀疑*，而*H. informaticus*，暴露在一个独立的渠道中，在构建他的世界故事时必须面对选择和怀疑。

随着这个进化寓言接近当下，内容也随之激增。

我们的英雄可以接触到一个巨大的全球信息领域，在每个主题上都充斥着争议、观点和对立的主张。它的数量和种类在许多层面上都超过了受控制的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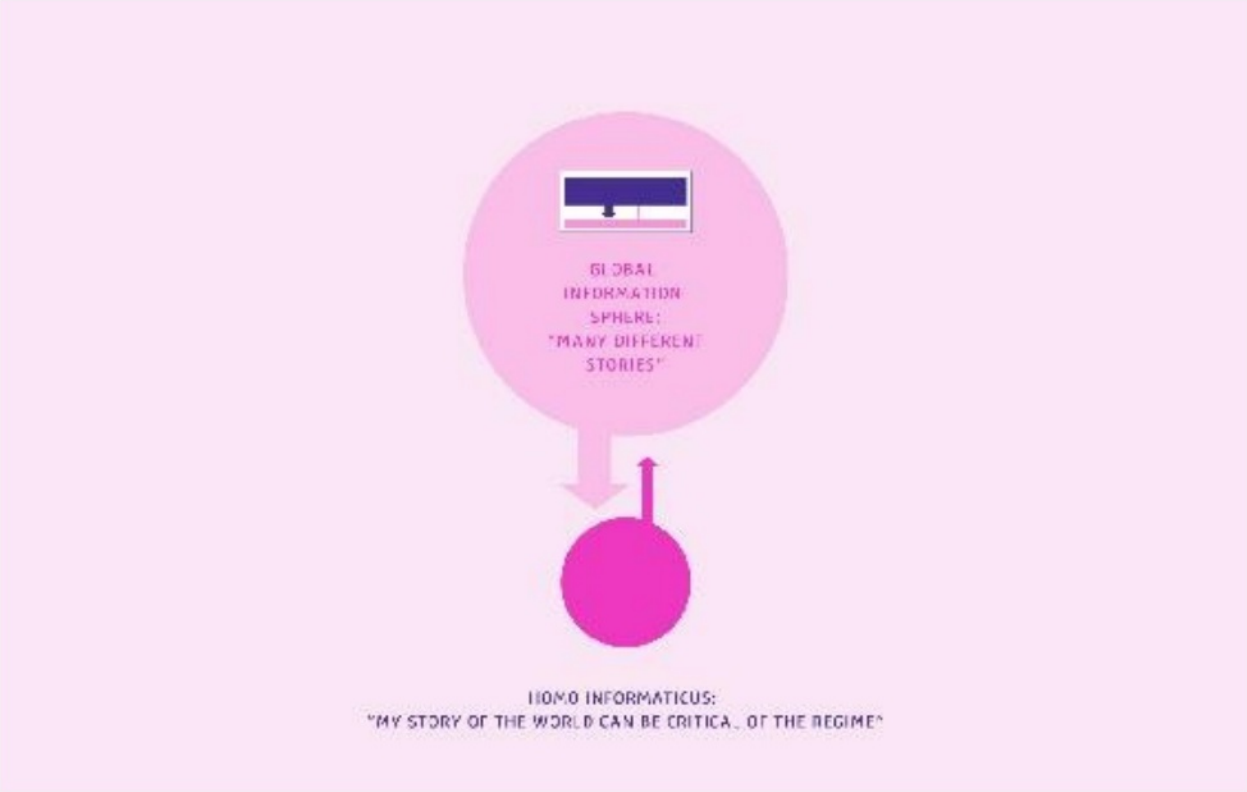
3.6独立频道:心理革命

如果*信息*树试图吸收这些物质，它的头就会爆炸。这不是会发生的事。他会挑挑拣拣。其他公众也会这么做。正是通过这种选择性，这种选择信息渠道的自由，公众打破了由大众媒体创造的、在威权统治下由政权控制的调解人阶级的权力。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调解人的垮台，意味着这个政权靠说服来统治的能力的终结。

各国政府都难以把握信息力量平衡的突然逆转。该政权以等级制度和认证为荣，但却被剥夺了反馈渠道，对许多全球内容几乎视而不见。它表现得好像除了外来的理想——色情、无宗教信仰、美国化——试图引诱公众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盲目的政权未能调整其合法性的故事，使其在一个拥挤、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显得合理。



3.7不堪重负:令人难以置信的萎缩的国家媒体

以体积为基础的准确表征会显示，与全球信息领域相比，国家媒体是微观的、看不见的。这就是*H. informaticus*对变化了的环境的体验:像亚马逊洪水一样，充斥着不敬的、充满争议的、反权威的内容，包括对政权的直接批评。

其后果是可预见的，也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政权积累了很多痛点:警察暴行、经济管理不善、外交政策失败、对灾难的拙劣反应。这些问题再也无法被掩盖或解释。相反，它们被新获得权力的公众抓住，并被置于公开讨论的中心位置。从本质上讲，政府的失败现在设定了议程。



3.8调解人的失败:当公众反驳时

随着政权的合法性故事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信息人*调整了他对世界的故事，与政权的故事相对立。他加入了同样心怀不满的公众的行列，这些人对现状充满敌意，渴望与权威挑拨离间，并寻求传播自己观点的手段，扭转局面，打击统治者。

传播的手段当然是由信息领域提供的。广播的单位可以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一个Hoder，一个Wael Ghonim，任何公众成员，*包括信息人*。其覆盖范围可达数十亿，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这个阶段，聚集在网络感兴趣社区周围的公众，已经有效地控制了传播手段。重要的社区围绕着人们喜爱的主题和渠道展开，这些主题和渠道总体上揭示了公众的真实品味，而不是大众媒体、企业或政府希望公众感兴趣的东西。

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有活力的社区往往会联合起来

当政治反对派遭遇政权的监视和控制时。

政权仍然控制着镇压机器。它可以拒绝服务、身体攻击、监禁，甚至杀死*H. informatius*——*但*它无法压制他的信息，因为这种信息不断被反对派社区放大和传播。由于反对派掌控着通讯手段，并扎根于全球信息领域，因此其声音的传播超出了任何国家政府所能触及的范围。

这是2011年1月25日起义前埃及的情况。这是今天中国的情况。现代国家的财富和蛮力被公众巨大的沟通力量所抵消。网络访问被过滤，警察监视可疑网站，外国新闻广播员被封锁，国内博客作者被骚扰并被投入监狱——但每一个撕裂政权合法性的事件都被反叛的公众抓住，然后被广播和放大，直到批评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这种拉锯战让等级对抗网络，权力对抗说服，政府对抗被统治者:在这种异化的条件下，每一寸政治空间都受到争夺，动荡成为政治生活的永久特征。

在我刚才描述的进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客观条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政权的恶性很重要。抗议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要比反对利比亚的卡扎菲或叙利亚的阿萨德——或者就此而言，反对朝鲜的金氏王朝——安全得多。

但是，*信息人*的崛起将政府置于危险的边缘，任何错误、任何不幸的事件，都可能把网络化的公众拉上街头，要求血战。这就是当今威权政府和自由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处境。我试图描述的世界危机涉及对政府失去信任，这是显而易见的。合法性故事的大规模灭绝没有给错误留下任何余地，也没有留下任何剩余的公共善意。任何星星之火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炸毁任何政治制度。

我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像信息这样抽象的东西如何影响像政治权力这样真实的东西。让我以

提出一个答案，以三个主张或假设的形式。

1. *信息影响政治,因为它无法被政府辩解的故事所消化。*

2. *信息向公众的扩散越大,任何政治现状就越显得不合法。*

3. *信息人,信息领域的网络化建设者和拥有者,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政府的合法性都提出了存在性的挑战。*

我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探讨其含义。

章节注释

1 Mary Douglas and Aaron 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 Ibid., Kindle location 1172.

3 Ibid., Kindle location 1591.

4 Walter Lippman, *Public Opin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Macmillan, 1922).

5 The two-step flow of influence theory was introduced by Paul Lazarsfeld and others based on a study of the 194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or its application to Twitter, see Shaomei Wu, Winter A. Mason, Jake M. Hofman, and Duncan J. Watts, "Who Says What To Whom on Twitt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in 2011, http://www.wwwconference.org/proceedings/www2011/proceedings/p705.pdf

6 Roland Schatz, "Rebuilding Reputation Won't Work Without the Full Picture," slides presented at the 11th International Agenda-Setting Conference, 2010, http://issuu. com/mediatenor_international/docs/rebuilding_reputation

7 Malcol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on'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7, 2010.

8 Clay Shirky,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Penguin Books, 2008).

9 Clay Shirky,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1.

10 All the *Homo informaticus* charts are mine.

11 Ghonim, *Revolution 2.0*, 137.

什么公众不是

4

我借用了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公众的定义，因为我发现它诚实而朴实:“在我看来，公众不是一个固定的个体群体。公众只是对一件事感兴趣的人，他们只能通过支持或反对演员来影响这件事。”这些话背后的哲学假设是李普曼的典型特征，他对专家和精英——他提到的“演员”——有着近乎神秘的信仰。但坦率而天真地说，这个定义恰好符合地下冲突的事实，而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没有一个单一的公众主体。公众有很多，每一个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和环境中。公众也不是被组织成社会生活的永久固定物。如果对一件使公众产生的事情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那么公众本身就会像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希望一样枯萎。

分析者的困难在于，他必须描绘出这种异质野兽的特征。在我的故事里，公众是主角。在它的多种表现形式中，它

它表现出了*共同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是由今天普遍存在的条件——第五次信息浪潮——造成的。仅举一个例子，我注意到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在另一种背景下描述的与边境教派对权威的厌恶有着显著的密切关系。只有那些被陈旧的分类蒙蔽了双眼的人才看不到，曾经与“观众”同义的公众不再沉默，不再被动——它已经跃上舞台，成为世界历史剧的主角。

然而，我在公众肖像中可能描绘的任何特征都可能被某些例子所证伪，我可能做出的任何简化或个性化主题的尝试都将导致讽刺和错误。

在我看来，最有前途的方法是遵循塔勒布(N. N. Taleb)分析复杂问题的“减法知识”方法。我不是断言公众是什么，而是解释公众*不是什么*。这类似于雕刻家在石头上凿凿直至出现相似物的方法，或者债券交易员通过减去风险来确定安全投资的公式。由于公众是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实体——一个复杂的系统——这种描述其行为特征的消极模式最不可能陷入人格化的谬论，即发明一些具有单一意识和意志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新“阶级”。

塔勒布的方法也很有帮助，因为“公众”这个词已经被用来代表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在层层混乱和特殊的恳求下变得模糊不清。所以最后一个比喻:我的任务类似于考古学家，他们拂去外来物质，直到物体恢复其原始同一性。

公众不是人民，但他们喜欢假装自己是人民

2013年6月29日，在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倒台一年零四个月、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通过自由选举当选埃及新总统整整一年之后，大批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政府。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成员，他对政府的狭隘党派态度疏远了许多人。抗议者由世俗团体领导，这些团体在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不久就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了。

但这里重要的是，在一个绝望的时刻，当伟大的理想与政治必要性发生碰撞，利益各方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双方都代表了什么。

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了穆尔西，组建了临时政府，并开始清洗穆斯林兄弟会。军方一直对穆兄会感到恐惧和厌恶，但这并不是他们干预的理由。他们声称要遵守人民的意愿。“武装部队……已经得到了埃及人民的帮助，”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哈利勒·塞西(Abdul Fatah Khalil al-Sisi)在叛乱发生后的最初声明中肯定道。尽管穆尔西当选总统，但塞西坚称，他未能“满足人民的要求”。[2]

临时政府的新总理穆罕默德·巴拉迪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 *在民主国家,当你有2000万人上街游行,你就辞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像你们那样的罢免或弹劾程序。这是一场反对穆尔西继续执政的民众起义……6月30日,人们走上街头,直到穆尔西下台,他们才做好回家的心理准备。*

巴拉迪坚持认为，军方将穆尔西赶下台“与穆巴拉克时期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3]

这些说法直接诉诸于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则:人民拥有主权。只有他们拥有合法性的授权魔力。各级政治权力必须来自全体人民，高于任何机构、派别或个人的要求。因此，人民有权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组织或重组政府。

塞西和巴拉迪用一种至少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古老的修辞手法，将抗议的公众等同于埃及人民。公众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埃及的合法统治者，而穆尔西由于未能满足公众的要求，已经陷入了暴政。

这个论点的一个问题是埃及人的支离破碎的状况

公众。许多人“对除掉穆尔西这件事感兴趣”，但也有许多人站在总统和他的伊斯兰盟友一边。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公众?按照李普曼的定义，两者都是。哪一个可以被认定为埃及人?我将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首先让我们提醒自己，穆尔西与穆巴拉克不同，是由51%的选民投票当选的，这是一个明显的多数。超过1300万埃及人投票支持穆尔西:*他们*不是在为人民说话吗?反对派的声音在这一点上非常关注，他们提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2000万抗议者走上街头，2200万签名请愿穆尔西下台，总比总统的票数要大得多。

但民主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人数，公众的政治权威可以独立于埃及7月事件是革命还是政变的问题来确定。

公众不是、也永远不可能与人民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由于在任何给定的问题上，公众都是由那些自我选择的对该问题感兴趣的人组成的，所以他们不拥有任何合法的权威，也缺乏一种结构来执行任何可能落到他们手中的权威。公众没有行政机关，没有法律，没有监狱。它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用语言和行动——用自己的血肉。这就是发生在埃及的事情。舆论的怒吼促成了政治变革，但迫使穆巴拉克和穆尔西下台的是埃及军方，而不是公众。

公众永远不可能是人民，因为人民是政治哲学的抽象。严格来说，人民是不存在的。像洛克和杰斐逊这样肯定人民主权的思想家，专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行动自由，不受国家的压迫。宪法序言中著名的“我们，人民”是制宪者对州政府终极权威的否定。人民自己永远缺席了。

因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公众*不是*主权。它的权威总是建立在说服而非法律的基础上。代议制民主国家制定了选举和陪审团审判等程序，在这些程序中，按照惯例，公众可以说是人民的化身。但它恰恰是超出民主渠道的公众活动的溢出

程序——有时，就像在埃及那样，在反抗程序的过程中——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不可估量的东西。

在老一辈，公众与人民之间缺乏契合，导致人们对民主的未来深感悲观。李普曼在绝望中得出了他的定义。这幅作品被命名为《*幻影公众*》——之所以叫“幻影”，是因为它是“一种抽象”，“不是一个固定的个体体”。简而言之，它不是人民。1927年，在《*幻影公众*》出版两年后，约翰·杜威出版了《*公众及其问题*》——*这些问题*是因为，在“机器时代”，公众变得“迷失”、“困惑”、“找不到自我”。公众就像一个闹鬼的幽灵，在民主的大厦里出没。[4]



4.1 沃尔特·李普曼

李普曼的悲观主义建立在两个精明的观察和一个可疑的假设之上。他很有先见之明地观察到，即使在工业时代公众

舆论影响着政策和政府事务。作为一个精英主义者，他相信公众“不会拥有局内人对事件的了解”，并且“只能观察那些表明他们的同情应该转向哪里的粗俗迹象”。由于公众毫无头绪，其意见的政治分量很可能被狡猾的局内人所误导或操纵。这使得李普曼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在今天仍然非常准确:

>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公众舆论是一种保持或创造的力量,引导社会走向明确设想的目标,故意走向社会主义或远离社会主义,走向民族主义或帝国,走向国家联盟或任何其他教义目标。*[5]

我们已经看到，纲领性的目标是中心的事情，从李普曼的时代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一直坚持边界理想的公众将会拒绝这些目标。

令李普曼心碎的是政治哲学的人必须存在于政治现实的假设。他知道公众是这个职位的唯一候选人，作为一个敏锐的事件观察者，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希望和事实之间的不平衡。“主权和全能公民”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公众诞生于私人公民之间的权宜之计，这些公民在一件事上有共同的利益——公民的或自私的——并且在其他问题上会以不同的方式结盟，或者干脆像幽灵一样消失。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这种易变的实体都不能与人民等同起来。

然而，对于那些希望挑战既定政府或政治制度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已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这不仅适用于埃及军方这样的操纵机构，也适用于公众本身。与埃及的抗议者相比，美国的“占领”团体在街头的人数很少，他们仍然声称代表“99%”反对精英阶层的掠夺。

我想，穿上君主的袍子和皇冠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经历，但其效果是贬低了民主进程，考虑到公众的易变性，最终结果只能是混乱。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大批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正在埃及街头集会。*他们*相信自己代表了埃及人的意志

人民的意志。被激怒的军方呼吁举行大规模的反示威活动，以打击“恐怖主义”。这场大戏的最后一幕已经无处可看:当人人都是国王的时候，权力*必须*与合法性分离。

公众不是群众，而是曾经被活埋在他们下面

西班牙哲学家约瑟夫·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sore Ortega y Gasset)——我为本书摘抄了他的书名——曾指出，在前工业社会，普通人生活在“分散”之中。定义他们的规则是地方性的，对阶级、宗教、性别、年龄和职业都有特殊的规定。在西班牙，直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妇女才可以戴披肩，只有城市妇女才可以戴帽子。对违规者的惩罚迅速而严厉，但现实情况是，很少有人认为违规者。这位加斯康农民从来没有想到，他与索邦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有许多共同之处。教授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都把对方看作是不同种类的人。

这些狭隘的思想领地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扫除了。教育提高了普通人的智力水平，技术提高了普通人的物质水平。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是自由民主，宣扬人与公民的普遍平等。事实证明，基督徒和犹太人、男人和女人、农民和教授之间，在价值和行为上都没有差别。人类那歪歪斜斜的木头被规划成一种普遍的、普遍的形式。

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否因为它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经济压力，我没有资格说。但是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需要大量的消费市场。所谓“大量劳动力”，我指的是一群同样可以训练到最高效率的工人。锻造和部署这样一个群体成为了“科学管理”及其伟大的倡导者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目标。有了时间和动作研究在手，科学的管理者就可以把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编成程序，就好像他们是一个单一的仪器——一个人的机器。

> *每个工人的工作都是由管理层至少提前一天安排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工人都会收到完整的书面指示,详细描述他的任务*

完成工作的方法,以及完成工作所使用的方法。[7]

这种制度是自上而下的、侵入性的、没有人情味的，但它在工业化世界成为正统，并引起了有影响力人士的注意。亨利·福特和列宁都是泰勒主义者，各有各的风格。他们都相信一个绝对正确的先锋队指挥着一群无差别的人类。

工业时代是泰勒主义的核心。普通人，在整个历史中都是如此无可救药地狭隘，被扁平化为大众: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富裕，流动性更强，在每一个活动领域都被组织成巨大的等级制度。大众充当了反大众的角色。更准确地说:群众为了等级制度的利益而*冒充*公众，同时剥夺了它的一切自发性，否定了它的真实利益。例如，在市场上，大众消费者是通过剥离所有的特殊性，只承认某些普遍的需求和品味而产生的:那些被大规模生产所满足的需求和品味。

在政治上，泰勒主义的组织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群众运动中达到了一个极端，这些运动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劳工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美国，政治机器——一个美妙的词——控制了大部分选民。各国家政党的偏颇程度也只是略有下降。由党派元老选出的总统候选人邀请了与教皇秘密会议一样多的民主参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群众只能在选举日说“是”或“否”，或者不投票。他们往往是被胁迫或贿赂，才同意领导层的决定。



4.1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沉醉于工业组织的成功，大众的创始人

运动及其崇拜者和模仿者试图将政治行动简化为纯粹的机械。左右皆如此，无论运动意识形态的实际内容如何，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后者通常是伪科学的杂烩:比如纳粹的种族达尔文主义，或者马列主义者的“科学唯物主义”。重要的是对群众的控制。运动成员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反过来，领导层操纵政治机器，使之朝着一种新的权力概念发展，在这种概念中，整个社会都被运动所吸收，群众取代了主权人民。

在这样的方案下，在一件事情中追求个人利益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独立的公众的空间。当我们听到关于“找不到自我”的“幻影公众”的绝望言论时，我们应该回想一下，这就是李普曼和杜威所面临的政治景观。这两个人都知道，在更早的时候，公众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强有力的独立性。18世纪的公众是由具有科学和艺术知识的人组成的网络，他们通过通信实际上联系在一起。他们非正式地称自己为“文物国”，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几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帮助普及了科学革命，阐明了自由民主的原则，并激发了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

在杜威的“机器时代”，那种自信的公众似乎就像戴粉假发的时尚一样已经灭绝了。群众似乎活埋了公众，也活埋了民主未来的前景。

在这里，我想打破历史叙事，快进到当下。任何留心的人都会注意到，文物国中戴着面具的公民与我们自己的网络公众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拟的、非正式的、自发的、网络化的而不是等级化的，对质量开放而不是认证。这是真的: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超过了他们与工业时代的干预大众之间的相似程度。这种相似是一种视觉错觉，还是反映了某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主题——但这不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

我更感兴趣的是考虑两者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文物国，说到底，是一个精英俱乐部，一个知识分子

奥林匹斯与奥尔特加特殊化的人性视野相去甚远。而今天网络化的公众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可爱猫咪的图片和色情上，而不是革命或政治哲学上。事实上，新的公众与旧的大众非常相似，旧的大众现在摆脱了泰勒主义者的控制，并在有活力的社区中回归到自己的特殊兴趣和品味。

因此，问题立即出现了:这种奇怪的逃脱是如何发生的?那些机器一般的群众，如此完全地掌握在有科学自命的精英手中，通过什么历史杂技，成为了今天的反权威公众?为什么李普曼和杜威这些聪明人对未来的预测如此错误?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自信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像现在和未来一样，过去是一团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每一个都孕育着各种可能性。原因无处不在，可以随意挑选。例如，1989-1991年欧洲共产主义的垮台，就被不同的分析人士归结为体制内部或外部的原因，不管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甚至是军事原因。每种解释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运行不同版本的历史，控制每一个因素。我们只有一个实例来建立我们的理论。以牺牲一个原因为代价而迷恋另一个原因，往往更多地揭示了分析者的情况，而不是事件本身。

最好的方法是贴近事实。幸运的是，事实没有争议。在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出版后的85年里*，群众运动在战争中被打败，在经济和选举中也被淘汰。他们失去了对普通人的控制。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群众运动在其潜在追随者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时代的死物。附着在古巴和朝鲜等地的干枯标本就是其彻底失败的例证。

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工业时代自由民主赖以建立的伟大等级制度也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政治机器被改革者撕得四分五裂。政党失去了很多权威，包括支配总统候选人的能力。毫不奇怪，他们的成员资格开始转向更有回报的安排，比如参加倡导团体。类似的损失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权威削弱了政府、企业和科学机构。到目前为止，这种衰落没有群众运动那样灾难性，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权威都从曾经强大的等级制度流向非正式的、自发的团体。

关于公众及其从大众埋葬中奇迹般复活，我的假设是这样的。每个公众都必须以积极和被动的方式行事，但在任何历史时期，这两种方式的比例完全取决于现有的结构选择。18世纪的公众是微小但高度活跃的。工业时代的公众人数众多，但受胁迫而处于被动状态。大众吸收了19世纪进入历史的数亿普通人，并将他们置于一些结构的指挥之下，这些结构几乎不允许真正的决策，很少允许真正的意见和行动选择。

但是，公众从来没有在群众的重压下消失。这是我的假设的一个关键主张。公众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和政治舞台上的惰性支柱。公众舆论退回到被动的模式，但它仍然是一个因素，它总是很重要——即使对纳粹德国来说也是如此，它在说服和宣传机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所有群众运动和由此产生的政权都是如此。他们痴迷于塑造公众舆论——到目前为止，比自由民主国家更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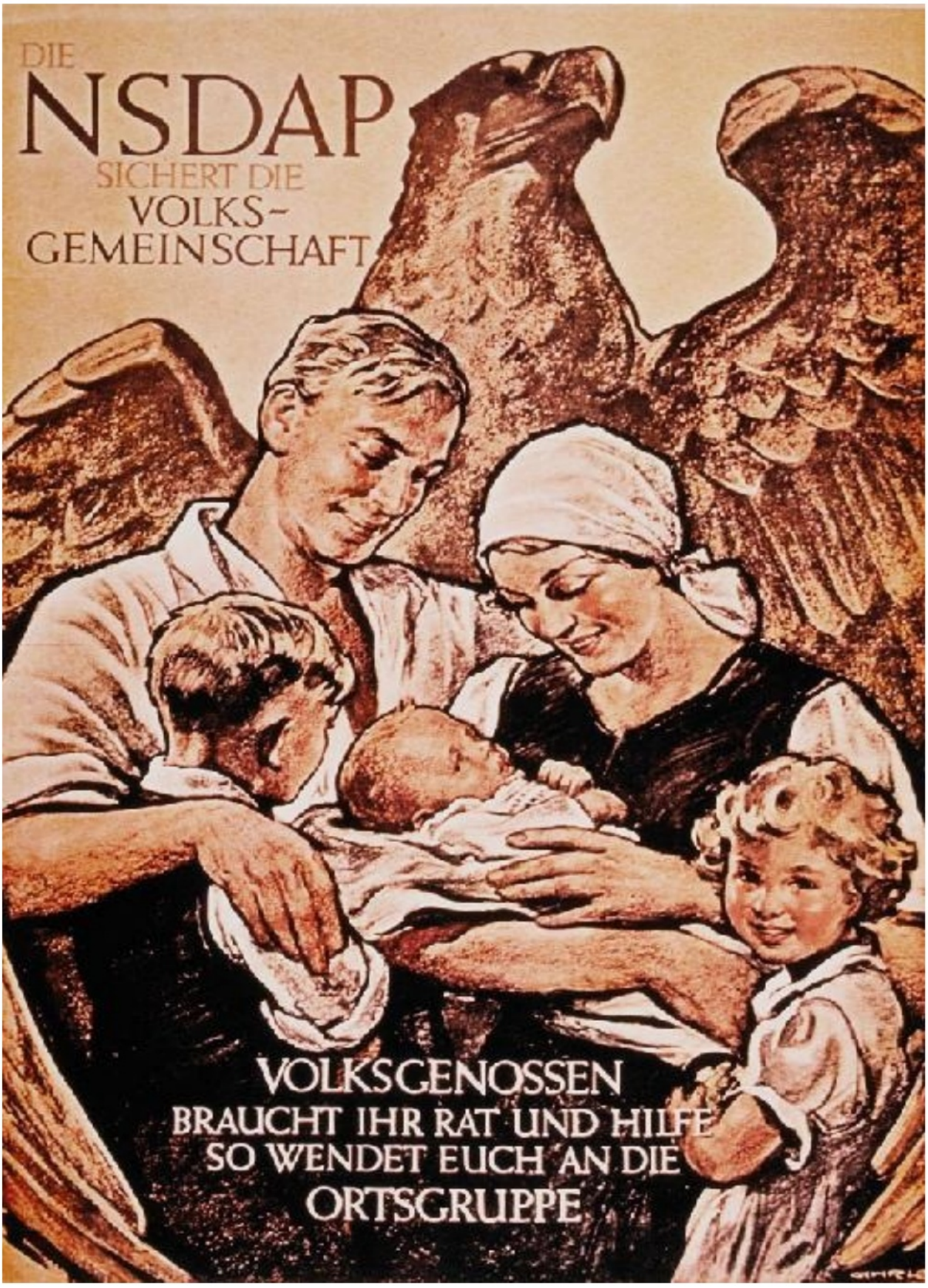
宣传是极权主义者承认他的权力不是全部。与民主政治家不同，群众运动的领导者缺乏反馈机制:他们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只能希望把想要的意见直接注入追随者的大脑。称之为灵魂的泰勒主义(Taylorism)。

但大众可能无法接受。公众带着自己独特的兴趣和观点，仍然生活在这些地方。它并不是惰性的。而这种反应能力对独裁者来说是危险的。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年的波兰都看到了公共资金的最终选择: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生死攸关的革命。到1989年，世界上所有的宣传都无法挽救这些政权免于被一扫而空的命运。到1991年，母船——苏联及其共产党——已经沉没。

旧的公众一直在反应，因为从结构上讲，它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TV观众只能作为消费者对三个频道做出反应，要么观看，要么关掉。由于明显的结构性原因，公众成员无法开发自己的TV。他们不能表演。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我已经指出，在民主国家，政治机器和强大的政党将公众的结构性选择减少到极少数。工业经济也是如此:大规模生产者创造了一个品味与实际生产的产品相匹配的大众。在信息和传播领域也是如此，在“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的座右铭下，出现了一群中间人，他们武断地控制着普通人可以获得的内容。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沿着这个光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一个几乎完全被动的公众，到一个极度活跃、极度侵入的公众。这是由于选择的激增而成为可能的。这个过程类似于我在关于信息人的寓言中描述的激进的战略逆转。随着普通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结构性选择，后者开始向他们最初的利益迁移，而曾经限制他们行为的制度失去了这样做的权力。

TV观众变成了YouTube的海报。运动和政党成员变成了个人意义事业的倡导者，经常聚集在虚拟会议场所周围，比如“我们都是哈立德说过的”Facebook页面。在商业中，设计优先于生产，个性化成为设计的伟大理想。在信息领域，技术创新释放了天文数字的能力，供普通人使用和滥用，重构了新的公众，使其能够攻击权威的庙宇。


DIE
NSDAP
SICHERT DIE
VOLKS-
GEMEINSCHAFT
VOLKSGENOSSEN
BRAUCHT IHR RAT UND HILFE
SO WENDET EUCH AN DIE
ORTSGRUPPE

4.3 注入金发的世界观:纳粹海报

这最后一个发展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李普曼和杜威对未来的预测是错误的:和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没能预见到个性化信息技术的到来。

工业组织拥护泰勒主义的理想，并致力于将公众转化为大众，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我对公众重新出现的假设可以简单概括一下。第一，公众从未消失在大众的怀抱或等级组织的控制之下。公众忍受了下来，尽管由于其结构性选择被剥夺而被迫进入一种被动模式。其次，地缘政治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结合为公众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选择和能力的前沿，公众从被动的沉睡中醒来，开始采取行动。作为行动者的公众立即与旧制度发生碰撞，而这些习惯了控制的旧制度的反应是愤怒和不理解，有时会摇摇欲坠，而且屡见不鲜地分崩离析。

我的意思是说，新公众一直是第五次浪潮的动荡边缘。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侵入了事件，既有机构已经陷入危机，面临解散的威胁。

公众不是群众，但两者是有关系的(很复杂)

在这本书中，我把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描述为公众对专制政权的胜利。然而，如果你拥有字面上的思维，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解释。你会注意到，是人群推翻了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府——人群只占两国人口的一小部分。既然公众并没有被证明与群众完全相同，那么你，按照你的字面意思，可以合理地怀疑为什么前者的成就被给予了如此多的信任。

公众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并不透明。虽然两者密切相关，但从来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知道，公众是由由一个共同的参照点联结在一起的个人组成的:李普曼称之为对一件事的兴趣，这可能意味着一种爱

电脑游戏或政治倾向。公众成员往往是分散的，通常只能从远处影响事件，通过“软”说服的方式:通过表达和交流一种观点。

相反，群体总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巨大的物理破坏力和凶猛性。它是一种行动形式，它把许多个人的欲望淹没在一个单一的粗糙的意志之下。在像古雅典这样的直接民主制中，它可以说代表了主权人民的意志。而在其他任何地方，群众只能代表自己。然而，整合人群的人总是会提出更大的同一性要求:对于政治人群，这种要求往往反映了公众议程中更情绪化的方面。因此，一个群体可以把自己，也可以被他人看作是有血有肉的公众，是行动中的“人民”或“无产阶级”或“共同体”。

有时——想想华盛顿的民权游行或攻占巴士底狱——群众已经获得了强大的象征意义，其影响远远超过其人数，甚至远远超过其历史时刻。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交流的方式。

公众调解了人群向一种象征力量的转变。它可以抓住一个事件，比如伊斯坦布尔反对拆除公园的示威活动，然后动员其代表示威者的意见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可能在实际事件中不存在的情绪和意义。以这种方式使用，群众就变成了一种沟通民意的工具。但人群本身也可以结晶成一个新的兴趣焦点，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这实际上就是土耳其发生的事情，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伊斯坦布尔以外，并演变成一场政治起义。

如果说公众可以将人群重新创造为一种交流形式，那么同样正确的是，这样的人群一旦被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就会创造出自己的公众。

这种双向影响的一个决定性例子发生在1979年6月，当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了他的祖国——共产主义波兰。在教皇为期九天的行程中，每走一步都聚集着大量的人群，这些人群以其庞大的规模向分散在波兰的信徒传达了一个超越现实的真理

反共反对派。

> *我当时和抵抗运动的朋友们一起在十周年纪念体育场。我们,还有其他一百万人。我第一次看到人山人海,亲眼所见。那时我们明白了,我们和我们的同类——这个国家的"弃儿"和"煽动者"——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一个目标,一切还没有结束,没有人能击垮我们,波兰人民。*[9]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最生动、最有力的示范效应。个人可能出于政治、宗教或爱国感情，或出于许多其他私人动机而加入到参加教皇的人群中。这都无关紧要。对于反对者来说，人群实际上是一种启示——一种自我意识的闪光，它将一个小利益群体的同一性融合到一个比它想象的更大的公众中。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带着完全的诚意，披上了"我们波兰人民"的外衣，把教皇的人群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波兰内外的许多人都接受了这种解释。经过30年的统治，共产主义对东欧的控制似乎出奇地不稳定。

民众与群众相爱的历史，充满激情的狂欢和令人心碎的抛弃，是一个尚未被讲述的故事。然而，在这里，我所关心的只是注意到，与独立的公众一样，自发的人群在群众时代几乎消失了。它沦为了等级组织的附属物——主要是政党和工会，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那么成熟的团体，鼓动禁酒令或民权。



4.4群众拒绝持不同政见者:哈瓦那2009年10月

该组织以泰勒式的关怀给人群写了脚本。这首先是通过为其提供口号，标语牌和适当的设置来实现的，但也象征性地，通过在事件发生之前宣布事件的意义来实现。这样的事件仅仅是对相关组织力量的考验:工业时代真实民意的摹本。

随着群众运动的出现，公众的疏远达到了高潮。群众运动的主要功能是把纪律严守的人群聚集在街上，他们通常穿着军装，以暴力告终。例如，在魏玛德国，当共产主义和纳粹的“群众”在巷战中互相残杀时，警察部队被推到了一边。在征服权力的过程中，这些团体用华丽的仪式来部署群众，以传达他们比对手教义的优越性。因此，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集会和斯大林的五一节游行。时至今日，我们仍能观察到这一制度残存的化石: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在节日场合仍会聚集群众享受他们的认可，并组织“拒绝派”人群骚扰反对派。

群众运动活埋了公众，剥夺了群众一切自发的生命和目的的独立性。一切都是照本宣读的，而这些照本宣读几乎是有意为之，显得不真诚——这种倾向在朝鲜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强度，那里的群众被要求表演通常只有马戏团才能表演的杂技。在波兰，欢欣鼓舞的教皇人群所引起的震惊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与官方人群的对比。

在新的千年里，公众带着复仇的情绪回来了，它对信息领域的控制使得与公众的亲密关系比以前在结构上可能的要密切得多。公众可以邀请自己在Facebook上抗议，在Twitter上发表街头评论，并在博客、Tumblr、Reddit和其他开放平台上反思事件的更大意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众舆论可以一刻一刻地与人群的行动融合在一起。这种与公众的亲密关系，使人群能够摆脱可预测的脚本，通过在网络上发布手机视频，直接与世界沟通，赋予了反抗的传染以光速。这反过来又把街道变成了一个政治不确定性的领域，令所有形式的权威都感到恐惧。

人群的不可预测性反映了公众的网络结构和宗派脾气。我们从舍基“自组装”群体的无脊椎形象中看出:没有领袖，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程序，只有对一件事的共同兴趣，让公众活跃起来，把人群推到街上。对于胡斯尼·穆巴拉克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这样的专制统治者来说，千禧一代代表着太阳底下可怕的新事物。过去的镇压旨在削弱敌对的群众运动，比如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如果它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政权就拥有了街道。

现在人群自发地自我集结起来。这可以采取异想天开的形式，就像“快闪族”一样，他们通过奇怪的行为来表示对现有权威的不尊重。但它也可能反映出严肃的政治计划，这些计划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并在街头时刻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自发性”意味着由技术盲目性造成的政权意外。难怪独裁者的第一反应是让时光倒流，回到更简单的时代——关闭埃及的网络，切断叙利亚城市的电网，比如德拉，这些都是反对派的据点。

进入全球信息领域扩大了群众行动产生的示范效应的范围和影响。公众成员仍然可以将人群视为个人启示，将不可能变为现实——特别是在两代人以来从未见过任何规模的抗议活动的阿拉伯国家。1月25日，Wael Ghonim到达解放广场后的反应与波兰活动人士看到约翰·保罗二世周围的人群时的惊讶和兴奋相呼应。

> *解放广场的景象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景象之一。大量的抗议者——即使没有数万人,也有数千人——占据了广场的大部分地面空间。这时我才意识到1月25日的抗议成功了。对埃及反对派运动来说,这将是历史性的一天。*[11]

但1月25日的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突尼斯民众成功将本阿里赶下台的启发。穆罕默德·布瓦齐齐自焚的照片传到了埃及和突尼斯。两国民众都对他的死表示哀悼。突尼斯人群的成员用手机录像记录了他们的存在。在突尼斯，这些影片无法直接上传到网路上，但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取得这些影片，并将它们播送到埃及和世界其他地方，透过这种途径，影片进入网路，人们可以随意搜寻和观看。这就是信息领域发挥作用的地方。

解放广场的人群反过来又为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起义赋予了英雄气概。陷入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的交叉火力中，今天的埃及人谈论着对“解放精神”的渴望。在那一刻，人群超越了公众的易怒。像穆巴拉克支持者发动的骆驼冲锋失败这样的事件获得了一种病毒式的名声。半岛电视台24小时在解放广场进行直播。电视台毫不掩饰对人群的同情。其他国际新闻广播员虽然没有那么明目大胆，但也把解放广场的人群描绘成事件的英雄。



4.5解放广场人群:2011年1月12 Photo©2011 Ramy Raoof，并以CC BY 2.0授权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解放广场人群的命运，仿佛这是一场史诗般的冒险。像往常一样，示威的效果很难得出结论，但阿拉伯起义的时间顺序很有启发性。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逃离突尼斯。解放广场人群于1月25日首次聚集，并于2月11日说服穆巴拉克辞职。也门(2月3日)、巴林(2月14日)、利比亚(2月15日)、叙利亚(3月16日)等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示威。

没有哪个理智的分析人士会坚持认为，解放广场的人群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之间存在一条直线的因果关系。人类事务不像台球

球或行星的轨道。我以前说过。但是，示范效应虽然是间接的，但可能非常强大。新闻广播员和网络视频美化了解放广场的人群，他们的背景和政治环境与埃及抗议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也门和叙利亚的观众强烈认同埃及的人群:爱情现在可以在远距离和跨国界进行。几周内相继爆发的叛乱几乎不可能不受这些感受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彼此了解的影响。

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公众和老牌权威之间的政治冲突中，群众的形象具有了决定性的重要性。在手机摄像头前，人们愿意降服权力，甚至不惜牺牲，这使得这场冲突的不对称性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一个政府可以像在叙利亚所做的那样，用老式的蛮力来应对，但代价是撕毁社会契约，成为全球贱民。每一次殴打、每一次枪击都会被录成视频，向全世界展示。每一个被杀害的年轻人都会在信息领域重新崛起，以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和哈立德·赛义德的方式，转变为反抗的有力论据。

如果说突尼斯和解放广场的示威效应帮助激发了阿拉伯人的起义，那么阿拉伯人群的英雄形象则激发了那些对政治变革感兴趣的西方人士。他们试图在民主的背景下重演解放广场的戏剧性事件。传染的媒介是信息领域，选择的武器是群众:由此产生的动荡应该有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但鉴于全球想象力在这一点上的失败，我将简单地称之为2011年。

章节注释

1 Nassim Nicholas Taleb, *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Random House, 2012).

2 Al Jazeera, "Transcript: Egypt's army statement. Statement of Abdul Fatah Khalil al-Sisi, head of Egyptian Armed Forces, announcing the overthrow of President Morsi," July 3, 2013,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07/201373203740167797.html

3 "An Interview With Mohamed ElBaradei, Who Hopes For Reconciliation in Egyp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n-interview-with-mohamed-elbaradei-who-hopes-for-reconciliation-in-egypt/2013/08/02/e409eac0-fab4-11e2-8752-b41d7ed1f685_story.html. Shortly after this interview was published, ElBaradei resigned to protest the armed forces' violent repression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4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27).

5 Lippmann, *The Phantom Public*, 55.

6 José Ortega y Gasset, *La rebelion de las masas* (Revista de Occidente, 1930), 47.

7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Public domain book, 1911), 16.

8 Wikipedia Commons.

9 Maciej Lukasiewicz, "History's Turning Point," *Rzeczpospolita*, October 16, 2003, http://www.worldpress.org/Europe/1698.cfm

10 From Reinaldo Escobar's blog, *Desde Aquí*, http://www.desdecuba.com/reinaldoescobar

11 Ghonim, *Revolution 2.0*, 184.

12 Photographed by Ramy Raoof.

2011年
相变

5

我重复一遍，我的故事关注的是不愿统治的公众与权力机构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我担心的是，在这种压力下，民主制度会被碾成碎片。巨大的心理距离将双方分隔开来，即使他们在冲突中走到一起。这个鸿沟充满了暗物质:不信任。

控制这些机构的精英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公众，他们认为公众是兽性的，容易产生破坏性的行为。实际上，他们试图通过将公众聚集成一个群体，并将其依附于既定的等级制度，来阉割公众。今天在任何一个美国机场瞥一眼，就会证实，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种上层对底层的恐惧变得更加强烈了。
因此，改变的是公众对权威的不信任，以及在第五次浪潮时代，公众将这种不信任转化为行动的力量日益增强。

亨利·罗森瓦隆(Henri Rosanvallon)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有趣的政治分析家之一，他写过“*不信任社会*的兴起”。[1]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公众必须依赖于专家、专家和政治代表等中介机构，这些机构是有制度和等级组织的。当专家失败时，公众只能求助于其他专家，而这些专家往往来自同一个失败的机构。这个过程类似于精英之间的相互保护协议。

失败通常被归咎于支持不足:例如，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后要求并得到了更大的预算。

愤怒的公众通过加大批评的力度和干预的频率来进行反击。有时，在一些地方，公众已经放弃了对现代社会的所有希望，陷入了一种永久的否定和抗议状态。

这一章讲的是2011年，当时不信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许多国家的公众走上街头要求变革。首先发生的是阿拉伯起义，其脚本似曾相识。大声疾呼要求自由的抗议者遭遇了试图镇压他们的独裁政权。在中东，信任的致命破裂可以在不扩展分析想象力的情况下得到解释:威权主义者欺骗和撒谎。

然而，到了春天，反抗的浪潮席卷了自由民主国家——西班牙、以色列、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这些都是相对开放的社会，是个人和政治自由的堡垒，但那里的公众深深认同阿拉伯抗议者，羡慕他们的革命。

所以这就是我这一章的主题。在2011年的某个时刻，剧本出了差错。严重的不信任让民主政治感到恶心。人们开始动员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并否认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了*他们*。他们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但他们要求的是不同的东西。他们想要彻底的变革:而在2011年之后投下阴影的巨大谜团是，这种*偏离*当前民主实践的变革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关于方法的一句话。许多历史学家对任何年份或任何年份群都可以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因果单位的想法嗤之以鼻。在学校里，我被教导一切都是流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形式的热爱，代表了一系列古典复兴中的一个时刻，可以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时代，一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林肯纪念堂。我确信，历史是在庄严的行列中前进的，而不是突飞猛进的。

当涉及到复杂系统的行为时，我现在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

社会和政治安排往往会累积噪音。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内部和外部力量不可避免地会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使整个体系越来越远离平衡。这种压力在表面之下无声无息地、无形地起着作用。它们是累积的，见效缓慢。但当变化到来时，它是突然而戏剧性的。从不平衡推向动荡，体系瓦解，必须在不同的基础上重建。

因此，水只是水与下降的温度相互作用，直到它突然变成冰。苏联曾经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也是一个超级大国，直到突然之间，它两者都不是。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法老形象，两周后他就走了。
2011年的事件是否代表了如此戏剧性的阶段变化仍不确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证明其后果，更不用说分析了。但这是我的工作假设。我相信，2011年标志着公众首次将权力不对称与政府平衡起来。它通过部署数字工具来动员舆论和组织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来实现这一目标。我还认为，2011年首次暴露了许多民主国家公众与民选政府之间的不信任鸿沟。自由民主本身受到了攻击。由于没有提出替代方案，2011年的事件可以说引发了第五次浪潮下生活的一个根本困境:虚无主义的问题。

至于后果，它们值得关注。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通过一个相变而转化，也可以被湮灭。变化的远端观点可以看起来像是对新的组织原则的拥抱，也可以看起来像是无序性的增加——永久的动荡。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叙利亚和埃及的事态表明，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

愤怒的限度，或者是无声的尖叫

2011年5月15日，成千上万以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走上西班牙50多个城市的街头。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是政客和银行家手中的商品。示威活动虽然喧闹但很和平，而且组织得很好。然而，他们与政党或工会没有联系，新闻媒体也很少注意到他们。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在西班牙政坛掀起了一场地震。他们

当局对此感到措手不及。西班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高层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年轻的示威者。他们似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关于这一切的意义，精英们开始了一场没有定论的辩论:街头的人群是政治健康还是疾病的症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德里抗议者的一个“集会”投票决定“占领”名为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的大广场——它成为了他们版的解放广场。这一举动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激起了“占领”运动的热潮。从第一次示威开始，西班牙抗议者就称自己为“15-M运动”，但他们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愤怒者”*(indignados)*。这个标签是从93岁的法国作家赫塞尔(stassaphane Hessel)的一本小册子中借来的，他向年轻人传达的信息是:“是时候愤怒了!”

抗议者听起来更真诚而不是愤怒，而且他们很聪明，普及了一串诙谐的口号。西班牙新闻媒体通过爱上那些言辞得体的愤怒者，弥补了最初错过这个故事的*遗憾*。

到6月，抗议活动吸引了数百万普通公民。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抗议活动的支持程度很高。这是不寻常的，因为愤怒者的唯一*明确立场*是他们拒绝西班牙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无名小卒的年轻人希望社会生活从无到有重新开始。

当然，在现实中，它们很大程度上来自某个地方:互联网，对西班牙当局来说，这是一个像埃及一样神秘的地方。示威活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在脸书上策划了几个月。一个自称为“现在真正的民主”的脸书小组在1月份出现了，并受到了一群奇怪的博主、活动家和网络教派的欢迎，他们的名字带有暗示性，比如“没有未来的青年”。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年轻的专业人士或大学生。埃及的起义——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在全球信息领域追随的起义——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启发，一种模式。组织者密切关注统一的参考点，他们和许多其他西班牙人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反对的是什么。

西班牙的客观条件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目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这个国家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国房地产市场崩溃的打击。失业率在欧洲最高:在年轻人中，失业率达到了45%。尽管房价下跌，但住房仍然稀缺。因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当选、主要关注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政府似乎力不从心。政客、银行家、专家——所有人似乎都脱离了现实。他们的解决方案给民众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在远方，德国和欧盟要求紧缩。

第一次示威活动被安排在西班牙地方选举前一周，大概是为了影响投票结果。为最初的抗议活动起草的宣言是一个无党派、非意识形态包容性的奇迹:

> *我们是正常的普通人。我们和你一样:早上起来学习、工作或找工作的人,有家人和朋友的人。每天努力工作以维持生计,为身边的人赢得未来的人。*
>
> *我们有些人认为自己更进步,有些人认为自己更保守。有些人是信徒,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有些人认为自己不关心政治……但我们所有人都对我们周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感到担忧和愤怒。政客、商人、银行家的腐败……*[3]

组织者接着谴责“政治阶层”“只关注经济大国的指令”，形成“党派专政”。他们指责“过时的、反自然的现行经济模式”使少数人富裕，而使其余人陷入贫困。在愤怒者摩尼教的*计划中*，西班牙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是破坏性的力量。

既然如此，你就会预料到会有人呼吁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不是送上断头台，那就把政治和商业阶层的腐败分子送进监狱。这场运动的语言实际上充满了对激进变革的渴望。但没有人提出任何建议。宣言中唯一的积极建议似乎与它所描述的危机的严重程度奇怪地不相称。它很简短

用被动语态写道:“道德革命是必要的。”

愤怒者的反抗不安*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结合在一起，为2011年的事件注入了活力。所有抗议活动的领导精神都与Wael Ghonim和Hoder属于同一人群:年轻，受过大学教育，在驾驭信息领域的道路方面表现出色。列宁会给他们贴上先锋的标签。我们称他们为早期采用者。有些人也拥护网络文化，既要坚持一丝不苟的平等主义，又要觉得自己比对手进化得更高。对权威、对现有结构、对过去的道德革命排斥，使这群人相信他们已经超越了政党，甚至意识形态:他们的反抗建立在普遍接受的正义标准之上。

然而，一些组织者赞同当代左派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另类世界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生态学家”等等。[4]*愤怒者们*摆出一种包容的姿态，但不需要太多深入的分析，就能辨别出反资本主义、反“体制”示威的左翼味道。在太阳门广场散发出来的革命行话中，阶级斗争和反全球化运动的规模几乎和阿拉伯起义一样大。这些人拥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普遍主义的愿景，以及各种各样的变革计划。他们在抗议活动中找到了机会，粉碎了被鄙视的政治秩序，酝酿了一场革命。

网络上的人们笨拙地与左翼人士一起动员起来。前者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信息，后者则有街头抗议的经验。他们在对现有秩序的厌恶中团结在一起——同样，没有矛盾的是，弥漫在他们的文化和一代人心中的宗派主义观点。

如果在叛乱的实验室里，一场政治运动被精心策划，完全符合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对边民派的描述，*愤怒者们*就会从手术台上走出来。根据这些作者的说法，该教派拒绝任何形式的领导，赞成一种激烈的平均主义，并在原则上谴责官僚机构和计划，认为它们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做决定需要长时间的辩论，对教派来说，不做决定比把责任让给领导人或政治局问题要小。

西班牙抗议者也是如此。他们拒绝承认领导人，甚至拒绝承认发言人。相反，每个人都被鼓励以自己的名义发言。他们在大会上见面，这一点也不像互联网聊天室:没有主持人，每个人都想发言，不管话题是什么，都可以这样做。多数投票被认为是代议制民主的可恶之处。意识形态和计划作为个人信仰被容忍，但作为群体行动的驱动力却被拒绝。至少在这方面，网络文化压倒了左翼人士。[5]

谴责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吸引了许多人参加抗议。纯粹的否定，对现状的敌意，成为网络和个人倡导相互矛盾的理想的共同参考点。但在人群和占领之后，这一点已经明确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政治变革——对于变革来说，比愤怒或诙谐的口号更有实质意义的东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接下来是一个谜题:现在该怎么办?

在动荡的2011年，公众在每次与权威的冲突中都面临着这个谜题的某种形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样的结构将取代旧的、被鄙视的机构?社会应该如何重组?每次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考虑到公众的宗派主义脾气，一切都不可能。

西班牙示威者最喜欢的噱头是“无声呐喊”:给每个人自己的内部革命。“现在就真正民主”组织者模糊的“优先事项”也接近于政治缄默主义:“平等、进步、团结、自由接触文化、生态可持续性……”如何为这些优先事项堆叠和支付的问题从未被提及，而忽略是故意的。每向一种意识形态或计划迈进一步，都意味着拥抱某种陈旧的、等级化的、不平等的和腐败的东西。由于*愤怒者*缺乏想象力来表达一个既普遍又宗派的社会，他们在沉默中发泄自己的想法。

随着选举的到来，一个致命的清晰时刻到来了。五月的抗议活动被安排在西班牙地方选举的同时，但该运动的方式

慷慨地说，投票是混乱的。法比奥Gándara是“现在就真正民主”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他只是要求公众“凭良心投票”。Gándara是一名政治活动家。他一定持有强烈的观点。他承认自己会去投票，但拒绝透露支持谁，称这是“私人”决定。[7]

其他人则没有那么胆小。他们给自己贴上“两者皆非”的标签，表示对选举过程和政党“独裁”的否定。一场“不要投票给他们”的运动在网上蓬勃发展，一张空白选票是支持示威者的方式的说法也传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结果似乎与抗议活动完全脱节。保守的人民党(Popular Party)在5月份大获全胜，主要是因为执政的社会党人内部崩溃。这一趋势在11月的大选中进一步加剧。社会党以有史以来最低的票数被赶下台，保守党获得了对议会的绝对控制。地区性和激进派政党的选票有所增加，但面对压倒性的保守派统治，他们却无能为力。非正式的废票竞选活动缺乏任何明显的影响。

因此，西班牙2011年的选举季以老牌左翼的惨败和右翼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在一场伟大的国家重新定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清晰中*，蔑视领导人的愤怒者们表达了许多想法。一些人认为，选举证实了体制无可救药的腐败，但对于能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他们保持沉默。另一些人则得出结论，真正的变革只能通过走向人民，创造更民主的社会结构来实现——这是一个宗派的梦想，相当于政治上的退位。



1 .马德里无声的尖叫

左派人士更清楚。他们了解失败的程度。他们的希望已经被选民击得粉碎，而社会党人的垮台确保了保守派统治多年，基本上没有反对派。

考虑到这些残骸，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考虑了两者都不明智。把社会主义者贬为“同样的老狗屎”是错误的，一位遗憾的愤怒者写道:“他们可能是狗屎，我们必须讨论它，但它不是同样的狗屎……”[9]这是运动政治分析中最尖锐的。

2011年12月19日，议会选举后不到一个月，太阳门广场的最后一批占领者宣布进入“无限期积极反思”时期。他们可以感觉到舆论的潮流正在远离他们的事业。

15-M运动正在失去参与,我们在示威活动中看到了这一点

集会,在社区,在活动中,在互联网上……是时候停下来问我们自己一些深刻的问题了…我们已经不再倾听彼此了吗?我们是否在重复旧的激进主义形式,这些形式已经被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它们排斥了太多的人?[10]

宗派的冲动产生了大量的人群、兴奋和对西班牙统治机构自以为是的谴责。数字网络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代议制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受到了损害。在示威开始时稳坐政权的社会党已经被掏空了内脏。一切都变了，但一切都没有改变。没有一个代表愤怒者世界观的项目、政策*或想法*被付诸实施。是占领者回家的时候了。

从下面看愤怒的根源，从上面看

我想衡量愤怒者的言辞*和他们*愤怒的根源之间的距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剥离西班牙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几个层面，并从两个角度来审视这些层面。一个是从下面，从地面上看，运动中的年轻人是如何经历他们的处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2011年的起义可以用西班牙统治机构的巨大失败来解释。第二个视角将是历史的鸟瞰图——它将表明，*愤怒者*的反抗是由对创造了年轻反叛者的世界的自我毁灭的蔑视所推动的。

我担心，这两种视角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很可能是互补的。精英们完全有可能陷入瘫痪，而公众则摇摇晃晃地陷入虚无主义。事实上，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

下面的观点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应该是什么?我们知道，*愤怒者*和数百万西班牙人一样，感到他们的期望被欺骗了，以至于愤怒和反抗。他们的反抗有道理吗?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现代政府有可能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它能胜任哪些活动。这个次要的问题，虽然被意识形态所包围，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经验上的难题:我保证

在第7章中给予它充分的关注。

但我们的答案也取决于政府对整个活动领域的能力要求——这种要求是真诚和真实的，是一厢情愿但虚假的，还是纯粹的欺诈。一旦公众接受了这些要求，就形成了一种期望，而不履行义务就会被视为违反了社会契约。

如果我们在经济危机前夕考察一下西班牙政府，就会发现它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的现代利维坦。它掌握着权力，征用财富——2007年该国财富的30%以下，以全球标准衡量，这个数字不算高。它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大概是在查阅了这些信息之后，通过一堆晦涩难懂、往往相互矛盾的项目，重新分配了权力和财富。与所有国家政府的情况一样，透明度不如对受青睐的选民的关心和喂养重要。而且，与一般情况一样，政府似乎无法平衡账目——2007年累积的债务也达到了GDP的30%。然而，这一比例正在迅速下降。[11]

—

某些情况是西班牙所独有的。中央政府从下面被一群“自治”地区政府挤压——总共19个，其中一些，如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隐藏着独立的伪装。西班牙政府因此被迫与政治实体分享权力和财富，这些政治实体往好了说对它的成功漠不关心，往坏了说则积极反对它的统治。

它还受到欧盟(eu)货币和监管阴谋的自上而下挤压。2008年，EU由27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主权的某些方面屈从于一个行政上层建筑。行政管理是纯粹的中央等级制度-官僚主义，未经选举，基本上不负责任。成员国割让的权力含糊不清，充满争议。

然而，放弃对货币的传统控制是足够明确的。1999年，西班牙与其他16个EU国家一起成为“欧元区”的一部分。这个货币联盟背后的原因我们不必在这里关心。重要的是政府在财政问题上失去了权威

这些问题以前都是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而且西班牙公众与货币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西班牙的资金被法兰克福的影子专家控制。这破坏了人们在经济恶化时所需要的信任感，而在2008年之后，这种信任感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发生了。不出所料，EU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愤怒者*的恶棍名单中名列前茅。

利维坦是一个庞大但无脊椎的怪物。再加上议会民主制中常见的权力分离，西班牙政府里就有了一堆乱糟糟的声音，一堆交叉的目的，以及众多的决策中心。只有当各级精英在治理方向上广泛达成一致，并且能够说服足够多的公众相信该制度对其有利时，该制度才能发挥作用。

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抗议者指责两个主要政党支持相同的原则和类似的政策，这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在中东政策、社会事务等边缘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民主、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欧元和EU等问题上意见一致。事后看来，失败和不信任笼罩着这一切，这看起来像是共谋，甚至是腐败。然而，在当时，如果在政策上没有这样的共识，西班牙这个笨拙的国家机器就会陷入停顿，这是不言自明的。

多年来，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系统似乎运转得非常好。2011年，一个25岁的人只能记得危机前的和平、相对的社会安宁和无尽的繁荣。上一次经济负增长的年份是1993年。大多数西班牙工人在工作中享有铁一般的保障。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部分公众对“两党一制”的模式抱有一定的热情。很少或根本没有工作保障的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但就像平时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在政治上不重要。

两个主要政党表现得好像他们已经解开了狮身人面像之谜，宣称他们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能力。他们是民主的政治家。他们的天性就是把这个制度的明显成功归功于自己。运气或复杂性的问题从未进入政治话语。西班牙公众当然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或者，尽管有政客，而不是因为他们，经济也可能繁荣起来。这是一个民主的公众。他们愿意相信政府夸大的说法。在丰收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街头抗议。

1996年至2004年间，保守党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雄心勃勃但毫无成果的外交政策上。2004年至2008年间，社会主义政府主要关注同性婚姻等社会问题。2007年到西班牙旅游的人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政府赞助的广告，其中一个是人们真的拥抱一棵树，另一个是两个女人接吻。2006年5月，社会党在议会中提议授予四种类人猿某些“权利”。精英们心照不宣的假设是，他们已经把战争与和平、财富与贫穷等基本问题远远抛在脑后，现在面临着把国家提升到更高道德层面的任务。

当经济开始摇摆不定时，政府否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公众对此表示赞同。在2008年3月的选举中，在经济灾难的边缘，社会党赢得了创纪录的选票，并以比2004年更大的多数票重新执政。

回想一下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对中间派等级制度的观察:它常常令人惊讶。现代政府可以盯着一千个活动的部分，但他们无法预测不连续性。他们无法理解相变。当危机到来时，他们对危机的规模把握得很慢。当危机的影响变得明显时，他们会条件反射性地动用手中的粗糙工具，不管这些工具是否会改善局势。从本质上讲，政府可以把钱砸在不想要的变化上，也可以投掷炸弹和警察。

尽管后来人们抱怨紧缩政策，但西班牙政府还是在经济危机中投入了大量资金。总统豪尔赫·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承诺要“充分发挥国家的投资能力”，他说到做到。资金被用于促进公共工程，用于自治区，用于银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持续恶化，政府强化了其能力的主张。萨帕特罗坚持认为，这场危机证明了政府相对于市场的重要性。“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在2008年11月说。“公民和企业

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安宁。”[13]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听起来一定像是在未来燃烧的时候摆弄。在萨帕特罗发表声明之前的12个月里，失业率飙升了37%。到2011年，总失业率超过21%，年轻人失业率接近50%。不受保护的工人阶级自然是受害最深的，但即使是公共雇员也经历了工资和福利的削减。放眼望去，前景一片黯淡。

从根本上说，问题在于，这场灾难是仅仅反映了精英阶层的无能，还是反映了腐败和犯罪疏忽。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与统治者之间先前建立的信任纽带:而信任是不存在的。只有一方继续宣称自己有能力，而另一方则在经济上日益痛苦和绝望。不信任毒害了公众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感知。年轻人青睐的数字平台助长了阴谋论。相信最坏的情况是很自然的。

西班牙的精英阶层和他们所居住的机构，除了繁荣之外，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过多的理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失败了。在他们的经历和其他许多人的经历中，权威原来并不是那么权威。在第五次浪潮的条件下，他们的失败对人类的影响不能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愤怒者*诞生于Facebook, Twitter将他们的不满全球化。因此，这场经济危机更像是一场飞机失事，一场公开的大灾难，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政府无处可藏。

在动荡的2011年，来自西班牙下层的观点关注的是上层的人，统治精英，他们空洞的主张，似乎是既定制度在履行社会契约方面的决定性失败。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破灭了。对许多人来说，对信任的违背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政党或政策，变成了僵化僵化的“党派独裁”。毕竟，社会主义者已经被扫地出局，而保守派却保留了许多相同的旧政策。

出于数字化表达的绝望，一个对废除整个制度感兴趣的公众已经形成。

的“关键信息”

该运动的学生和参与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写道，抗议者“是对决定人们生活的整个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拒绝。””[14]这无异于消灭代议制民主和资本主义。如果这些现代世界的偶像能够被推翻，社会就会清除剥削和不信任，个人就会再次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存在。*愤怒者们就是*这样相信的。

从上面看——我的意思是，从历史的奥林匹斯山看——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这些信仰是否基于现实。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不可能发现的。几乎立刻，你就会碰到另一种历史或实验历史所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历史。*愤怒者*想象，如果没有“整个政治和经济机构”，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以及西班牙公众作为一个整体，都会过得更好。但问题依然存在:与什么相比?

与西班牙近代史相比，“*愤怒者”的诉求*听起来奇怪地格格不入。以摒弃代议制民主为例。1975年之前的40年间，西班牙一直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这个政权不容忍异议，更不容忍公众抗议。一场以街头抗议和占领公共场所为基础的运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自由民主所保障的言论权利，而自由民主是运动希望废除的。我猜想，*愤怒者们并*不想让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从坟墓里复活。但考虑到埃及抗议民众与军方之间的联盟是在反对民主结果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可能性也不应被视为一种俏皮话。

类似的不和谐也适用于经济问题。在人们的记忆中，西班牙一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如果“资本主义”指的是自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实践和制度，那么它的成就是非凡的。2011年，也就是危机爆发的第三年，人均GDP是1980年的五倍:约为3.2万美元，而1980年仅略高于6000美元。根据这些事情的标准定义，西班牙现在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是衡量财富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11年的31%，几乎翻了一番。同期，西班牙股市的市值从910亿美元跃升至逾1万亿美元。2012年，也就是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年，西班牙股市出现了

西班牙的人均手机*和*汽车数量超过了美国

财富的积累产生了可以预见的有益的社会影响。例如，1980年至2011年间，预期寿命增加了7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从1980年的千分之18下降到2011年的千分之4。各级教育入学率显著提高。2011年，互联网普及率接近70%。那一年，西班牙在Facebook普及率方面排名世界第九，拥有近900万用户。[15]

—

我不相信说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创造了*愤怒者*和他们的抗议活动所产生的阶级是在造句。尽管抗议者们有着深切的不满情绪，但他们博览群书，受过高等教育，行动灵活，足够富裕，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并且非常擅长动员在线社交网络，而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在这些网络上开始的。他们把民主保护和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就像他们对待自己呼吸的空气一样。

从上面看，*愤怒者*似乎是在反抗两个截然不同的敌人:西班牙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产生他们的历史力量——抗议者。考虑到这场运动的宗派主义特征，反抗精英的失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条战线的结果就不那么明朗了。舆论的浪潮需要时间才能膨胀成一场合法性危机:西班牙的民主，或者资本主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可能已经被2011年的事件致命地动摇了，现在只等着一些政治震动崩溃。在它发生之前，我们无从知晓。

但这样的胜利只会弄巧成拙。如果*愤怒者们*以某种方式成功地摧毁了他们深深鄙视的制度，他们将通过消除使两者成为可能的条件来消灭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运动。这不是一个谜题，也不是一个悖论，而是在第五次浪潮之后经常遇到的政治病理。

西班牙抗议者不愿提供替代现状的方案，这让他们陷入了否定的泥潭。他们只能嘲笑、谴责、拒绝。这完全符合他们的思维模式。他们制作的文件显示出很少的历史意识。他们为数不多的积极建议含糊不清，相互矛盾。只有一种否定暗示着可怕的事情

现在，还有充满活力的过去，*愤怒者*找到了他们真正的声音。

纯粹的否定是虚无的，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像童话里的诅咒，因为它是开放式的。在它的魔咒下，革命者永远无法宣布胜利，甚至无法从高处瞥见应许之地。他只能痛击既有的秩序，直到把历史的痕迹从社会生活中抹去。然后，他作为历史的孩子，也会消失。

所以我在这里，第一次，在西班牙街头反抗的背景下，提出虚无主义的问题。我用这个词指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毁灭的意志，包括自我毁灭的意志。具体地说，我指的是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否定，轻率地无视其后果。从上面看，*愤慨者*和他们的运动，至少在某些情绪上，被描绘成革命愿望和社会自杀协议的超自然混合体。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一代，当面对生存的挑战时，他们选择割断和撕裂自己的根。而且，他们并非无能为力或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掌握着全球信息领域的巨大说服力，而且，根据民意调查，他们得到了广大公众的大力支持。即使他们没能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也能够而且确实削弱了它的合法性——正如我所说，可能会达到致命的程度。

现在提出的虚无主义问题，将像一个忧郁的幽灵，盘旋在2011年的政治版图上。

特拉维夫的帐篷城如何变成了中产阶级不满的马戏团

2011年夏天席卷以色列的帐篷城抗议活动与西班牙以及更早的埃及和突尼斯的事件有着强烈的家族相似性。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意外。信息产生了湍流。示范效应在起作用。在他们的电视和笔记本电脑上，不安的以色列公众目睹了群众的力量，甚至可以使无情的独裁者屈服。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公众不满的爆发彼此相似，因为它们都是我的故事中巨大的地下碰撞的一部分——它们都是本章主题——铰链转动的例证。

以色列的抗议活动表面上是在特拉维夫开始的，但实际上是在埃及和西班牙爆发骚乱的同一个地方:Facebook。在同样的人口群体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使用数字网络的人。25岁的视频编辑、电影学院毕业生达芙妮·利夫(Daphni Leef)扮演了瓦埃尔·高尼姆(Wael ghonim)这个角色——尽管我认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从很多方面来看，她都是一个普通人。她没有领导任何政党或社会组织，也没有作为公众人物在她的国家激起任何涟漪。她只代表自己。
7月初，利夫得知她在特拉维夫公寓的租约不会续签。当她发现自己在市区内买不起另一套公寓时，利夫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份活动邀请:在时尚的罗斯柴尔德大道(Rothschild Boulevard)搭帐篷，抗议高昂的房价。

这一举动取得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成功。7月14日，利夫和几个朋友在罗斯柴尔德大道过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学生和劳工组织加入了抗议活动。到7月23日，一个帐篷城在林荫大道的商店和咖啡馆之间蔓延开来，3万人高呼“人民要求社会正义”的口号，游行到艺术博物馆。第二天，帐篷城和示威活动在耶路撒冷和十几个以色列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包括工人阶级聚居的城镇内盖夫和霍伦。就像在埃及和西班牙一样，抗议活动的规模扩大得比当局理解所发生事情的能力快得多。第一次示威游行两周后，超过30万人走上街头，据说这是以色列短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特拉维夫的游行者展开了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埃及在这里!
16

抗议者传达的信息是对亲市场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的野蛮批评，以及对自己的温和赞赏:他们到处抛出“觉醒”、“更新”和“重生”这样的词语，试图描述他们想象中自己带来的超然变革。并不是只有他们在为自己的行为鼓掌。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抗议活动的支持率非常高——在一次民意调查中高达88%。17

帐篷城的居民虽然出生在网络上，但很快就成了以色列新闻媒体的宠儿。
有时，似乎所有人都能清晰地表达一个

在这个能言能语的国家里，一种事业或一种思想把他们的希望投射到反叛者身上，就像投射在一块空白的屏幕上一样。阅读对2011年“以色列之夏”的早期报道和分析，就像是在一厢情愿的想法迷宫中漫步。[18]

以色列抗议者因为其定义的模糊性而吸引了相互矛盾的政治幻想。这重复了在埃及和西班牙建立的模式。领导者、计划和组织结构的缺乏是最明显的。那些定期接受媒体采访的人，比如利夫，很有魅力，也很聪明，但他们缺乏指挥或决定的权力，而且他们之间经常争吵。在是否与政府谈判的问题上，抗议者之间产生了分歧。社会正义的目标——被认为是起义的北极星——对他们和他们的媒体崇拜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释放出了巨大的动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颠覆了以色列稳定的政治格局。为了解释这种盲目的压力激增——为了把握以色列事件与我关于2011年阶段变化的假设之间的关系——我需要澄清，帐篷城抗议者到底是谁，以及他们最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谁”这个问题很清楚。抗议者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并受益于一些工人阶级分子的积极参与——但这不是他们。他们并不代表以色列人民或其无产阶级。几乎所有的组织者和大多数示威者都来自特拉维夫富裕的世俗德系犹太人家庭。这是中产阶级潮人的反抗，而不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比如达芙妮·利夫(Daphni Leef)，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有着她所属的艺术界所青睐的一般左派态度。她拒绝在军队服役，显然是出于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在这一点上，利夫与她的原型——更传统、政治上矛盾的韦尔·高尼姆——不同。

从参加帐篷抗议的团体来看，左翼人士在以色列发挥了比在西班牙更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一些右翼人士认为整个事件是左翼政党操纵的结果。这让我觉得不太可能，原因有很多——尤其是，如果以色列垂死的政治左派知道如何召唤大批群众，他们早在2011年夏天之前就会做到了。左翼未能在抗议活动中注入任何组织力量或明确的纲领。如果左翼分子

网民的宗派精神对年轻的反叛者的影响要大得多。

因此，他们的要求是无忧无虑的不连贯。举个例子:有人提议取消大学学费，增加教职员工的福利。[19]

作为一个阶级，以色列人的年轻一代甚至比他们的西班牙同龄人更受其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成功的影响。以色列成功地避免了2008年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人均GDP从2008年的27,600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31,000美元以上。失业率为5.6%，不是问题。大多数示威者要么保住了工作，要么完全期望毕业后能找到工作。他们不是没有未来的青年。从某些方面来看，以色列的不平等加剧了，但抗议者的人口结构一直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之一。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贫困率最高的阿拉伯以色列人和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在最底层挣扎，而且这两个群体都没有参加2011年的抗议活动。[20]

走上街头的是以色列的黄金青年。这是从上面看的，也是从地面看的。然而，就像*愤怒者一样*，他们希望砍掉自己的根。他们希望成为另一个自己。他们深深地感到，正如其中一人所说，“以色列社会缺少了一些东西;我们的集体优先事项出了问题。”这句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的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东西。他们的国家出了问题。“这与住房无关，”一位年轻记者解释道。“这是一种受欢迎的弑父行为。在对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自己的否定中存在着反抗的跳动的心脏。

这种感觉给对社会正义的模糊呼唤注入了生命力和紧迫感。抗议者用这句话表达了许多含义。在制度层面上，它意味着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猪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否定，以及对十多年来选民支持的市场导向政策的逆转。自2001年以来，以色列左翼势力遭到重创。受人尊敬的工党在建国后的史诗般的岁月里为这个国家助产，现在已经支离破碎，成了一片废墟。罗斯柴尔德大道的年轻人经常表达对旧时代唯心主义的渴望。尽管他们喜欢玩革命——一种嘲弄

断头台在帐篷里拔地而起——他们用过去来想象未来，要求的只不过是福利国家的回归。

社会公正也意味着要解决特拉维夫高昂的生活成本。达芙妮·利夫的不满在变成政治之前是针对个人的，但它在她这个年龄和阶级的许多人身上引起了共鸣。年轻人要求经济适用房。学生希望降低学费。家长们发起了一场反对托儿费用的“婴儿车抗议”。医生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人们难免会怀疑，这一群体“弑父”的热情，与其丧失赚钱能力成正比。

从罗斯柴尔德大道(Rothschild Boulevard)的帐篷城中，很少有人呼吁消除这种制度，或民主，甚至是非奴性的资本主义。但人们对现代政府寄予了奇妙的、近乎弥赛亚式的期望。

以色列叛逆的年轻人真正想要的是这个。他们希望政府纠正错误。他们希望政府在一个平等、友爱、当然还有负担得起的社会里为他们立法，让他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他们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甚至没有对其含义的定义，但这并不重要。这也是政府的工作——倾听那些被政治化的人群，那些要求社会正义的“人民”的声音，然后以某种方式实现它。利夫断言，以色列公民“明白，我们都应该得到更多;要明白他们有权向政府提出更多要求。[22]

内塔尼亚胡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偏好与他们自己随意要求国家干预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困扰。他们不是革命者，但他们也不崇拜代议制民主——而且，在他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他们相信罗斯柴尔德大道可以对耶路撒冷发号施令。“从现在开始，年轻人将塑造政府的愿景，”31岁的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s’ Union)主席、利夫(Leef)的竞争对手之一伊茨克·什穆里(Itzik Shmuli)宣称，他是抗议活动的媒体面孔。[23]

在这次事件中，政府虽然被起义的规模所动摇，但反应比在西班牙类似情况下更为敏捷。帐篷城首次搭建三周后，内塔尼亚胡任命了一个由经济学教授曼纽尔·特拉滕贝格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并对其进行了授权

他要求在一个月内提出具体的政策改革，以解决抗议活动背后的不满。在承认代议制民主机制在这次事件中失败的情况下，该委员会被要求充当政府与“公众内部不同团体和部门”之间的中间人。[24]这是对帐篷城人民的暗号。

特拉滕贝格委员会的建议包括住房补贴、对低收入者减税以及对富人和企业增税。这些措施违背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意愿，但它们在2011年10月获得了批准——这是朝着许多年轻抗议者所期望的福利国家迈出的一小步，也是试探性的一步。示威活动的规模和规模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不可抗力，政府对此做出了回应，因为它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无论是抗议者声称的遮羞布，还是真诚的妥协，如果没有帐篷城的反抗，受特拉滕贝格启发的法律永远不会得到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代表了反叛者的胜利。

这并不是他们的看法。对于那些对政府权力抱有无限信心的人来说，小步前进似乎是懦弱的蓄意阻挠。对于那些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手段实现个人转变的人来说，提供经济支持看起来像是贿赂——而且是微不足道的贿赂。对于被一边倒的否定所激励的公众来说，任何积极的、任何具体的东西都被视为威胁。

示威者不准备以任何条件宣布胜利。西班牙的*愤怒者*们就是这样，解放广场上的人群也是这样，尽管有一些地方差异。事实证明，2011年的多次起义不可能超越否定，与现实达成和解。在以色列，达芙妮·利夫周围的组织直接拒绝与政府谈判代表谈判。他们在宗派美德方面仍然固执己见。但即使是那些向政府伸出援手的人，比如施穆里和他的学生会，也否认了这一结果。

到那时，抗议活动已经达到了高潮。最后一次大规模示威是在9月3日。10月3日，警方拆除了罗斯柴尔德大道的帐篷城。零星的示威活动持续到2012年，但人数减少了，媒体的关注也减少了。政治力量集中在

内塔尼亚胡呼吁在2013年1月举行大选。两位著名的抗议者——其中一位是施穆利——在劳工党的名单上参选，并赢得了以色列议会的席位。他们从街头革命者转变为传统的政治家，标志着2011年的以色列之夏已经把灵魂交给了中间派。

2013年的选举结果与2011年的事件缺乏任何明确的联系。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党失去了7个席位，但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政党。内塔尼亚胡本人继续担任总理。他可能在抗议活动中被削弱了一些，但是，不像穆巴拉克和萨帕特罗，他没有被推翻。工党获得了几个席位，但仍停留在第三位。

达芙妮·利夫继续怒斥卑鄙的资本家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她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名人。她发起的抗议活动对她来说效果很好，尽管他们没有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也没有给以色列选民留下什么痕迹。
抗议活动也表明，在公众神秘莫测的表面之下，强大的否定潮流几乎不需要任何挑衅就能爆发成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埃及公众已经忍受了30年的胡斯尼·穆巴拉克统治。由于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太阳门广场的*愤怒者*失去了未来的希望。在以色列，公众对现有秩序的生存挑战是因为利夫发现她无法忍受通勤时间的延长。



5.2 Daphni 利夫

占领华尔街与令人困惑的否定政治

2011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西班牙和以色列的事件是网络化公众的真正动员，它将不同的利益群体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政治运动。在每一次事件中，人数都是巨大的，组织者都是政治上的业余爱好者，抗议活动几乎都是由他们发起的

立即获得了自己的生活。广大民众对抗议者表示了祝福。

2011年9月在美国各地涌现的各种“占领”团体没有达到其中的许多标准。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他们远不及以色列的30多万人走上街头，而这个国家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由于参与人数如此有限，这一事件有可能反映了半专业活动家和不满贩子的意愿，而不是一股席卷大部分公众的意见浪潮。在许多占领运动派系中，包括最初在纽约的派系，这种可能性接近于实地的现实。至于美国公众，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摇摆不定:多数人倾向于支持运动的目的，但不赞成运动的方法。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我毫不犹豫地将占领者纳入2011年阶段变化的一部分。请允许我提出三个原因。

第一，我发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和埃及、西班牙和以色列走上街头的民众在人口统计学和行为上有很强的相似性。他们是同一群人，在不同的国家:年轻人，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而且，在OWS运动中，主要是白人。宗派理想推动他们投身政治。原则上，所有这些都否定了对领袖、计划和自上而下的组织的需要。

纽约和许多其他占领地的组织者不成比例地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西班牙也是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介绍了占领者遵循的决策机制和原则——例如“全体大会”和对共识或“直接民主”的要求。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是经历过巷战的老兵，即使没有变得冷酷无情，也是经验丰富的，他们拒绝资本主义及其所有成果，鄙视自由民主。[26]

但是，如果无政府主义团体有本事在全美组织数百场抗议活动，他们早在2011年之前就会这么做了。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2011年抗议活动缺乏积极的政治定义——据统计，60%的OWS人士在2008年投票给了巴拉克·奥巴马，并对结果感到失望。[27]喜欢帐篷

特拉维夫的居民，他们想要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具宗派主义色彩的左翼运动，它在意识形态上偏爱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年轻的幻灭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不太可能被两者都注意到。

第二，在很大程度上，占领者的生活是虚拟的。他们在网络上组织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占据一个物理空间，他们占据一个物理空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网上谈论它。与2011年的其他抗议者相比，他们是第五次浪潮的生物，能够在人数不多的情况下，通过数字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Tumblr上的“*我们是99%*”(We Are The 99%)活动，让普通民众在一张纸上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对自由派评论员和整个新闻媒体产生了巨大影响。每一个占领运动的网站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Facebook页面。警察试图驱逐年轻占领者的每一次暴力行为都被手机视频捕捉到，并发布到网上。作为行动缓慢的“中心”的代表，市政府被迫陷入了进攻和撤退的尴尬套路，公众舆论时而对抗议活动造成的破坏感到愤怒，时而对解散抗议活动所需的武力水平感到愤怒。

所有这些都与我在本章中提到的其他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三:就像他们在西班牙和以色列的同胞一样，OWS抗议者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否定力量。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他们可以随意指责。他们厌恶的对象——掠夺性的经济体制、腐败的政府、金钱统治的社会——以一种共同目标无法做到的方式将他们团结起来。他们传播了一种观念，即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欺压底层的99%的人，而他们，少数中产阶级的白人年轻人，代表了广大的美国公众，人民，在反抗。OWS运动将这些一度边缘化的态度注入主流，成为自由派政客的口粮。在我看来，谴责的浪漫已经成为奥巴马总统治理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将百万富翁妖魔化，是奥巴马2012年竞选成功的一个修辞支柱。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担心的是，在公众与权威之间优柔寡断的冲突中，民主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OWS运动的人数可能很小，但传达的信息是重要的。它

将美国政治推向了纯粹的否定和不信任，侵蚀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仅凭这个原因，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就属于我对阶段变化的调查中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

* * *

也就是说，围绕OWS的奇怪事件的数量似乎违反了概率定律——尽管，当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做了，这就是我猜测的在起作用。从2011年初开始，出于明显的象征性原因，一些人试图扰乱华尔街。这些尝试吸引了很少的出席者，也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加拿大反消费主义在线杂志《广告破坏者》*(Adbusters)*发起了针对美国资本主义总部的第一次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该杂志在6月份注册了#占领华尔街#的标签，并在其博客上发布了以下建议:“你准备好迎接解放时刻了吗?在9月17日，我们希望看到2万人涌入曼哈顿下城，搭建帐篷、厨房、和平路障，占领华尔街几个月。[28]

那天出现的几百名示威者被警察赶出了公共场所，直到他们在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找到了避难所，在一种奇怪的理想混乱中，他们受到了私人属性神圣性的保护。当媒体对最初的占领视而不见时，组织者忘记了他们的反消费主义，转而求助于一家商业公关公司——工作马公关公司(Workhorse Publicity)，帮助他们传播革命的信息。这家公司做得非常好，实际上还因此获得了一个专业奖项。[29]

除了这些怪癖，OWS运动的故事可以用几句话来讲述。从9月17日到11月15日，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营地随着事件的发生而起起落落。在警察试图逮捕或驱散抗议者之后，更大的人群总是接踵而至。例如，一名纽约警察向一群年轻女性喷洒胡椒喷雾的手机视频在网上疯传，引起了极大的愤慨。继400名扰乱布鲁克林大桥交通的占领者被捕后，约1.5万名抗议者于10月5日从福利广场(Foley Square)游行到公园。不久之后，占领活动开始在美国各地蔓延——据一名消息人士称，占领活动蔓延至600多个地点。每个网站的人数仍然很少，但媒体对这场运动的关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纽约，

并非毫无同情心。包括劳联-产联在内的工会提供了支持，尽管工会成员大多不愿参与。就像在特拉维夫一样，这不是工人阶级的反抗。OWS运动也未能吸引到大量的非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裔活动人士。

每个占领运动的网站都拥护非暴力，但有些网站比其他网站更非暴力。在奥克兰，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指责对方的暴行。11月2日，占领奥克兰的“总罢工和反资本主义游行”成功关闭了奥克兰港——这可能是抗议活动对经济造成的唯一重大影响。

卫生问题一直是个问题，当局经常把卫生问题作为清理营地的借口。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无家可归者和其他明显不是中产阶级的人陆续进入营地，犯罪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15日，纽约警方以“环境不卫生”为由，将示威队伍驱逐出了祖科蒂公园。几天之内，市政府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占领地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零星的抗议活动和重新占领的尝试持续了几个月，但参与的人数逐渐减少，变得无足轻重，而公众舆论——就其对这场运动的关注而言——也变得消极起来。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公众和媒体已经不再关注这场运动。

事实证明，与实际的抗议活动相比，OWS运动僵化的宗派思维对美国政治生活更具吸引力。在呼吁第一次占领时，*广告破坏者*提出了一个单一的要求:一个总统委员会“负责结束金钱对政治的影响”。这一要求立刻被遗忘了。就像在以色列一样，媒体评论员和知识分子冲了进来，提出了让抗议者接受的方案。这些建议都被忽视了。作为原则问题，占领者拒绝提出要求。他们觉得向一个非法政府请愿有失身份。以下是祖科蒂公园大会“要求委员会”讨论的声明:

> *运动不需要提出要求,因为运动是一个自信的过程。这个运动有影响改变的力量。它不需要要求。OWS运动不提出要求。我们只会坚持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就越大。不要要求别人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自己。*[30]

我们以前听过这种情绪，希望——期望——等级制度能通过使其屈从于教派而被净化。“从现在起，年轻人将塑造政府的愿景，”伊茨克·什穆里说。政府不会被推翻。政府要成为宗派美德的工具。祖科蒂公园将指挥华盛顿，实现它想要的。作为一个普遍的主张，这与美国政治的现实脱节。但在任何给定的问题上，都不是这样:OWS可以动员公众舆论，实质上，它可能已经足够，对其否定的目标造成致命的伤害。

占领者想要实现的，正是2011年所有反叛者和街头起义者想要实现的:否定一系列历史条件、制度和关系，正是这些历史条件、制度和关系的持续存在，驱使他们进行反抗。他们希望用历史来废除历史，用等级制度来消除等级制度，用政府来推倒权威的庙宇。

OWS所反对的事情又长又深。9月29日通过的《占领纽约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New York)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数不多的正式声明之一，其中包括一堆对权威的疯狂抱怨，最后以一句平淡的呼吁“创建一个程序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结束。

我们来到你们面前,正值企业统治我们的政府,这些企业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将自身利益置于正义之上,将压迫置于平等之上。我们在这里和平集会,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事实,这是我们的权利。

他们通过非法的止赎程序没收了我们的房子……

他们肆无忌惮地接受纳税人的救助……

他们使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永久化……

它们毒害了食品供应……

他们不断寻求终止工人的权利……

他们用数万美元的教育债务来绑架学生……

他们一直外包劳动力……

[……]他们把我们的隐私当作商品出售。

他们动用军队和警察来阻止新闻自由。

[……]他们使殖民主义永久化了……

他们参与了对海外无辜平民的折磨和谋杀。[31]

—

这种系统性的不公正与所提议的行动——我上面提到的“过程”，对“维护你的权力”的粗略劝诫——之间的不相称反映了一种我们现在应该熟悉的逻辑形式。2011年的革命意味着谴责。真正的变革留给了别人。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他仔细阅读了占领运动地点的大会在线记录，并编制了一份参与者希望为世界做出改变的名单。这让人读起来筋疲力尽。

> *……控制金融投机,特别是高频交易;审计美联储;应对住房危机;规范透支费;管制货币操纵;反对工作外包;捍卫集体谈判和工会权利;减少收入不平等;税法改革;改革政治竞选资金;推翻最高法院允许企业无限制提供竞选捐款的判决;禁止对公司进行救助;控制军工联合体;改善对退伍军人的照顾;限制当选政治家的任期;捍卫互联网上的自由;确保互联网和媒体上的隐私;打击经济剥削;改革监狱制度;医疗改革;打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仇外心理;改善学生贷款;反对Keystone输油管道和其他环境掠夺性项目;制定应对全球变暖的政策;对英国石油公司和类似的石油泄漏公司进行罚款和控制;加强动物权利;支持替代能源;批判个人领导和垂直权威,从美国的新民主文化开始*

camps; and watching out for cooptatio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 . . [32] —

这些对现状的改善所使用的行动词，隐含着否定和消除:“改革”、“控制”、“逆转”、“限制”、“战斗”、“精细”、“批判”。加在一起，它们传达了一种对美国政治既定秩序的厌恶感。占领者并没有处理替代方案，但他们希望扫除大多数支撑他们世界的现存政治和社会安排。

从精英阶层的角度来考虑抗议者是有益的，他们否认了这些精英阶层的合法性。巨大的心理距离扭曲了这种视角。站在陡峭等级制度顶端的政客们把街上传来的喊叫声和口号当成了一种混乱的胡言乱语。因为他们是秩序的守护者，他们觉得有必要对门外的混乱做出一些回应。他们的困境是，任何反应都将使政府与叛乱分子面对面，极大地提高了后者的地位。

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透过他们的制度假设的厚厚的镜片来观察2011年的叛乱。如果反叛者想要废除历史，那么政治精英们就会被历史禁锢，并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按照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的逻辑行事。因此，政府的行为显得奇怪地战术化、局部化，与意识形态脱节。

穆巴拉克认为，如果他否认示威活动的存在，示威活动就会消失。当激烈的战斗在开罗的街道上流血时，国营的埃及电视台一直在播放购物中心里欢快的人群。然而，这位上了年纪的独裁者没有察觉到，*信息人*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的政权不再有能力支配现实。当穆巴拉克意识到他必须直接回应抗议时，已经太晚了。

萨帕特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感受到了反抗和否定的诱惑，却发现自己成了这两者的攻击目标。在意识形态上，他来自一个平等主义的传统。实际上，他是西班牙的总统，有着他的职位所带来的所有浮华和距离——以及来自反叛公众的敌意。萨帕特罗和他的政党从未解决这个根本的困境。

自由市场主义者内塔尼亚胡的回应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则，转而解决来自罗斯柴尔德大道的更具体的抱怨。

他的政府以不同寻常的战术速度行动，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幸存下来。

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从未对联邦政府构成丝毫威胁。几乎所有由自由派民主党政客领导的市政府，都在努力对当地的占领采取适当的姿态。就连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社(Michael Bloomberg)，一个亿万富翁和“百分之一”(如果有的话)，也首先依靠技术细节来容忍，然后关闭了祖科蒂公园。在网站被清理期间，彭博社不让记者进入网站——同样给出了模糊的技术原因。

有时，奥巴马总统被媒体问及他对占领运动的看法。他总是以同情的态度回应抗议者，他把抗议者的不满与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问题让他在2008年赢得了总统职位。这是总统的一个相当典型的声明:“我认为它(占领运动)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挫败感，我们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在全国各地造成了巨大的附带损害……然而，你仍然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试图打击那些最初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滥用行为。为了强调这一信息，10月16日，白宫宣布奥巴马总统“为99%的人的利益而工作”。[34]

一位现任总统拥护一项因为政府是由企业经营而否定政府合法性的运动，这似乎令人费解。这位总统的动机可能包含了一些政治考量的因素。许多年轻的抗议者曾是2008年奥巴马竞选活动的积极分子。

但我敢说，奥巴马总统对OWS运动的同情是真诚的，这是任何政界人士都可以做到的。我还认为，这场运动的否定恰恰吸引了总统。它们与他对世界的直觉评估，以及他关于如何在不放弃自己美德的情况下驾驭事件的想法是一致的。OWS运动并没有影响总统。因果关系之箭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竞选期间就预料到了这场运动的许多修辞特征，这也是2011年许多“占领者”参与其中的原因之一。

奥巴马总统在这场阴暗的世界战争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但它属于一个更大的主题——民主政府的命运——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总统提供了一个机会，打破了他从未觉得相投的制度视角。像萨帕特罗一样，奥巴马可能认为自己既是反叛者又是总统，但与萨帕特罗不同的是，他在这两种身份上都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结构。

奥巴马总统代表了当权的宗派情绪。抗议活动使他能够对该国的统治机构提出批评，并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对其合法性的怀疑。

八月的伦敦，或者反复出现的虚无主义问题

2011年8月4日星期四下午6点15分，马克·达根在伦敦托特纳姆社区与警方发生冲突时被枪杀。由于英国警察枪杀事件的官僚作风令人难以理解，这一事件的细节直到今天仍不明朗。29岁的达根显然携带武器，据说参与了犯罪活动。

6日下午，120多人聚集在英国托特纳姆警察署前。一份政府委托的关于伦敦骚乱的报告说，该组织是由达根的“家人和支持者”组成的，但我想知道死者的个人关系是否真的延伸到那么远。有些人可能是被指责的乐趣所吸引。大多数人对警察都有一种真诚的厌恶。抗议活动最初是和平的，但到了晚上8点30分，发生了严重的骚乱，警车遭到袭击并被点燃。

于是，为期四天的骚乱和抢劫开始了，伦敦数十个社区遭受重创，并蔓延到英国其他城市。在流血和破坏中，达根枪击案很快就被遗忘了。它曾经是一个火花，但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不是一个事业。在结束之前，已经有5人死亡，数十人住院，无家可归，造成了价值5亿英镑的损失。

与解放广场和太阳门广场不同，伦敦骚乱没有收到Facebook的邀请。但参与者积极使用黑莓短信服务(BlackBerry Messaging Service，简称BMS)

受影响社区的年轻人。《经济学人》将这些骚乱命名为“黑莓骚乱”。“[35] 2011年8月，全球信息领域在伦敦发挥作用。

与2011年其他事件不同的是，犯罪行为是骚乱的显著特征。许多被捕的人以前都有过违法经历，四分之一的人过去犯过10多次罪。[36]但是，这一事件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场快速推进的犯罪浪潮。这是法律及其执法者权威的崩溃:完全不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伦敦罪犯的角色与祖科蒂公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相似。他们用行动展示了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找出骚乱的“原因”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两种宇宙叙事最终结晶并相互对峙。第一个讲述了一个社会压迫和剥夺的故事:它将骚乱归咎于政府削减开支和随之而来的服务缺失，以及失业、不平等和种族主义。第二种叙述谴责了英国人的道德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骚乱者是一种权利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容忍不当行为，却不要求任何责任或自我约束。

事实上，2011年的伦敦骚乱是一系列极其复杂的人际互动。我不知道如何去证明一个或几个原因导致了这次事件。我怀疑，对这种宇宙原因的探索，更多地是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热情的驱使，而不是出于分析的好奇心。

我不需要解释暴动，所以我就不解释了。我要做的是，把这一事件放在公众与权威之间的全球冲突的背景下进行框定。我还将表明，它增加了2011年一个阶段变化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有利于公众的重大战略逆转，公众现在占据了信息和传播的高度。

这一切似乎都没有特别具有挑战性。

* * *

即使从事犯罪行为，公众也是公众。英国各地约有1.5万人参与了骚乱。他们在一件特殊的事情上有着共同的兴趣:偷东西、砸东西却不受惩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效地废除现有的权威——政府、属性的保护者、令人讨厌的警察。暴乱者在游戏的早期就做到了这一点。新闻媒体和网络上传播的图片显示，年轻人闯入商店抢劫，而警察站在一旁，看起来很困惑。在骚乱发生之初，英国当局就像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中一样无能为力，反应迟缓。

暴乱参与者在数量上的优势加上战术上的通讯指挥，使他们的优势更加明显。他们在伦敦不太富裕的地区肆意妄为，他们可能就住在那里，但他们也利用BMS组织袭击伦敦购物区的消费中心。

> *来自伦敦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伦敦中心牛津广场!!光秃秃的商店要被砸烂了,所以来拿点(免费的东西!!)去他妈的联邦政府,我们会把他们和我们的暴乱一起送回去!>:哦…37*

牛津广场实际上成了骚乱的发生地。

BMS系统为暴徒提供的战术优势成为了警察的战略噩梦，他们可以窃听信息，但很快就会被大量可用信息所淹没。伦敦大都会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关于骚乱的报告在社交媒体这一主题上很有意思。

> *8月的事件表明,社交媒体如今被意图制造混乱的人广泛用作策划和沟通媒介。*
>
> *[……]公安部无法全面实时监控社交媒体,因此无法走在事件的前面。*
>
> *具体来说,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技术都没有足够的弹性来审查、捕获和下载大量的公开信息*

source data which needed to be processed. [38] —

这些文字可能是突尼斯、埃及、西班牙或以色列统治阶层中的官吏写的。他们被压抑的愤怒沸腾了。一个“意图制造混乱”的人竟然在沟通和智慧上胜过当局，这是对自然秩序的违反:是对神圣的践踏。信息海啸席卷了英国政府和伦敦警方的权力。

肇事者与2011年的政治叛乱分子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然而，他们并不是“黄金青年”，尽管他们对BMS系统的精通表明他们有能力购买同样类型的电子设备。对警察的仇恨是将街上的乌合之众融合成真正的公众的共同参考点之一。警察代表着一种他们希望从地球上消失的权威结构。否则，他们就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可言。当被问及他们为什么抢劫时，最常见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一位参与者把问题反过来问:“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获得新东西的机会?” [39]

暴力和犯罪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他们关注的是特定的对象:警察、专门销售数码产品的商店。通过YouTube的魔力，你仍然可以看到2011年的年轻掠夺者从伦敦的商店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等离子电视，抱着电子游戏。他们想要享有盛誉的小玩意和娱乐，这些都是富裕阶层的产物。但是，像其他民主国家的反叛者一样，他们在他们所希望的生活和使这种生活成为可能的制度之间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精神分离。这种间接的自我毁灭的方法再次提出了虚无主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一会儿会多说一些。

现在应该很清楚的是，英国当局不仅在2011年的骚乱中没有尽到责任，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没有尽到责任。政府首脑、内政大臣、伦敦市长和反对党领袖都在国外度假，不得不匆忙赶回国内。官方安抚和控制局势的声明似乎与电视屏幕和笔记本电脑上铺天盖地的画面脱节。暴乱者所憎恶的警察，现在又招致了属性所有者的敌意。自保的平民团体自发形成，媒体略带贬义地给这些团体贴上了标签

"义务警员"，但可以说是在接近自然状态的情况下表现出明智的行为。在许多地方，在8月的那四天里，政府的合法职能失去了控制。

在暴乱后的震惊中，英国政府开始考虑自己在信息和通讯方面的劣势问题。它提出的解释，足以让穆巴拉克哈哈大笑。对图像和感知的控制——演示效果——是最重要的，正如2011年中心层级的典型情况一样。政府任命的专家组注意到了这一点

> *英国内政事务特别委员会(Home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表示，骚乱蔓延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电视和社交媒体传递的感知是,在一些地区,警方失去了对街道的控制。*[40]

但失去控制并不是一种感知。这是地面上的现实。所以这里隐含着一个想法:如果电视描绘了一个不同的现实，真正的现实将不复存在。该小组建议，“广播媒体”应该“继续努力”，以提高其准确性和清晰度，并保持“最高的新闻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建议在公共骚乱期间，把购物中心里快乐的英国人的画面放在电视上，但事情的精神是一样的。

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态度也在意料之中。托特纳姆区议员提议关闭黑莓即时通讯服务。首相戴维·卡梅伦同意，合法当局需要对公众的数字表达能力施加限制。“当人们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暴力活动时，”他说，“我们需要阻止他们。[41]他没有说该怎么做，这番勇敢的讲话也没有带来什么成果。然而，他的心态却很能说明问题。认为政治权力可以关闭信息领域的信仰被证明不仅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独裁者的幻觉。这是中央政府持续存在的幻觉。



5.3伦敦抢劫手机[42] Photo©2011 D. Clements

英国骚乱与2011年的其他事件不同，尽管差异并不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公众的观点和愿望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而不是犯罪行为。在托特纳姆和牛津广场上扰乱和平的年轻人厌恶权威，并相应地做出了行为。适当考虑的话，他们的行为也与政治抗议者的世界观相一致——事实上，比抗议者的行为更一致。只有在英国，混乱才演变成暴力，因为只有骚乱者的行动才将2011年的否定推到了合乎逻辑的结论。

我可以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我的意思。它是这样的。

假设占领者长长的否定名单准确地描述了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民选政府不对人民负责,实际上是企业的独裁。在银行和企业剥削工人、毒害自然的同时,它们所控制的政府却压制言论自由,在海外谋杀和折磨无辜者。民主游戏的规则是一种诡计,一种掩饰真相的诡计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最富有的1%对最底层的99人的压迫。

如果这真的描述了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下的生活,那么理性的反应会是什么?

2011年的政治反叛者们对这个问题含糊其辞。大多数人都是舒适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对当下的戏剧太感兴趣了，无法接受自己言论的含义。于是，他们占领了一个公共空间，抗议现状，希望某种外部力量——大概就是他们如此鄙视的政府——能带来改变。

英国暴徒的行为就好像政府、警察和法律都缺乏合法性一样。我坦率地承认，他们没有考虑清楚这一点。他们没有写宣言，也没有喊出聪明的政治口号。但他们的宣言也不是无声的呐喊:他们偷窃、焚烧，有时还杀人，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具身政治抗议者一直呼吁的变革。后者拒绝了他们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暴徒则将后果付诸行动。

暴徒们生活在一个无因无果的世界里。他们设想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斥着手机、视频游戏和等离子电视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破坏了使这种生活成为可能的过程。他们表现得好像理想的事物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他们脚下的草一样。可恨的权威制度只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我将英国政府对骚乱的笨拙反应与穆巴拉克政权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进行了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中央和等级制度的授权似乎比民主或威权主义更重要:这是民主国家抗议者的抱怨。但是，同样地，在某种程度上，公众的否定和否定必然会提出虚无主义的问题。英国的犯罪公众与其他地方的政治公众最相似，都无视这一界限。

福克斯的面具能告诉我们什么人的混乱

2011

2011年的抗议者只在好莱坞版中通过他们的幻想生活与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本书描述的几乎每次抗议活动中，你都会发现人们戴着2006年电影《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中流行的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这对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无法想象列宁、毛或卡斯特罗会允许他们的同志假扮一个虚构的人物。

对复仇情节剧的迷恋暗示了2011年的年轻违法者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以及他们想象自己在做什么。

1606年，盖伊·福克斯因参与火药阴谋炸毁议会而被处决。这个面具传统上是在“盖伊·福克斯之夜”戴着的，人们会用篝火庆祝阴谋的发现。好莱坞颠覆了这个故事。这部电影描绘了一个由狂热的宗教专制政府统治的未来英国，其迫害听起来就像占领华尔街的受害者目录:“移民、穆斯林、同性恋、恐怖分子、疾病缠身的堕落者……“V”是一个戴着福克斯面具的神秘人物，为了推翻政府，他实施了一场暴力狂欢。影片的结尾是，戴着V形面具的庞大人群压倒了安全部队，背景是国会大厦和大本钟爆炸的音乐声。

在对自己所处的地点和时代的厌恶中，V有时听起来像是一*名愤怒者*。“事实是，这个国家出了严重的问题，”他沉思着。但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动作英雄，在影片的132分钟里，他亲自屠杀了统治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这种对正义大乱斗的渴望，以优秀的电影风格，丝毫不受质疑。
虽然这很难说是2011年的政治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V字仇杀队》对*参与者的影响。Wael Ghonim用盖伊·福克斯的面具来强调他作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说过”Facebook页面管理员的匿名性:



祖科蒂公园43号的5.4 " ~~V~~

> *2006年,我看了电影《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爱上了这个神秘战士与邪恶作斗争的故事。当我创建Facebook页面时,我仍然受到这个想法的影响:一个匿名哨兵的概念,他试图唤醒身边的人,激励他们反抗政府的不公正。为我的文章《你是谁,行政先生?》我用了电影主角所戴的与众不同的面具作为主要形象。*[44]

—

“我认同V对改变的渴望，”温文尔雅的高尼姆解释说，“尽管我绝不赞同他的暴力手段。”对于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

这个面具最初是由黑客组织“匿名者”(Anonymous)引入的，用于抗议政治，该组织声称自己拥有与《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主角类似的巨大力量*。“匿名者”只能被描述为第五波的变种后代，从最虚无主义的元素中衍生出来

，它在公众与权威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不确定的角色。它的成员有时说话像革命者，但通常表现得像伦敦的暴徒，窃取数据和破坏网站，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最终被确认身份后，他们都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激进政治活动。当他们夸口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lulz”时，他们是认真的。[45]

匿名者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YouTube上一系列以面具为主题的夸张视频中，黑客们做出了许多威胁——比如，要和支持者一起“涌入曼哈顿下城”、宣布“向纽约警察局宣战”、利用黑客技术“抹掉”纽约证券交易所。事实证明，这更像是一出戏，而非现实。一段视频传播了向抗议者喷洒胡椒喷雾的警察的姓名和个人资料。拒绝服务攻击拖慢了纽交所的速度，并使其下线了几分钟。除此之外，黑客社区对2011年的动荡唯一持久的贡献，就是用V面具重新连接了它。[46]

我不想把这件事说得太过分。就像命名惯例一样，对《*V字仇杀队*》的迷恋是更大冲突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它揭示了抗议者的一种情感取向:他们在极端程度上是自我戏剧化者。他们的言语和行动之间的脱节，他们对结果的理解和对原因的冷漠之间的脱节，可以用这种特质来解释。

和V一样，他们的自我戏剧化表现在否定的姿态上——否定、指责、毁灭、抹去历史、留下未来的空白。影片以对旧政权的摧毁作为结尾。剩下的事情自然会水到渠成。“只要有足够的人，炸毁一座大楼就能改变世界，”V曾宣称。但这只存在于小说中。

瓦埃尔·高尼姆得到了近乎完美地扮演V的机会。作为一股默默无闻的政治力量，他折磨穆巴拉克政权，集结反对者，并协助策划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然而，在胜利的那一刻，需要的不仅仅是否定。电影已经结束，但埃及的戏剧还在继续。高尼姆是现实生活中的V，一旦反对的姿态失去效力，他就缺乏一个可以遵循的剧本。



5.5《匿名者》的自我戏剧化

因为民主国家的政治环境要危险得多，所以那里的自我戏剧化相应地显得更加奢侈。

欧洲、以色列和美国的政治叛逆者感到，权威结构(尤其是政府和经济精英)的失败背叛了他们。这种感觉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金融大师和监管者曾愚蠢地下了大赌注，但当2008年股市触底时，承担损失的是公众，而不是他们。批评甚至冷嘲热讽的空间很大。

然而，最终，像“失败”这样的术语只能相对于某些期望来应用——我们已经看到，反叛者对现代政府的期望在其范围上是虚幻的，在定义上是空洞的。他们把神奇的，或者，我冒昧地说，神圣的特质归于繁琐的，过于人性化的官僚机构。他们相信政府能创造奇迹:政府能赋予他们个人生活以意义。这种信仰在以色列最为明显，

这个国家迅速克服了危机的影响。那里的抗议者富裕且有工作，但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正义的背景下实现个人的实现。他们从未解释过这意味着什么。大多数美国占领者也保住了工作。相反，那些最接近贫困的人从未参加过2011年的任何街头反抗。

即使在抗议活动的言辞中，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说得对，他写道，“这场运动”是关于“一切，同时又什么都不是”。[47] 2011从未执着于2008:其冲动是要彻底废除历史，开启一个净化因果关系的未来。

由于渴望在某种世界历史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反叛者常常给人一种他们在寻找原因的印象。他们蔑视细节——意识形态，政策——却擅长冗长的指责。法国愤怒的先知埃塞尔(st<s:1> stephane Hessel)了解这种自我恶化的过程。

> *的确,愤怒的原因在今天似乎不那么清晰,世界似乎也更加复杂。谁说了算;谁是决策者?这并不总是容易辨别的。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小群精英,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清楚地识别。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联系。但我们周围也有无法忍受的事情。你必须去寻找它们;仔细搜索。*[48]

一生都在寻找难以忍受的东西，必然会破坏大多数现存制度和社会安排的合法性，包括那些创造和维持破坏者的制度和社会安排。

与虚构人物V不同的是，2011年的实际抗议者无法抹去权力和社会的污点。穆巴拉克下台了，西班牙社会主义者被投票选为濒临灭绝，内塔尼亚胡妥协了，奥巴马借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但结果是，三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地方能与参与者的灿烂期望相匹配。旧的制度依然存在。工业时代的等级制度因其自上而下的短视而跌跌撞撞。这些结构的行为遵循着一种内在逻辑:尽管伊茨克·什穆里(Itzik Shmuli)有乌托邦式的宣言，但政府从未成为社会力量的仆人

反抗。

但我在本章中提出的假设，并不是说2011年的公众有兴趣或有能力取代当前的权威机构。它们两者都没有。宗派主义到极点，公众一*想到*要承担中心的职能，就会感到腐化。在最明显的层面上，这一阶段的变化涉及一种新的能力，可以动员大量公众，从而吸引从政府领导人到媒体再到普通选民等所有政治参与者的注意。这是天底下的新事物，只有在第五次浪潮的改变中才有可能实现。数字平台让那些想要洗劫伦敦商店的暴徒，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能比当局更聪明地组织和行动。

其后果不是革命，而是永久动荡的威胁。当局敏锐地感觉到，现在仍然感觉到他们的*无能*。政府意识到，公众随时可能涌入政治舞台，以光速组织起来，谩骂否定的诅咒。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已经彻底变得士气低落。这是否应该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进行研究。但是，当权派政客之间的信任危机已经排除了采取大胆行动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

这一阶段的变革始于2011年，但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在2013年2月的意大利大选中，一个名为“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新政党在议会下院赢得了25%的选票，成为那里的第二大政党。这个派对是一个喜剧博客的创意，他自称贝佩·格里洛，以*《木偶奇遇记》中的Jiminy Cricket角色命名*。除了愿意参加选举之外，五星运动在所有方面都完美地再现了2011年抗议活动中令人困惑的理想和否定。尽管获得了800多万张选票，但它缺乏一个连贯的纲领。唯一的统一原则是对意大利政治建制派的深深厌恶。贝佩·格里洛的崛起与改革或激进变革毫无关系，但这意味着既有秩序的羞辱和道德败坏。

这是2011年最深刻的后果:在民主进程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你谴责*政客*的时间有限，之后你就必须拒绝这个产生他们的制度的合法性。2011年的抗议活动公开迈出了这一步，相当一部分选民也这么做了

为之鼓掌。就像金钱和婚姻一样，合法性在*客观上*是存在的，因为绝大多数公众在*主观上*同意它确实存在。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改变了想法，那么授权的魔力就会消失。这个过程对分析人士来说是缓慢而不可见的，但是，正如我所指出的，转折点会突然到来——对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权来说，仅仅是几周的事情。现有的自由民主政体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多远，这是一个猜测问题。我们还有时间去发现，用V的话说，2011年的街头反抗确实“改变了世界”，而且不是以一种好的方式。

章节注释

1 Henri Rosanvallon, *Counter-Democracy: Politics in an Age of Dis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2 Manuel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Polity Press, 2012), 112.

3 Manifiesto "Democracia Real Ya," my translation, http://www.democraciarealya.es/manifiesto-comun/

4 Fernando Cabal, ed. *Indignados! 15 M* (Mandala ediciones, no date) Kindle location 135.

5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128 forward.

6 Manifiesto "Democracia Real Ya."

7 Photo by Juan Santiso.

8 Javier M. Faya, "Fabio Gándara, portavoz de ¡Democracia Real Ya!: 'Yo votaré el domingo,'" *Diario de Burgos*, May 19, 2011, http://www.diariodeburgos.es/noticia.cfm/Espa%C3%B1a/20110519/fabio/gandara/portavoz/democracia/real/ya/votare/domingo/31CA6909-036C-F947-4C5DA36DC9652FB4

9 Cabal, *Indignados! 15 M*, Kindle location 451.

10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141.

11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economic data in this chapter comes from the World Bank Data Catalog website, http://datacatalog.worldbank.org/

12 "El PSOE solicitará al Congreso de Diputados que se reconozcan los 'derechos humanos' de los simios," *El Mundo*, May 24, 2006, http://www.elmundo.es/elmundo/2006/04/24/sociedad/1145890969.html

13 "Zapatero admite que el dato del paro es 'objetivamente negativo,'" *Cinco Dias*, December 10, 2008, http://cincodias.com/cincodias/2008/11/04/economia/1225938222_850215.html

14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122.

15 "Facebook Facts & Figures for 2010," *Digitalbuzz*, March 22, 2010, http://www.digitalbuzzblog.com/facebook-statistics-facts-figures-for-2010/

16 Noah Efron, "The Israeli Summer," *The Huffington Post*, July 31, 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noah-efron/the-israeli-summer_b_914389.html ; Harriet Sherwood, "Israeli Protests: 430, 000 Take to the Streets To Demand Social Justice," The Guardian, September 4,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sep/04/israel-protests-social-justice; Asher Schecter, "A Short

Guide to Israel's Social Protest," Haaretz, July 11, 2012, http://www.haaretz.com/news/national/a-short-guide-to-israel-s-social-protest-1.450369

17 Harriet Sherwood in *The Guardian* cites a figure of 90 percent.

18 See, for example, Melanie Lidman, "Scale of Social Protests Surprises Experts," *Jerusalem Post*, August 11, 2011,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Scale-of-social-justice-protests-surprises-experts

19 Yoav Fromer, "Generation Aleph: The Selfish Goals of the Tel Aviv Tent Protesters," *Tablet*, August 17, 2011,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75270/generation-aleph

20 Economic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Data Catalog website, http://datacatalog.worldbank.org/ ; see also Tia Goldenberg, "Israeli Protests: Poorest Sit Out Demonstrations," Huffington Post, August 12, 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8/12/israel-protests-poorest_n_925446.html

21这两句话都出自frommer, "阿莱夫一代"。

22 Naama Cohen-Friedman, "Social Activists: The Revolution Is Here," *Ynetnews.com*, July 30, 2011,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102107,00.html

23 frommer, 《阿莱夫一代》。

24 Herb Keinon, "Trajtenberg Oversees First Meeting of 'Rothschild Team,'" *Jerusalem Post*, August 9, 2011, 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Trajtenberg-oversees-first-meeting-of-Rothschild-Team

25 Image by Rafimich, Wikipedia Comm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Daphne_Leef_%D7%93%D7%A4%D7%A0%D7%99_%D7%9C%D7%99%D7%A3.jpg

26 David Graeber, "Occupy Wall Street's Anarchist Roots," *Al Jazeera* in English, November 30, 2011,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1/11/2011112872835904508.html; Nathan Schneider, "Thank You, Anarchists," The Nation, December 19, 2011,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65240/thank-you-anarchists# ; "Translating Anarchy: Interview with Mark Bray, OWS organizer and author of the new book Translating Anarchy: The Anarchism of Occupy Wall Street," OccupyWallStreet, September 12, 2013, http://occupywallst.org/article/translating-anarchy-occupy-wall-street/

27卡斯特,《*愤怒的网络*》,199年。

28 "#OCCUPYWALLSTREET: A Shift in Revolutionary Tactics," *Adbusters*, July 13, 2011, https://www.adbusters.org/blogs/adbusters-blog/occupywallstreet.html

29 "2012 Platinum PR Awards: WOW! Awards," *PRNews*, August 15, 2012, http://www.prnewsonline.com/featured/2012/09/15/2012-platinum-pr-awards-wow-award-3/

30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188.

31 "Declara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New York City," #OccupyWallStreet, NYC General Assembly, http://www.nycga.net/resources/documents/declaration/

32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186.

33 Andy Kroll, "VIDEO: Obama: Occupy Wall St. 'Expresses the Frustrations the American People Feel,'" *Mother Jones*, October 6, 2011, http://www.motherjones.com/mojo/2011/10/obama-biden-occupy-wall-

34 Glenn Thrush, “W.H. With the ‘99-Percenters,’” *Politico44*, October 16, 2011, http://www. politico. com/politico44/perm/1011/obama_preoccupied_2e1e701c-9e52-4e29-a7a3-1d074659996b.html

35 “The BlackBerry Riots,” *The Economist*, August 13, 2011, http://www. economist. com/node/21525976

36 “One in Four Riot Suspects Had 10 Previous Offenses,” BBC, September 15, 2011, http://www.bbc.co.uk/news/uk-14926322

37 Josh Halliday, “London Riots: How BlackBerry Messenger Played a Key Role,” *The Guardian*, August 8,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1/aug/08/london-riots-facebook-twitter-blackberry

38 *Four Days in August: Strategic Review Into the Disorder of 2011*, *Final Report*, 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 March 2012, 105, http://content.met.police.uk/cs/Satellite?blobcol= urldata &blobheadername1= Content-Type&blobheadername2=Content-Disposition&blobheadervalue1 =application%2Fpdf&blobheadervalue2=inline%3B+filename%3D%22145%2F595%2Fco553-114DaysIn August.pdf%22&blobkey=id&blobtable=MungoBlobs&blobwhere=1283551523589&ssbinary=true

39 “London Riots: Young Rioters Say They’re Proud To Steal,” *Mirror*, August 11, 2011, http://www.mirror.co.uk/news/uk-news/london-riots-young-rioters-say-146880

40 *After the Riots: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Riot Communities and Victims Panel*, no date, 22, http://www.fredsakademiet.dk/ordbog/sord/riots.pdf

41 Doug Gross, “British PM Proposes Social Media Ban for Rioters,” CNN, August 12, 2011, http://www.cnn.com/2011/TECH/social.media/08/11/london.riots.social.media/index.html

42伦敦暴动视频截屏，http://www.youtube.com/watch?v=Ed0QJJL9sYQ

43 From Joe Lustri, *bogieharmond*, http://www.flickr.com/photos/68146720@N05/6356999163/in/photolist-aFKhnR-avSxur

44高尼姆,*革命2.0*,102。

45 The *Urban Dictionary* offers a helpful definition of “lulz” for the uninitiated: “Lulz is the one good reason to do anything from trolling to rape. After every action taken, you must make the epilogic dubious disclaimer, ‘I did it for the lulz.’”

46 The best summary of Anonymous participation in OWS, which includes the YouTube videos, is Andy Captain’s “The Real Role of Anonymous in Occupy Wall Street,” *Fast Company*, October 11, 2011, http://www.fastcompany.com/1788397/real-role-anonymous-occupy-wall-street

47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185.

—

48 Stéphane Hessel, *Time for Outrage*, (Hachette Book Group, 2010) 11.

的危机
权威

6

2011年的街头抗议虽然表面上是政治性的，但却是全球对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权威捍卫者的攻击的一部分。抗议者与政府的关系，就像博客和社交媒体与报纸、YouTube与电视、纳普斯特与唱片行业、大规模在线课程与大学、亚马逊与购物中心、开放科学运动与科学机构的关系一样。站在信息领域的制高点上，公众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寻求打破被认可的精英所把持的垄断。

权威，正如我所使用的术语，源于合法性，源于垄断。在某种不确定的程度上，公众必须信任和听从权威，否则它就根本不是权威。权威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传递确定性。它在群体的共同故事背景下解释现实。为此，它必须依靠说服而不是强迫，因为赤裸裸的武力会破坏信任和信念。说服的需要反过来解释了对可见的权威象征的制度性倾向——贵族的长袍，医生的白色连衣裙，金融家的阿玛尼西装。权威是一种无形的品质，行使它的人希望被认可他们的本来面目。

从历史上看，他们一直是社会戏剧中唯一的演员，公众沦为观众，只能哭泣或鼓掌。权威是作者(author)的一种扩展，它最初的意思类似于“发起者”——在本来是惰性的人群中活跃的人类因素。

目前的权威结构是工业时代的遗产。当公众需要答案时，他们会求助于机构，而不是有魅力的个人。这些机构经历了泰勒式的理性化过程:它们无一例外地自上而下、专业化、职业化，容易出现伪科学的仪式和行话。要进入这样的权威领域，需要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认证过程——多年的学术教育和学徒期。招到的人多，被选中的人少。被选中的人相信自己是他们特殊领域的毋庸置疑的主人——多年来他们也是如此。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公众缺乏质疑、更不用说反驳来自信息垄断的权威判断的手段。

今天的大多数权威人士都是在那个幸福的时代走上自己的位置的。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思想上，他们都对局外人不屑一顾。他们对业余侵入者的本能厌恶激发了霍德19年半的刑期，以及对肖恩·范宁和纳普斯特的相互毁灭诉讼。

当然，这种激烈的反应部分可以解释为对失去权力和金钱的恐惧。权威与这两者密切相关——这是一种自然的联系。权力需要准确的情报来采取行动。垄断一直是一个开拓市场的位置。如果我停止笼统的思考，想象一个具体的权威人物，我就会变出一个警察、一个政治家、一个银行家。

一方是权威，另一方是权力和金钱，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公众往往看不见。但每一种都对社会关系产生离散的影响，而在这三者中，我认为权威很容易是最重要的。

即使从纯粹的实践角度来看，说服也总是胜过强迫或贿赂。合法性的授权魔力比警察的棍棒或百万富翁的支票更能深刻而持久地引导社会行为。

这些主张本应被视为老生常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公众不是这样认为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认为每一次权威的失败都必须用金钱和权力的勾结来解释。许多分析人士也不这么认为，他们信奉某种版本的旧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概念——认为公众可以被说服去听从权威，而违背自己的最大利益。

在一个历史规律以及未来事件的形态被完全理解的世界里，虚假意识可能会被唤起。只有在对因果树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被允许把一个理智的有意识的决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真”还是“假”。但这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不是人类的状况。在每一项决定及其后果之间，都笼罩着一层无法穿透的不确定性。现在只能猜测未来，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过去的记录并不好。即使在专家中，过往记录也很糟糕。原因不是错误的意识，而是人类事件的惊人复杂性，这使得预测变得不可能。

当被问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时，周恩来应该是这样回答的:“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在那个例子中，如果是真的，周是以一个诚实的政治分析家而不是革命预言家的身份说话的。

权威掏空现有机构的危机，并不是因为这些机构把自己出卖给权力或金钱而产生的。这是事后的解释——碰巧大多数公众和许多专家都相信这种解释。然而，需要解释的事实是失败:机构声称的能力与实际表现之间令人痛苦的可见差距。我认为，这种差距是人类知识局限的结果。它一直存在。改变的是公众对它的认识。

在工业时代，权威的出丑一直被谨慎地管理着，被处于行业巅峰的专家的神秘感所掩盖。今天，失败发生在公开场合，在公众面前，每个人都能看到。随着全球信息领域的到来，每一次失败都被捕捉、复制、倍增、放大，并被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权威。危机在逻辑上是随着既有机构所拥有的说服力——合法性和可信性——的毁灭而来的。

这本书的重点是政治，因为我个人关心民主的未来，但也因为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分析政治事件。这是我自己的特殊领域。但我也可以把科学机构或大学不稳定的未来作为我书的首要主题。战场无处不在。对权威的攻击已经扩展到社会景观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在那里，既定的等级制度面对着控制新交流平台的公众。

在本章中，我的意图是说明这种更广泛冲突的某些方面，并反思其后果。一些权威领域——科学、金融机构、商业——已经被用来代表其他领域。许多其他机构本可以在一出类似的失落与困惑的悲喜剧中扮演同样的角色。政府在这里是次要的，但从来没有完全缺席。它为科学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并对银行和企业进行了监管，但效果并不确定。权力和金钱永远不能被完全抛弃:这是阴谋论者满意的源泉。

另一方面，真正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阴谋来解释，如何解释权威的危机和制度的不稳定行为。

如果SCIENCE是THE的神，那么THE就站在了决定的边缘

1919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皮卡迪利大街召开会议，宣布了阿瑟·爱丁顿在巴西北部普林西比岛和索布拉尔市探险的发现，这是现代科学在公众中享有声望的划时代时刻。这关系到宇宙的形状。

爱丁顿是剑桥天文台的负责人，他在5月29日日食期间测量了光的引力曲率。牛顿的宇宙，以其绝对空间的概念，预测了0.87弧秒的曲率。然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抛弃了绝对空间。它假设了一个自我折叠的宇宙，有限但无限，并预测了引力曲率大约是旧模型的两倍。“恒星应该看起来从太阳向外偏移了1.7秒弧，”

爱因斯坦在1916年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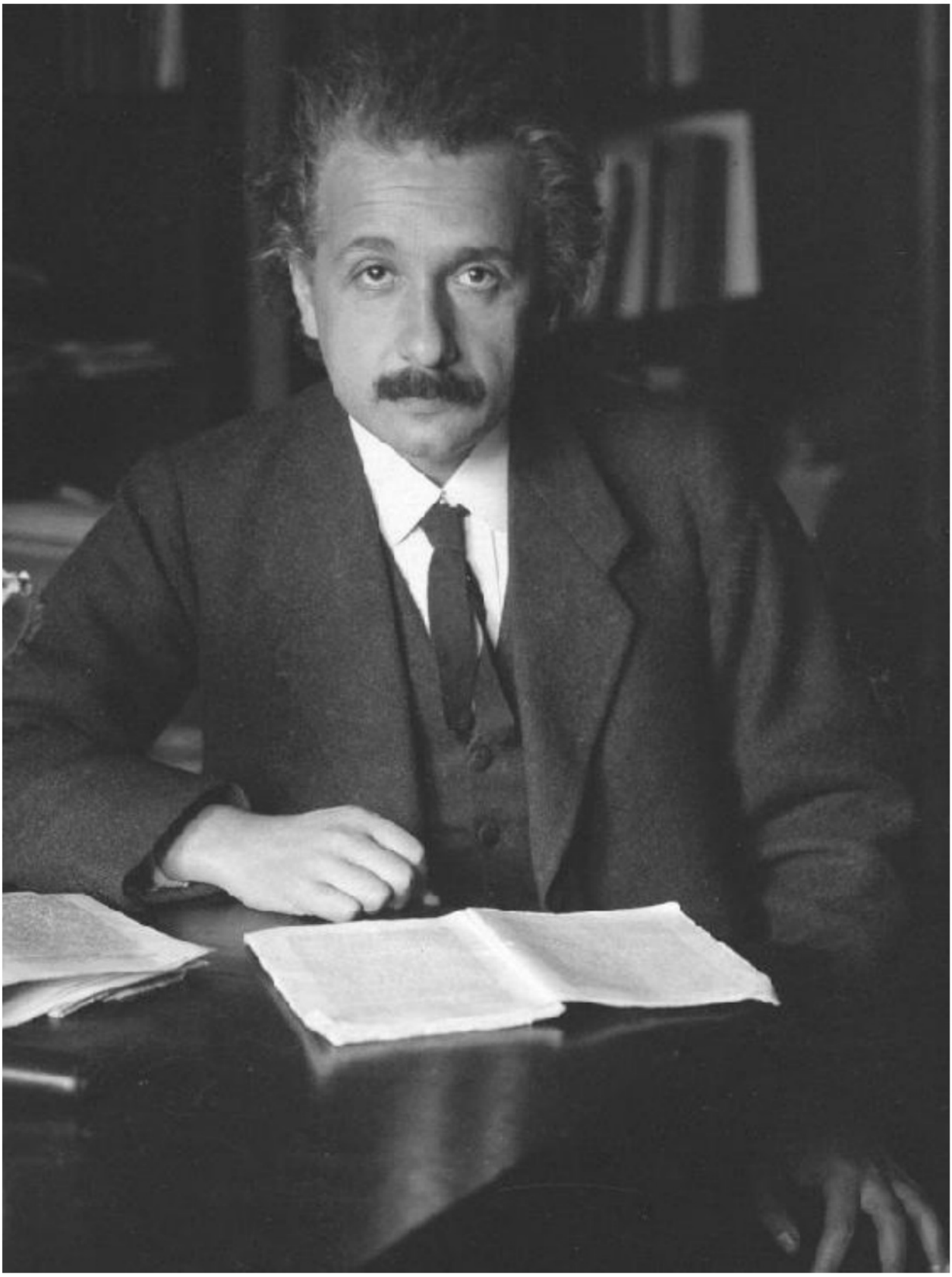
聚集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杰出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爱丁顿的测量结果显示，光的曲率略高于1.7弧秒。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森爵士强调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它们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说着这些话，宇宙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形式。

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狂热。伦敦《时报》的标题是“SCIENCE革命”。“牛顿思想被推翻。”论文热情地表示，爱因斯坦的理论将“需要一种新的宇宙哲学，一种将扫除迄今为止所有被接受的哲学”。《纽约时报》也不甘示弱，称爱因斯坦预言的证实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成就。”第二天，它的标题是:“天空中的灯光都歪斜了。”

这种反应只有放在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自18世纪以来，伏尔泰等知识分子感到有义务涉足化学实验，科学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知识中最严谨的领域。科学意味着说话具有极大的权威。我们已经看到，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给他的体系贴上了“科学管理”的标签。早在几十年前，马克思就把他的政治理想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乌托邦式的计划。

一般来说，科学家的声望来自于这样一种信仰，即他探索了神秘的领域，并为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利益。但这一事件的某些特殊条件有助于放大爱因斯坦成就的共鸣。

这是大众传媒时代的第一个重大科学突破，而且它发生在一个只有少数杰出专家才能理解的领域。当被告知人们相信世界上只有三位科学家能够理解广义相对论时，爱丁顿安静了下来。“我只是想知道第三个可能是谁，”他解释道。新闻媒体告诉公众，宇宙的结构已经被具有超人智慧的人以难以理解的方式改变了。科学家们被伪装成柏拉图式的守护者:高高在上、高高在上。



6.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20

这一事件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直接而痛苦的时期，但却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琐碎竞争。一个由英国赞助的考察队以牺牲一位英国天才为代价，证明了一位德国理论家是正确的。科学工作者是无私追求真理的旧观念似乎得到了证实。

爱因斯坦的公众形象有力地强化了这一点。他成为了第一位科学家媒体明星，他小心翼翼地努力符合曾经被应用于基督教圣人和古典时代哲学家的刻板印象:一个如此致力于真理和智慧的人，他把所有世俗的欲望都远远抛在脑后。爱因斯坦忧郁的眼睛、浓密的胡子和凌乱的头发，为两代公众具身了科学，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对人类对财富、权力和私利的正常激情的冷漠。

我觉得将1919年11月的那一刻与我们自己的时代进行比较很有启发意义。当时，科学家们的言论毫无疑问是权威的。他们所属的机构——英国皇家学会、普鲁士科学院——为他们的工作质量提供了保证。反过来，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个深奥的话题时，也找到了热切的听众。

工业时代的等级制度没有受到挑战。没有人怀疑爱丁顿的发现，也没有人要求看原始数据。奇怪的是，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科学工作是混乱的。爱丁顿并没有简单地提出光的引力曲率为1.7角秒的单一测量值。有很多测量结果，一些来自普林西比，一些来自巴西，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评估和平均。

向皇家学会公布的数字或多或少是通过任意排除异常值得出的。爱丁顿的发现被证明是有效的，但这些发现既基于他对爱因斯坦计算的信任，也基于他的考察所收集的数据。

在爱因斯坦取得胜利后的大约一个世纪里，科学的实践已经发生了变化。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中:仅在美国就投入了大约4000亿美元

2009.[3]富裕的代价是研究的集中化和制度化。政府、大学和企业界组成的铁三角控制着科学家个人的职业生涯。结果，追求真理的孤独而无私的理想被科学家官僚的理想所取代。尽管科学的各个领域差别很大，但一般来说，科学的成功与其说是由研究成果的质量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为机构带来“研究支持”的能力决定的。

从业人员通过忠实地、毫无疑虑地服务于他们的机构主人，从而上升到科学机构的顶端。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这一点不亚于在民主国家。政府对研究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治上的考虑。[4]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向癌症宣战”。如今，对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气候变化的研究在政治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公众对具体结果的期望所产生的压力使诚实的科学行为变得复杂。

人们对科学方法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所有科学家都认同的唯一方法是同行评议过程。这一方法也面临着压力。同行评议的前提是有独立思考的专家来评估可管理的数据集。通常，在第五次浪潮时代，这两个条件都不适用。今天的科学家以团队为单位工作，研究的主题可能非常专业，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理解和回顾文献。作者和审稿人可以在一个相互欣赏和保护的亲密圈子里互换位置。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对知识的限制会导致一位分析人士所说的“研究卡特尔”，它会积极扼杀少数或非正统的观点。[5]

与此同时，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必须审查的数据量激增，超出了现有机构的吸收能力。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已成为对数据进行排列和建模的必要条件，而且通常需要高级的统计技能来评估任何发现的有效性。包括审稿人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同行评议过程作为一个更简单时代的遗留物，因此越来越不能保证许多科学领域研究的完整性和合法性。[6]

总而言之，自1919年以来，科学实践从宗派边界(爱因斯坦的发源地)转移到一个由大型官僚机构主导的中心。从事科学实践的科学家们被吸收进了服从上级命令的等级制度中。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回忆一下，爱因斯坦是后者中的一员——极大地扩大了，通常的障碍被竖起来阻止入侵者进入权威的内部殿堂。例如，科学期刊的费用变得令人望而却步，因此只有机构才能付得起订阅费。头衔、终身职位和奖励激增。在这方面，科学机构的行为与政府、新闻行业和工业时代其他机构的行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机构都声称对信息拥有垄断地位，以证明自己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是合理的。

可以预期，不守规矩的公众最终会挑战现有秩序的这样一个支柱:事实就是如此。业余爱好者从许多方面涌入了科学领域。为了本章的目的，我只要稍微提一下两件发人深省的事情就足够了。

第一个事件始于一种熟悉的仪式:控制着信息领域的公众，以一种完全出乎权威意料的方式行事。2009年11月19日，有人入侵了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数千封电子邮件，并在一个不知名的俄罗斯服务器上向公众公布了这些邮件。电子邮件上的名字属于参与全球变暖研究的最杰出的气候学家，其中包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许多主要贡献者。这封邮件的发布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计划于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协调气候变化政策。

从这些电子邮件中，人们看到了气候学等级制度的一幅不太讨人喜欢的肖像，*这是自然而然的*。科学家们听起来虚荣、小气、偏狭、沉迷于媒体报道，对外人辱骂。当涉及到自己的数据集和计算机程序时，他们往往显得一窍不通。在这方面，他们面临着与爱丁顿相同的问题:地球过去的温度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而是对许多温度“代用物”的解释，比如树木年轮和冰芯。这些电子邮件清楚地表明，气候学家发表的断言超出了他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无论如何，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已经丢失了。在这里，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问题

爱丁顿不知道，也可能无法想象:根据《信息自由法》(FOIA)，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求提供论文中引用的数据集。[7]

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阿尔法官僚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和英国CRU负责人菲尔·琼斯(Phil Jones)。这两个人互相提名对方获奖，并向同事施压，要求他们签署支持IPCC正统观点的请愿书。忠诚和不忠诚的问题，维持该组织的信息垄断的问题，充斥着他们的电子邮件。激怒这些机构看门人的威胁是那些闯入的局外人、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提出所有这些FOIA请求的“怀疑论者”和“反对者”。

曼恩、琼斯和他们周围的一群科学家把自己包裹在同行评议过程的斗篷里，而“怀疑论者”一直回避这种过程。他们是经过认证的科学专业人士，在合法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是他们的信条，是他们权威的来源。但由于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他们所在领域的同行评议，而这些电子邮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让不同的声音远离期刊和媒体，因此他们的说法建立在一个循环逻辑之上。很明显，本应匿名的评审过程已经成为气候学领域的一个舒适俱乐部。以下是琼斯给曼恩的信:

> *你可能认为基思或我已经审阅了你的一些论文,但我们并没有。我审阅了雷和马尔科姆的论文,希望是建设性的,我认为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我也知道你非常有建设性地审阅了我和加比·海格尔的论文。*[8]

当持不同意见的作者终于设法在*《气候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同行评议的论文时*，曼恩的反应是攻击并使该出版物失去合法性。

>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停止将《气候研究》视为合法的同行评议期刊。也许我们应该鼓励气候研究界的同事们不再向该杂志投稿或引用该杂志的论文。*[9]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的资深人士汤姆·威格利(Tom Wigley)对*气候*研究中的“垃圾科学”感到厌恶，他建议“直接去找出版商，指出他们的期刊被认为是一种垃圾。

在审稿工作的幌子下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介。威格利的想法是对《华尔街日报》进行一种驱魔，包括清除允许发表这篇违规论文的编辑。

> *迈克让编委会成员辞职的方法可能不会奏效——他必须把冯·Storch也除掉……我听说发行商对von Storch并不满意,所以上述方法可能也会消除这一障碍。*[11]

曼恩似乎特别震惊的是，这篇相反的论文的作者之一是来自哈佛的有资格的天体物理学家。

> *这次最新的攻击使用了一个妥协的同行评议过程,作为一种工具,在明显合法的科学审查的幌子下发起一场科学虚假信息运动(通常是恶意和个人的),允许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使用"哈佛"的绰号。*[12]

这些电子邮件显示，世界领先的气候学家正忙着组织一个研究联盟。当同行评议过程支持他们的立场时，它就是一种合法的权威来源。当它为正统的批评者提供了一个平台时，它就受到了损害，如果不是恶意的。粉碎不同观点的愿望，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与追求真理变得难以区分。在这一尝试中，他们最终失败了，但电子邮件显示，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

在许多官僚主义的绝望背后，隐现着史蒂夫·麦金太尔的影子。我们以前听过他的故事:一个撞进权威内部圣殿的业余爱好者。麦金太尔是加拿大人，有数学天赋，2002年左右对气候科学产生了兴趣。他的博客"气候审计"(Climate Audit)成为气候数据怀疑论者组成的喧闹而重要的社区的中心参考点。几乎所有在电子邮件中抱怨的FOIA要求的数据都来自麦金太尔和他的支持者。

麦金太尔与气候科学的关系与瓦埃尔·高尼姆与穆巴拉克政权的关系是一样的。他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被颠覆性的新技术赋予了权力，他的行为方式让中心的官僚们感到震惊。

琼斯在早期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对网络没什么兴趣。”“……我会忽略那些所谓的怀疑论者，直到他们进入同行评议的舞台。“我知道世界在变，我们做事的方式也在变，”很久以后，琼斯带着明显的遗憾回忆道，“但这些要求和各种简单的错误，不应该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妥善处理事情的方式。”他是那些伟大的工业机构的声音，看着他们的世界陷入混乱。

尽管气候学家在内部邮件中偶尔承认麦金太尔的计算是正确的，但在外部，他们觉得有必要在每一步都毫不妥协地诋毁和谴责麦金太尔。“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为这个白痴做出任何让步，”曼恩告诫一位英国同事。在给琼斯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曼恩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我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我不会回复，甚至不会承认收到了他们的电子邮件。在我看来，没有理由给他们任何数据，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在自担风险!"[16]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本·桑特(Ben Santer)最好地表达了人们的共同信念，即麦金太尔代表了大门内的野蛮人:

>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再容忍麦金太尔先生和他的亲信的行为。[…]在我看来,史蒂夫·麦金太尔是气候科学界自封的乔·麦卡锡。我不愿意接受他对我的科学研究进行麦卡锡式的调查……今后我将继续拒绝这样的数据要求。我也不会向麦金太尔提供计算机程序、电子邮件通信等。我对这些问题的感受非常强烈。我们不应该被科学上的操场恶霸所胁迫。*[17]

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这种恐惧和厌恶的对象不是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这样的美国参议员，也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麦金太尔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博主，除了说服别人之外，没有别的力量。这是自爱因斯坦时代以来的新鲜事物，科学家们无法忍受的是被闯入者质疑的行为。在他们的交流中，气候学的主要实践者也不像爱因斯坦。他们听起来自私自利，思想封闭，与公众对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完全相反——而且，在电子邮件公布后，他们被曝光

这个不讨人喜欢的方面，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对CRU邮件的报道以一种全球信息领域典型的不稳定方式进行。大众媒体不确定如何理解这个故事，一开始对它避而远之，但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在博客圈爆发，首先是围绕气候审计的重要社区。11月20日，《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气候门:人为气候变化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18]就这样，这件事有了一个永久的、或许缺乏想象力的名字。新闻媒体现在蜂拥而至，报道的倾向性完全取决于消息来源在人为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编辑立场。CRU的科学家们同样毫无想象力地坚称，他们被断章取义了，这一事件暴露了“怀疑论者”发起的一场“人格诋毁”运动。[19]

后果难以预料。对气候科学信任的侵蚀可能是哥本哈根峰会失败的部分原因，但这很难证明——而且，无论如何，这超出了本章的范围。涉及电子邮件的几位气候学家，包括曼恩和琼斯，都受到了他们所在机构的调查。虽然他们作为科学官僚领主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但他们都被证明是清白的。考虑到是“中心”在调查“中心”，这样的判决是可以预见的。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公众如何判断这件事。

我相信公众对科学的评判比科学机构对自己的评判更为严格。我承认这一点也很难证明:据我所知，在气候门事件发生前后，没有任何公众对科学信任的衡量标准。也没有回溯到1919年的数据。现有的调查显示，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度显著下降，但我怀疑它们低估了事实:许多人在被问及科学时，仍然想到爱因斯坦，而不是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中心。他们深情地回忆起那个孤独的真理追求者，却看不到那个官僚主义大师。只有在关注具体问题时，公众才会承认，甚至是对自己承认，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有多大。

左派人士认为，科学是大企业的工具，科学家们愿意用转基因食品毒害我们，

动物为他们的老板赚取更大的利润。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这是足够准确的。不可否认，企业支付并控制了所有科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

对于右翼人士来说，科学已经成为大政府的使女，引发气候和环境恐慌，为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施越来越严格的政治控制辩护。这种说法虽然言过其实，但总体上是正确的。政府的支持是当今科学研究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权力和政治利益，就会给予这样的优待，那就太虚伪了。

CRU邮件中披露的信息可能会促使公众在一条彻底改变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感知的道路上又迈出一步。这位善良的真理守护者，往好了说，已经变成了偏远精英的自私自利的盟友，往坏了说，已经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不道德的走狗。这种转变是不完全的、不稳定的，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把受青睐的科学领域排除在外。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并不重要。合法性和婚姻一样，是一个非是即否的命题。你不能部分结婚，也不能部分合法。

我可以间接地把科学界权威的危机追溯到1919年的那一刻，以及公众心中对科学的力量和科学家的本质所形成的期望。这些期望是完全不现实的，但缺乏现实主义是公众与大机构关系的特点。在过去，这抬高了大机构的威望。如今，这让它们暴露在阴谋和欺诈的指控之下。这位科学家辜负了自己崇高形象的失败，侵蚀了他地位的合法性，我怀疑这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

我的最后一件事让我得以一窥这种失宠对科学家个人可能产生的影响。

2009年4月6日，意大利古城拉奎拉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拉奎拉的新老建筑像火柴棍一样倒塌，造成300多人死亡，65000多人无家可归。事后，意大利公众的愤怒转向了国家重大风险预测和预防委员会的科学家们——这个机构的不幸名字被认为与它的表现背道而驰。检察官起诉了7名科学家

委员会成员被控过失杀人罪，指控他们提供了关于致命地震风险的“不准确、不完整和相互矛盾的信息”。[21] b> 2012年10月，这7人被定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多万美元。

这似乎是一个意大利式的离谱期望落空的案例——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这一事件包含了许多层次的冲突和困惑。

拉奎拉和加州一样，位于一条主要的断层线上，在4月6日的灾难发生之前，它经历了几次较小的地震。在悲剧发生前几天，风险委员会的科学家官僚们在该市开会评估情况。然而，他们的注意力被两个话题分散了。一个是该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另一件事是一个业余爱好者闯入了他们的特殊领域，这个人就是乔阿基诺·朱利安尼。

当地人朱利安尼声称发明了一种方法，通过使用非常规的指标来预测地震，比如氡水平。他既不是地震学家，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科学家:《经济学人》略带嘲讽地将他描述为核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技术员”。但是，他预测3月29日附近的苏莫纳镇将会发生一场严重的地震，这使他为自己吸引了相当多的注意力，并在公众中引起了一些恐慌。结果证明这是一场虚惊。

在拉奎拉开会的风险委员会成员们担心的，是朱利安尼和他对合法权威的践踏，以及地震灾难的威胁。在闭门讨论科学的过程中，他们多次承认不能排除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然而，当他们面对媒体时，他们似乎对反驳朱利安尼危言耸听的言论更感兴趣。

意大利政府科学官僚机构的高级官员贝尔纳多·德·贝尔纳迪尼斯(Bernardo De Bernardinis)肯定地说:“科学界继续向我证实，事实上这是一个有利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持续的能量释放。”贝尔纳多·德·贝尔纳迪尼斯是七人中唯一一个实际上不是科学家的人。

当被问及公众是否应该喝杯葡萄酒放松一下时，德伯纳迪尼斯回答说:“当然，当然”，并推荐了当地的葡萄酒。[24]六天后，拉奎拉成了一片废墟。

公众需要对风险进行评估。它合理地得出结论，风险委员会正在这样做。公众听到了一位专家的预测:较小的地震“持续释放能量”意味着发生危险地震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但委员会的专家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做预测。科学家官僚们认为，他们是在反对伪科学，是在重申他们对非法从业者——非法侵入者的权威。正如一位敏锐的分析师所观察到的，风险委员会的声明“根本不是专门针对地震的，而是关于公众应该将哪些人视为合法和权威的，哪些人不应该被视为合法和权威的。”[25]

公众对察觉到的制度失败的愤怒推动了刑事起诉，而定罪则引起了公众的满意。但对科学家们来说，整个事件令人费解。其中一名地球物理学家在被判刑后惊呼:“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26]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以回答这个问题来结束我对科学作为一种权威机构的简短考察。

风险委员会的专家们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公开承认科学强加给他们的不确定性程度。他们不愿意公开地说:“我们不知道短期内拉奎拉是否会发生大地震。”在这种不情愿中，他们表现出了典型的中央等级制度。CRU的气候学家也认为，公布他们研究结果的统计不确定性水平会妨碍他们传达信息。“忽视不确定性是不对的，而仅仅以武断的方式表达不确定性是不对的……使不确定性淹没了时间变化的规模，”基思·布里法抱怨道。[28]

风险委员会(Risk Commission)等机构代表权威，换句话说，它们的处理方式是确定的。他们声称自己在各自的领域里对真理和谬误都有能力。任何怀疑的迹象都破坏了这一主张。公众

不确定性为不择手段的局外人创造了机会——像乔阿基诺·朱利安尼和史蒂夫·麦金太尔这样的人——用“垃圾科学”污染公众的思想。

然而，要摆出万无一失的姿态，需要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成功水平，以及对说服手段的垄断。结果，这两个条件都远远没有满足。

意大利专家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们在科学家的抱负和权威官僚的权力之间跌入了沟渠。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成为风险委员会的成员，但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把精力集中在赶走朱利安尼这样的入侵者上，而不是集中在他们专业知识的实体上。

最终，这七人被判有罪，因为意大利公众对科学的过高期望迟早只会导致幻想破灭和感知失败。科学永远不会成为上帝。科学家既不是对抗癌症战争的指挥官，也不是地球对抗气候变化的救世主——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预见即将来临的灾难的先知。事实证明，爱因斯坦的预测能力并没有超出他的特殊研究领域。在一个信息过剩、制度障碍崩溃的时代，在一个充满不信任的社会里，其结果必然是一种背叛感和惩罚欲。

这些都不能成为起诉的理由，更不用说监禁了。这不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我的论点是这样的:公众与权威之间的深刻冲突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全面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机构被原谅，即使是曾经最受尊崇的科学。在意大利的背景下，对风险委员会(Risk Commission)科学家的起诉，必须被视为一场针对精英的更大反抗的一部分。2013年，这场反抗让一个不知名的政党——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赢得了选举胜利。
掌控着信息领域的公众发现，中央处处存在腐败现象，并利用其新的说服力攻击每一个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将科学错误定罪，只是这场世界大战中的一场冲突。趋势一直是

把这段插曲视为某种意大利特有的，但我再说一遍，冲突是结构性的、全球性的。意大利政府可能特别软弱，很容易被公众吓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2009年的意大利或许可以让我们窥见其他民主政府的未来。

专家们的恐慌，或者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是如何不知道的

如果亨利·罗森瓦隆(Henri Rosanvallon)的“不信任社会”有一个正式的诞生日期，那就是2008年9月15日，周一: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投资银行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后，终于在这一天破产了。在随后的经济大屠杀中，专家和政治精英们暴露出了惊人的无知程度，而且是在整个世界都能看到的舞台中央。银行家和监管者、政客和官僚——结果证明，他们都对未来下了醉醺醺的赌注，实际上是在帮助把美国经济推下流动性不足和坏账的悬崖。其后果是立竿见影的、毁灭性的。全世界的普通民众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失业率升至一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

六年后的2014年初，受影响的经济体尚未从2008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人们对经济专家的信任已经消失，可能是永远消失了。

当然，我的故事关注的是专家阶层的这场沉船，而不是危机本身。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生平和时代说起是一个合适的起点，正是他把一位经济专家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几乎是神话般的人物。

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主席——这是美国中央银行的一个不祥的名字，通常被不带任何意味地称为“美联储”。根据法律，美联储的使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同时，维持物价的稳定。这些目标背后的主张，我只能用一种神奇的品质来形容。它们预设了一种完全脱离经济现实的预言和控制能力。美联储主席就像《天方夜谭》中的精灵一样，被期望驯服这股旋风。

格林斯潘是在8月份被任命的。两个月后的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超过500点。一万亿美元的持有财富一夜之间消失了。22%的单日跌幅是历史上最大的——相比之下，大萧条之前的股市崩盘的跌幅还不到12%。第二天——“可怕的星期二”——许多著名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他们找不到买家。

无论是美联储内部还是外部，没有人知道市场暴跌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如何扭转自由落体——或者如何防止一场金融灾难吞噬整个经济。新主席收到了惊慌失措、自相矛盾的建议。尽管美联储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技术性声明来安抚市场，但格林斯潘选择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联邦储备委员会，与它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责一致，今天确认它准备作为流动性的来源来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这标志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向低息化转变。

到可怕的星期二结束时，市场已经反弹到创纪录的涨幅。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股市恢复了向上攀升的势头。经济复苏的原因和最初的崩溃一样难以理解，但格林斯潘获得了很大的功劳。[30]松了一口气的民选官员和新闻媒体都认定，危机期间肯定有人在掌权，而美联储主席，这个职务描述暗示着超人的力量，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这一事件为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18年任期奠定了模式。在此期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通胀和失业率都很低。由于他的地位，格林斯潘被认为应该为持续的繁荣赢得最大的掌声。格林斯潘本人避免提出这种说法。像每一位优秀的分析师一样，他明白未来是不可知的，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影响经济的能力有限。[31]

但他是美联储主席，他站在一个巨大的权力等级体系的顶端，我怀疑他认为自己必须被视为有先见之明、能掌控局面的人。他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怀疑，

他形成了一种折磨人的沟通方式，使得不同的观察者对他所说的话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把这种方式称为“建设性的模棱两可”。格林斯潘在公开场合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圣典一样被解读。甚至他的沉默也被解读为阴谋。

格林斯潘因在1995-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而受到赞誉:对许多人来说，他似乎已经废除了商业周期的铁的必要性。在一个难得的骄傲时刻，格林斯潘将软着陆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了比较，将他自己对有意义的经济数据的探索与爱丁顿对普林西比和巴西的短途旅行进行了比较。格林斯潘就像爱因斯坦一样，在他的领域里成为了一个高耸的人物，一个专家中的专家，这是肯定的，但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名人。鲍勃·伍德沃德2000年为这位美联储主席写的传记，书名就叫《*大师*》，让人联想到天才指挥家的形象，他一挥指挥棒，就把经济引向了完美无瑕的表现。
2006年1月，79岁的格林斯潘从美联储退休，《*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暗指他“近乎神一般的地位”，并指出他经常被称为“这个国家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艾伦·格林斯潘主导了美国经济政策二十年，”文章反映道。“谁能接替他的位置?一旦他走了，联邦储备会发生什么?”格林斯潘最重要的成就是说服了精英和公众，追求物质幸福需要一位杰出的专家来监督。

格林斯潘代表了一种相对新型的公众人物。他是某种程度上的经济权威，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官僚大师。这种混合体，即专家官僚，与记者、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学行政人员，实际上还有科学家官僚，属于同一阶层。他们似乎都是事物永恒秩序的一部分，但实际上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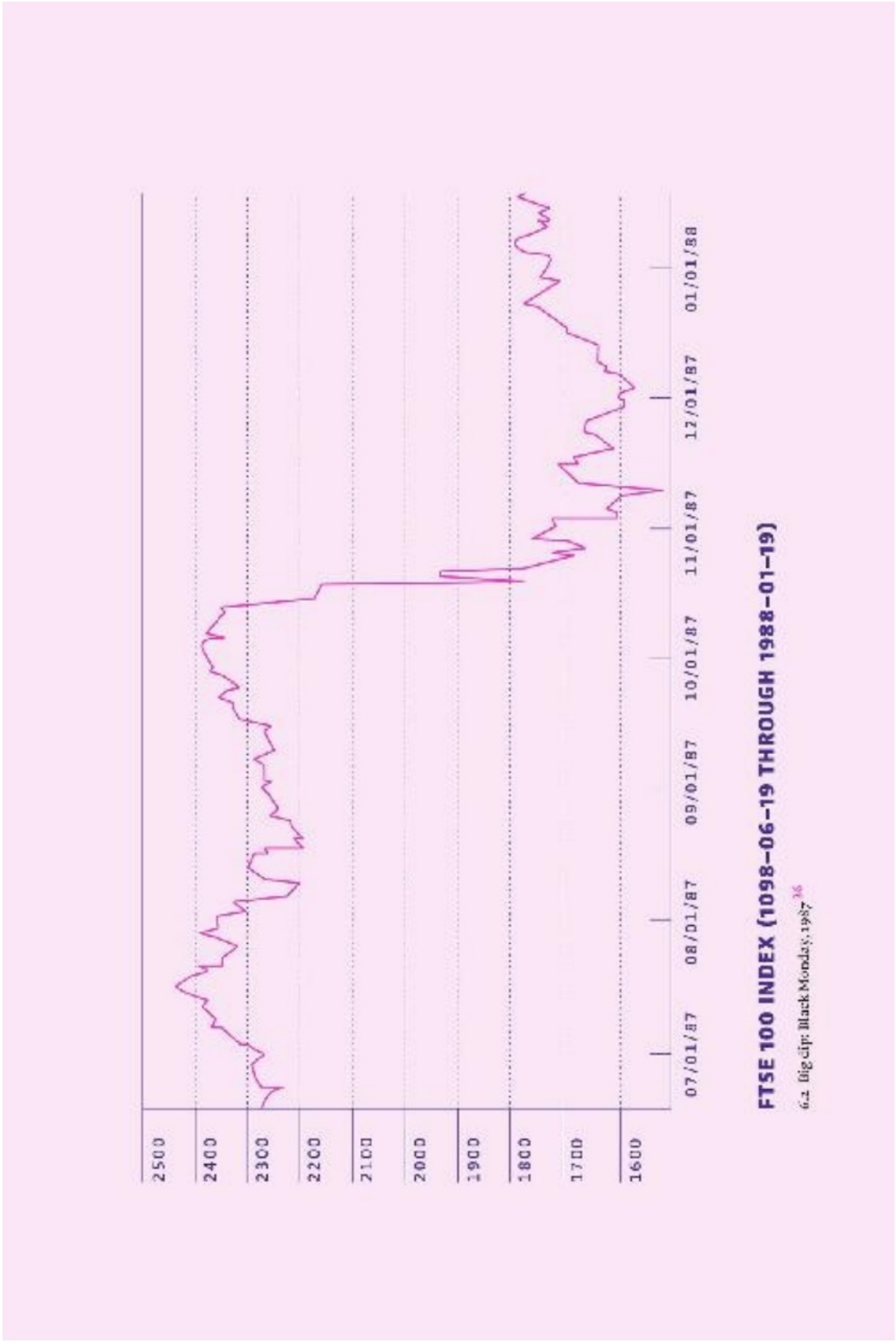
直到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还在庆祝“受过特殊训练的人”的到来，他们“追求比业余爱好者头脑中自发产生的更广泛的真理体系”。李普曼指出，越来越多的“更开明的指导思想已经聘请了受过训练的专家，或者

他们训练自己，使管理这个伟大社会的人能够理解这个社会的某些部分。简单地说:政府渴望控制，而专家们，作为在等级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交换，提出示范如何实施控制。

现代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漩涡。在20世纪，政府中“更开明的指导思想”与他们的专家手挽着手，围绕这一模糊的交易建立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威结构。美联储占据了这一高度，并被授予独立的权力，以避免民主进程的污染。但在经济官僚机构中也有许多豪宅。请看下面这张2008年金融危机时联邦政府维持的非常不完整的经济机构名单:

> *货币监理署(成立于1863年)、联邦储备系统(1913年)、证券交易委员会(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34年)、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1934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1936年)、联邦全国抵押贷款协会(1938年)、金融行业监管局(1939年)、联邦贷款住房抵押公司(1970年)、经济分析局(1972年)、劳动分析局(1972年)、金融犯罪执法网络(1990年)。*[38]

这些机构的专家官僚们对自己的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们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大量业余爱好者经常屈服于一种紊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格林斯潘称之为“非理性繁荣”。原始的情绪蒙蔽了公众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大局和共同利益。然而，这位专家是一位无私的知识追求者。如果给他一定的政治权力，让他变成一个专家型官僚，他就会预测经济的运行轨迹，并取得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比如更高的就业率，或者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这是体现在美联储使命中的内在信念。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成功的职业生涯似乎证实了这些说法。



6.2 fig cip: Black Monday 1987[16]

因此，我们回到2008年。专家阶层无忧无虑的无知

把金融体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它在面对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困惑，往往会导致恐慌，在痛苦中被伪造，并失去了它所声称的能力。体系中的每一个机构都灾难性地失败了，首先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它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宽松货币，助长了一种赌场氛围。像雷曼(Lehman Brothers)这样的投资公司把这些钱拿来“杠杆化”，用手中实际持有的每一美元押注30美元。由政府指定评估投资风险的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给这种复杂的、未经测试的次级证券的评级为AAA:当一切都说了并做了之后，穆迪已经偏离了20倍的标准。白宫和国会向监管机构施压，要求他们接受风险越来越大的抵押贷款，从而吹大了房地产泡沫。

这是精英们的彻底破产——只有公众来买单。

当金融体系崩溃时，当权者的反应是不可理解的震惊。“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感到纳闷。他没有得到答复。“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他妈的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投资金融家彼得·温伯格(Peter Weinberg)在纽约一次疯狂的会议上问道，“政府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雷曼董事会的一名成员问道，在极端情况下，他背叛了对专家官僚理想的坚定信念。[42]

之后，这场经济闹剧中的大多数参与者坚持认为，未能预测到经济崩溃是普遍现象。标准普尔负责人在国会作证时说:“对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的急剧下滑感到意外的，并非只有标准普尔一家。”实际上，无论是房主、金融机构、评级机构、监管机构还是投资者，都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在股市下跌之前，关于房地产泡沫的警告比比皆是，但发出警告的人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边缘化。[44]

无论这场危机是被预测到还是可以被预测到，还是所有的经济预言家，无论对还是错，都只是像n·n·塔勒布(N. N. Taleb)所描述的那样，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之上利用了一股稀薄的随机性，我都没有资格说:谢天谢地，我不是一名经济分析师。但是，如果我说没有一个是专家阶层的表现，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辩护

在任何层面上，他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总统，给了这个阶层最后一次救赎的机会。候选人奥巴马称这场危机是“一种陈旧和被误导的哲学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种哲学在华盛顿主导了太长时间。”[46]奥巴马总统一上台，就重申了“失败的经济理论”导致了这场危机的论点。“我反对那些理论，”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位新总统认为，在布什执政时期，政治考虑败坏了专家的判断。一个没有这种动物精神并以健全的经济理论为指导的新团队将使国家恢复繁荣。

由政府专家起草并于2009年2月由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实现了总统的理论。为了帮助推销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两位白宫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和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对该措施将如何降低失业率做出了切实的预测。我想他们的报告反映了奥巴马总统的诚意，但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误判。

截至2008年12月，失业率为7.3%。罗默和伯恩斯坦计算出，如果没有刺激措施，到2010年初，失业率将攀升至9%左右，但有了刺激措施，失业率将达到8%的峰值，到2009年年中，失业率将下降得更快。这是新专家团队大胆的预言:结果是，这一预测过于乐观了。在刺激法案通过后，失业率达到了10.1%的峰值，直到2012年底才触及8%——比没有刺激的最坏情况预测还要糟糕得多。从人的角度来看，白宫的数字忽略了300多万失业美国人的困境。

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为罗默和伯恩斯坦在预测方面令人不安的失败提出了两个原因，但这两个原因似乎都没有取悦专家阶层。第一个原因是对实际经济状况的无知。2009年的经济状况碰巧比专家们所意识到的要糟糕得多，尽管他们在统计上有很多神奇之处。第二个原因是对追踪失业轨迹的过度自信。像罗默和伯恩斯坦所宣称的小数点精度那样预测主要经济指标(如失业率)的变动，从来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怀疑，同样不可能的是，在权力结构中处于高位的人士——一位现任总统，一位白宫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承认预言的不可能性。在这种矛盾中，很多关于机构权威危机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

事实证明，新政府中的专家们的表现并不比他们声名狼藉的前任们好。在实现预期结果方面，新经济理论并不比失败的旧经济理论更成功。专家阶层的破产是两党之间的事情。奥巴马白宫通过发布硬性预测，押注于其专家型官僚与前几任官僚之间的质的差异。如果能效仿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刻意模糊，效果会更好。

并不是说格林斯潘的声誉在海难中幸存了下来。这位曾经无可非议的前主席，在2008年10月被拖到国会面前，被拼命寻找替罪羊的政客们纠缠不休。格林斯潘本人，如此善于让别人认为他是绝对正确的，现在承认自己“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状态”，并犯了一个“错误”——他发现了“模型中的一个缺陷……”这就定义了世界是如何运转的。[52]

格林斯潘总结道:“市场竞争和自由市场的一个关键支柱确实崩溃了。”他补充道:“我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句话可能被认为是他帮助提升到影响力高度的这一阶层的墓志铭。[53岁]

2008年精英阶层的失败，就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因此加剧了对未来的普遍恐惧。当然，公众默许了强加在专家官僚身上的不可能实现的期望。公众认为会有人掌权，要求繁荣的机构顺利运作，但把肮脏的细节留给中央的阴谋诡计。在丰年里，很少有人抱怨，但当崩溃来临的时候，一种不可战胜的宗派主义使公众没有任何责任感，并允许它把责任完全推到当权者的肩上。

人们的指责遵循着可以预见的模式。左翼人士将危机归咎于对银行业放松管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是这样

正确。右翼人士指责大规模的政治干预经济活动。他们也有很好的理由。但这两种批评，以及其他涉及“贪婪”和更精心策划的阴谋的批评，都没有抓住更大的要点。一方认为只有立法者和监管者才能控制未来，另一方则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然而，从2008年的证据来看，金融机构所宣称的能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而深刻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寻找罪魁祸首的分歧要小于寻找原因。所有在灾难发生时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都被谴责为骗子和恶棍。所有支撑政治和经济现状的理由都受到质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跌至历史最低点。布什政府颜面尽失，共和党在2008年大选中失去了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刺激计划失败后，不信任的浪潮转而对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不利，他们的执政联盟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遭到粉碎。

银行、股市和企业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许多人向政府施压，要求起诉对危机负有责任的银行家——这种对失败的定罪与意大利拉奎拉地震事件大致相似。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美联储进行公开审计，而另一项针对美国投资者的调查显示，他们对美联储的信任度最低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这位专家型官僚已经名誉扫地，被赶下台。然而，专家的替代品总是另一位专家:伯南克代替格林斯潘，珍妮特耶伦代替伯南克。精英们在经济治理上的失败，面对的是除了谴责和惩罚之外，不愿做更多事情的公众。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的非经济后果是一场否定的盛宴，在大众和社交媒体上罕见地一致庆祝。



WHITE HOUSE UNEMPLOYMENT PROJECTIONS (JANUARY 2009)

6.5 Failure of prediction and control [21]

第五次浪潮

如果你想挑战我的假设，可以进入任何大型购物中心。例如，进入泰森百货公司(Tyson)的百货商场(Galleria)，这是高档购物者的黄金消费殿堂，我有时会在下雨天去看看。它建于1988年，1997年进行了扩建，设计师们相信，它看起来“像欧洲的街景”。实际上，它看起来有点像艺术家m·c·埃舍尔(M. C. Escher)的幻觉。

在这里，你将与2008年苦涩的否定绝缘。2011年的大规模叛乱不会给你们带来明显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公众对各个领域权威中心的创伤性攻击:与此同时，泰森的Galleria继续前进，泰然自若地炫耀。商店来来去去，但体制却岿然不动，毫发无损。一个自上而下的、实体的、等级分明的结构——购物中心——在一个网络时代似乎还在生存，实际上还在蓬勃发展。

如果你继续这样追问下去，你很快就会陷入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境地。2008年的灾难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失败。那些在灾难后名誉扫地、一扫而空的当权者，可以用资本主义精英来形容。他们曾声称对繁荣之源拥有权威，但事实证明，他们既无能又不稳定。资本主义界最接近教皇的人物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现在承认，这一体系未能把握世界的真正运行方式。

然而，现在你来到了泰森的Galleria，这是资本主义教堂里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小教堂。你还不如在2008年之前的繁荣期来过这里:没什么变化。看起来，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与我们同在。

因此，我的困境是，如何将公众的反抗和制度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明显生存联系起来。请注意，通过我自己的方法，我无法声称未来会发生清算。我拒绝预言式的分析。我讲的故事必须与经验证据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一般来说，要谈论现在和过去。

因为我发现这种困境被层层卷起，就像洋葱一样，我会试着把它们剥开，一次剥一层。

如果问题是资本主义能否挺过2008年的创伤，答案一定是，“是的，到目前为止。”它可能遭受了可怕的创伤，这将是其灭亡的原因。也许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会意识到2008年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这是不可知的。眼下，在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没有其他选择，没有人呼吁革命，泰森的Galleria向富裕的消费者敞开大门，而不是向抗议者敞开大门。



6.4泰森Galleria，2013 ––

如果问题是公众的反抗是否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威胁，答案肯定是，“不完全是”。左派人士在2011年谴责了资本主义，但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西班牙*愤怒者*和美国占领者的宣言中夹杂着反资本主义和反“制度”的言辞，就连以色列帐篷城的抗议者——他们中最温和的——也感到有必要攻击“卑鄙的资本主义”。然而，如果我对2011年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反资本主义只是街头起义者巨大乌托邦野心中的一个元素，他们的目标是废除历史，即决定论

因果的，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代表着一个纯化的未来。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这符合反叛者的宗派主义脾气:他们想要*抗议*，而不是取代。反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它是通往否定的另一条道路——如果推得够狠，就会通往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互联网人用强大的个性化技术描绘了完美的未来，赞美风险资本家，尤其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样的科技潮人，是他们让这些技术成为可能。

泰森Galleria的繁荣，以及全球各地类似的镀金场所，表明反抗的公众并没有明显地反资本主义，反商业，甚至反对任何特定的公司，无论多么不受欢迎或强大。2010年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件期间，没有发生针对英国石油公司的抗议活动。谷歌和微软引发了欧洲政治阶层的焦虑，但欧洲公众一直乐于利用这些公司提供的平台来逃避和滥用他们的精英。同样，在美国，针对沃尔玛的运动是由有组织的压力团体和民选官员发起的，而不是自下而上反抗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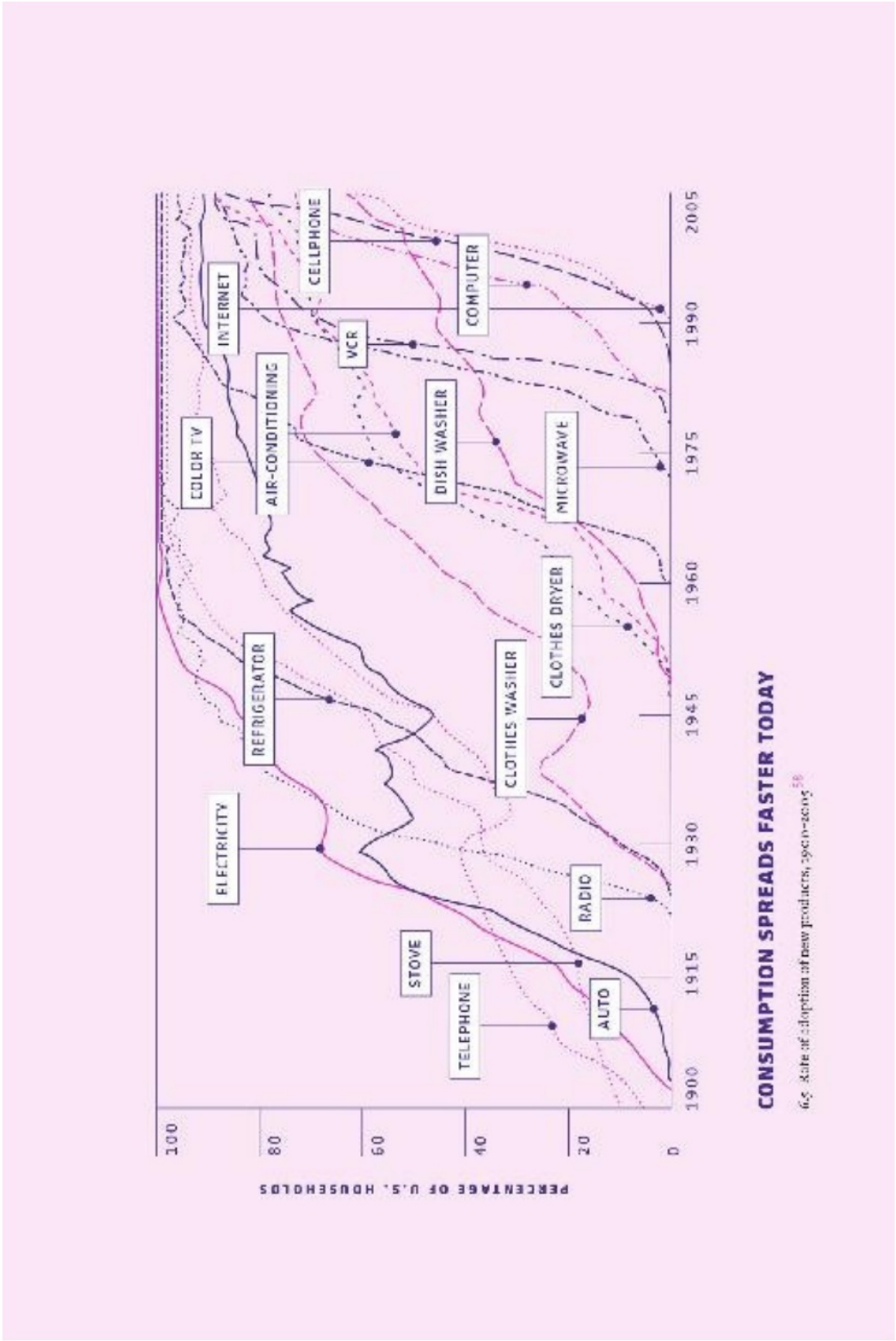
当公众感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可以*以光速猛烈地抨击一家公司。GoDaddy在宣布支持《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简称SOPA)后遭到强烈反对就是一个例子。该法案旨在扩大版权法对网络内容的管辖范围。网上组织的抵制活动非常成功，在24小时内，GoDaddy就屈服了，宣布反对SOPA。这一事件很短暂:一旦GoDaddy改变立场，抗议活动就结束了。但它证明了公众有能力在市场上制造混乱，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进入下一层:如果问题是网络化的公众是否影响了商业行为，答案一定是“是的，毫无疑问”。公众对企业施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像它对政府、政治家、教育者、媒体和服务提供商施加的要求一样:每一笔交易都要把顾客当作一个有积极品味和兴趣的*人*来对待，而不是把顾客当作一个被动的、无差别的*群体中的一员*。

记住那个难听的词，“分解”。意思是:拆开，拆包——拆开。就像在政治上一样，群众的解体是一个革命性的经济事件。它标志着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新工业国家”(new industrial state)的终结，在这个国家里，大企业和大劳工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瓜分现代经济的战利品。今天，大企业面临着预期寿命急剧缩短的问题，大劳工正在全面撤退，而消费者——叛逆的公众——正在掌控局面。

迎合特殊口味的公司蓬勃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亚马逊(Amazon)，它拥有庞大的库存和“像你一样的人”算法，尽管许多在线商店也符合这一要求。(1.4万亿美元商业网络的发展轨迹可以作为公众对反资本主义圣战缺乏兴趣的证据。)要说实体店的成功故事，我推荐星巴克(Starbucks)，在那里你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啜饮着加了肉桂和焦糖的“拿铁”，但没有一丝牛奶，如果这是你碰巧渴望的。

但这些都是暂时的胜利者，他们可能——其中许多人肯定会——明天就会被击败和取代。对主体化处理的需求所带来的革命性经济影响，并不存在于“长尾效应”或数字集市的增长中，而是存在于这种需求必然引起的市场动荡中——在创新和生产的搅动中，在企业组织和企业消亡的搅动中。将其生产系统的僵化强加于公众的工业巨头正在被推翻:经济上相当于穆巴拉克政权的肯定是通用汽车。然而，他们的继任者将在一个被矛盾冲动席卷的景观中领导一种短暂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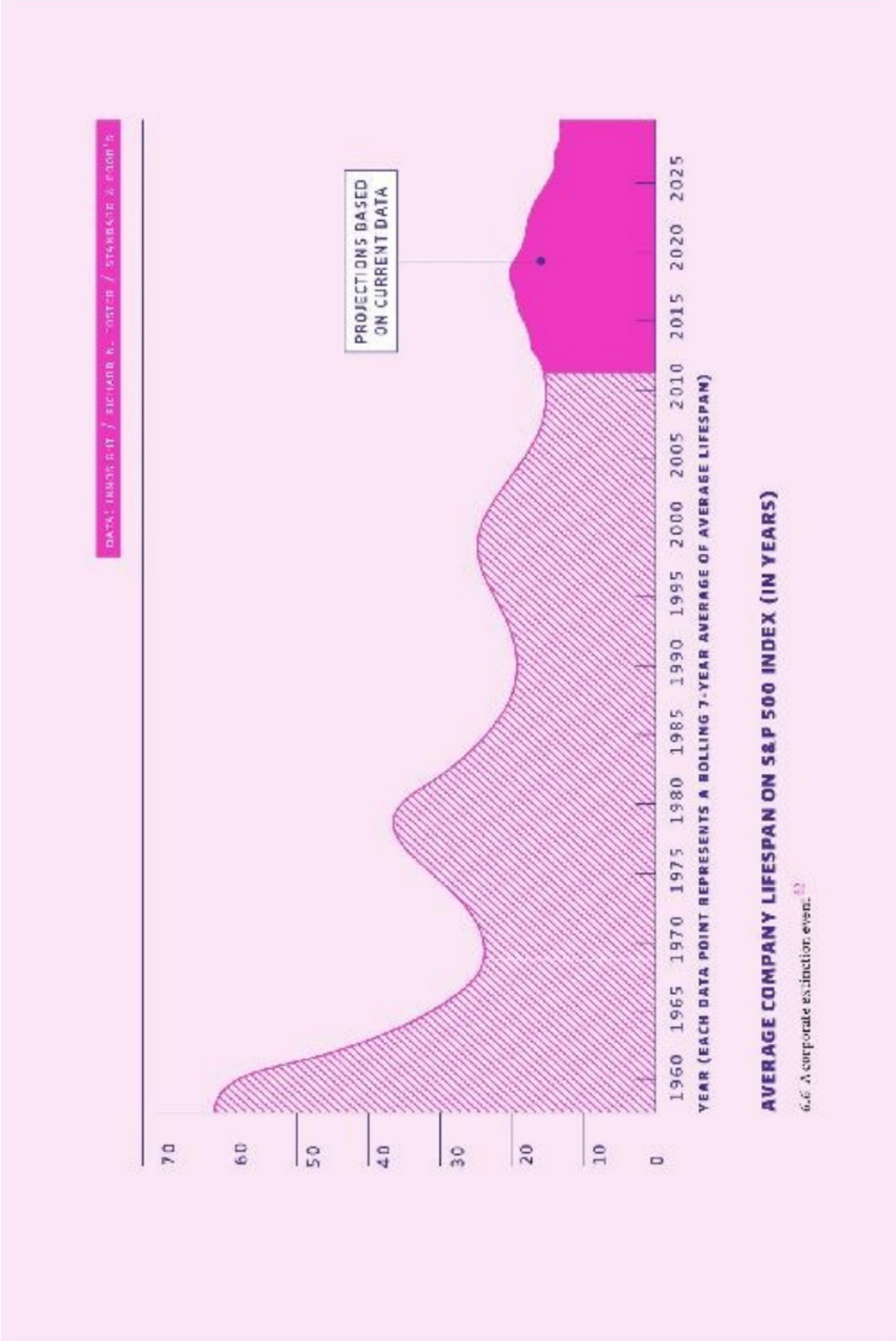
大众消费者是工业时代的发明:“一刀切”。

遵循流水线的逻辑。我们看到，大众向网络化公众的转变，只有随着数字技术的到来和全球信息领域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现在，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似乎在起作用——创新导致了需求的原子化，而原子化的需求又在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领域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创新速度。今天的生活感觉就像在一个令人眩晕的变化循环中与一个又一个新事物进行连续的搏斗，这并不是一种幻觉。

在《*与机器赛跑*》一书中，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迈克菲推测，这种疯狂的创新是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我们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我们正处于大衰退或大停滞之中，而在于我们正处于大重组的早期阵痛之中。""我们的技术在飞速发展，但我们的许多技能和组织却落后了。"这些作者写道，正常情况下，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会适应当前消费模式的转变。

> *然而，当变化发生的速度快于预期和/或制度的调整能力时，这种转变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过去十年中，技术的加速发展不仅颠覆了一个行业，而且几乎颠覆了所有行业。*[59]

我觉得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的论点有些投机。但请稍作思考，看看上面的图表。对于专门生产旧产品的公司来说，新产品的大量涌现肯定是灾难性的，这不仅仅是猜测。1999年被列入《财富》500强的公司中，有一半到2009年已经退出。[根据]理查德·福斯特的说法，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的平均寿命已经从20世纪20年代的67年下降到今天的15年。[61]



如果两个图表中的信息被整合，跳出来的故事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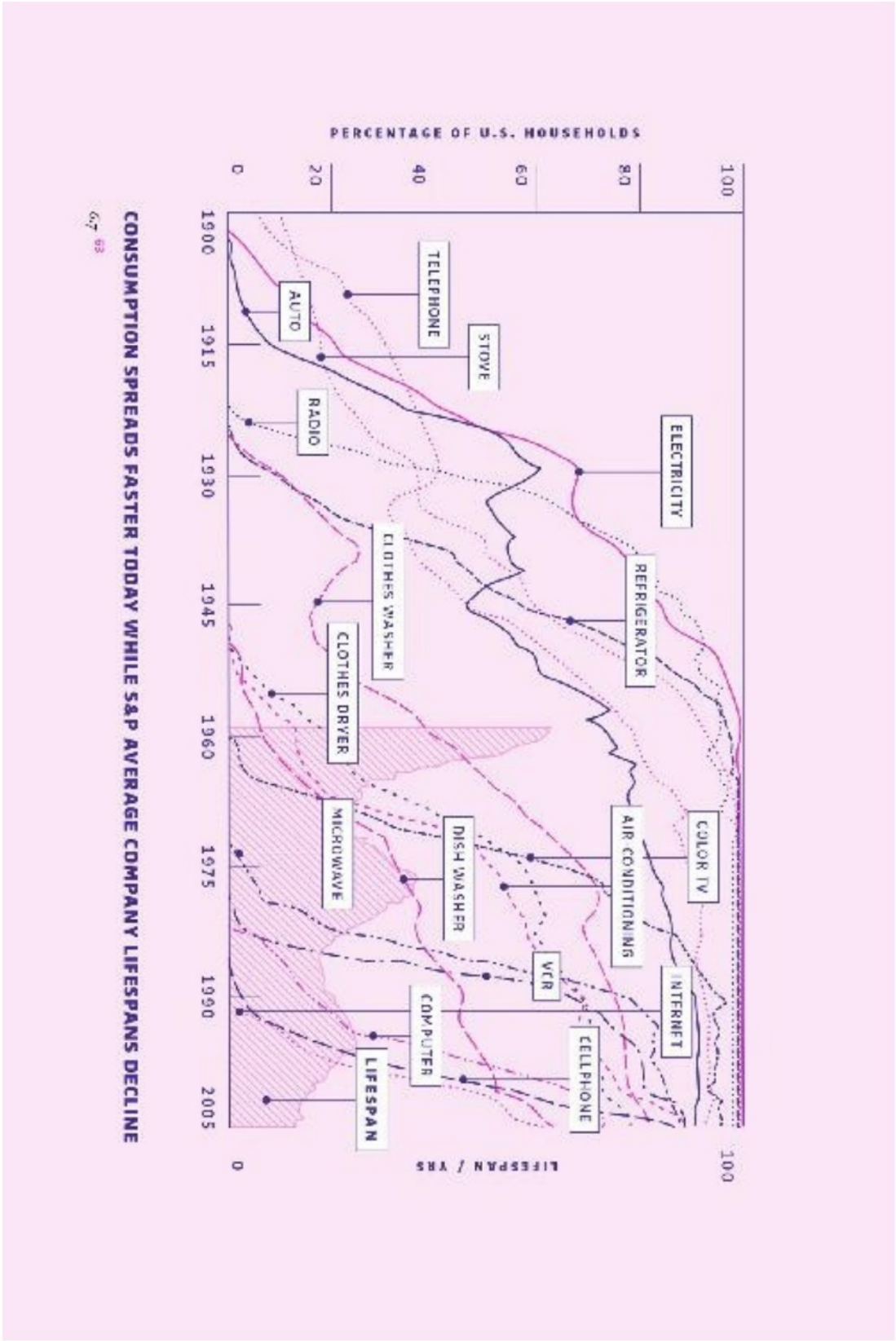
被冲突和压力撕裂的商业环境。无论创新洪流是否像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所认为的那样，破坏了整个经济，它都与个别公司的某种类似灭绝事件有关。我注意到，故事背后的变化和艰难的现实，与第五次浪潮对市场的预期影响是一致的。

泰森百货商场里的个别商店*确实*来去匆匆。购物中心起起伏伏。(到目前为止)泰森很幸运能跻身后起之秀之列。

公众对这种对大公司的不断屠杀完全漠不关心。事实也应该如此:在这场大屠杀中，公众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些*公司提供商品。其他公司的尝试和失败——甚至死亡——都无关紧要。现在，前者是最后的，而消费者是主宰者。

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和试探性的解释，即为什么网络化的公众对现状如此具有破坏性，却容忍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现有的经济体系。市场是一个纯粹的试错过程。在商界，就像在自然界一样，大多数新的尝试都失败了。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例如，大多数新的政府政策都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大多数教育改革都失败了。大多数科学假设都失败了。*试错*法的试错部分主要包含错误，除非这组试验足够大，足够有竞争力，足以产生可能的成功，而且系统足够聪明和灵活，能够识别成功并给予奖励。

在公众与精英之间的全球斗争中遭受重创的许多结构都是单一试验过程的俘虏，并试图从权威的角度对成功进行等级定义。新举措通常会失败，而失败通常会被解释为失败，并被加倍重视。我们看到，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后要求并得到了更多的资金。7870亿美元刺激计划的支持者将其失败归咎于支出不足。这些论点只有在这些机构垄断了信息和通讯手段的情况下才有说服力:换句话说，只有在它们不受质疑的情况下才有说服力。当然，今天公众总是会提出疑问，而且通常会在信息领域找到答案。



在商业中，各种各样的试验同时进行

潜在的盈利结果和成功或失败都是由消费者自下而上决定的。如果一家公司失败得足够严重，它就完蛋了。这个空白会被更成功的公司填补。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快，代表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对第五次浪潮的敌对条件的显著适应，包括普遍存在的反权威情绪。

我想说得精确一点。我并不是说企业比政府更聪明或更有效。企业在聪明和高效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已经表明，考虑到时间尺度的差异，企业的失败率再现了物种灭绝的无意识、随机模式。我也不是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科学家或官僚等人表现出更强的预言能力。在这一点上，我将简单地引用邓肯·沃茨(Duncan Watts)的话:“公司业绩通常不是由首席执行官的行为决定的，而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比如整个行业或整个经济的表现，而这些都是个别领导人无法控制的。”[65]无论如何，赞颂一艘对沉没的预期与日俱增的船的船长是很奇怪的。

在目前的环境中，据我所知，事实证明，企业并不比其他机构更明智、更有远见或更成功。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资本主义比大多数受到公众攻击的机构更有效地利用了其部分的失败。借用塔勒布的术语，资本主义似乎是“反脆弱的”:它“通过利用而不是遭受随机事件、不可预测的冲击、压力源和波动性，不断地自我再生。”[66]这使得这个体系能够在2008年的恐怖事件中繁荣发展，同时，并非毫不相干地，给消费者带来了大量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然而，对个别公司来说，这种加速发展的环境感觉就像流浪汉的狂奔——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这给我们的经济困境带来了最后一个奇怪的问题。

如果问题是单个公司与叛变的公众之间的关系是否与中央的所有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相似，那么答案一定是:“看起来当然是这样。”在单个公司的层面上，以个性化需求为主导的新市场类似于更大的冲突1

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只是微缩和上快进。问题的核心是结构。今天的公司是为工业时代而组织的。除了最小规模之外，每个公司都是一个小官僚机构，专门做一件事，或者几件事。一家公司可能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也可能做得更差，但如果被要求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或者不断改变自己的做法，它的表现会很糟糕。官僚机构善于保守，却不善于改变。

企业界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在现状的边缘疯狂修修补补，希望找到解决方案。呼吁“改变文化”，呼吁植入“创新文化”，呼吁“像创业公司一样思考”，这些呼声已经成为经商背景噪音的一部分。不幸的是，问题不在于文化或心理。它是结构性的，它威胁到每个公司中有权势的人和团体的权威。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接受这种威胁。已经有人尝试用“委员会”取代等级制度，用更网络化的方式取代官僚主义。我不知道这些实验有什么成功的迹象，它们违背了官僚主义的精神——我怀疑，也违背了人性的本质。

除了商业顾问从企业客户那里榨取数十亿美元之外，自亨利·福特(Henry Ford)时代以来，公司的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改变真的到来——如果网络的速度和自由能以某种方式与等级制度的大规模和稳定结合起来——这将代表着人类关系的一次历史上最彻底的转变。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我认为企业生死存亡的剧烈波动将继续加速。

不确定性、无常，以及没有权威的生活的其他症状

我在这一章所呈现的故事，并不等于权威危机的数学证明。人类事件很少受到这种分析的影响。人类关系的深刻变化在发生时也很难察觉，更不用说量化了——我的故事涉及的是远低于文化意识视野的世界的碰撞。我想，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正经历着一场工业革命。

我用特定类型的证据提出了特定的主张。我打算*描述*制度权威的危机是什么样子，*并举例说明*几个例子，而不是在毫无疑问的情况下论证这个命题。所以:我的分析可以被证伪。一系列互不相关的原因可能导致公众对机构行为者(科学家、专家、银行家等)的信任崩溃。我不相信情况会是这样——但我以前就错过，而且不止一次。

如果我是一名医生，试图诊断这种特殊的疾病——权威危机——我会寻找明确的因果模式和症状。在这些模式中，我将包括公众夸大的期望，以及权威夸大的能力要求。我必须相信地震学家可以把我从地震中拯救出来，相信美联储主席已经驯服了商业周期:这些权威必须要么相信同样的事情，要么至少在我的错觉中串通一气。

第二个因果模式是，精英们失去了对外界对其业绩的描述的控制，尤其是在业绩未能达到预期的时候。我指出，这种控制是垄断的一种功能，因此诊断这种模式的另一种方法是确定公众是否打破了机构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密谋压制不同意见的气候学家必须相信，他们的数据是专业机密，他们的私人电子邮件是不可侵犯的，而公众必须能够看到皇帝全裸的样子，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种不起眼的形象。其结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和合法性的丧失。

第三种模式将是另类权威中心的崛起。这是垄断丧失的必然结果。一旦对话范围扩大，公众掌握了控制权，这种动态就不是爱因斯坦在山顶上仔细观察宇宙，而是迈克尔·曼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背后监视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和他的博客。每一个由对某件事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组成的重要团体，都会对机构的权威构成威胁。

我相信我已经对这些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足以表明它们无处不在，破坏着既定的秩序。但也有一些危机的表现——既然我扮演的是医生，就让我们称它们*为症状吧——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中。我想讨论的是

其中的两个，在这一点上非常简单。

政治和专家阶层声称对既定的真理有能力。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所做的就是:制造确定性，消除怀疑。但是，如果确定性是权威的功能，那么权威衰落的一个症状将是围绕重要问题的激进和普遍的*不确定性*。唉，没有任何工具可以衡量确定性或缺乏确定性:但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心态进行比较是有益的。

60年前，爱因斯坦以上帝的声音说话。30年前，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每天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把“所有适合刊登的新闻”送到我们家门口。20年前，艾伦·格林斯潘运用万无一失的公式来确保我们的繁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实上的纠纷，我们就通过查阅《*大英百科全书*》来解决。那时候，信息世界的形状就像一个金字塔。那些在顶端的人从噪音中决定信号，从欺诈中决定知识，从不确定性中决定确定性。公众和大众媒体接受了这种安排。在一切条件平等的情况下，人们信任和依赖权威。

今天，我们淹没在数据中，却渴望意义。改变世界的信息浪潮严重恶化了信噪比。塔勒布说:“你得到的数据越多，你对事情的了解就越少。[67]而你知道的越多，你的信任就越少，因为现实与当局声称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变得无法忽视。”如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学家害怕与怀疑论者发生争执，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他们呢?如果风险委员会的地震学家都不能警告我们灾难性的风险，谁会呢?正如我试图在本章中表明的那样，公众已经对他们赖以理解世界的人失去了信心——记者、科学家、各行各业的专家。通过同样的过程，精英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呢?像渡渡鸟一样消失了。它的位置已经被维基百科取代，它对许多条目进行“编辑”和“还原”，让读者对任何给定版本的议程都不确定。

缺乏确定性并不是无知:它是在我们所知的一切中溃烂的怀疑碎片，是对既定真理制度的彻底幻灭。一个重要的影响是一种文化上的酒吧争吵，因为每一个重要的问题都成为利害关系方之间的刺激物和冲突的来源。

例如，关于基督教或耶稣，有什么可以不加限制地说出来的?维基百科中最激烈的两场编辑之争恰好围绕着这些主题。

这种状况引发了现有秩序的反革命。一次又一次，在一个又一个学科中，被认可的专家试图重新获得对认知封闭杠杆的控制。一有机会，机构行动者就会以公众的不确定性为由攻击公众:例如，公众被指责为茧成一个日常的我，被指责为在进行一场“对科学的战争”，被指责为沉迷于前所未有的党派之争，等等。这样的唠叨暴露了游戏的本质。权威精英们的反革命陷入了困境，因为精英们自己也被那可怕的怀疑碎片折磨着。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你会预料到一个充斥着骗子和骗子的景象，他们兜售着幸福、爱情、性、健康和更好的政府的*积极*公式。你也会预料到，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断言也会引起很大的噪音和雷鸣: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每一条信息都必须大声喊出来，才有被听到的希望。刺耳的声音会影响每一种沟通方式，但对政治修辞的破坏性最大。为了留住观众，政客和评论员将不得不比竞争对手更大声地尖叫，采取更激进的立场。

我刚才是否准确地描述了当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轮廓，我把它留给读者来决定。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第二个症状:无常。权威总是让人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幻觉。原因显而易见:如果在联邦政府身上盖上一个截止日期，那么从今天开始就会出现对其授权的背叛。如果公众怀疑这些机构的持久性，后者的权威就会被颠覆。

我承认无常和不确定性一样，是对现实的一种感知，无法精确测量。但有一个坚硬的经验世界在任何时刻都与感知相冲突，从分析角度来看，我认为最安全的做法是贴近那个世界。

从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开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曾经是一个

掌握独立的工具和程序——学习开车、打电话、操作车床或收割机。现在，它是关于吸收开放式变化的能力。上面的图表显示了我们采用技术创新的加速速度。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新设备、新系统和新媒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旧的技术知识迅速退化并变得无用，就像软盘和盒式录音带一样，它们杂乱地堆放在我们家里满是灰尘的角落里。

有一种信仰认为数码是永恒的——你年轻时的裸照会让你魂牵梦绕。相反的说法更接近事实。数字化意味着短暂。网络权威、影响力和关注度波动很快。网站站起来，在演讲者的平台上有短暂的片刻，然后就静音了。他们的文字和形象有时会留存下来，变成化石，但也经常消失。大量的电子邮件、短信、同时间聊天都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旧的链接没有任何意义。像AOL或Friendster这样的老平台在今天毫无价值。旧格式与新格式“不兼容”:一个非常好的词。无常，无非是现在与甚至是最近的过去的不相容。

再想想我们与工作和政府的关系吧。本章的另一张图表从灭绝事件的角度描绘了标普成分股公司的预期寿命:老牌知名品牌及其产品以比一个世纪前快得多的速度破产和消亡。工人们已经适应了这种工作场所的动荡:他在任何一家公司工作的平均时间已降至4.4年。[68]这些都是对经济成功虚荣程度的实证衡量。

我承认，政府更具思辨性，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目睹了政治命运之轮的剧烈颠簸。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碾压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体制，他的执政联盟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然后在2012年轻松连任。像突尼斯和埃及这样几十年固若金油的政权突然化为乌有。

与我们的认知相对抗的残酷事实的世界已经脱离了过去的束缚，而且似乎正在自我吞噬。我们如何主观地对这个世界做出反应——这是可以讨论的。我想提出一种有趣的可能性。

你可能会认为，地球上失去稳定的存在，会促使人们在更高的星球上寻找固定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原教旨主义吸引力的上升将证明无常的经验。这让我深入到主体性的领域，但也有经验的暗示和迹象。我们看到，在埃及，旧政权最初被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取代，后者赢得了该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公平的选举。中东的残酷现实是，凡是世俗的阿拉伯威权主义者摇摇欲坠的地方，伊斯兰组织都能兴旺发达。在美国，要求更高的信仰——福音派、摩门教徒、哈西德派——是以牺牲旧的机构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机构过于类似于美国中心的世俗等级制度。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当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

对于世界上的统治阶级和能言善辩的精英来说，这种对宗教的转向既骇人听闻又不可理解——但这是对人性的否认。如果人间之城成为过眼烟云，人们就会转向上帝之城。

在暴力的极端，你会遇到像基地组织(Al Qaeda)这样的组织，他们与现有秩序的异化，既盲目地打击又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没有什么比世贸大厦在大火和灰尘中倒塌更令人灼热的无常形象了。西方知识分子经常将基地组织视为一个由盲目的狂热分子经营的原始主义组织，但事实并非如此。该组织无情地站在公众反抗权威的最前线，它不仅无视人的生命，而且无视几乎所有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结构，这再次紧迫地提出了虚无主义的问题。

不确定性和无常是第五次浪潮条件下社会生活的症状。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猜想。也许这两种属性比工业时代所假定的精通和自信更准确地反映了人类状况的现实。无论格林斯潘和意大利地震学家在公开场合说什么，他们*确实*对这些数据的含义感到不确定。

但这本书的核心冲突并不是关于现实本质的争论。这是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其中流血不止。不确定性，在这场斗争中，反映了对现存知识结构的否定。无常意味着对现有权力和金钱结构的破坏。一个巨大的空白空间，一个概念上的空洞，一个虚无，正在这个过程中

在创造中，曾经一个复杂的社会在制度上与自身的矛盾和谬误作斗争。

自由民主一直是调解这种内部缺陷的主要机制。虚无主义的问题现在与权威危机纠缠在一起，将以肯定或否定民主进程合法性的措辞来回答。当我开始考虑这场危机对政府的影响时，对我来说，这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不可估量的问题。

章节注释

1 Anecdotes and quotes on the Einstein-Eddington episode taken from Walter Isaacson's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 Schuster, 2007), 255-267.

2 Wikipedia Commons. This image is availab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under the digital ID cph.3b46036

3 From the World Bank Data Catalog website.

4 Both dictators took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See Richard Over,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Stalin's Russia*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5 Henry H. Bauer,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Knowledge Monopolies and Research Cartels," *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Vol. 18, No. 4, pp. 643-660 (2004), http://henryhbauer.homestead.com21stCenturyScience.pdf

6 "Trouble At the Lab," *The Economist*, October 17,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588057-scientists-think-science-self-correcting-alarming-degree-it-not-trouble

7 *The Climategate Emails*, John Costella, ed., (The Levoisier Group, March 2010), http://www.lavoisier.com.au/articles/greenhouse-science/climate-change/climategate-emails.pdf

8 Ibid., 10.

9 Ibid., 30.

10 Ibid., 34.

11 Ibid., 33.

12 Ibid., 34.

13 Ibid., 12.

14 Ibid., 144.

15 Ibid., 89.

16 Ibid., 57.

17 Ibid., 129.

18 James Delingpole was the author.

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jamesdelingpole/100017393/climategate-the-final-nail-in-the-coffin-of-anthropogenic-global-warming/

19 "Colleague defends 'ClimateGate' professor," BBC, December 4, 2009, http://news.bbc.co.uk/2/hi/8396035.stm

20 Gordon Gauchat, "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 A Study of Public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4 to 201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2), 167-187, http:/ www. asanet. org/images/journals/docs/pdf/asr/Apr12ASRFeature. pdf, and Eurobarome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2010,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340_en.pdf

21 Roger A. Pielke Jr., "Lessons of the L'Aquila Lawsuit," *bridges*, vol. 31, October 2011, http://sciencepolicy.colorado.edu/admin/publication_files/2011.36.pdf

22 "L'Aquila's earthquake: Scientists on the dock,"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4,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29006

23 John Dollar, "The Man Who Predicted an Earthquake," *The Guardian*, April 5, 2010, http://www. theguardian. com/world/2010/apr/05/laquila-earthquake-prediction-giampaolo-giuliani

24 Dollar, "Man Who Predicted Earthquake" and Pielke, "Lessons of L'Aquila Lawsuit."

25 Ibid.

26 "L'Aquila quake: Italy scientists guilty of manslaughter," BBC, October 27,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0025626

27 An excellent evalu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the forecasting of earthquakes is found in Nate Silver's *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Why So Many Predictions Fail—But Some Don't* (The Penguin Press, 2012), 142–175.

28 *Climategate Emails*, 84.

29 Bob Woodward, *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Kindle location 507.

30 Ibid., Kindle location 602-609, 641.

31 Ibid., Kindle location 396.

32 The *New York Times* and *Washington Post*, in particular, seemed to cover two mutually hostile Alan Greenspans. See Woodward, *Maestro*, Kindle locations 2426, 2452.

33 Woodward, *Maestro*, Kindle location 3878.

34 Ibid., Kindle location 2498-2506.

35 "After Alan," *The Economist*, October 13, 2005, a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5025627

36 Wikipedia Commons.

37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233–4.

38 I have excluded agencies employed by the government to fund its own activities, such as IRS and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39 Silver, p. 29

40 Andrew Sorkin, *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and Themselves* (Penguin Books, 2009), 439-440.

41 Ibid., 448-9.

42 Ibid., 368.

43 Silver, *Signal*, Kindle location 388-397.

44 Ibid., Kindle location 397 forward.

45 Nassim Nicholas Taleb, *Fooled By Randomness: The Hidden Role of Chance in Life and in the Markets*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4), 79-91.

46 "Obama Delivers Speech on Economy," *New York Times*, June 9,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08/06/09/us/politics/09transcript-obama.html?pagewanted=all

47 Barack Obama,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ebruary 4, 2009, http://www.gpo.gov/ dsys/pkg/DCPD-200900057/pdf/DCPD-200900057.pdf

48 Christina Romer and Jared Bernstein, "The Job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 no publisher given, January 9, 2009, http://otrans.3cdn.net/45593e8ecbd339d074_l3m6bt1te.pdf

49 Silver, *Signal*, Kindle location 722-743.

50 Ibid., Kindle location 743-754

52 "Greenspan admits 'mistake' that helped crisis,"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3, 2008, http://www.nbcnews.com/id/27335454/#.UpFaY8Tkv74

53 Ibid.

54 Silver, *Signal*, Kindle location 344-349.

55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Anti-Trust America: A trust deficit is driving our economy down," *City Journal*, February 27, 2009, http://www.city-journal.org/2009/eon0227pslz.html

56 "74% want to audit the Federal Reserve," *Rasmussen Reports*, November 8, 2013, http://www.rasmussenreports. com/public_content/business/general_business/november_2013/74_want_and "US investors trust financial adviser over Bernanke, survey finds," *SmartBrief*, February 7, 2012, http://www.smartbrief.com/02/07/12/us-investors-trust-financial-advisers-over-bernanke-survey-finds#.UpNjicTkv75

57**我的照片**。

59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Driving Productivity, and Irreversibly Transforming 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y*, (Digital Frontier Press, 2011), 9, 40.

60 Tony Elwin, “The Cost of Culture, a 50% turnover of the Fortune 500,” http://www.tobyelwin.com/ the-cost-of-culture-a-50-turnover-of-the-fortune-500/.

61 “Creative Destruction Whips Through Corporate America,” *Innosight*, Winter 2012, http://www. innosight. com/innovation-resources/strategy-innovation/upload/creative-destruction-whips-through-corporate-america_final2012.pdf

62 Courtesy of Richard Foster.

63 My combined chart.

64 Paul Ormerod, *Why Most Things Fail: Evolution, Extinction and Economics* (Pantheon Books, 2005), Kindle location 66.

65 Duncan Watts, *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 How Common Sense Fails Us* (Crown Business, 2011), Kindle location 3312.

—

66塔勒布，*反脆弱*，8。

67 Ibid., 126.

68 Jeanne Meister, “Job Hopping Is the ‘New Normal’ For Millennials: Three Ways To Prevent a Human Resource Nightmare,” *Forbes*, August 14, 2012,

http://www. forbes. com/sites/jeannemeister/2012/08/14/job-hopping-is-the-new-normal-for-millennials-three-ways-to-prevent-a-human-resource-nightmare/

的失败
政府

7

前一章将我的假设扩展到了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以及曾经被认为是合法的每一种权力的行使。我坚持认为，这种冲突无处不在。像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和气候门(Climategate)这样的小规模冲突，是哲学家们所说的“副现象”，是表面效应而非原因，就像冰川融化时发出的裂缝和隆隆声。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公众——对某件事感兴趣的普通人——与精英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奇怪的逆转。

当我把注意力转回政治时，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在我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民主在一种被否定和不信任所毒害的氛围中演变。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一个安全的民主政府，比如2011年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政府，也可能遭遇一场因厌恶现状而引发的突然起义。2008年，类似的叛乱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推上了总统宝座，并在2010年将反奥巴马的茶党(Tea Party)推上了风口浪尖。民主党政府失败了，而且被认为是失败的。他们的替代者也失败了，并被认为是失败的

失败。个别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信誉，被抛弃了，但在某些时候，整个制度必然会陷入失败——对那些急于变革的人来说，代议制民主的繁琐机制将成为失败的部分原因。

在准备好基础并发出必要的清嗓声之后，我将在本章开始分析民主在像我们这样充满不信任的社会中是如何发展的。

我在2011年事件的背景下提出了政府失败的*条件*问题，现在必须明确说明。政府的失败只能相对于它自己的主张或公众的期望而言。如果民主政府确实越来越频繁地失败——正如我所坚持的那样——那么，要求、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衡了。在这一点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一直被我们历史形势的特殊性所震惊。工业时代政府的乌托邦野心，试图完善社会秩序，可笑地像一套超大的盔甲，挂在他们软弱无力的后继者身上。然而，这种唐吉诃德式的姿态一直保持着。在我们的政治语言中，关于非凡野心和高超技艺的虚构一直存在，没有任何讽刺意味。

民主政治的修辞似乎与民主政府所能取得的成就的现实脱节了:我建议在本章中思考其中的原因。第五次浪潮的破坏性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等式的一个方面。政府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数字化的鱼缸中，让全世界都能看到，但世界所看到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政府的主张、表现和说服力。

我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被意识形态之争所困扰的领域。在许多关于政治失败的问题背后，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关于权力的范围和限制的问题。现代政府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同样的项目:例如，在增加国家财富的同时降低失业率。我们现在知道，它们并不是万能的。因此，必须存在一个经验边界，超过这个边界，权力的运用就会弄巧成拙。任何跨越边界的主张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这是希腊悲剧的必然结果。

关于有效政府的边界条件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但任何对当代党派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猜测这项研究的命运。它已被特殊恳求的喧闹声淹没。

无论如何，我在这一章的目的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我把政府的局限性看作是人类知识局限的函数，而不是意识形态偏好的函数，在这种方法上，我与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的著作《为什么大多数事情都失败了》(*Why Most Things Fail)密切相关,这本书研究得非常透彻,书名也很有趣。*
书中所分析的奥秘是伟大的民主制度的衰落，从雄心勃勃的高度，到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悲叹的今天的海报儿童:看看我的作品吧，强大的，绝望的。

肯尼迪是如何以失败取胜，而奥巴马是如何成功走向失败的

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回顾50年前，你会看到一个美国政府，即使面对失败，它仍然能够获得公众看似取之不尽的同情和信任。因此，让我建议，第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从那里走到今天的。

1961年4月17日，大约1400名武装的古巴流亡者在古巴南部海岸的一个叫做猪湾的地方登陆。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权。这些流亡者是由中央情报局组织、训练和提供的。这次行动经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审查，并得到了美国新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批准。世界上的每个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从冷战的角度来理解这次袭击:这是美国政府试图在一个离佛罗里达太近而让人感到不安的国家里，摧毁一个崭露头角的苏联盟友。美国政府提供了一层否认的面纱，但这是陈腐的。

三天之内，反卡斯特罗的流亡者就彻底溃不成军。所有人不是被杀，就是被古巴政府军俘虏。一个现代政府的强大可以被1400个人推翻的荒诞理论被证伪了。按照这种奇特观念行事的责任完全落在了美国、美国政府，以及不可避免地落在了美国年轻的总统身上。

当时，肯尼迪政府正接近其要求被评判的100天期限，因此，从政治角度来看，猪湾事件发生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总统的年轻，到目前为止是魅力的源泉，冒着被认为缺乏经验的风险。毕竟，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是欧洲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而肯尼迪是太平洋上的一艘PT船的船长。

新闻媒体并没有淡化这次失败的严重程度。报道和评论的语气传达出一种感觉，即这一刻对新政府来说已经是决定性的。《*纽约时报*》顶级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写道:“约翰·f·肯尼迪平生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被舔。”“在他的43年里，他面对过疾病，甚至死亡，但失败对他来说是新的东西，古巴是一个笨拙和耻辱的失败，这使情况变得更糟……”雷斯顿总结道:“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可能比他如何进入这件事更重要。”[1]

在私下里，肯尼迪对这件事失去了连任的机会感到绝望。在公开场合，他会见了共和党人士，展示了两党合作，并就古巴局势发表了两份声明:4月20日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发表了一次全国广播演讲，第二天举行了一次电视新闻发布会。这些总统声明不仅影响了古巴的血腥事实，还影响了美国公众对猪湾危机的感知。想象一下今天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些声明，这是一项有趣的分析工作。

在对报纸编辑的演讲中，总统否认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入侵从头到尾都是美国的一场表演。他把这次袭击归功于“古巴爱国者”，并坚称他们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只是善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在确立了美国对该事件的不干预之后，总统演讲的其余部分相当强硬地主张，美国有权在未来必要时进行干预，以履行其“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主要义务”。[2]。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鉴于美国因袭击古巴而受到的“宣传抨击”，“我们与你们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真实事实”是否没有帮助

动机是什么。”肯尼迪总统的回答似乎是针对一个不同的问题，但却成为媒体报道猪湾事件和总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核心。

> *一个自由社会的问题之一是信息的问题,而独裁政权却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有句老话说,胜利有100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关于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说了我认为有用的话。进一步的声明,详细的讨论,不是为了隐瞒责任,因为我是政府的负责人——这是很明显的——而仅仅是因为我认为,在目前的困难局势下,这样的讨论对我们没有好处。*[3]

很重要的一点是，肯尼迪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他的外交政策失败进行讨论的。首先，他否认美国对此事负有任何责任。这并不是一个误导媒体的问题，媒体已经知道了美国参与的程度，但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它关闭了问责的大门。然后，他显然以“政府负责官员”的身份接受了失败的责任，但由于美国没有正式参与，所以很难说总统到底在承担什么责任。最后，当被邀请详述美国政府参与秘密阴谋的问题时，他断然拒绝了，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这样做。

从我们这个时代反射性否定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如此完全地相信总统的条件，似乎令人惊讶。白宫记者团中没有人嘲笑不干涉的谎言。新闻界没有发表任何秘密文件，揭露中央情报局参与古巴行动的深度。几乎没有媒体发出反对的声音，认为封锁机密在政治上是自私的。

在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讲中，白宫征求了两位新闻舆论巨头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瑟夫·阿尔索普的意见。他们的话被写入了演讲的文本。这种类型的交流并不是一种新做法，但这显然降低了媒体批评政府回应的可能性。事实上，媒体作为一个机构“似乎团结起来支持肯尼迪。[5] .失败被转化为

积极的经历。正如托马斯·w·本森(Thomas W. Benson)在《JFK》(JFK)一书中所言，媒体通常把这位年轻的总统描述为在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之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人。言下之意是，肯尼迪虽然没有经验，但他拥有掌握总统职位要求的智慧，以及不逃避责任的性格力量，这是他自己的责任。[6]



7.1JFK新闻发布会:1961年4月21日

由于英年早逝，肯尼迪总统从未参加过连任竞选，但他也没有因猪湾入侵失败而受到丝毫的政治损害。大量的公众继续信任总统。事件发生两周后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为82%，比之前的民意调查提高了10%。“我做得越差，就越受欢迎，”肯尼迪开玩笑说。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能说出这句话的白宫主人。在1962年的中期选举中，猪湾事件和肯尼迪在外交事务上缺乏经验并没有成为问题，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保持了压倒性的多数

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增加到三分之二左右。8

基层的失败成了JFK政治成功的垫脚石。这是如何实现的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肯尼迪掌握了令人敬畏的修辞武器库。他很受新闻界的欢迎，新闻界在困难时期努力保护他的声誉。但对我来说，同样有说服力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出来，站在冷战黑暗的中心深处，媒体和公众觉得他们和总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的成功和失败也是他们的。在今天，对一个机构的这种忠诚会被认为是腐败的，或者是受到虚假意识的驱使。

要认识到精英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快进到一个具有类似属性的事件上，这个事件更接近现在。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赢得总统大选之际，美国和世界的金融体系分崩离析，带来了残酷的经济后果。新总统和JFK一样，年轻、受欢迎、能言善辩，而且相对缺乏经验。对公众来说，奥巴马面临的危机比对加勒比海岛屿的一次失败袭击更痛苦，也更根本:但是，与JFK的猪湾事件不同，这不是他造成的。这场灾难是在他的前任任内发生的，政治上的指责完全指向了那个方向。

在最后一章中，我概述了奥巴马总统对危机的解读，以及他希望如何克服危机。他对中间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宗派主义批评:腐败的机构受到错误、过时理论的诱惑，给自己和国家带来了灾难。奥巴马相信，他的新政府已经摆脱了过去的污点。因此，他的专家是真正的专家。他们的理论是数据驱动的，是最新的。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逻辑的终结:刺激计划。

在他当选后的几个月里，奥巴马总统就美国复苏和再投资计划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这是刺激计划的正式名称。一次是在2009年1月9日，在乔治梅森大学，在他宣誓就职之前，第二次是在国会联席会议之前

2月24日，在该法案已经成为法律之后。这两次演讲的引人注目之处，除了总统在支持法案时发展起来的修辞之外，还在于谴责的内容和提议的内容之间的不协调。

总统对经济衰退原因的分析是战略性的，影响深远的，连贯的。奥巴马总统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说，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与其说是经济衰退，不如说是道德上的失败。“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一个从公司董事会延伸到华盛顿特区权力大厅的严重不负责任的时代. . . .是时候抛弃旧习惯，培养一种新的责任精神了。[9]

但是，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展示这种新精神的实际建议比比皆是。这项经济刺激法案预计将启动经济，“挽救或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但它也涉及促进可持续能源、修复基础设施、改革我们的儿童教育、提高美国工人的竞争力，以及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这份长达1000多页的法案缺乏一个指导思想:它的授权可能会潜在地波及社会或政治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

这种程序性的分裂是第五次浪潮条件下政府行动的典型特征。对公众的影响是引起了对隐藏动机的警觉和怀疑。

国会于2009年2月通过了刺激措施，投票结果因党派分歧而存在分歧。从表面上看，这是总统的一次胜利，他在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实施了他的一项主要政治议程。白宫专家曾在公开场合自信地详细预言了该法案的条款将如何降低失业率。今天我们知道他们错了，刺激计划本身就失败了，但这一事实需要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猪湾事件对肯尼迪来说是一场直接的、不可否认的灾难——相比之下，2009年2月的刺激计划是一项成功的总统倡议，尽管存在争议。

然而，在1961年团结在肯尼迪总统身边的公众，在2009年奋起反抗

反对奥巴马总统，并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粉碎了他在国会的执政多数。

2009年茶党运动的出现预示了2011年叛乱组织所遵循的许多模式。它始于网络。在经济刺激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的前一天，29岁的西雅图博主Keli Calender卡兰德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吸引了100多人参加。在活动之前，Calendar在她的博客上发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挑战，重新分配知识:

> *别搞错了,总统明天就会签署那个法案,我不抱幻想,他真的会听我们的。但是,也许,只是也许,我们可以发起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滚雪球般的运动,让人们走出家门,彼此见面,共同努力,让这个国家重新走向个人自由和自由的真正激进的创始原则。*[10]

当地一群积极分子在卡兰德的号召下联合起来，称自己为“西雅图自由之子”。

两天后，也就是2月19日，一位名叫里克·桑特利(Rick Santelli)的不知名TV商业记者在芝加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的交易大厅播放了一段反刺激政策的演讲。桑特利抱怨的重点是，该法案通过救助不负责任的抵押贷款借款人，促进了“不良行为”。他毫不怀疑问题的根源:“奥巴马总统，你在听吗?”桑特利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总结道:“我们正在考虑7月份在芝加哥举行一次茶党活动。你们所有想去密歇根湖的资本家，我要开始组织了![11]

桑特利的有线TV频道CNBC的观众寥寥无几，但全球信息领域提供了放大: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博主们在网上聊天，这段怒骂的视频立即在YouTube上疯传。这种行人TV表演的受欢迎程度应该是一种警告，即空气中有什么东西。2月27日，美国至少40个城市爆发了茶党抗议活动。2009年纳税日4月15日，全美约750起抗议活动。9月12日的“纳税人向华盛顿游行”吸引了7.5万至30万人参加，具体人数取决于是谁统计的。[12]

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奥巴马总统面临着一场致力于挫败他的目标的新运动。

* * *

茶党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党。从地理上和气质上看，这些都是边界类型的人，从哪里来的人组成了数百个地方网络，通过Meetup和Facebook等数字平台进行互动，但坚决拒绝任何官方组织、等级制度、领导和发言人。自由工作(FreedomWorks)和茶党快车(Tea Party Express)等为数不多的帮助策划和资助活动的全国性团体，从未被视为这场运动的代表，而且往往被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茶党网络之间的联盟被一位作者描述为“脆弱的，往往是为了一次游说活动或政治事件而产生的，然后就解体了。”[13]

—

推动茶党采取行动的理想完全是宗派的，也就是说，反对:反对大政府，高税收，赤字，债务，华盛顿政治和政治家，特别是奥巴马总统的立法，如刺激计划和医疗保健计划。这是对中间派的反抗，被认为是暴虐的、自私的。茶党运动的诱人吸引力，就像后来的占领者运动一样，是否定的快乐，是推倒政治权威圣殿的屋顶的快乐。除了原教旨主义者对宪法的尊重之外，任何积极的提议要么激发了缺乏兴趣，要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奥巴马政府、民主党的显贵们，甚至共和党的当权派——都是茶党不请自来关注的对象——对这次起义的反应是惊讶和难以置信。我在这本书中记录的每一次公众与权威之间的冲突都是如此。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写道，“中心”很容易感到惊讶。它发现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质疑它的决定。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总统和民主党刚刚在2008年的选举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是阴谋论。

2009年8月，茶党活动人士扰乱了全国各地国会议员举行的讨论总统医保立法的市政厅会议，

民主党领导人将参与者斥为“人造草皮”——共和党操纵者伪造了一场草根运动。当主流共和党人更有可能成为茶党政治活动的目标而非受益者这一事实变得清晰起来后，另一种阴谋论被提出:茶党运动被企业利益“拉拢”了，尤其是科赫工业公司的大卫和查尔斯·科赫兄弟

这种一刀切的指责总有一定道理。毫无疑问，共和党候选人希望骑在反奥巴马起义的老虎上。科赫兄弟向自由意志主义团体捐赠了资金和组织力量，其中包括一些与茶党有关的团体。然而，作为解释突然涌现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进入美国政治生活的假设，精心设计的阴谋论观点似乎充其量是不够的。如果共和党或科赫兄弟真的可以为自由主义大众扮演花衣魔笛手，他们究竟为什么要等到总统选举*之后*才这么做呢?如果“增选”意味着改变运动的方向，那么就需要解决一些基本的分析问题，比如这种变化是*什*么，以及它是*何时*、*如何*发生的。

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是，公众在行动。茶党代表了对某一特定事件感兴趣的相当多的人。在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竞选总统时的反建制叛乱中，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而在2011年及之后的阶段变化中，这种情况将再次发生。公众在行动，这一次是从右翼而不是左翼出发。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构造碰撞又重新开始了。这些机构对形势视而不见——他们无法从纯粹的业余爱好者身上察觉到威胁，需要精心编造故事，让其他精英来指挥事件——这并没有使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现实无效。



7.2茶党示威，华盛顿特区:2009年9月12日[15]图©2009蔡斯怀特塞德

就像最近每一次公众反抗权威的起义一样，2009年的反叛者既不属于无产阶级，也不属于被压迫者，他们也不是无知的无知者。他们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茶党突击部队似乎比普通美国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富有，更白，年龄更大。如果说*愤怒者们*认为自己是没有未来的年轻人，那么茶党则可以被描述为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的家庭。但从任何历史或全球的比较来看，他们的当下都是繁荣的。[16]

在这场运动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是自由意志主义，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反权威态度，受到许多因2008年罗恩·保罗(Ron Paul)竞选总统而被政治化的选民的欢迎。这些人对宗教漠不关心或怀有敌意，原则上对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斯(John Stuart Mills)所说的“生活实验”持宽容态度。运动的另一翼由宗教右翼占据，他们关注同性婚姻和堕胎等社会问题。这两个群体除了各自的否定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就足够了。

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经常被看作是意识形态上的镜像。我不会把这种相似推到超出其自然极限的地步。茶党关注的是个人自由，占领华尔街运动关注的是社会和经济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都是对方噩梦中的野兽，是他们的国家似乎即将变成的活生生的恐怖。如果存在相似之处，那就是在教派的脾气中发现，这两场运动被认为是来自边境的政治业余爱好者的作品。两者都害怕权力和金钱的大机构，但又不屑于组织或任命自己的领导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道德和政治荒芜的世界中公民美德的最后前哨。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距离，也许可以缩小为一场关于私有属性的争吵。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会产生强大的后果，我并不打算淡化它们。我只是观察到，意识形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现在都必须适应更深层次的斗争——适应权威危机和公众的宗派主义特征。

与“占领者”不同，茶党的追随者们一头扎进了选举政治。这是一种不同，产生了不同。与意大利的五星运动不同的是，茶党并没有单独行动。相反，他们集中精力改造共和党，使其成为实现自己理想的载体。虽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仍然令人瞩目:在第113届国会中，48名共和党众议员和5名参议员属于“茶党核心小组”。许多州长和州政府官员也参与了这场运动。

叛乱的高潮出现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茶党把国会竞选变成了一场针对奥巴马总统及其计划的全民公投，其程度非同寻常:在一项对选民的调查中，56%的人表示，他们要么投了支持总统的票，要么投了反对总统的票。这种做法有利于在热情上占有优势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联邦和州一级大获全胜的共和党。众议院从民主党的多数变成了共和党的多数，而在参议院，民主党失去了5个席位，并因此失去了他们不受阻挠的多数席位。

对于巴拉克·奥巴马来说，这场选举灾难意味着一种执政模式的结束和另一种执政模式的开始。他的转变是独一无二的

成为我故事的一部分:我会在本章的最后继续这个话题。但是，总统想要从中间派那里强有力地宣称自己有能力的任何希望——任何他可以效仿罗斯福和约翰逊，推出针对重大“问题”的大项目的想法——都必须放弃。党派间的立法之争已经转移到了预算和税收决策的边缘。2010年之后，总统推动的任何一个重大项目都没有成为法律。

在不那么动荡的年代，茶党可能会在其出人意料的胜利和对政府控制权的挑战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比如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结果却恰恰相反。一旦奥巴马总统的政治议程被敲定，这场运动就开始失去凝聚力和力量。这是一场对宗派边界的反抗，其动机是对中心的否定，缺乏积极的建议，信徒们可以在否定实现后围绕这些建议团结起来，继续前进。

* * *

我曾描述过两届政府的失败，时间间隔约为50年:肯尼迪总统的猪湾事件和奥巴马总统的刺激法案。其后果在根本上是不同的。JFK的麻烦很明显，而且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发现自己的声望在上升。公众团结起来支持这位陷入困境的总统。以奥巴马总统为例，失败在当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观点问题，但他面临着公众的反抗，这使他在国会中的执政多数被消灭。

1961年至2009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写成一本比这本书厚得多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都变了。我更关心的不是这条轨迹，而是为我的主题提供一些联系:公众的反抗和权威的危机，这些发展与奥巴马总统的困难密切相关，而与肯尼迪总统的困难完全无关。
政府要以我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失败”，至少必须具备两种情况。必须发生一些被认为是失败的经验性事件。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破裂。命令和服从的习惯，对上级权威能力的信任，对为精英们辩护的故事的信仰——所有这些关系都必须被磨损或打破，

如果失败，就会产生政治后果。

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总统职位是受保护的机构。他在猪湾事件中的失败被媒体归咎于新总统的年轻和缺乏经验:他还没有进入办公室。肯尼迪对责任的矛盾接受使媒体能够讲述一个年轻总统学习工作的积极故事。猪湾事件并不失败。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经验。公众接受了这个故事，并支持JFK。

奥巴马总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几乎在他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之后，总统和很大一部分公众之间就出现了不信任的鸿沟。作为一种制度，总统职位非但没有提供保护，反而让现任总统暴露在令人衰弱的怀疑之中。作为候选人的奥巴马在这次重估中大捞一笔。作为总统，他很快就受到了惩罚。

巴拉克·奥巴马以来自边境的正义之声竞选总统，对抗以党内希拉里·克林顿和即将退休的现任共和党总统布什为代表的失败的、没有原则的中间派。这使得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成为公众反对现有秩序的早期例证。正如在我考虑过的所有此类事件中一样，公众拥有了一种新的战略优势:对信息领域的控制。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筹集资金和在网上招募志愿者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19]

但造反的公众也面临着战略上的困境:由于起源于政治真空，它缺乏统一的组织、意识形态、纲领或计划。解决方案几乎在所有公众享受政治成功的地方都能找到，那就是毫不留情地关注当下受到攻击的特定错误或不公正。数字化放大后的否定，一直是把形形色色的公众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

回想一下，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抗议者包含了许多理想和观点，但所有人都对穆巴拉克政权怀有敌意。占领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反对有利于“百分之一”的经济制度。茶党可能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可能是宗教保守派，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以经济刺激计划和“大政府”为代表的大政府

医疗保健法。倡导一项积极的计划会粉碎这些群体:参与者对他们反对的东西感到充满活力，但对他们所支持的东西却模糊不清，意见不一。事实上，当环境要求他们阐明一个替代现状的方案时，这三个运动都动摇了，分裂了。

奥巴马总统的公众支持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他曾是一名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宗派候选人*，因为反对伊拉克战争而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他竞选总统的政纲是彻底否定布什的政治遗产。然而，他的积极纲领含糊不清，尚未形成。像“我们可以相信的变革”这样的口号吸引了许多相互矛盾的政治观点。一旦他当选，他所支持的任何计划都必然会疏远他的一部分基础。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茶党是由脱离总统阵营的独立人士滋养起来的——我怀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曾经厌恶布什总统，但仍然对政府的大项目持怀疑态度。[20]

奥巴马总统与茶党之间的决裂，早在总统职位合法性下降时就有预兆。导致这种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并非所有原因都与作为本书主题的冲突有关。在肯尼迪总统(JFK)意气相投的时代过后的某个时刻，精英们不再喜欢政治和政治家了。新闻媒体明显地放弃了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民主制度的保护，开始把民选官员伪装成根深蒂固的说谎者。就我的目的而言，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当公众作为一股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时，冷战时期总统们的共同目标假设已经在不信任的酸液中溶解了。

然而，有一个相似之处是存在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所领导的政府所宣称的能力，就像肯尼迪(JFK)时代所宣称的那样，是非凡而不可能的。除了谈话，其他一切都被削弱了。言论与政府现实之间的根本脱节，对任何有眼力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被信息领域放大了，这本身就是不信任蔓延的主要媒介。

HOW BRASILIA AND CABRINI GREEN BECAME DODD-FRANK AND THE EU CONSTITUTION

今天的政府所宣称的，甚至可能是他们所相信的，都是从工业时代的前辈那里继承来的。这同样适用于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公众的目光越过了他们实际统治者的软弱形象，看到了工业时代的宏伟抱负。我注意到，这些雄心壮志几乎从未实现过，但这并不重要。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也很有说服力，它们是在政府控制通讯手段的时候提出的，它们在没有经过太多思考或讨论的情况下，成为了今天民主政治的默认设置。

因此，任何检验政府主张与现实可能性的尝试，都必须从一点历史开始。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称的20世纪的“高级现代主义”政府方法，经常把赌注押在旨在使社会秩序臻于完美的庞大工程上。这类项目的专制例子有斯大林对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毛泽东对中国的“大跃进”和朱利叶斯·尼雷尔对坦桑尼亚的“村庄化”。民主的例子包括巴西利亚市的建设，“城市更新”住房项目，如芝加哥的卡布里尼绿色，以及美国政府针对贫困、犯罪、毒品和癌症发动的各种“战争”。

每一场战争的目的都是通过运用政治权力来完善社会关系。高级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信仰:它认为，如果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实施合理的计划和科学知识，就可以消除人类状况的痛苦，从暴政和不平等到饥饿和疾病。它的敌人是历史，迷信和混乱之母。英雄是专家官僚，他能把历史一笔勾销。我们以前见过这个角色:李普曼笔下的“受过特殊训练的人”，神奇地挥舞着他的“更广泛的真理体系”。

高度现代主义适合工业时代的等级制度。在政治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独裁者和民选总统都是如此。这种吸引力是结构性的。一切都是自上而下的。只有精英们拥有使社会合理化的技术和科学训练。当时的公众仍然被认为是不完善的无形的大众载体，而政府的雄心是永远消除这些不完善。统治精英们希望把这群人提高到更接近他们自己的更高的存在状态。他们的野心是利他主义的。他们的意图是纯洁的。如果他们的手段冷酷无情——这些

包括在不同时期的强迫迁移、侵入式监视，甚至监禁和死亡——这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蛊惑下，各国政府将经济落后等状况定义为“问题”，并以近乎狂躁的强度专注于某种即时解决方案。斯科特写道：“高度现代主义光学的清晰度是由于其坚决的独特性。”“它的简化虚构是，在它的审视之下，任何活动或过程都只有一件事在进行。[23]政治巨人论的倾向自然就从这种心态中产生了。

巴西利亚的建设可以作为上个世纪政府巨大野心的一个例子。该项目于1957年在巴西民选总统尤塞利诺·库比切克的领导下开始。一个新的首都将在这个国家的北部荒野中从无开始建造，通过理性规划和技术的纯粹力量，它将一举切断贫困和欠发达的结。巨大的公寓楼，按照完美的几何网格布局，被专家们确定为理想的居住空间。宽阔得出奇的高速公路，没有人行道，纵横交错的城市。自然，整个设计都是面向政治权力中心的，这些权力中心的宫殿往往被巨大的空旷空间所隔离。自然，只有统治精英，政治家和专家官僚，才会住在这座辉煌的人类之城。但该项目旨在将巴西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并从根本上改善普通巴西人的命运。它在精神和意图上都是乌托邦式的。库比切克承诺，建设这座城市将为巴西人赢得“五十年的进步”。[24]



7.3政府各部，巴西利亚

巴西利亚代表着对巴西的否定:一个真实的国家，一个真实的历史，一个从过去的经验中演变而来的习惯和风格。为了达到完美，这个世界必须被重新创造。这是高级现代主义政府以不加节制的花言巧语的形式传递给我们这个时代政府的非凡主张。

同样不寻常的事实是，几乎所有执行这一主张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从未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例如，建造巴西利亚的工人本应在工作完成后离开，但他们却留下来，住在完全没有计划的、摇摇欲坠的房子里。需要住在首都附近的富人不喜欢那些消毒过的公寓楼，于是在外围建造了一些不合理的豪宅。根据斯科特的说法，到1980年，“巴西利亚75%的人口居住在从未预料到的定居点”，这种混乱、非官方的巴西利亚维持并支撑着这座简朴的现代主义首都。[25]巴西经济快速发展的梦想，早已被人们遗忘。

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让世界焕然一新的热情让巴西举步维艰

公众的恐惧。几千万人死于苏联集体化和大跃进。这个故事众所周知，却很少与它的起因联系起来。尼雷尔的村庄化运动是苏联式集体化的一个版本，后者的灾难性失败在30年后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坦桑尼亚的受害者人数多少没有那么骇人听闻，但结果基本上是一样的。

同样，卡布里尼格林和大多数住房项目一样，也被夷为平地。联邦政府对社会状况发动的战争，以敌人或多或少站在敌对行动开始前的位置而告终。高度现代主义民主的失败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却与它们的根源脱节。我在这里说，如果你想理解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就*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

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公众还是精英，都生活在试图重建人类状况的政府的历史阴影之下。

今天，很少有政府认为这是可能的或可取的。自苏联解体以来，重新创造世界的狂热已经过时了。但是，民选政府非但没有承认自己已经从完美主义的噩梦中觉醒，反而似乎对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沮丧。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非但没有进入一个新时代，反而让人感到陈旧和迟到。政客们在过去的巨大阴影下瑟瑟发抖。他们感觉到公众在高度现代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愤怒者运动*和占领者运动要求废除历史，将人际关系从记忆的监狱中释放出来。

回到我的具体例子:肯尼迪总统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猪湾事件是一个典型的雄心勃勃的高度现代主义项目，试图用几百名武装人员引发推翻一个既定政权的行动。通常，这个项目也失败了，但失败没有负面的政治后果，也从未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然而，奥巴马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这种背景下，我打算称之为*晚期*现代主义，以捕捉时代的普遍感觉。他周围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扁平化。可能性的范围缩小了。我已经简要地论述了从它们到

现在:无论因果链如何，变化本身是不可否认的。

当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时，他站在前任们的阴影下。他怀着羡慕和怀旧的心情回顾罗斯福、约翰逊，甚至里根。和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奥巴马总统模仿了现代主义的高级习惯，即把具体情况定义为需要同样宏大解决方案的巨大问题。在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他发现有必要“与混乱的过去彻底决裂，为我们的国家设定一条新的道路。”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总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动袭击的组织身上，而是宣布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后期的现代主义政府宣称，他们的能力来自于发起高级现代主义项目的同一雄心壮志。这使他们处于一种虚假和危险的境地。高度现代主义失败了，但它让政府参与了规模巨大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目标范围之广让精英和公众都眼花缭乱。这些项目所讲述的故事并不是失败的，而是史诗般的行动，高度戏剧性，摘星的故事。

现在再谈这种浪漫已经太迟了:政府已经失去了英勇努力的意志。

2009年的经济形势被奥巴马总统描述为要求与过去彻底决裂，为国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然而，他缺乏高度现代主义那种狂躁的“奇点”，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刺激计划——是一个大杂烩，需要1000多页来描述，耗资近8000亿美元，但不知何故，毕竟，几乎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总统从来没有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开始的前提下进行后续行动，从来没有与历史的死手进行史诗般的战斗。他的执政模式是冗长的、战术式的，分散在许多目标之中。他希望每一项值得的事业都能得到捐款。刺激计划从来没有像巴西利亚那样令人眼花缭乱，也没有向贫困宣战，它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激烈而坚决的反对。

总统把他的言辞放在一个雄心勃勃的高级现代主义的层面上，但他在指导b他的政府的行动时却带有晚期现代主义的胆怯，当然，他受到了不安的公众压力的约束。深刻的

说话和行动之间的脱节暴露了真相。民主政府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政治语言还没有跟上。高级现代主义政府是一位严厉的先知，要求摧毁混乱的现在，为完美的未来腾出空间。晚期现代主义政府更像是一位慈祥的叔叔，给自己最喜欢的外甥女和外甥们分发巧克力碎饼干。他不希望改造他们。他只是想让他们快乐——尤其是和他在一起。

如果说当权的高级现代主义是完美的引擎，那么晚期现代主义就成了幸福的机器。只要它确定了某种程度上受害的、残疾的、麻烦的、低于平均水平的、被冒犯的、不舒服的——实际上或潜在的不快乐的群体，它就一定会介入。它的行动在政治上相当于分发巧克力曲奇:今天的政府迫切希望人们看到它在做一些事情，任何事情来帮助人们，并因其良好的意图而得到认可。干预没有边界，但也没有史诗般的结果。民选官员非常清楚，公众在行动，他们对后果感到恐惧。他们的主要野心是要让我们相信，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的痛苦，站在我们一边，已经为我们最喜欢的事业捐了一点钱，只要我们公众允许他们和平地结束任期就好了。

干涉主义用千百种策略代替了单一的大胆战略。就其宣称的目的而言，计划似乎很难让人理解，而且，就像刺激计划一样，需要通过冗长的立法。奥巴马总统的标志性项目《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长达900多页，内容相互矛盾:“豁免”一词出现了214次。2009年加强对美国金融体系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bill)长达848页。相比之下，1913年建立美联储(fed)用了31页，1935年完成《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用了37页。

对微观社会调整的渴望，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欧洲的民主国家首先向它投降，而且更加坚定。例如，欧盟2004年提出的宪法草案包含400条条款(美国宪法只有7条)和855页，其中每一条能想到的正确观点都被授予一块巧克力饼干。

在英国，保罗·奥默罗德整理了一份早期运动的清单

议会——一种程序性的工具，允许任何议员为自己喜欢的项目寻求政府的支持。

> *在2004年随机选择的某一天,有人敦促英国政府……对政治民意调查进行全面调查;给予空气质量更高的优先级;坚决打击“残障”;追授帕迪·梅恩中校荣誉勋章;在北爱尔兰范围内推行护理和获得关节炎治疗的标准;敦促出台法规,提高欧洲度假胜地的安全标准;增加对临终关怀医院的资助;不恢复人头税;确保英国外交使团成员在孟加拉国安全工作;坚决处理针对NHS工作人员的袭击;提议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定》;对海湾战争综合症进行独立的公开调查;支持“为养老金买单”游行;投资东海岸干线铁路;公共场所禁烟;明确牛津郡议会设立庇护中心的成本;支持小企业对大型外国跨国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为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道歉;修改财政法案,允许人们投资电影;最后,废除重新投票以维持工会政治资金的规定。*[27]

奥默罗德的评估是:“干预的冲动，希望被看到正在做某事，已经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28]

这种世俗趋势的影响是在整个社会的表面上参与民选政府的合法性，但这样做是薄弱和无效的，就像石油在水上一样。从肥胖到气候变化，没有什么事情是如此个人化或如此宇宙化，以至于不能被认为是政府的失败。如果政治权力已经成为幸福的保证，那么政治家必须为人类生活的悲剧维度承担责任。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必须对每一个困扰选民的不完美和焦虑负责。政治干预虽然是对公众的一种安抚姿态，但却加剧了它旨在消除的不信任。经济刺激和医疗保健法案激发了茶党(Tea Party)的反抗，而欧盟宪法尽管在公认的意见面前卑躬屈膝，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我再说一遍，失败是政府要求和公众期望的结果。高级现代主义政府声称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来达到完美。从修辞上讲，他们今天的继承者也承担了这个负担，他们还声称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干预以促进幸福。这些主张在实践中的历史，最好用与现实的谦卑碰撞来形容。失败一直是常态，而失败的影响就是让民主进程的合法性流失。

就公众而言，他们倾向于从表面上接受政府的主张。过去100年里雄心勃勃的花言巧语已经演变成民主的自然语言，公众现在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政府努力，它就能解决任何问题，改变任何不受欢迎的状况。晚期现代主义者的干预冲动及其漫无目的的迂回，被公众解读为要么是暴政，要么是腐败——不知何故，从来没有被解读为慈父的无效姿态。然而，政府的干预只会招致公众的不满。奥默罗德没完没了的议会能力要求清单，可以在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从占领者声明中挑选出的对政府同样没完没了的期望中找到镜像:

> *……控制金融投机,特别是高频交易;审计美联储;应对住房危机;规范透支费;管制货币操纵;反对工作外包;捍卫集体谈判和工会权利;减少收入不平等;税法改革;改革政治竞选资金;推翻最高法院允许企业无限制提供竞选捐款的判决;禁止对公司进行救助;控制军工联合体;改善对退伍军人的照顾;限制当选政治家的任期;捍卫互联网自由……29*

公众根据政府自己的条件来评判政府，但加上了不良意图。我对这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现代主义者的高要求超出了政府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晚期现代主义者的优柔寡断可以更多地用政治必要性来解释，而不是用精心设计的阴谋论来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下，失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要提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它是否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要转向这个问题。

保罗·奥默罗德和为什么大多数事情都失败了

巴西利亚建成了。我去过那里:那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巴西利亚的失败在于没有规划的城市的发展，吞没了原来的城市，以及令人失望的经济回报。库比切克曾吟诵过那些神奇的字眼，现代化和进步。巴西利亚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现代政府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他们修建了高速公路，帮助根除了天花和小儿麻痹症。但他们承诺了更多的东西——无非是美好的生活——而且他们要求加强对财富和权力的控制，以实现这一目标。失败往往是过度承诺和过高期望的结果。

在新千年之交的某个时刻，精英们失去了对信息的控制，权力安排开始翻转。由于确信公众的愤怒，民选政府出于对后果的恐惧，要么采取了行动，要么没有采取行动。合法性等同于推卸责任，而执政的目的则变成了表现出没有罪责。

Henri Rosanvallon写道:“人们追求的不是实现政治*目标，而是某些身体和道德品质*。”“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透明度，而不是真相或普遍利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美德。“[30]无论前进还是后退，各国政府都在无尽的失败循环中痛苦不堪，在许多层面上，在任何地方，都是真实的和可感知的。

在民主的诞生地希腊，在2008年灾难性的经济失败之后，所谓的政府要对国际机构的“三驾马车”负责。政治体制在边缘摇摇欲坠:2012年5月的选举有利于激进的左翼、共产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使国家陷入僵局，并有必要在6月举行新的选举。有一项指标显示，2013年对政府的信任下降到14%。[31]

在西班牙，在“*愤怒者*”谴责该国“过时和反自然的经济模式”失败三年后，失业率高达25%，青年失业率超过50%。[32]. 75%的公众不赞成马里亚诺·拉霍伊总统处理危机的方式

经济——但85%的人不赞成这位反对党领袖。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到18%。

在意大利，过去十年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被判犯有税务欺诈罪，尽管他在监狱里度过一天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在两个月的政治僵局之后，政府是一个由猫狗混杂在一起的脆弱联盟。正在崛起的新政党“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由一名前喜剧演员出身的博主领导，他自称是Beppe Grillo-Jiminy Cricket。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下降到15%。

五星运动(Five Star)等反建制政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出现，表明公众对一如既往的民主政治感到愤怒。这些政党起源于政治光谱的两极边缘，或者是凭空而来，但它们都有着与主流右翼和左翼截然不同的一套主张:它们的承诺都是关于指责和惩罚。他们希望消灭的敌人是资本家、银行家、移民和外国人，也就是欧盟。一些造反的政党，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实际上在权力的门槛上徘徊。其他一些政党，如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实力雄厚，足以让精英们感到恐惧。在每一种情况下，高度现代主义的乌托邦项目和晚期现代主义的胆怯干预都被拒绝，而支持纯粹否定的政治。

在美国，政府的失败有时就像是对公众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监听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数十亿部手机和网络通信。2013年5月，美国国税局承认，在2012年大选前夕，它曾针对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对手进行审计，并一直拒绝给予与茶党(Tea Party)有关的团体免税待遇。在机场和联邦大楼，典型的互动将公众置于国家武装力量面前的嫌疑人和恳求者的角色。政府方面的紧张情绪可以通过军事化的冲动来衡量:教育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都资助了自己的特警队。“大政府”对美国人构成最大威胁的信仰绝不是茶党的怪癖:在2013年12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2%的人认为大政府是美国人的最大威胁

受访者都持这种观点。[34]

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普遍失灵。2013年10月，美国公众目睹了他们选出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官员未能就预算达成一致。在16天的时间里，直到最终拼凑出一份预算，联邦政府在一个半存在的僵尸状态中摇摇晃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经过三年的准备，总统医改法案的技术和程序要素在起飞的那一刻就崩溃了。2014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该计划的支持率直线下降，降至36%。[其他]传统的政府活动，如边境管制和邮政服务，似乎把失败当作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政治制度——让我们用恰当的名字来称呼它:代议制民主——在不断失败的压力下正在崩溃。与此同时，政客们被指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党派偏见，据说选民们正在“成群结队地”抛弃民主党和共和党，一项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需要第三个主要政党。这些报告中没有矛盾之处。总之，他们准确地描述了公众和他们不断选举的人之间的裂痕。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在70%到80%之间波动。到2013年，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开始时，民众的信任度已经达到了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相当的水平:19%。[37]

当我回顾这一连串令人沮丧的失败时，关键的问题是，情况是否本可以不是这样。即使政府的主张过于雄心勃勃，政府的能力也可能在困扰民主政治一个世纪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公众的高度期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民主政府的能力和诚信提出更尖锐的问题。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面临着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民主政治是围绕民主政府无力解决的问题而展开的斗争。

寻找政府行为的界限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事情。我打算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的向导是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他是一位具有统计分析天赋的英国经济学家。[38]岁

在《*为什么大多数事情都失败了*》*一书中*，奥默罗德的持久兴趣是在复杂系统的框架下理解人类的行为。行动可以是个人的决定，也可以是政府的计划。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是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从分析的角度来说，都是一样的。对奥默罗德来说，问题的核心是演员的*意图*与他的行为*结果*的匹配程度。

他的片名给出了答案。奥默罗德发现，在复杂环境中，行为的结果与其所陈述的意图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一点适用于你和我，适用于苹果和b谷歌这样的公司，也适用于联邦政府。大多数事情都失败了，因为我们人类倾向于从狭义的问题角度思考问题，而通常很少注意到这些问题最重要的特征:它们所处的更广泛的*背景*。当我们认为自己在解决问题时，实际上是在破坏环境。大多数后果将是意想不到的。

奥默罗德的发现绝不是决定性的，但我认为它们极具说服力。他把关于政府边界条件的争论从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道德和政治领域——转移到了可能性领域，即对人类如何与世界互动的更现实的理解。道德和政治应该从奥默罗德的结论出发:从可能开始。

今天的情况远非如此。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围绕着雄心勃勃的意图和能力要求展开，而这些在第一次接触现实时必然会失败。

这同样适用于商业，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奥默罗德将公司的失败率与物种的灭绝率进行了比较:“描述公司灭绝的频率和规模之间联系的精确数学关系，”他写道，“……与化石记录中描述生物物种灭绝的数学关系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时间尺度不同。39想想其中的含义。公司*想要*生存，甚至是蓬勃发展，并按照这些意图行事。他们研究市场环境，起草战略计划，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弱点。然而，最终，他们的失败率与动物灭绝的随机模式“几乎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失败的公司倒闭，被新公司取代，而政府累积失败，使其在系统上更加脆弱。

奥默罗德研究了民主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的表现，这些问题一直与他们的野心有关:我称之为他们对能力的要求。失业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每一个当代政府都声称有能力减少失业。2009年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的设计者声称，该法案将挽救或创造350万个就业岗位，并显著降低失业率。这将通过花费大量资金来实现。这必然是政府选择的经济工具。奥默罗德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为了追求充分就业等有价值的目标，吸收了国民产出的更大一部分。在英国，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保存着出色的统计数据，自1946年以来，公共部门的规模占经济的比例比1870年至1938年期间翻了一番。然而，政府扩张前后平均失业率的差异在统计上可以忽略不计。

每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的历史轨迹。公共部门大幅增长，而长期失业率未受影响。刺激计划耗资近8000亿美元，但其对失业率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奥默罗德总结说:“无论政府角色的大幅增加带来了什么好处，减少失业——贫困的主要原因——都不是其中之一。”[40]

另一个明确的问题是犯罪。自青铜时代以来，执法和维护人身和属性安全一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你可能会认为，随着政府财富和势力的增长，犯罪率会下降，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1960年至1980年间，美国的犯罪率增加了两倍。今天，在严格执行“三振出局法”和监狱人口空前增加之后，犯罪率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两倍。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涉及各种经济模式和对违法的态度，也出现了犯罪率的急剧上升。一位来自火星的分析师，不被意识形态所蒙蔽，可能会

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政府预防、减少或惩罚犯罪的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犯罪率脱节。[41]

在贫困、收入不平等和按阶级、种族或宗教划分的地理隔离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脱节。几十年来，民主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使公民摆脱贫困，更公平地重新分配收入，并整合社区以促进凝聚力社区。尽管做出了这些不懈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充其量，贫穷、不平等和种族隔离没有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情况恶化了。结果与初衷不符。

对奥默罗德来说，政府的失败是人类状况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使*是拥有智能设备和连接能力的信息人*，在处理信息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生物。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参与者——即使是拥有博士学位和大量科学研究成果、掌握着国家强大权力的专家参与者——也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扰动视而不见。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以神秘的、从根本上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例如，个人层面上的轻微种族偏好可能导致系统层面上明显的种族隔离。[42]把制度的一部分单独挑出来作为需要政府行动解决的“问题”，会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通常是不希望看到的后果。无论采用何种策略或技术，未来都继续隐藏在不确定的面纱后面。预言和控制都是幻觉。

> *人类,无论是作为个人行事,还是在公司或政府中做出集体决策,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做出决定的目的是实现特定的、预期的结果。然而,我们对正在形成的世界的看法是,很难甚至不可能在任何有意义的意义上预测决策的后果。我们可能想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即使在看似简单的情况下,似乎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决定未来。*[43]

这种对现实的描述打乱了许多现代假设

例如，科学技术可以穿透未来。或者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社会关系可以根据某种有远见的原则被理性化。如果奥默罗德是对的，那么今天的大多数民主竞选都是围绕虚幻的问题展开的，而民主政治家要想当选，就必须承诺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表现出了过度的党派之争，那可能是因为政治组织之间的团队合作——对输赢的统计——保留了一种他们拼命坚持的现实，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会抓住一点漂浮的碎片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决定未来，政治参与者就会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把进步与对现状的否定和谴责混为一谈。这已经在宗派主义的公众身上体现出来了。从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到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公众拒绝承认现状的合法性，同时拒绝参与制定替代方案。

一种将否定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偏好，已经开始在那些负责维持政治现状的人中间蔓延。对于这种矛盾的发展，我认为大部分责任都落在奥巴马总统身上，他的宗派主义使他回到了我的故事。

贝拉克·奥巴马和否定的乐趣

公众反抗的假设如果成立，必将对政府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等级制度反应迟钝，容易出其不意，在信息领域的争论还没开始就已经输掉了。那些以召集集体行动意志为己任的人，已经失去了信任和合法性。各地的统治者都面色苍白，战战兢兢地成为自己言辞的囚徒。出于纯粹的历史原因，民主统治者被谴责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并宣称自己有能力:这就是游戏的方式。但是，民主的游戏现在正与现实交战。结果是持续的失败。

民主派所面临的困境，其危险程度不亚于独裁者。政客们必须承诺不可能的事情才能当选。当选官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在肯尼迪时代，公众和精英们把目光从天皇身上移开

裸体。相比之下，我们把布什总统在伊拉克的失败和奥巴马总统在经济刺激计划上的失败当作炫耀，就像战败的酋长在罗马人的胜利上炫耀一样。在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民主的生活已经被简化为展示和沉思皇帝的顽皮行为。需要一条摆脱现代民主乌托邦式野心的出路，民主政府才能得以维持。

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崛起和复活。

这位总统曾因简历上有“社区组织者”的头衔而受到反对者的嘲笑，但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使他与叛逆公众的言辞和自我形象保持一致。社区组织者被期望揭露、谴责、激起义愤。他不断地纠结于现存秩序的诸多不公正，他以英雄的姿态要求变革。而变革本身则被推给了其他负责任的一方——通常是政府机构。组织者进行否定，而不是行动。总统对民主政府的愿景也可以用类似的术语来描述。[44]

—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作为一名来自边境的叛乱分子竞选总统，但很明显，他最初希望通过实施罗斯福和约翰逊传统的大项目，从中间派的角度进行治理。这是一个棘手的转向，而且，正如我所展示的，总统从未成功地完成它。他支持的项目拖累了他的人气。那些被落实为法律的措施，比如刺激计划，引发了茶党起义，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瓦解了他的执政联盟。

在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对形势的变化做出了衡量，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雄心。无论是出于计划，还是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出于气质，他恢复了一个正直的局外人对腐败的建制派喊冤的姿态。他在言辞上与自己办公室的权力、与中心保持距离，并放弃了那些导致b他的政府走向失败和失败的能力和英雄计划的主张。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很少有观察者能理解这种做法与历史的脉络是多么格格不入。美国总统被认为是实干家和成就家——精通立法、政策和政治。奥巴马总统似乎对融入这种模式不感兴趣。他是在一股反对权威的浪潮中崛起的，而当他被打倒时，他也被打倒了

被认为是权威。公众对政府感到愤怒和厌恶。从此以后，他将成为这种愤怒和厌恶的代言人。这位经验丰富的社区组织者将拥抱并加强公众对现有秩序的不信任。

总统成了这个国家的主要控告者。由于国会的党派分歧，他不再需要追求积极的立法计划，他把自己裹在好斗言论的温暖毯子里，背弃了民主政治中激烈的妥协。

从2010年到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大量的问题和事件引起了奥巴马总统的谴责。所有这些都符合政治上分裂的“楔子”形象:特雷冯·马丁(Treyvon Martin)枪击案中的种族主义、经济上的不公正和市场体系的不平等、对妇女、移民、同性恋权利的推定侵犯。在一次引人注目的政治策略中，总统的连任竞选忽略了他在任期间的成就，并再次将他描绘成一个与现状抗争的叛乱分子。他的对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发现，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的职业生涯让他成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的百万富翁集团的一员。作为指控者，总统可以摆脱在位的负担。在茶党叛乱的灾难发生两年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相对轻松地赢得了连任。
2013年4月26日，奥巴马对美国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发表讲话，这是他连任六个月后的讲话，他可以像任何美国政治人物一样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从中可以看出他风格的大致特征。总统首先选择了一个引起分歧的话题——在这次演讲中，是堕胎和计划生育。然后，他用模糊但强大的力量来框定这个问题，这些力量希望践踏普通公民的权利。

> *因此,事实是,经过几十年的进步,仍然有人想让时光倒流,采取更适合上世纪50年代的政策,而不是21世纪的政策。当涉及到妇女权利时,他们参与了一项精心策划的历史性努力,使基本权利倒退。*
> *42个州已经出台法律,禁止或严重限制妇女选择的权利……*
>
> *在北达科他州,他们刚刚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你选择的权利*

选择,早在6周就开始,即使女方被强奸。一个女人可能在怀孕六周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这太荒谬了。这是错误的。这是对女性权利的侵犯。[45] —

你可能会期望总统对这些令人震惊的不公正现象逐一进行详细的论证，指出罪魁祸首，并宣布白宫的一项战略，以击败那些希望把时钟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人。但这正是奥巴马总统不同于他的前任的地方。尽管对妇女权利的侵犯明显很严重，但他几乎没有提到具体细节，也没有提到行动计划。医疗保健法得到了肯定，并以社区组织者的方式向观众发出请求，希望他们“传播”有关该计划的消息，但没有提到这与推翻基本权利的努力有什么联系。总统以一种奇怪的超然的方式提出了他的指控，更多的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辩论性的。

他最后说:“我想让你们知道，你们还有一位总统，他会和你们一起走好每一步。”这场战斗，甚至是战场，似乎都是在夸夸其谈，但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如果没有他指责的声音，反女性势力就会在暗地里密谋并取得胜利。

2013年12月4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对另一群友好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表明了他对否定的支持。这次演讲的主题还是一个楔子问题:这一次是经济不平等。总统首先承认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国会共和党人为了废除《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而鲁莽地关闭政府,再加上本届政府在实施新法案最新阶段的执行不力,在过去几个月里,没有人表现得太好。因此,美国人民对华盛顿的不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46] —

然而，总统认为，公众的沮丧不仅仅是短暂的政治事件的结果。它们有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缺乏流动性导致了公众的愤怒和绝望。

总统指出，美国曾经是一片充满经济机会的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现代主义前辈们(从林肯到约翰逊)的庞大计划，他对这些计划给予了大量怀旧的赞美。“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接着说，“这种社会契约开始瓦解。”

> *随着社区价值观的崩溃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企业游说华盛顿削弱工会和最低工资的价值。随着涓滴经济变得更加突出,对最富有人群的税收被大幅削减,而对学校和基础设施等能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富有的项目的投资却被允许萎缩。*
>
> *……其结果是经济变得极其不平等,家庭更加没有安全感。*

就像在计划生育协会的演讲中一样，奥巴马总统在不平等问题上的恶人仍然是模糊的、无名的。从总统的话中，我们看不出游说华盛顿的企业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需要，也没有解释社区价值观的衰落和涓滴思想的兴起。但是，自私的力量虽然模糊不清，却足以将美国人生活的主旋律从机遇变成堕落。一旦他的言辞进入指责模式，总统就变得具体起来:

> *因此,我们经济核心的基本协议已经磨损了……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国家最为明显,它挑战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本质....问题是,在不平等加剧的同时,我们看到近年来向上流动的水平有所下降。出生在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孩子,有三分之二的机会进入或接近收入最高的家庭。出生在底层20%的孩子有1 / 20的机会进入顶层....统计数据不仅显示我们的不平等程度接近牙买加和阿根廷等国家,而且今天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比我们大多数富裕盟国的孩子更难,比如加拿大、德国或法国。他们比我们有更大的流动性,而不是更少....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变化伤害了所有群体:穷人和中产阶级;内城和农村的人;男女;和*

所有种族的美国人. . .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教育、心理健康、肥胖、缺席父亲、与教堂隔绝、与社区团体隔绝等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现在与成长的贫富一样重要。

我很难想象，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还会有哪位总统为美国描绘出如此无情的黑暗图景。“不平等加剧和流动性下降的共同趋势，对美国梦、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全球所代表的东西构成了根本性威胁。”显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发现，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正处于道德和物质上的瓦解之中。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类似的指责，但*目的*的不同表明，他对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

2008年和2009年，当奥巴马总统指责他的前任“极度不负责任”时，他采取了现代总统的典型姿态。他以国家政治主要推动者的身份发表讲话，定义了一个问题，为他提出的解决方案——经济刺激方案——辩护。2013年，还看不到任何解决方案。总统援引了他的“增长议程”和“贸易议程”，但这些都是口号，而不是计划。许多现有的政府项目得到了赞扬，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医疗保健法，但没有提出任何新方案。

总统现在是一个谴责者，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他描述了一种破坏性的趋势，但拒绝声称自己有能力应对这种趋势。在他看来，这次演习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让他与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愤怒保持一致。

* * *

奥巴马政府对争议或丑闻的反应，显示了它与权力的特殊关系。在每一个案例中，奥巴马总统和他的直接顾问们都在强调总统所选择的身份——谴责罪恶社会的边境先知——与沉闷的政府机器之间的巨大差距。一种美德的被动被强加于美国总统的传统形象之上，因为他总是掌控着局势。

举个例子:据说奥巴马总统从电视新闻中得知，IRS监察长正在调查该机构针对茶党组织的行为。据推测，他的高级幕僚早前就得到了通知，但他们认为这件事不值得他关注。一名前高级助手将这一丑闻归咎于“官僚体制下的一些人”，并补充道:“作为总统，你下面有很多东西，因为政府太庞大了。总统本人断言，在IRS监察长的报告“泄露给新闻界”之前，他“当然对它一无所知”。48

在另一个政治家看来，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巧妙的躲闪。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如果有什么闪避，那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虽然他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政治权威，但他在修辞上与所有权威分离，赢得了两次总统选举。他一直是一个否定的人:荒野中的先知。对于总统和他的小圈子来说，联邦政府“在”他们的“下面”存在着巨大的道德距离，并且由肮脏的官僚组成，他们完全应该受到公众的不信任。

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约翰·f·肯尼迪的那句“我是政府的负责人”，就能体会到，在叛逆的公众的压力下，政治权威的行使已经变得多么凄凉。

巴拉克·奥巴马脱离权力杠杆的举动，在总体上对奥巴马友好的精英中引起了恐慌，他们误以为奥巴马的指责言辞是传统激进主义的声音。《*华盛顿*邮报》的达纳·米尔班克指责“奥巴马，一个不感兴趣的总统”，并抱怨说

“他不想控制b他的政府的行动。自由派《纽约客》(New Yorker)的一篇讽刺文章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奥巴马总统在周六的广播讲话中向美国人民保证，过去四年他在美国政府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该报面无表情地说。50

言下之意似乎是，总统在工业时代的高级现代主义政治中进行了尝试，但失败了。如果说我的分析接近事实的话，那也远远没有描述当时的情况。我认为，巴拉克·奥巴马代表了民主政治中一种令人不安的新发展:边界征服了中间派，宗派情绪上升到美国

权力的最高位置。

重新审视这些术语很重要。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认为，边界将自己定位为中心的否定。教派气质是在对等级制度的不平等和腐败的异化中形成的。按照这个逻辑，宗派主义边界的统治必然意味着政府的自我否定:权力与自身的异化。在这种矛盾的中心进行治理一直是奥巴马风格的精髓。失败被从屋顶上先发制人地谴责:以前的政治领导的失败，过时的经济理论的失败，对基本权利的保护的失败，对“社区价值”和整个社会的失败。谴责证明了总统的诚意，并团结了公众——实际上，不是在联邦政府机构或民主进程的背后，而是在他的政府和他本人的背后。合法性坚持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固有品质，他是一位宗派先知，是一位将与公众并肩作战的总统。



7.4与权力的不寻常关系51 (AP Photo/Jacquelyn Martin)。©2013年美联社

至于民主，它的价值取决于具体的结果。一个允许妇女权利被践踏、商人助长不平等的进程，凭良心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使民主合法化，而不是民主合法化。他的失败只可能是秘密势力阴谋的结果，公众走上街头进行义愤填膺式的抗议是正当的。类似这种推测性的场景在埃及发生过。反对专制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对公众来说，民主意味着选举。针对合法当选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民主意味着清除政府中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及其宗教授权。

但代议制民主，就其实际存在而言，是一件程序性的事情。它要么容忍多元化的结果，要么就退化为混乱或加冕。更重要的是，总统要求的结果——套用奥默罗德的话——不在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例如，尽管民主政府的初衷是最好的，但经济不平等在各地都在加剧。在美国，这一问题在布什政府时期有所增加，但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恶化。奥巴马总统成功地将自己的能力与不平等的“问题”分离开来，从而逃脱了民主党的困境，但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弥合民主政治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政府的指责式风格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病态的发展，一种变形，是公众与权威之间的地下斗争所带来的。像所有政治家一样，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需要一个可行的政治空间来施展手腕。在他的特殊情况下，他被现代民主的雄心勃勃的失败和网络化公众的掠夺所挤压。在2010年的失败之后，总统决定采取一项战略，将公众选择的对抗权威的武器——否定——置于政府的中心。他将自己的政治个性与官方职位分离开来，最好的解释是，这是对严重外部压力的绝望反应。他个人的成功使他很可能会有模仿者。

然而，公众仍然和以前一样:不服气、不安、不高兴。它随时可能爆发，就像2010年那样。奥巴马总统能够模仿公众的声音，但他并不是公众选择的工具:他骑着一只老虎，必须不断提高他的言辞攻击，以避免公众转而反对他。这只会加剧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腐蚀性不信任。当

这种不信任得到了最高民选官员的证实，对民主的彻底拒绝成为一种可辩护的立场，在下一次不可避免的政府失败时被援引。

章节注释

1 Thomas W. Benson, *Writing JFK: Presidential Rhetoric and the Press in the Bay of Pigs Crisi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4), 39.

2 Ibid., xv–xix.

3 Ibid., 37–38.

4 Screen shot of video of con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Mqdk4uaZRk

5 Benson, *Writing JFK*, p 36.

6 Ibid., 36–42.

7 Jim Rasenberger, *Brilliant Disaster: JFK, Castro, 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

(Scribner, 2011), 332.

8 "Text of Obama Speech on the Economy," CNBC, January 8, 2009, http://www.cnbc.com/id/28559492

9 Yuri Maltsev and Roman Skaskiw, *The Tea Party Explained: From Crisis to Crusade* (Open Court, 2013),

Kindle location 1526.

10 The entire Santelli rant can be watched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EZB4taSEoA

11 Maltsev and Skaskiw, *Tea Party Explained*, Kindle location 1558.

12 Ibid., Kindle location 1858.

13 In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Manuel Castells takes this co-optation to be self-evident.

14 Screen shot from 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UPMjC9mq5Y

15 Maltsev and Skaskiw, *Tea Party Explained*, Kindle location 1717.

16 See, for example,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Tea Party Compared," *The Guardian*, October 7, 2011,

http://www. theguardian. com/commentisfree/cifamerica/2011/oct/07/occupy-wall-street-tea-party, and

Peter Aldhous, "Occupy vs. Tea Party: What Their Twitter Networks Reveal," *NewScientist*,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newscientist.com/blogs/onepercent/2011/11/occupy-vs-tea-party-what-their.html

17 Gary C. Jacobson, "Barack Obama, the Tea Party, and the 2010 Elections," *Extensions*, Summer 2011,

http://www.ou.edu/carlalbertcenter/extensions/summer2011/Jacobson.pdf

18 Rob Cottingham, "The Obama online campaign, by the numbers: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 2008," *Social Signal*, November 22, 2008, http://www. socialsignal. com/blog/rob-cottingham/the-obama-online-campaign-by-the-numbers

19 Jacobson, "Obama, Tea Party, 2010 Elections."

20 For the best-argued and most incisive analysis of this trend in the news media, see Thomas E. Patterson, *Out of Order*, (Vintage Books, 1993). One citation should suffice (Kindle location 179): "After the 1992 election, I asked several of the nation's top journalists why they portray the candidates as liars. 'Because they are liars,' wa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 . ."

21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 Ibid., 347.

23 Ibid., 117–130.

24 Photo by Ben Tavener

25 Scott, *Seeing Like State*, 128.

26 "Text of Obama Speech on the Economy," CNBC, January 8, 2009.

27 Paul Ormerod, *Why Most Things Fail: Evolution, Extinction, and Economics* (Pantheon Books, 2005), 236.

28 Ibid., 236.

29 See Chapter 4 for fuller quote and context.

30 Rosanvallon, *Counter-Democracy*, 257–9.

31 Anna Manchin, "Trust in Government Sinks to New Low in Southern Europe," Gallup World, October 30, 2013, http://www. gallup. com/poll/165647/trust-government-sinks-new-low-southern-europe.aspx

32 World Bank Data Catalog website.

33 "Support for Spain's government grows as graft scandal recedes—poll," Reuters, October 6, 2013 http://uk. reuters. com/article/2013/10/06/uk-spain-politics-idUKBRE99503Y20131006

34 Jeffrey M. Jones, "Record High in US Say Big Government Biggest Threat," *Gallup Politics*, December 18, 2013, http://www. gallup. com/poll/166535/record-high-say-big-government-greatest-threat.aspx

35 "Health Care Law: 74 Percent Rate Their Health Insurance Good or Excellent," *Rasmussen Reports*, February 10, 2014, http://www. rasmussenreports. com/public_content/politics/current_events/healthcare/health_care_law

36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oeba," *The Economist*, December 7,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united-states/21591190-united-states-amoeba; Richard Wolf, "Voters leaving Republican, Democratic parties in droves," *USA Today*, December 22, 2011, http://usatoday30. usatoday. com/news/politics/story/2011-12-22/voters-political-parties/52171688/1; Jane C. Timm, "Majority of Americans want a third party," MSNBC, October 14, 2013, http://www.msnbc.com/morning-joe/majority-americans-want-third-party

37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1958–2013,"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October 18, 2013,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3/10/18/trust-in-government-interactive/

38 Ormerod belongs to a group of thinkers who in the last decade have thrown much light on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what human beings can and can't know, predict, or ordain: N. N. Taleb, Duncan Watts, James C. Scott, Philip Tetlock, Nate Silver.

39 Ormerod, *Why Most Things Fail*, Kindle location 66.

40 Ibid., 38.

41 Ibid., 236.

42 Ibid., 67–68.

43 Ibid., 99.

44 I urge the reader to browse the many job postings for "community organizer" on the web, which add up to a familiar portrait.

45 Melissa McEwan, "President Obama at Planned Parenthood," *Shakesville*, April 26, 2013, http://www.shakesville.com/2013/04/president-obama-at-planned-parenthood.html

46 "President Obama on inequality," *Politico*, December4, 2013,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3/12/obama-income- inequality-100662.html

47 The senior aide was David Axelrod, and he can be seen making this statement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hd6XLbbtIY

48 Wynton Hall, "President Obama on IRS scandal: 'I certainly did not know anything,'" *Breitbart*, May 16, 2013, http://www. breitbart. com/Big-Government/2013/05/16/Obama-On-IRS-Scandal-I-Certainly-Did-Not-Know-Anything

49 Dana Milbank, "Obama, the uninterested president," *Washington Post*, May 14,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opinions/dana-milbank-obama-the-uninterested-president/2013/05/14/da1c982a-bcd7-11e2-9b09-1638acc3942e_story.html

50 Andy Borowitz, "Obama denies role in government," *The New Yorker*, May 18, 2013,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borowitzreport/2013/05/obama-denies-role-in-government.html

51 Screen shot from 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SAKcKMncfY

虚无主义和民主

8

工业时代的大等级制度感觉自己在衰落，我倾向于同意这一点。它们进化成一种更温顺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信息在更少的人之间传播得更少、更慢。今天，网络化的公众在旧机构中肆意横行，使它们丧失了吸引注意力和决定思想和政治议程的权力。

每一位专家都被一群业余爱好者包围着，他们急于抓住每一个错误，嘲笑每一个不成功的预测或政策。每个CRU都有自己的黑客，每个穆巴拉克都有自己的瓦埃尔·高尼姆，每个巴拉克·奥巴马都有自己的茶党。没有什么是秘密的，也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所以等级制度前段时间失去了他们的英雄野心，现在他们也失去了勇气。他们怀疑自己的权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

这种巨大的战略逆转几乎没有产生替代工业时代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公众搭乘的是新技术和平台，但他们是用户而不是制造者:他们对利用技术创新来制定自己的意识形态、方案或计划不感兴趣。公众反对，但不提议。因此，在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里，政治争论就像是法国大革命或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种扭曲的回响:我们仍然以*左右*之分争吵，

*保守*和*自由*，即使旧的景观已经被清扫干净，这些可敬的标签的相关性已经变得不确定。

缺乏新的选择，缺乏出路，使民主政治陷入了失败与否定的永恒反馈循环。而来自各个角落、毫无缓解的否定，已经把民主进程推向了虚无主义的边缘——这种信仰认为，现状是如此令人憎恶，破坏将是一种进步。

我以前曾触及过虚无主义的问题:现在是正视它的时候了。如果你同意我在前几章试图建立的假设，那么一定程度的社会和政治虚无主义——一种自杀的愿望——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如果*当代民主的工业时代等级制度正遭受权威危机，*如果*公众四处奔波，期待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将继续流失合法性——也会有人认为应该让它摆脱痛苦。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发现这样的推理链在什么时候会变得致命。这是一个很难解析的问题。“合法性”是一种授权魔法:据我所知，它是无法量化的。可能会说一些以前从未说过的话。例如，一位总统可能会谴责他所主持的政治制度。但其影响尚不清楚。围绕戏剧性事件进行的民意调查可以衡量不信任程度，但只能透过玻璃，而且是阴暗的。

在这一章中，我的意图是讲述一个虚无主义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即将传播开来的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以充满激情的信念，确认了一种对虚无——虚无——的偏好，而不是对现状的偏好。你所需要的只是倾听来自信息领域各个角落对它的否定和谴责。在某些情况下，让我建议，这种合唱可能会膨胀成公众的主流意见。

实际上，那些抱怨现有秩序的人都不属于经济上受压迫者或政治上受压迫者:相反，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大多富裕。因此，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必须是试图理解这些人是如何形成政治观点的，如果认真对待，这些政治观点将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

我想分析那个阴影中的生物，虚无主义者，在使他的进化成为可能的环境中。



8.1虚无主义者的电影之夜[1] Grand Lake Theater Photo, Oakland CA©2011 David Gans

从颓废到虚无，在其间的陌生地方驻足

在这个晚期、疲惫的民主时代，大量的人认为生活越来越糟。气候正在变得更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每年都会告诉我们这一点。“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毋庸置疑的，”IPCC在2013年警告说，“自1950年以来，观察到的许多变化是几十年到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2]错在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的经济体系:全球变暖是“人为的”，是人为造成的。对我们的惩罚是以极端天气事件的形式出现的，比如毁灭性的飓风“桑迪”，它摧毁了纽约州

2013年的纽约市。一个环保组织声称已经收集了28万个桑迪“幸存者”的签名，向白宫请愿，要求“立即采取气候行动”。奥巴马总统同意在这个问题上转向指责模式。他指责说，海平面上升“加剧了”纽约的“破坏”，极端天气事件的代价可以“用失去的生命和生计、失去的家园、失去的企业、数千亿美元的紧急服务和救灾资金来衡量”。[4]。

经济变得越来越糟。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种信仰为政府继续干预提供了理由。对于保守派来说，它证明了攻击总统和他雄心勃勃的高级现代主义言论是正当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公众来说，经济衰退显然是一个“棘手的判断”，只有25%的人持反对意见。[5]

政治生活越来越糟糕。我在最后一章列举了民主政府的诸多失败。这些失败都是在公开的情况下，在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很难将其归咎于某一个人、政党或意识形态。失败似乎是系统性的。政治精英们既固执己见，又软弱无力。与肯尼迪总统时代不同，公众是无情的。与“最伟大的一代”相比，现在这一代人已经失败地进入了颓废和绝望的政治。

巴拉克·奥巴马对谴责有着强烈的宗派偏好，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在变得更糟，这并不奇怪。无论手头的问题是极端天气还是经济不平等，总统在他的声明中都描述了一个道德和物质衰退的社会。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就像每一个憎恨当前秩序的思想家——右翼和左翼，公众和精英——奥巴马总统怀念正义的过去。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经济基础稳定而安全，未来看起来比过去更加光明。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跟随你父亲在当地工厂的脚步，你知道一份蓝领工作可以让你买房子，买车，也许偶尔去度假，医疗保健，一份可靠的养老金。对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上大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你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而且它*

这意味着毕业时不用背负大量债务,而且可以指望在充满活力的就业市场上获得晋升。

但高度现代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总统解释说，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社会契约”已经瓦解，我们进入了自己的堕落时代。[6]

美国政治，我认为全球的民主政治，都在英雄过去的阴影下烦恼。伟大的计划曾经被尝试过，结果是稳定、安全、进步。今天，许多方面的情况都在恶化，但这个系统似乎无法产生解决方案。例如，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正在恶化，但精英和公众之间的对话都集中在衰退的症状上，集中在持续的失业、不平等、缺乏流动性、首席执行官的高得离谱的薪水上，而不是可能扭转局势的政策变化上。奥巴马总统已经把前任的减税政策扔进了过时理论的垃圾箱。他推行大规模经济政策的努力，即刺激计划，以自己的方式失败了。现在已经没有关于新的减税或新的刺激的辩论了。政治进程似乎毫无生机、疲惫不堪，政客们也很害怕。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压倒一切的感觉:我们是伟大一代的颓废的孩子，找不到回头的路，找不到从我们正在下沉的流沙的出口，因为那个流沙就是我们自己。寻找责任方并进行指责的本能冲动，被数量庞大的目标所挫败。在美国，还有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右翼和左翼政府已经交替，其结果几乎无法拆解。意识形态、政党、选举——民主的正式选择似乎都在同一个失败的地方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承载着如此多不完美之处的制度——代议制民主——开始失去其授权的魔力。这从金字塔的顶端和下面都能看出来。

从上层看: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个人幸福的保障，然而选民们对自己的生活发自内心地感到不满，对这个衰败时刻的政治和政治家也感到不满——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进行的大量民意调查都证明了这一事实。随着日益增长的

绝望之下，民主政府干预个人生活，以达到他们所谓的仁慈目的，然而选民们在这些努力中看到的只不过是篡夺和腐败。茶党(Tea Party)和占领者(occu占领者)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他们都反对一个干涉所有人、处处失败的政府。赋予民选官员合法性的契约正在被撕毁。政客们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坚信选民会惩罚那些未能承诺重大改善的言论，这一信念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可以像奥巴马总统一样，脱离自己的立场，但这只会加剧合法性的流失。

自下而上:正在前进的公众认为，民主制度与工业时代的其他所有等级制度没有什么区别。总统和总理，国会和议会，似乎遥不可及，自私自利，往好里说是无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往坏里说是因金钱而堕落。公众觉得他们选出的代表不能代表他们，把他们说成是一个不同的阶级。擅长言辞的*愤怒者*在他们的口号中传达了一种与政治阶层明显的分离感:“你们不代表我们”、“市场说了算，我从来没有选举过他们”、“我们不是反体制的，体制是反我们的”。对民主政治的否定，甚至是破坏，现在在公众的心目中已经与民主的*理想*分离了。

这种理想仍然保留着某种授权的力量。主要的*愤怒派自称*“现在就是真正的民主”。占领者声称代表99%的人，而茶党则代表人民反对政府。然而，对于反抗的公众来说，民主的理想无法与代议制民主的常设机构所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控制相调和。

一些团体，如美国的茶党(Tea Party)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 Star)，也参加了选举，但他们是本着对中间派的宗派排斥精神参加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其他人，像大多数*愤怒者一样*，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投了弃权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由业余人士组成的公众对民主的看法都很简单:它是*直接的*。当Wael Ghonim希望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解决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时，他对他的读者进行了民意调查。茶党爱国者的网站也遵循了同样的程序。占领者的无政府主义集会允许每个人发言，并要求在达成决定之前获得普遍同意。

这些都不是代议制民主的替代品。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不可能被在线调查或无政府主义集会所统治。当然，精英们对改革体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希望紧紧抓住现有金字塔的顶端。一向对等级制度持怀疑态度的宗派主义公众，从未相信新的结构会带来更令人满意的结果。既有的秩序持续地失败了，但没有谈论替代方案，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革命的信念——我将有机会指出这一点。

权威的危机就是民主的危机。公众对制度的攻击往往是对民主进程的攻击。

民选官员经常被右翼叛乱分子形容为暴虐。茶党最喜欢用的政治幻想是美国独立战争，巴拉克·奥巴马扮演了乔治国王的角色。没有人真的提倡暴力推翻，但这个比喻很能说明问题。和总统一样，茶党也认为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但他们认为“我们国家的衰落”的时间跨度要长得多——“我们花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才达到目前的危机状态。”根据茶党爱国者组织的马克·梅克勒和珍妮·贝丝·马丁的说法，这场危机的要点是一个贪婪的政府践踏了美国人的权利。

> *我们感到受到威胁,因为一个曾经为保护我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而存在的政府,已成为行使这些权利的主要障碍。我们的政府已经突破了宪法的限制,夺取了从金融市场到住房贷款的一切权力,而且企图更进一步,试图控制大到医疗保健系统,小到学校自助餐厅的菜单。*[9]

这些话中明显的背叛感奇怪地呼应了奥巴马总统关于“主导华盛顿的误入歧途的哲学”的言论，以及他的信仰，即强大的力量正在参与“精心策划的历史性努力，以推翻基本权利”。从右翼和左翼的角度来看，教派的脾气找到了不同的目标，但所有人都认同中间派的恶意，即使中间派已经得到了选民的支持。

对于左翼的叛乱者来说，民选政府显然是大公司的工具。“这个体系的意志和目标是积累金钱，”一份*愤怒者宣言解释*道。《占领纽约宣言》甚至更为明确:“我们来到你们面前，正值企业统治我们的政府，这些企业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将自身利益置于正义之上，将压迫置于平等之上。”[11]一位参加马德里太阳门示威的人努力地表达了这场运动的否定之大:“这是一场和平的议会外政治爆炸，目的是反对整个体系，反对国家和国际，反对银行家、商人、工会、政党、机构、通讯媒体。[12]

这些话只是口头上的，但这些话代表了疏远的公众对民主的否定，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花言巧语与现实息息相关。在世界各地，对民主的支持正在消退:衡量这类事情的学者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民主]在埃及正在瓦解，在委内瑞拉、土耳其、希腊以及更多的国家也在刀尖上摇摆不定。西欧和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即使在那里，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和忠诚度似乎往往取决于能否实现预期的结果，而不是选民的意愿。

旧民主国家的精英对其腐朽的政治表现出一定的愤怒，同时公开钦佩“有效”的专制方法。中国就是最受欢迎的例子。《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2009年写道:“只有一件事比一党专制更糟糕，那就是一党民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美国所拥有的。”他接着解释说，一党专政有“弊端”，但如果“是由一群相当开明的人领导的，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它也可以有很大的优势。”一个政党可以强行推行政治上困难但又至关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是推动一个社会在21世纪向前发展所必需的。[14]

换句话说，合法性取决于结果:与专制的中国相比，民主的美国的结果是一团糟。通用电气的CEO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似乎同意这一判断。在谈到中国时，他说:“唯一有效的是，国家控制的共产主义……可能不是你的菜，但他们的政府

管用。面试官查理·罗斯说:“他们能把事情做好。”

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1月28日的国情咨文中谴责了华盛顿“陈腐的政治争论”，提出要与分裂的国会合作，但又尖锐地补充道:“但美国不会停滞不前，我也不会。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要采取不需要立法的措施，为更多的美国家庭扩大机会，这就是我要做的。一位宗派主义的总统似乎在暗示，民主中间派无法把事情办好。

虽然精英们渴望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但就公众而言，他们认为政治屈从于等级制度，被权力意志所腐蚀。公众对中国式的专制毫无好感，而且鉴于其桀骜不驯的脾气，他们几乎无法区分专制制度和代议制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民主似乎是另一种控制结构。

* * *

亨利·罗莎瓦隆讲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解释了选民是如何对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把他们提升到主权地位的政治体系失去热爱的。

罗莎瓦隆指出，从历史上看，民主的首选策略是更加民主。进步意味着选举权的扩大。被边缘化的群体——工人、妇女、种族和宗教少数派——可以想象没有比完全投票权更伟大的政治征服了。民主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转向了包容性。在争取普选权的长期斗争中，隐含着这样一种承诺:一旦所有人都在体制内，就会出现神奇的事情:美好的社会。“这将终结腐败，”罗莎瓦隆解释说。它将确保大众利益的胜利。17

事实上，包容和异化是同步发展的。罗莎瓦隆认为这不是悖论——这是因果关系。环顾四周:每个成年公民都可以投票，但没有任何神奇的事情发生。一切都没有改变。相反，作为选民的我们，被抛弃在不完美的自我中，在代议制政府的必要程序和乏味机制中蒙混过关。

这是公众对民主“不再抱有幻想”的一个原因，它可能是从一种包容的意识形态转向一个不信任的社会。但不满还有更深层次的根源，这种根源只能用世界历史创伤来形容。

一代人以前，对革命的信念仍然是进步的标准——对那些自认为激进的人来说，这是一片乐土。我以前曾从不同的角度谈过这个问题。曾几何时，高级现代主义政府认为他们可以治愈人类的状况。他们可以重塑世界。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卓越的项目，比如农业集体化或巴西利亚的建设。当时的争论是，革命是应该在改变社会关系的“一个伟大的夜晚”中突然而暴力地实现，还是应该通过渐进式改革的方式，逐步而民主地实现。

这种信念已经消亡。我不想详述死亡的原因，而只想陈述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行动者相信革命的真实性，更不用说它的可取性了。因此，激进的和民主的政治，虽然有着相同的乌托邦终点，却失去了方向性的一致性。“进步”这个词本身就变得不礼貌，令人尴尬。没人知道它到底是哪个方向。

政府对激进的社会政治解决方案失去信心，标志着高度现代主义和我们后来的、疲惫不堪的版本之间的界限——我重复一遍，这是一种失宠，而不是理解的增加。高级现代主义行动的“坚决的独特性”被战术之字形的优柔寡断的多样性所取代。先知的怒容让位于慈祥的大叔的抽搐。这样的变化并没有讨好那些被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精英。

对于激进变革的倡导者——这也包括了参与反抗的公众——来说，革命之死就像是当头一棒。他们也失去了战略眼光，迷失了方向，看不到大局。没有了革命的目标线，激进分子发现自己只能在“个案”的基础上进行动员，反对一些立即感到不公正的人。他们没有打败或推翻政府，而是试图控制政府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的行动，这些具体情况占用了他们的精力。他们这样做纯粹是用否定的力量。

激进主义，曾经的目标是改变社会，现在更谦虚(但是，它可能是，更成功的)努力恐吓民主政府承认无休止的失败需要纠正。“激进，”罗桑瓦隆肯定地说，“就是每天指责别人;就是在社会的每一个伤口上捅刀子。它不是把大炮对准权力的堡垒，准备最后的突击。因此，人们渴望谴责和蔑视积极的计划，这些计划塑造了宗派公众的行为。

革命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生命代价，都是一种建立在乌托邦乐观主义基础上的理想。绝望，无论多么现实，都驱使着先知们走向荒野，以蝗虫和野蜜为食，梦想着救世主。下面是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博主、学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明智的思想家，沉思着他所谓的我们“后民主”时代的贫瘠:

> *中左翼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它想要做出艰难或不受欢迎的选择。而是没有真正的选择了。它迷失在迷宫中,既无法触及其传统基础(无论如何,这些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亡或与之疏远),也无法提出宏伟的新倡议,国家不再拥有实施这些倡议的工具。当重要的决策都是在民主政治之外做出的时候,中左翼只能继续经历民主的仪式性运动,同时一直祈祷有人代祷。*[20]



8.2否定时代的政治口号[21] No Justice, No Peace, Fuck the Police March, ©2012 Glenn Halog授权使用CC BY-NC 2.0。

一个以承诺完美开始的制度，最后却带来了虚无。政府无能为力，政治迷失在迷宫中，民主是一种空洞的仪式，一种谎言。虚无是唯一的现实，它主宰着国家。打击虚无至少看起来像是*某种东西*:向前迈进了一步，是一种值得祈祷的代祷。于是我们又回到了《*V字仇杀队》的电影虚无主义*:“人多了，炸掉一栋楼就能改变世界。”我们又回到了2011年8月伦敦暴乱者的现实世界虚无主义:“光秃秃的商店要被砸烂了，来拿点(免费的东西!!!)去他妈的联邦政府，我们会把他们和我们的暴乱一起送回去!”

我想把我的建议说得非常清楚。巨大的结构性冲突——尤其是公众对权威的反抗——让民主政府背负着失败的重担，民主政治远离现实，民主项目耗尽了创造性的能量，因此也失去了希望。在这一点上，虚无主义者出现了。他不是一个有着缜密的意识形态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领导组织的政治人物。

虚无主义党的成员资格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相反，虚无主义者只是像所有人一样，对环境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他正在采取行动破坏环境。

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虚无主义者虽然本质上是在与自己交战，但会很高兴地把整个民主大厦推倒，作为他自杀协议的一部分。他把激进主义带到了逻辑上的极端。他并不是想要征服权力，或者用某种新政来取代权力，只是想消灭挡在他面前的机构:“去他妈的联邦政府”。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有必要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个政治突变体，未来的很大一部分似乎都取决于他。

虚无主义者的肖像，是我们否定的总和

这个诞生于第五次浪潮、如今正潜行于不确定未来的神秘野兽究竟是什么?在所有关于公共和权威、网络和等级的讨论之后，你会问，他适合在哪里?

最重要的是，他被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所吸引和激励。我将在后面更明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在这里，让我先说它带有异化的成分。虚无主义者的世界并不属于虚无主义者。它属于自私的势力，属于令人厌恶的人。

他认为他的民选政府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值得蔑视。这是下层民众的看法。乔治·w·布什告诉他，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那里并没有发现任何武器。巴拉克·奥巴马向他解释说，经济刺激计划将控制失业率，但还有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何塞·路易斯·萨帕特罗甚至拒绝向他提及“危机”这个词，而经济灾难却席卷了西班牙。我把这些事件称为政府的失败，但虚无主义者并不是这么看的。他认为他的统治者是骗子和骗子，他在网上充斥着关于这个问题的愤怒咆哮。

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的人脉非常广，就目前这个词的意义而言。他*是疯狂的信息人*。在他的沟通技巧的高端，他可能是一个黑客在匿名，破坏索尼的企业数据库。在低端，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的暴徒，协调一个

在他的短信服务上进行抢劫探险。虚无主义者通过他的数字设备活了起来。没有它们，他会陷入一种与虚无相同的状态:他会沉默。相反，他对那些令他着迷的奇怪话题非常了解，他对周围的世界发表了大量的坚决否定。

有了联系，虚无主义者就联网了。他可以和其他人联系起来，就像他自己一样具有破坏性，并在实时混乱的瞬间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而且总有其他人:虚无主义者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当他对一件事感兴趣时，他属于公众，有时他确实如此，但他的偏好是绝对极端的宗派主义。他病态地、可怕地*反对*。他想象着，如果他所生活的社会明天被消灭，他会很幸福。

在政治上，这种冲动使他超越了拒绝或反抗。虚无主义者是一个政治黑洞，不允许任何光和质量从他的暴力怀抱中逃脱。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鼓动者，而在上个世纪，他肯定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注重隐私的人，一个在政治上的业余爱好者，游走在其他业余爱好者之间。虚无主义，在他身上，并不是一份全职工作——而是一种潜在的状态。它在个案的基础上爆发。导火索可能会被他Twitter上关于阿富汗战争或涌入他的国家的移民潮的一些新闻点燃。或者，他可能只是在那种充满疏离感的、消耗一切的感觉中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他就变成了他自己:一个毁灭的代理人。
在抗议者的集会中，他的声音是响亮的、不可调和的。在和平示威中，他的声音是透过商店橱窗举起燃烧瓶的那只手。在与警察的对抗中，他急于流血。在网络论坛上，他有着丰富的想法，想要黑掉、曝光、瘫痪这个世界的机构。他是炸弹客，是随机枪手:一个没有来由的恐怖分子。

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例如，他被一种模糊但末日来临的厄运感所占据。他认为，这个世界将走向毁灭。推动它前进是最好的事情。如果政府愿意，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解决我们的问题——尽管虚无主义者很疏远，但他坚信这一点，他所掌握的有关政府腐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生活越来越糟。

但这就够了:我想触及问题的核心。我在这里要说的是

虚无主义者像预示灾难的幽灵一样纠缠着民主政治，但我不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与他是什么人、他的想法、甚至他的所作所为有关。关于他的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他来自哪里。对未来的威胁，如果有的话，源于他的过去。

虚无主义者从他想要粉碎的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没有被边缘化*——*他不是*一个流落街头的人，*不是*一个被遗弃的灵魂，*不是*一个受迫害的少数群体。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产业工人或共产主义波兰的天主教徒相比，他与现存秩序的关系截然不同。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不是受害者，无论是相对于历史标准还是今天的世界。一见到他，你就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陌生的人。和他说话，我也不一定会觉得他和我是不同类型的人。按照今天人们对这类事情的估计——从统计上讲，粗略地说——他*就是*你和我。

虚无主义者提出的终极谜题是，他是特权阶层的孩子。他健康、健壮、长寿、受过大学教育、口齿伶俐、穿着时髦、游历广泛、见多识广。他住在自己的地方，最坏的情况是住在父母家里，从不住在山洞里。他可能有一份好工作，口袋里肯定有钱。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被宠坏的典型代表，这个系统拼命地让他快乐，然而他对自己的生活、他的国家、民主——这个系统——的感觉却充满了恶毒的不快乐。

这种感觉迫使达芙妮·利夫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搭起帐篷，要求摧毁“愚蠢的资本主义”。她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她毕业于电影学院，从事视频编辑的工作。与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大多数人相比，她的生活是享有特权的。然而，由于他买不起她的旧公寓，她心中充满了不公平的感觉。她觉得这个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贪婪的，她会把它降低，以缩短通勤时间。“我们都应该得到更多，”这是她的一条戒律。在虚无主义者浑浊的头脑中，那个“更多”无限延伸至乌托邦。

类似的感受驱使“非此即彼”的*愤怒者*背弃了代议制民主。从历史上看，西班牙刚刚从贫困和军事独裁中走出来，而当前这一代人，即使在2008年崩盘之后，也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富有、受教育程度最高、社会和政治最自由的一代人。然而，那些高举“非此即彼”大旗的人却沸腾了

和利夫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并愿意摧毁一个未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制度。

> *“我们的父母很感激,因为他们在投票,”27岁的玛尔塔·索拉纳斯(Marta Solanas)说,她指的是西班牙老年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下度过的几十年时光。“我们是第一代说投票毫无价值的人。*[22]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特权阶级在反抗自己。在这里，民主的受益者厌恶民主，叫嚣着要民主灭亡，甚至看不到另一种选择。就像漫画中的人物一样，虚无主义者痛恨他所坐的那根多节的树枝，并构想着应该把它锯掉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会一头扎到地上摔断脖子吗?也许他确实知道:虚无主义是一种自杀契约。或者，他可能认为自己会在空中飘浮，无视万有引力定律?也许他确实是这么想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抹杀历史的呼吁，在最顽固的时候，是一种对因果的宣战。

我请你们仔细思考一下我刚才引用的那位*年轻的愤怒者*的话。她说，她的父母对选举民主心存感激。她那一代人是第一个把忘恩负义当成美德的人。同为西班牙人的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sortega y Gasset)曾在他称之为“大众人物”的现代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极端的忘恩负义”，并将其描绘成历史宠坏的孩子。大众人是漫长而辉煌的过去的继承者。在他出生的那个世界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安全、自由、财富、去温暖的地方度假——实际上是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结果，但大众人并不这么看。刚获得教育和繁荣，他想象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并对过去产生敌意，就像对任何限制因素一样。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一直都在那里。它们似乎脱离了人类的努力，包括他自己的努力，所以他把它们看作是给予的，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他呼吸的空气一样。感激是毫无意义的。大众接受这个制度的恩赐，认为这是他应得的，但如果他的愿望中至少有一点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会把这个制度的根和枝、现在和过去都撕毁。[23]

虚无主义者与奥尔特加的大众主义者完全不同，但两者都有一定的家族特征。比异化更准确的说法，是一种激进的忘恩负义

描述让虚无主义者滴答作响的感觉。他的政治和经济期望与他个人的幻想和欲望相称，而后者是无限的。他期待完美。他坚持乌托邦。用奥尔特加的话来说，他“没有自己极限的经验”，至少不是他应该欣然接受的东西。每一次与人类境况的相遇，每一次社会的不完善和政府的失败，都会引发摧毁的冲动。由于坚信自己理应得到更多，他在忘恩负义中感到无比正义——这种感觉有时被致力于促进普遍幸福的晚期现代主义政府所证实。

所有这些都只是诊断上的问题:作为体制病态的症状。按照我对他的描述，虚无主义者看起来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一个缺乏计划或组织的兼职者。他可能是联网的，但他也是无名的。他提出的谜题是，在任何意义上，在任何事件的组合下，他是否能获得足够的动力来破坏或破坏民主进程。

答案应该不难找到。顺着这本书的线索找到一个可能的结论，你就会找到答案。

在我看来，虚无主义者并不一定是一个被异化的个体，一个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一心要炸毁现状的聪明的“V”字人物。像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这样的独狼式袭击者，因为憎恨移民而在挪威随机杀害了77个人，这只是对更可怕可能性的一瞥，是一种警告。从前面几章的证据来看，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称之为虚无主义者的那一束破坏性冲动，代表了公众在反抗中的一种潜在倾向。潜在地，他是一群人。在某些条件下，他可能是你。



8.3 挪威奥斯陆:2011年7月，首相办公室被炸

我所讲述的故事中的每一个公众都是从特权地位动员起来的。这在物质上、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是穷光蛋。没有人是贱民。公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除了出现在现场之外，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广场的抗议者都是富裕的埃及中产阶级的儿女。他们生来就享有特权。愤怒者是西班牙第一代摆脱贫困和暴政的后代，他们怀揣着特权阶级的雄心壮志。茶党、占领者、土耳其、伊朗、委内瑞拉、乌克兰的抗议者——所有人都将否定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信息领域的掌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却被b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赋予了公众。

天生享有特权的公众，必须与那些将其从需要和束缚中抚养出来的机构和个人保持某种关系。如果承认过去，这种关系必然是一种负债关系。罗马人在家里到处摆放着杰出祖先的雕刻像。但是，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当公众拒绝历史，渴望从零开始时，他们与维持历史的机构的关系将是一种彻底的忘恩负义。一旦特权被认为是自然的，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先前的努力，虚无主义者的幽灵就会在叛逆的公众中变得有血有肉——任何失败，任何从完美中堕落，都会点燃不满的风暴。

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潜在状态”。潜伏性有时会成为现实——这本书可以被解读为这个主题的一系列变体。从上面看，政府习惯性地失败了，如果他们继续承诺不可能的事情，就注定要失败。民众从下而上，抓住每一次失败来打击统治机构，有时还对失败的后果抱着虚无主义的蔑视。在两者之间，试图调解冲突的是笨拙的代议制民主机制。我说，虚无主义者之谜的答案并不特别难找到。那些担心民主未来的人——我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

僵尸民主，一场大规模灭绝的恐怖秀

旧工业世界正在逝去。这种组织人类的模式，所以

辉煌地成功了一个半世纪，却被太多的信息，太多的矛盾所淹没。管理这个体系的精英们不再相信有前进的道路。他们被困在淤泥中，努力只是为了忍受:apr<s:1> moi le洪水。

虚无主义者——作为世界毁灭者的公众——将他的刀刺向那些常常像没有灵魂的躯体的机构。你可以随意挑选一些例子:日报、政党，甚至是现代政府。这类机构保留了表面上气势恢宏的结构，但它们似乎缺乏生命体征，只能像僵尸一样踉跄着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

我从一开始就担心代议制民主。我担心它也可能会消失。我不知道法雷尔是否正确地认为，今天实践的民主政治也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

我用这种文学式的措辞是指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指的是一个紧紧抓住生命，仍然掌握权力，但已经失去合法性的机构。它在公众眼中没有真正的权威和威望，它的生存是由于惰性和公众不愿产生替代方案的不稳定结合。它的存在是默认的。例如，这就是老牌民主国家主流政党的状况——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党和工党、社会党和戴高乐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被榨干了意义。它们是默认存在的。

合法性与信息有关。相比警察突袭或无人机爆炸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这是软的。我们再一次面对权力的概念，就像一场石头剪刀布游戏，只不过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有趣的数据点，一如既往地以谜语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知道，有时布比剪子好。Wael Ghonim在Facebook页面上开始了推翻胡斯尼·穆巴拉克的行动。但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过程使这次重估成为可能。

所以让我讲一个故事，关于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它们如何解释和证明，它们如何生存，如何消亡。

每一个伟大的制度都是由一个故事来证明的。这个故事将这个制度与更高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并最终与世界的道德秩序联系起来。它说服普通人——你和我——如果我们想做正确的事，

我们应该按照制度的要求行事。这个故事赋予了我称之为合法性的授权魔力。

比如高级现代主义政府，就讲了一个通过运用权力和科学来完善社会关系的故事。在此基础上，它在没有太多抗议的情况下，将整个社区夷为平地，为卡布里尼绿地(Cabrini Green)等住房项目腾出空间。在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时代，美联储(Federal Reserve)讲述了一个通过深奥的知识掌握经济的故事。这使得该机构能够令人信服地辩称，赌场氛围是最谨慎的货币供应方式。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表面的光鲜。它们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纸有时会战胜剪刀:柔和的话语点燃了强大的历史记忆，公众走上街头。因此，政治行动者往往会就宏大叙事的所有权问题相互争论。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奥巴马总统通过反复呼吁开国元勋和宪法来证明扩大机会的理由。然而，我们知道，茶党把宪法作为其论点的中心，认为总统践踏了国家的建国原则。美国的政治未来似乎是由谁来掌控它的历史来决定的: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不寻常或矛盾的情况。

一场大灾难淹没了许多长期存在的合法性故事。它们正在成群结队地消亡。

由于每个故事都声称要解释一个不断变化的人类现实，它必须依赖于机构看门人，他们根据整洁的情节线来解释混乱的事件。这一直是基督教主教和白宫新闻秘书的工作:在混乱的事件中强加一个正义性的故事。但我们已经看到，技术的发展对调解人并不友好。公众对信息领域的征服意味着看门人的被推翻——通常伴随着那些赋予其机构权威和威望的故事的崩溃。

以阿布格莱布监狱为例。来自这座巴格达监狱的反常数字图像，打乱了美国为入侵伊拉克辩护的精心构思。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这些图像传播到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任何权威机构都无法触及的地方。这是两幅奇怪的并置图

在信息时代，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国防部长则在考虑是否要将这些照片*正式*公开。

今天的中东就像一个叙事的坟场。在突尼斯和埃及，上了年纪的统治者——就像我们的国防部长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在现有信息的背景下，他们的信息听起来有多么荒谬。在这两个国家，官方故事的崩溃*早*于政权的崩溃:当高大的人物被暴露为无知的侏儒时，结局就近在咫尺了。

该地区的*反叙事*也被事件一扫而空。拒绝以色列未能确保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的安宁或合法性。基地组织的信条是，除非“遥远的敌人”——美国——首先被吓退，否则当地的独裁者永远不会被推翻，这一信条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信性。亲西方或反西方，支持政权或支持暴力，在阿拉伯语国家，大多数既定的意识形态正被一场巨大的叙事大火吞噬。

在国内，为民主辩护的故事正在瓦解。对普选魔力的信仰已化为乌有。对民选官员真正代表人民的信任处于历史最低点。关于革命、高度现代主义和政府改造人类状况的能力的神话，现在看起来就像幼稚的童话。即使是像巴拉克·奥巴马这样的大政府倡导者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他们的现实。晚期现代主义者声称，幸福可以通过仁慈的叔叔式干预来衡量，但从未赢得不信任的公众的接受。自上而下的民主的支柱，李普曼的英雄，专家官僚，像2008年的邪恶女巫一样融化了。

围绕和支持现代民主政府的机构权威——新闻业、学术界、科学界——受到了系统性的挑战，给新闻业和气候变化政治等中介领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场大火已经吞没了政府本身，它有着雄心勃勃的承诺和习惯性的失败，它可能会一直延伸到无所不包的民族国家的叙述中，将政治生活剥去冰冷的赤裸，正如托尼·奥尔科特(Tony Olcott)引用马克思和《*宣言*》所暗示的那样:[26]

所有固定的、快速冻结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一系列古老而可敬的偏见和观点,都被一扫而空,所有新形成的关系在僵化之前就已经过时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融化成空气,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虚无主义者出现了。

* * *

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制度仍然与工业组织模式捆绑在一起，它们有可能成为一场巨大的文化灭绝事件的一部分。

我不得不补充说，这场灾难的时间线甚至必然性都是不确定的。在辩解故事大规模灭绝的背后，在政府的失败和民主的死亡背后，公众与权威的缓慢碰撞，既是表面戏剧的原因，也是后果，仍在继续。精英们无法维持公众不愿改变的现状。动荡席卷大地，却永远不会到达下一阶段，仿佛世界历史的时钟，人类事件的大本钟，已经在午夜停止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

因此，我也不得不问，在我们疲惫不堪的时代和尚未成形的未来之间这一失去的时刻，屈服的程度和偶然性是多少。如果像马克思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我们就像困在历史坚硬琥珀中的虫子，那么写这本书就是一件愉快但最终毫无意义的工作。然而，我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是如此命定，我也不相信必然性。即使我承认社会和政治结构构成了一种命运，*它们*也恰恰是今天在起作用的东西。

否则，我还不如耸耸肩，像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餐厅里的决定论者那样说:“我想我还是坐在这里等着看我点什么好了。”

请允许我，为了讨论的缘故，历史并没有凝固——至少没有完全凝固。那么，公众与权威之间的冲突又是怎样的呢?它一定会爆发出来

从深处迸发出来，变得个人化。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充满偶然结果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将被一个致命的问题所包裹。

这些选择是显而易见的:选边站队，参与还是不参与。这个问题将涉及到发生冲突的庞大系统，以及每个人的渺小。如果现代政府，尽管拥有财富和权力，都不能决定复杂系统的未来，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小范围内，是支持一方还是另一方，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这个颓废时代的所有受伤的虚荣心，都将在这一个问题中结集起来。

我承认，我现在已经脱离了分析，陷入了猜测的领域，但我们就在这里。这就是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对前几章的分析，无论多么粗糙，*都是试图描绘*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环境既前所未有，又未被注意到。但地图只是一种工具。对于像我这样仍然是代议制民主的顽固支持者的人来说，到达正确的地方仍然是一个问题——导航到地图上的“X”，这标志着与这个环境的正确关系。

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章节注释

1 Screen shot of video, http://hellaoccupyoakland.org/occupy-oakland-forum-police-actions/

2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https://www.ipcc.ch/report/ar5/wg1/docs/WGIAR5_SPM_brochure_en.pdf

3 Will Wrigley, "Hurricane Sandy Survivors Demand Climate Change Action From Obama,"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1, 2013, http://www. huffingtonpost. com/2013/02/11/hurricane-sandy-climate-change_n_2664563.html

4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Climate Change," The White House, June 25,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25/remarks-president-climate-change

5 "Are Things Getting Better? More Americans Continue to Believe the Economy Is Getting Worse," *YouGov*, February 27, 2013, https://today. yougov. com/news/2013/02/27/are-things-getting-better-more-americans-continue-/

6 "President Obama on Inequality (transcript)," *Politico*, December 4, 2013,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3/12/ obama-income-inequality-100662.html

7 See, for example,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 2014, http://www. economist. 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8 Mark Meckler and Jenny Beth Martin, *Tea Party Patriots: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Henry Hold and Company, 2012), 6.

9 Ibid., 13.

10 Cabal, ed. *Indignados!*, Kindle location 36.

11 "Declaration of the Occupation of New York City."

12 Cabal, ed. *Indignados!*, Kindle location 449.

13 Joshua Kurlantzick, *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6–31.

14 Thomas Friedman, "Our One-Party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09, http://www. nytimes. com/2009/09/09/opinion/09friedman. html?_r=3&adxnnl=1&partner=rss&emc=rss&adxnnlx=1342620027-Z4vProSA4/hgcF8nbyrItw&

15 "Jeff Immelt: China's Communist Government 'Works,'" RealClearPolitics Video, December 11, 2012,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2012/12/11/jeff_immelt_chinas_communist_government_works.html

16 "President Obama'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8,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1/28/president-barack-obamas-state-union-address

17 Rosanvallon, *Counter-Democracy*, 150.

18 Ibid., 255.

19 Ibid., 255.

20 Henry Farrell,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Aeon Magazine*, April 25, 2013, http://aeon.co/magazine /living-together/henry-farrell-post-democracy/

21 Screen shot from video.

22 Nicolas Kulish, "As Scorn for Vote Grows, Protests Surge Around the Glob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9/28/world/as-scorn-for-vote-grows-protests-surge-around-globe.html?pagewanted=all&_r=0

23 Ortega, *La rebelion de las masas*, 86–87.

24 Screen shot from video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E07Bu9pdgM

25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 2009, http://voices.washingtonpost.com/44/2009/01/president-barack-obamas-inaugu.html

26 Anthony Olcott,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May 2010, http://www.academia.edu/662725/All_That_Is_Solid_Melts_Into_Air

选择和系统

9

这一章比前几章更具思辨性，分析性更少。你受到警告。改变的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需要兑现我的分析。如果世界如我所描述的那样，*一些事情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改变什么，或者摆脱我们以前的理解。否则，我只不过是在今天压倒民主政治的否定的巨大重量上加了一根骆驼的稻草。

我的故事以一场信息海啸开始，以那头粗野的野兽——虚无主义者结束，以实际实践的民主跌跌撞撞地走进失败和自我怀疑的迷宫告终。现在，我想分析一下，在这个动荡的环境中，参与者——公众、政府、你和我——所能做出的*选择*。最终，我脑海中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选择的组合可以划出一条走出迷宫，进入开阔阳光的道路。

我原本把这一章的标题定为“该做什么”，太明目张胆地传达了我的意图。在描绘了一个被无情而又难以理解的力量所扭曲的体系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然而，我认识到，我不愿意摆出预言家甚至倡导者的姿态。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当然，除非你一开始就受到与我相似的动机和理想的驱使。

我不会假装发现了我们这个衰弱的时代的逃生口，我也不会沉湎于无所事事的否定。因此，我决定做明确的选择。*它们*将在新的景观中被发现。你，读者，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至于我的，我会告诉大家。

有些选择导致混乱，有些选择导致中国，但真正让人困惑的分析问题是，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分辨出一个和另一个。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的观点说服了我:即使是现代政府的庞大机器也无法决定未来。民主的危机源于对这一事实的否认。我们想要一次又一次地建设巴西利亚，跨越50年，进入一个永远比现在更理性的未来。至少，我们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说话时，表现得好像他们可以利用政府的权力来改善人类状况，而自1991年以来，我们就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在奥默罗德解释的现实中，大多数事情都必须失败，包括雄心勃勃的政府项目，因为世界太不可预测和非线性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的选择又能带来什么不同呢?聪明的读者会立刻明白，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个人*选择能产生影响?寻找答案是本章的一条主线。

高度现代主义的习惯导致了某些默认假设:例如，只有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强加有意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因此，只有政府的最高层才有能力选择前方的道路。我们其余的人则属于惰性的大众。这些假设在精神上一直是不民主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已被过去50年的经验所证伪。英雄式的自上而下的倡议，习惯性地、按自己的方式都失败了。群众在不守规矩的公众中觉醒到政治生活，第五次浪潮释放的巨大能量完全是从下面涌起的。为社会的等级控制辩护的意识形态摇摇欲坠，衰落，并开始走向灭绝。

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一直是高、低两个世界的战争，但这也导致了角色的彻底逆转，业余爱好者，不知从哪里来的人，蜂拥到金字塔的斜坡上，践踏被选中的少数人的保护区。大众的简单世界，现在网络化和在线化，已经

彻底扰乱了由精英管理的复杂体系，无论好坏。我的问题是，从代议制民主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领域能否更好地协调一致。

可以把这一章看作是对个人和政治选择如何影响民主运作的反思。

如果结构是命运，那么个人选择将胜过政治选择

深入到使公众能够混淆权威的网络中，你很快就会到达我所说的*个人领域*。这是日常生活的圈子，直接体验到它所有的地方特殊性。在这里产生了对个人有意义的选择:配偶、孩子、朋友、事业、信仰。政府和高层政治成为背景。想象他们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规定或立法幸福，是一种现代的幻想。

因为个人领域是紧密聚集的，信息很少会偏离行动的一两个因果联系。一个朋友提到他公司有个职位空缺，你就去申请了。这就相当于看到一辆卡车正向你驶来，然后利用这个信息让开。这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与更远的熟人或朋友的朋友之间的一些较长的链接，使个人参与大规模集群(网络)成为可能。

信息人(*Homo informaticus*)的进化引发了公众与政治权威关系的巨大相变，当他们对某件事感兴趣时，就会部署数字设备，与数百万人组成的网络进行个人互动。

如果说公众的反抗有时类似于个人对官方和绝对权威的斗争，那么同样真实的是，工业时代似乎往往有意将每一个个人、地方或历史特征从景观中推平。20世纪的政府调查了个人领域，发现它难以达到其目的，并试图将对称和统一强加于其上。

现代国家,通过其官员,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试图创造一个完全标准化的地形和人口

这些特征将最容易被监控、计数、评估和管理。现代国家乌托邦式的、内在的、不断受挫的目标,是将其之下混乱、无序、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简化为更接近于其观察到的行政网格的东西。[1]

在民主国家，标准化的冲动通常会导致某种版本的巴西利亚——没有人行道或社区的几何城市，建在荒野中以逃避过去非理性的混乱。政府，以高度现代主义的模式，向沉默的大众强加了一项交易:放弃你的个人领域，以换取社会的完美。这种冒险一直是我经历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知，它的结局很糟糕，但政府失败所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我提到的不平等、失业等重大问题。选择被抽离了个人领域，在那里，因果关系是短暂而有效的。它们一路飞到一个非常高的金字塔顶端，被精英们吸收，而精英们每走一步都必须与复杂系统内因果关系的非线性和意外后果作斗争。

卡布里尼格林的破坏行为和帮派暴力让我们得以一窥，当个人选择被一种标准化的逻辑所阻碍时，会发生什么。

* * *

仅仅在一代人之前，结构上的必要性决定了等级制度必须变得更陡峭、更有控制力、更有效率。当时有两个政党，两个汽车制造商，三个电视网络，每个城市有一份报纸，所有这些都是在几乎没有能量的情况下运作的，也没有来自下层的投入。泰勒主义精神统治着整个社会。上层可以在微小的细节上指挥下层。底层是一团无形的、不动的东西，完全由上层的命令激活。这就是工业时代的结构性命运。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可能了。公众的选择范围很窄——共和党或民主党，雪佛兰或福特——除非他们希望退出这个体系和它的所有福利。

今天，两极分化被逆转了。公众有了选择:这是第五次浪潮的唯一特征。公众有选择权，各地都把选择权兑换成现金，把精英拉下来，降低政治金字塔的高度。普通民众已经扭转了标准化的局面

官僚机构，现在坚持把他们的品味和利益强加于更大的系统。他们要求个性化的服务。他们渴望不加牛奶的拿铁——不仅来自星巴克，也来自他们的政府。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发现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直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动弹而不撞到对方。达芙妮·利夫(Daphni Leef)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前者有着通勤者的反抗精神，后者则脱离了体制权力，这是个人向政治靠拢的新例证。古老而庄严的金字塔正在崩塌。它的墙壁看起来很脆弱。虚无主义者等待时机。这似乎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性命运。

但命运是以历史选择的名义出现的。我们有选择——不只是我们中间的虚无主义者，而是所有人，包括像我这样从未放弃代议制民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包括分析性评估。由于历史的偶然，我们的民主变得工业化和泰勒化。这就是它目前的形式，它在公众心目中的样子。但是，历史的潮流现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作为纯粹等级制度和权威的政府已经失去了很多合法性，并在许多方面受到攻击。

分析性的问题是，民主是否必须保持工业化才能持久。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陡峭的权力金字塔坍塌成一个更紧密的结构，民主是会受到损害，还是会繁荣。或者从个人角度来说: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政府制度的简单捍卫者，是否永远注定要捍卫目前形式的制度，反对历史的掠夺。

网络乌托邦主义者和网络悲观主义者一直在争论新媒体对民主行动主义的重要性。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仍然没有定论，但无论如何，我都提出了一种不同的问题。我的问题涉及工业组织模式对民主政府的内在必要性，以及乘着信息海啸在数字网络中组织起来的公共组织的内在破坏性。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难解的难题。如果我暂时把公众的否定和矛盾放在一边，答案就会从这本书中呈现的大量证据中浮现出来。政府的失败并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现代政府英雄主义主张的结果，而且

这些主张所引发的期望不断受挫。产业组织崇尚专家和自上而下的干预主义，与民主精神相去甚远，并已被证明对代议制民主的实际实践是灾难性的。它以自己的方式失败了，也被视为失败了，它以一种对公众的瘫痪恐惧和对颓废的绝望感染了民主政府。

虚无主义者之所以危险，部分原因在于他是正确的。当萨帕特罗认为2008年的西班牙没有陷入经济危机时，他大错特错了。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问题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奥巴马总统在刺激计划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是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拥护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在一个关键方面是相似的: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主宰未来。他们具身一个与现实脱节的体系。如果要用他们的表现来评判民主，那就很难不陷入否定。

因此，这归结为替代方案。工业化民主的陡峭金字塔最有效的替代方案不是雅典模式的直接民主，也不是Wael Ghonim Facebook页面风格的网络民主。而是个人领域:信息和决策沿着最短的因果联系移动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从政治回归到个人，它们可以直接处理，根据当地知识，作为一系列可观察到的试验和错误的一部分。个人的成功可以被模仿和复制。个人的失败不会牵连到整个系统。

我注意到，目前的轨迹主要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公众希望把个人的东西强加于政治，就像它把个人的经商模式强加于资本主义一样。这里有一个矛盾:尽管公众对政客不屑一顾，但他们的行为往往表现得好像幸福确实是总统赐予的礼物。“占领者”和“愤怒者”的末日愤怒，是一种混乱的乌托邦愿景的阴暗面，这种愿景要求当局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连信奉自由意志主义的茶党也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角色是“保护”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我的意思是说，公众完全是政府失败的同谋。替代方案的问题必须超越民主的正式组织，延伸到我们对民主政府所能提供的东西的期望。

望远镜般的博爱，还是不可能的政治

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不赞成奥巴马总统对经济的处理。这位以自己的政治直觉为荣的总统很清楚这些数字，并谴责了一个助长经济不平等的制度。这些都是美国政治的重大问题，自19世纪末现代主义崇高理想兴起以来一直如此。

当公众评价总统对经济的“处理”时，我不会假装肯定地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猜想，民众期望在经济领域取得史诗般的成果，比如高增长和大幅降低失业率，这些都是由一个享有对整个体系的指挥和控制的统治者强加的。奥巴马总统在某种程度上辜负了这些期望。刺激计划的失败可能对公众舆论造成了沉重的影响——但这是一个循环逻辑。奥巴马总统之所以提出刺激计划，是因为他正确地相信，作为总统，人们期待他取得史诗般的经济成果。

然而，现代政府关于经济的说法已经被多次证伪。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奥巴马总统，更像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拥有指挥和控制能力的英雄人物。他在2010年后发表的宗派言论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宁愿谴责不平等，也不愿提出重大的经济举措，因为在政治上，这似乎更理性。

联邦政府和美国经济是同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体系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确定的、非线性的，而且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把一位总统对经济的“处理”当作他在管理自己个人领域的抵押贷款和支票账户来评判，这是对现实的严重颠倒——但我怀疑，这正是公众在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所做的。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政客们对政府提出了脱离现实的要求，并因此未能实现不可能的目标，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选举日在公众中的成功意味着第二天的失败。

我想考虑的替代方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我们期望中的*诚实*有关。总统处理不了经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为他们提供建议的专家很少像n·n·塔勒布(N. N. Taleb)所说的那样，“在游戏中承担风险”:当他们犯了错误时，他们不承担任何惩罚，就像他们在2008年灾难性地犯了错，然后在2009年又立即因刺激计划而犯了错。

当涉及到经济问题时，政治家们应该因其主张的谦虚而获得奖励，而不是他们豪言壮语的雄心壮志。在任总统应该因为放弃教皇绝对正确的姿态，谈论不确定性、风险和权衡而受到赞扬。我们选出的总统中，掌握试错概念(即从错误中学习)的人越多，我们就应该越高兴。

这种选择是否可行，我留给你，明智的读者，去决定吧。但这是一种选择。你和我，以及每一位公众成员，都可以使我们的政治要求屈从于现实，就像我们在处理个人事务时*必须*处理我们的私人需求一样。政府主宰经济的理想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称之为“经济”的聚集活动的旋风并不像一个工厂车间，由一些大师根据泰勒主义原则精心策划。

因此，我们面临的选择相当严峻:要么使我们的需求与我们历史时刻的知识保持一致，要么继续留在过去失败的野心的阴影下。

让公众的期望与历史现实保持一致，应该会对意识形态产生连锁反应。旧的分类本身也会被重新梳理。对政治权力和伪专家的内在信仰，近代的颓废和无能感——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将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争吵和情感，这些情感实际上与当下的可能性有关。

然而，我赶紧补充一句，抓住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并不需要某种保罗式的皈依。你*可以*保持你原有的政治信仰，同时开拓新天地，但你*不能*把现实当作敌人，你不能把失败和不诚实混为一谈。

这个选择还有第二部分。用于评估政府项目的标准也是工业时代的发明。我们，公众，被邀请根据一些抽象的统计*数据,一些数字*——例如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失业率和贫困率——来支持或谴责总统。在围绕经济刺激计划的争议中，我们看到失业率被当作棒球比分来使用。这个数字显示了公众谁在这场政治游戏中获胜。

像GDP这样的数字实现了一种修辞功能。它们享有科学的威望，似乎比实际经历的混乱的现实更优越。它们支持着现代主义者的崇高主张，即我们一眼就能知道庞大系统的真相。

但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一种错觉。如果我丢了工作，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可以直接进入我的个人领域。如果有人告诉我，上个月的失业率从5.1%上升到5.6%，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无法了解数字背后的真实情况。这种上升可能反映了贪婪的公司或腐败的政府的阴谋，或自然灾害的影响，或纯粹的不幸，或这些和许多其他可能性的任何组合。



9.1整数的含义。《在2000人的死亡中，阿富汗战争的新肖像》，摘自《纽约时报》，2012年8月21日©2012《纽约时报》。版权所有。经许可使用，受美国版权法保护。未经明确书面许可，禁止印刷、复制、再分发或转发本内容。

即使失业率衡量的是美国失业人口的实际数量——它并不是[2]——即使我把政府是否应该为就业负责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放在一边，用数字来玩政治也是一种无聊的假装游戏。政治一点也不像棒球。最终获胜的是最有说服力的故事，而不是最高分。每当政府试图将特定的结果强加给一个复杂的系统时，情况都是如此。例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军事人员的死亡人数被用作替代衡量标准，但战争政策的成败完全取决于谁赢得了关于事业正确性的争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见证了美国军队在历史上遭受的最可怕的屠杀，如今他被认为是我们最伟大的总统。

毒害民主进程的许多否定都源于个人和统计数据的混淆。我可能拥有一份出色的工作，

但刺激计划未能实现其目标令我愤怒。我可能住在和平的维吉尼亚州维也纳，远离伤害——但一份关于几名美国人在喀布尔死于暴力的报告，似乎是当局的致命失败。沉溺于粗略的统计数字，使我容易产生浮夸的个人幻想:认为如果我迫使政府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行动，我就能挽救宪法，或者说地球，或者停止战争，或者现在就结束贫困。

尽管我个人的领域充满潜力，我还是要加入哗变的公众，要求废除现存的秩序。

这种道德和政治上的转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我看来，狄更斯最好的小说中，最好的人物是《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的杰利比夫人(Mrs. Jellyby)，她花了很长时间来改善“尼日尔河左岸博里奥布拉-加哈的当地人”，而在伦敦的家中，她的孩子们却到处乱跑，无人照看。狄更斯称之为“望远镜式的慈善”——为了英雄的幻想而践踏个人领域。

> *杰利比夫人坐在一堆废纸堆里,整个晚上都在喝咖啡,间或给她的大女儿口授口授。她还和奎尔先生进行了一次讨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讨论的主题似乎是人类的兄弟情谊,并表达了一些美好的情感。然而,我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专心听讲,因为皮皮和其他孩子都围到我和艾达的一个角落里,要我再讲一个故事。于是我们坐在他们中间,小声地给他们讲《穿靴子的猫》,我也不知道还讲了些什么,直到杰利比夫人偶然想起了他们,才叫他们去睡觉。*[3]

公众的反抗具有伸缩式的和杰利比式的一面。尽管他们从未深入细节，但造反者认为，通过象征性的姿态和纯粹的欲望力量，他们可以将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复杂体系重塑为个性化的乌托邦。相反，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进入了n·n·塔勒布(N. N. Taleb)狂野的“极端的斯坦”，在那里，“我们遭受着奇异的、偶然的、看不见的和不可预测的暴政。”在那个不稳定的国家，“你应该永远对你从数据中获得的知识持怀疑态度。[4]

我不能像美国那样指挥复杂的社会体系，但我可以

控制我对它的政治期望:我可以选择使它们与现实保持一致。为了抓住这一选择，我必须将我对世界的要求从望远镜转向个人，因为可行的现实存在于个人领域。例如，我可以对失业做些什么，但我不知道在失业率问题上可以或应该做些什么。我能直接知道一项法律对我的生意的影响是好是坏，但我不知道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我可以帮助有需要的朋友，但我对尼日尔左岸的博里奥布拉-加哈的当地人没有什么影响力。

控制，无论多么脆弱，满足，无论多么短暂，都*只能*在个人领域中找到，而不是在政府报告的天文数字中找到。

一个套筒式的慈善家，站在道德的高度，会把这种行为称为自私或逃避现实。然而，在我看来，自私会导致要求政府满足我的一切需要。逃避现实意味着把我的个人责任置于对人类兄弟情谊的关心之下。狄更斯笔下的杰利比夫人是一个自私的逃避现实者。那些选择将自己的期望固定在个人领域的现实上的人，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在这个亲密空间的短暂因果关系中，我*可以*参与政治和政府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形成观点，如果我愿意，还可以根据这些观点采取行动。我可以加入重要的利益团体，参加慈善活动，包括代表激进变革的抗议活动。当我的理想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取得胜利时，我可以欢欣鼓舞，当它们被击败时，我可以感到沮丧。这是允许的。

我*不能*要求复杂性具有确定性，也不能指望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的统计公式和数字有能力决定未来。我不*应该*做的是，把一股具有腐蚀性的拒绝和否定之流倾注到一个民主制度上，这个制度在满足我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和期望方面一直在努力，而且大多是以失败告终。

给君主出谋献策，或是在不信任的社会里进行治理的艺术

在当前普遍存在的条件下，最重要的选择关系到公众——你，我——以及公众的政治期望。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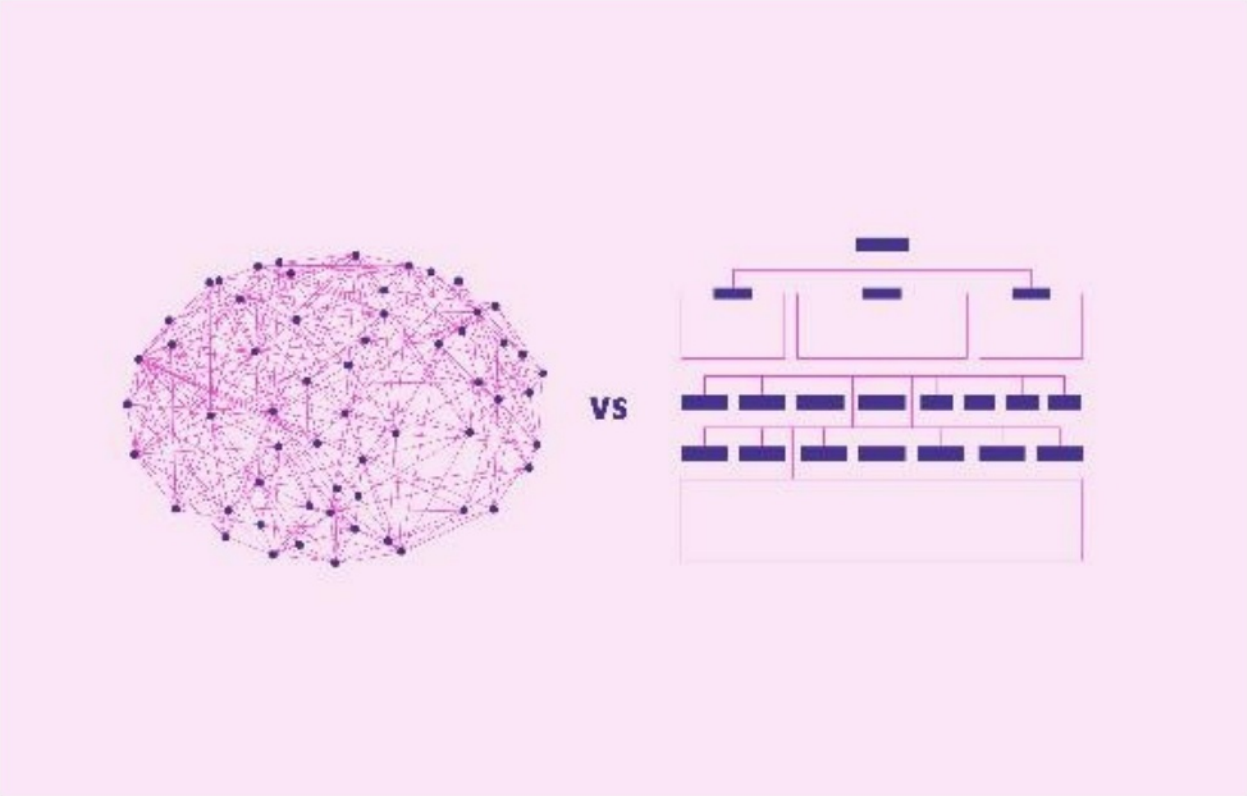
这些选择基于真正的偶然性:我*可以*将我的期望与现实或乌托邦式的幻想结合起来。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决定权是我的(你们的，我们的)。

政府也面临着划时代的抉择。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专家和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正在失去公众的青睐。金字塔正在缩小:顶层和底层之间的距离变得紧得令人不安。在2011年的抗议活动中，一个Facebook页面的匿名管理员Wael Ghonim被穆巴拉克政权的强大成员找来担任谈判代表。当时，他刚刚从一所秘密监狱中走出来，国家安全部门将他关押了11天。

权力和劝导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目前，合法性既属于制度，也属于行为和个人。民主政府到处都被叛逆的网络化公众所包围。制度变革，甚至是激进的变革，都是可能的，但它们不会作为必然性或历史规律的结果而到来。它们必须被选择。

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将在讨论政府时谨慎行事。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偶然性。我可以选择我对政府的期望，但我没有办法*把这些期望强加给*体现政府的人和结构。由于我不希望涉足乌托邦幻想，或者听起来像李尔王对风暴的抱怨，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选择是有限的。

但我不能不考虑政府的选择，也不能不在我的故事中心留下一个巨大的、无法解释的空洞。



9.2结构性命运:网络对抗层级6

让我从理想开始，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它。在所有可能的最好情况下，政府将采取主导某一历史时期想象的形式。现代政府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将让位于*网络化*政府，能够利用“小世界”的联系，在形式上缩小权力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政治问题——例如，拟议的立法——将在一个更广阔的虚拟舞台上进行辩论和解决，在这个舞台上，普通人，不亚于当选的或官僚精英，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政府的产出将是众包的，因此会被检查。

这不会发生。等级制度是一种太顽固的结构。高层的自身利益和宗派底层对行使权力的*不感兴趣*，几乎可以肯定，目前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金字塔正在失去高度，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完全变平。除非出现一些不可预见的、前所未有的突破，否则政府的组织结构，就像企业的组织结构一样，将仍然是自上而下的。

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也就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

等级政府，民主政府，必须找到重新获得合法性的方法，而不是在每一点上都屈服于网络化公众的否定。我认为，决定性的选择关系到如何处理那种令人不安的代理人——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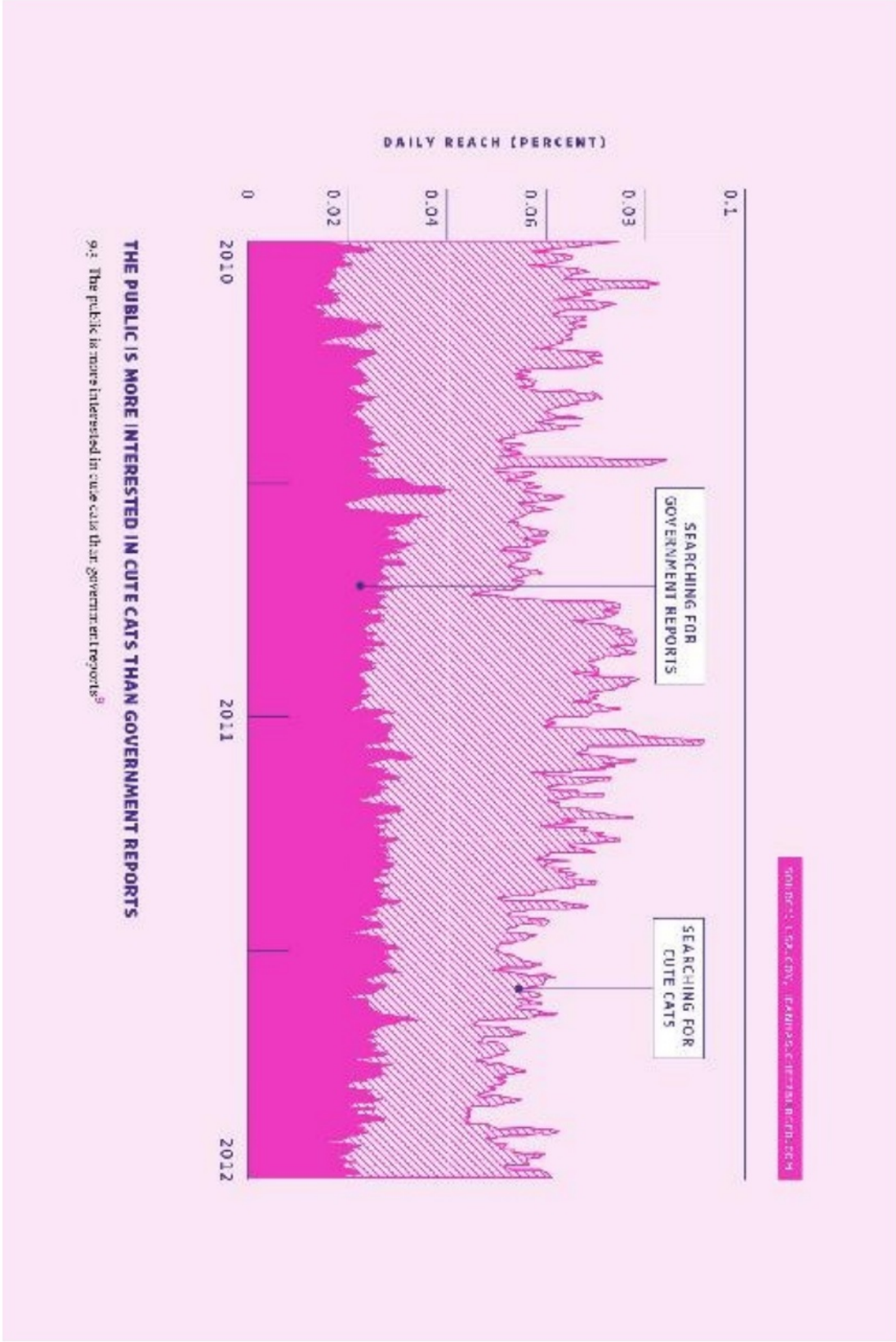
作为一种结构，等级制度在处理数字平台方面已经被证明是极其无能的。尽管有许多大胆的现代化言论，但社交媒体和新的通信技术对政府来说仍然是一个深刻的谜团，而金字塔顶端的人仍然厌恶业余爱好者的入侵和网络的粗鲁非正式性。因此，每当公众乘坐数字工具出现在街头，就像从空气中凭空出现一样，他们都会感到一连串的惊讶。

政府在拥抱数字技术方面的尴尬尝试，最能说明它的无能。根据2011年12月的一项研究，大约56个联邦机构拥有1489个“。gov”域名，但其中400个域名将用户重定向到另一个政府网站，265个域名不起作用，20个域名“正在开发中”。托管联邦网站似乎没有指导原则:每个机构的数量从160到2不等。总共有150个不同的网络发布系统和250个不同的网络托管提供商被用来运行政府的1.1万个网站。这些疯狂的技术和信息的主要用户是“联邦工作人员”，其次是研究人员和新闻界。”[7]

这是工业时代的老精英们传给兄弟们的信息，几乎是象征性地通过数字系统而不是纸质报告进行过滤。公众不需要申请，也对任何情况都不感兴趣。举个例子，美国政府网站把自己描述为“美国政府的官方门户网站”。这听起来很重要，也很雄心勃勃。然而，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该网站的“日访问量”或网络总流量仅为0.02%左右——不到Icanhascheezburger.com日访问量的一半，后者是一家主打幽默猫咪照片的网站。目前，美国政府的官方门户网站在美国网站中排名1751位，在全球排名6303位。[8]

当政府试图通过数字媒体接触更广泛的公众时，它以惊人的方式失败了。作为新医疗保健系统一部分的在线保险市场花费了联邦政府4亿美元，花了三年时间才开发出来。据*《纽约时报》报道*，该网站是

本应是“为寻求医疗保险的公民提供一站式，点击即走的中心”。然而，它在交付时就崩溃了。对许多用户来说，仅仅登录是不可能的。《*时报*》援引一位保险业高管的话说:“问题的范围相当大。在我们的电话结束时，人们说，‘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但这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除了自上而下，政府不知道如何与公众互动。这就是联邦机构如何构建他们的1.1万个网站。



比如911事件后的中央情报局，那些负责发展医疗保险的机构

网站坚称，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资金不足。一名管理员声称:“工作人员英勇敬业，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都知道这一点。”[11]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政府的失败是系统性的。它遵循了希腊悲剧的模式，过度的骄傲或傲慢，导致了英雄的毁灭。现代政府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不确定性，主宰未来。它做不到:当它尝试时，它失败了。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相信它可以按指令创建一个巨大的“市场”，并将其简化为每笔交易只需点击几下。它也做不到这一点。

悲剧性的缺陷并不是在技术方面的无能。这是一种控制的幻觉——尤其是控制信息的等级制度的内在冲动。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选择。它可以继续在网络文化上挤压一个自上而下的框架，仿佛新千年的社会和技术重组可以回到1989年。届时，政府日益接近公众的条件将受到政府外部力量的支配，这些力量可能对民主漠不关心或怀有敌意。

另一种选择是，政府可以选择参与其与公众的历史性调整，并通过将信息以金字塔底层都能读得清的方式转移到网上来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即使交互性——一个真正网络化系统的来回性——受到限制，政府的生产过程也可以在每一步都体现出来。我说过，网络化政府在今天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我看来，开放政府仍然是一种可能。

为了让政府在网上与公众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官方语言必须在风格和长度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一种选择，绝不是琐碎或肤浅的选择。以国会两院制定法律为例。每一项提议的法案都可以被公布，每个版本、修改或修正案都可以被实时记录:但这还不够。像经济刺激计划那样，当一项法律长达1000页时，它就会让公众难以消化。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大多数投票表决的民选代表来说，它是难以消化的:这是自上而下的野心压倒民主程序的一个例子。

当政府上网时，它将不再只是对自己说话。如果政府选择在每一个操作层面直接向公众提供信息，它就必须学习公众的语言，即使这限制了公众的反击能力。比如，法律条文会更短。缩短多少?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比1000页短得多。公众，而不是政府，将通过信息领域间接地设定这个边界。

政府的简洁性并不是一个疯狂的梦想。如果我们的祖辈能在37页的篇幅内完成社会保障计划，我们就能在类似的规模上做出不那么重要的税收或预算决定。这是政府的决定。

这只是一个推测性的例子，说明如果政府选择在网上公开起草草案，可能会发生什么。堵塞大多数官方沟通的法律和伪技术术语也将减少到最低限度。目前鼓励不透明的动机将被对说服力的需求所取代。官僚机构将通过公众的冷眼审视自己。仅这一点就可能带来变革。监管机构的干预和解释将被透明地与法律的初衷进行比较。不再有1.1万个机构网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单一的。gov网站，它将在我们当选的官员所能容忍的范围内深入到全球信息领域。

这可以一步一步地尝试。联邦政府的部分部门可以在一次难得的试错中循序渐进地接受它。但是，按照这些思路，政府要么要做，要么可能会对政府*做一些*事情。公众正在行动起来。年龄，回忆起来，卡在了午夜。我不做预言，不妨称之为猜测:但我确信，政府对全球信息领域置身事外的程度，正是信息领域以茶党(Tea party)式的反抗和维基解密(wikileaks)式的爆料的形式，会在不请自来、具有破坏性的情况下，冲回权力的选区。

* * *

向公众发布信息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让公众参与制定法律或政策。公众对法律或政策的参与一直是由其对一件事的兴趣决定的，而这反过来又受到公众分裂性的限制。对于任何给定的政治问题，一个重要的群体，沉迷于这个主题，可能会跳到这个案子上。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会打呵欠，转身走开。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共同的参考点才会引起政治上重要的群体——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可能代表或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公众不是、也永远不可能与人民完全相同。
关键不在于把公众拉到金字塔的顶端，搞某种“一日为王”的“电子政务”演习，而是要把精英的产出推到个人领域，让公众生活和做决定。

公众对权威的反抗可以被框定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的较量:制度的和实际的。机构只能感知一般的抽象概念，比如失业率或GDP。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细节视而不见。实用知识填补了这一空白:它由无法概括的地方特质组成。这可以很简单，比如知道附近哪些汽车经销商在修理时作弊，哪些医生照章办事而不是病人。

公开性的选择取决于信息流向的方向，以指导有效的行动。

民主的支持者会认为，纯粹从原则上讲，信息应该从政府流向公众，在那里它可以被插入日常决策的矩阵中。但我相信，从实现结果的效率角度来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答案。政府的失败与实用知识的贬值是同步进行的。

高高在上的现代主义统治者陶醉于完美的可能性，努力将地方现实缩小到他们观察到的行政网格中。他们希望底层的社会看起来像巴西利亚或卡布里尼格林。公众也开始想象，*个人*的实现取决于*制度*的行动，并相应地调整了对民主的期望。在自上而下的野心和失败的循环中，我们处于后期，公众在反抗，精英们对自己的软弱和颓废感到恐惧，两个世界的碰撞将实践知识*和*制度知识粉碎为虚无。

政府可以做出其他选择。通过将其业务推向网上，它将摧毁机构知识的神秘性。你和我，作为the的成员

公众，将观察官方统计数据的混乱生成过程，并将任何相关信息直接与我们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我(你，我们)将有机会在合理理解政府方面的复杂性如何影响决策的情况下做出个人决定。例如，如果我经营一家企业，我将收到可能影响我利润率的法规的早期预警。

然后我(和你)就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一头扎进复杂的政治世界，参加游说活动。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在有意义的选择存在的个人领域内活动，将我自己和我的企业置于我认为与政府的正确关系中。我仍然可以做出错误的决定。事实上，我很可能会:我不能比艾伦·格林斯潘或奥巴马总统更能预言未来。但是，我的失败是我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责任——我将能够立即运用实际知识来改善我的处境，而不是等待遥远的、公式化的机构采取行动。我要谦卑地过我的生活，勇于尝试和犯错，而不是在错误上加倍下注，指望权力带来成功。

通过把政府事务的初稿摆在公众面前，民选官员和他们的专家官僚们会让自己脚踏实地。他们将允许公众在做出假设、权衡和最佳猜测时抓住他们。政府将不再神秘，就像科学革命后的大自然一样。这将缓和公众对结果的期望。如果风险委员会在拉奎拉的会议记录被立即发布到网上，那么随之而来的刑事起诉可能就可以避免:科学失败就会被理解为人类知识有限的结果。

任何一个用心去看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不确定性的面纱给总统和美联储主席的视野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点不亚于普通男女。一旦承认这一事实，失去的神奇力量很可能会被合法性的获得所补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悖论，只是观察基于幻觉或现实的行为之间的区别。

巨大的能量被不知从何而来的人们释放出来，网络化的，自我组装的，自下而上的。这就是第五次浪潮的结构性命运

我的故事的中心主题。不信任社会中的民主政府可以选择驾驭海啸，也可以选择被海啸淹没。后一种选择将使政府陷入失败的泥潭，失去合法性。我担心，这将使民主制度任由第一个有说服力的政治选择摆布。

章节注释

1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81.

2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ow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Unmployment,” http://www.bls.gov/cps/cps_htgm.htm

3 Charles Dickens, *Bleak House*, Chapter 5: “Telescopic Philanthropy,” http://www.worldwideschool.org/library/books/lit/charlesdickens/BleakHouse/chap4.html

4 N. N. Taleb,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Random House, 2007), 34–35.

5 The most lucid and readable book on networks and small worlds, in my judgment, is still Albert-Laszlo Barabasi’s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2002).

6 My chart.

7 Ed O’Keefe, “How many .gov sites exist? Thousand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0, 2011, http://www. washingtonpost. com/blogs/federal-eye/post/how-many-gov-sites-exist-thousands/2011/12/20/gIQAkGAG7O_blog.html

8 所有网站数据来源于alexa.com

9 图表由alexa.com提供

10 Robert Pear, Sharon Lafraniere, Ian Austen, “From the Start, Signs of Trouble at the Health Port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0/13/us/politics/from-the-start-signs-of-trouble-at-health-portal.html?_r=0

11 Ibid.

怀疑者的结局

10

我的论点同样很简单。21世纪的信息技术使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公众，从哪里来的人，能够打破工业时代政治等级制度的权力。其结果并不是像1789年和1917年那样的彻底革命，也不是像1991年那样的彻底崩溃，而更像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定居之前的长期不稳定。任何一方都无法消灭另一方。当解决方案出现时，很可能会违背斗争的条件。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

如果我的论点是正确的，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达到圆满的革命性变革的历史时期。机构被耗尽了信任和合法性，却在一种僵尸般的状态中生存。政府被推翻或被投票推翻，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镜像。等级制度被降低，但拒绝产生自上而下控制的幻觉。因此出现了对英雄般的过去的崇拜，颓废的心理——这种感觉，在一个极端无常的时代是如此引人注目，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的论文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认为是原创的。我一开始就说过这一点，现在再重申一遍。构成我的故事的大部分事件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人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个别事件和策略事件上:超越了将中东动荡概括为

一场“阿拉伯之春”，许多联系被忽略了。

我着眼于战略，着眼于大局，将纳普斯特、博客和“气候门”纳入同样的叛乱中，这些叛乱将巴拉克·奥巴马推上了总统宝座，将胡斯尼·穆巴拉克赶下了法老的宝座。我描绘了一个在各个领域反抗权威的公众。也许这就是我的贡献。

现在应该很明显，我对创意的兴趣不如对民主的兴趣，民主已经陷入了公众和权威之间的交火中——有时，就像在埃及，真的是这样。这个时代的革命冲动是由奇怪的个人乌托邦期望推动的。民主政府在实现平等、社会公正、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廉价公寓、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方面的失败，已经把公众推向了拒绝实际实行的代议制民主的边缘。有些人已经走到了拒绝的边缘。失败孕育了挫败感，挫败感为否定提供了正当理由，而否定又为虚无主义者铺平了道路，虚无主义者相当真诚地行事，其原则是:不管有什么替代方案，摧毁体系就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是挪威人，富裕且接受过国际标准的良好教育，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份1518页的宣言，对纵容他的体制深为痛恨，然后在奥斯陆首相办公室附近引爆了一枚炸弹，亲手射杀了数十名儿童。把他当成一种预兆吧。公众和权威之间的冲突得不到解决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有可能忍受布雷维克的倍增。

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了。基地组织，政治伊斯兰教的虚无主义派别，已经指明了方向。

从我的论文中可以得出许多偶然性，政府和公众都可以选择。我以可能令人震惊的简短篇幅谈到了它们。我可以选择把我对生活的要求指向个人而不是政治。这将把有意义的决策转移到个人领域的相对自由中，远离在复杂的仙境中迷失的遥远制度。政府可以选择将其业务草案在网上公开，任何愿意这样做的人都可以仔细审查。这将为个人层面的官方干预提供早期预警，并引发爆炸

指挥与控制的神话——从而使公众的期望与现实保持一致。

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些选择，如果付诸实施，是否会恢复民主制度在公众眼中的合法性。但它会抵消大部分不信任: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10.1黄金虚无主义者:安德斯·布雷维克 -

还有一个大问题。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从第一章开始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他想知道)他怎么能确定我的论点，以及接下来的一切，是*正确的呢?*答案是:他不能肯定。分析可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人类的知识也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肯定地知道任何命题是正确的。我们只能尽力证明，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分析师靠反事实和弄虚作假——或者至少他们应该这么做。

作为一名分析师，我必须认真对待怀疑者的问题。我自己必须是一个极端的怀疑论者。既然我的论文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理解它*在哪里*以及*如何*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我的故事是虚构的，那么零假设一定是正确的

每一篇论文都只是对世界的一种描述。从这种描述中必然会出现一些*东西*，一些可证明的效果或变化——否则，提出这个话题就没有意义了。影响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更远、更高层次的。因为一篇论文必须依赖于“公众”和“权威”这样的抽象概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引力”和“相对论”——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寻找对效果的支持和证伪。例如，Eddington在巴西和普林西比的发现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可预测结果是一致的。

确定人类事务中的影响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实例很少，原因相互作用相当令人困惑。分析人员必须忍受比物理科学家所能忍受的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精确性。我希望我能给你一个数字，比如爱因斯坦的光曲率，来证明或反驳我的故事，但我不能。如果我尝试了，那将是我屈服于数字命理学的工业谵妄的一个症状。

诚实的分析*确实*要求清楚地陈述论点，并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影响。

我的论文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变化，两种结构性力量在永久的碰撞中被发现:以网络组织起来的公众和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政府(权威)。

其总体效果是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在任何地方，现状都受到攻击和压力——但没有一个地方是公众的反抗结晶为一场彻底的革命。由于结构和历史原因，这样一个整齐的终点不太可能很快到来，我预计埃及式的抗议活动会激增，这些抗议活动威胁或推翻了政权，但未能重组成一个新秩序。

一种一级效应可以从公众的性格中看出来。对政府和政策的反对是自组织的，而不是控制的，是由业余人士而不是专业人士进行的，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通常是*反对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这些特征似乎是宗派网络所固有的。因此，我预计会有更多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出现在*愤怒运动中*

和茶党模式，在政治舞台上爆发——民主和专制政权都是如此。我还预计，当期望的结果未能实现时，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现代晚期政府的行为也可以算作一级效应。今天的政府反应迟缓，不敢前进，不愿让步。在民主国家，政府习惯性地被有希望的结果所吸引，而它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公众对信息领域的征服让统治者感到茫然和困惑。他们知道，人们期待他们做出英雄般的行动，但也知道，每一项倡议都会受到质疑，每一次失败都会被放大。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是不变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期望民主政府对社会表面的干预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规律，给人一种有所作为、有所掌控的感觉。更广泛地说，我希望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做出*更多*承诺，同时承担更*少风险*。例如，法律和政策的长度将继续膨胀，使作者能够生成*一些看似*(无论多么模糊)注定了未来的词语。

我战战兢兢地转向更高层次的影响:这些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很难追踪，但恰好对我所讲述的特定故事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读者啊，我要摆在你面前的，是一种解读，一个从另一个故事衍生出来的故事，是关于我的论文在我看来最有力的间接影响。

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更高层次的影响是既有制度的合法性几乎致命的流失。我说“近乎致命”，是因为在民主国家，制度以活死人的模式存活了下来。它们确实存在，但只能在政治格局中笨拙地跌跌撞撞。在专制国家，情况有些不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和执政党已经死去，被埋葬了，但由大致相同的人管理的类似机构已经取代了旧政权。在利比亚、突尼斯和其他地方，制度性的混乱盛行。

我相信，在所有情况下，制度的微弱脉搏都可以追溯到公众造成的无情创伤。我希望这样的攻击能够

持续下去，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公众讨论中对该制度的否定和谴责程度上升，更多被泄露的文件被认为是对统治者的谴责，以及街头抗议活动的扩散。我会寻找政府之外的实体，如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来吸收传统上分配给脑死亡机构的许多职能。政府可以开始松绑。

其他更高层次的影响包括公众对当局的攻击逐渐失去抑制，反建制政治团体的兴起，以及潜伏在阴影中的虚无主义者及其毁灭的狂热梦想的可能性。因此，我预计，要求推翻政府、废除体制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频繁。像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和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这样的贱民政党，将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暴力随时可能爆发，尽管点燃导火索所需的确切情况我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

最后:在我论文所描述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必须把保护自己不受公众伤害作为优先事项。例如，我认为中国政权更关心的是对中国公众的监视和控制，而不是对外冒险——在海外冒险主要是为了操纵国内舆论。这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联邦政府。它会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美国公众，对待外国敌人主要是为了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民主国家，民选官员会试图通过与民主进程保持距离来获得好感。我预计会有一些想要模仿奥巴马的人，他们寻求通过蔑视权力来统治，并领导他们自称厌恶的制度。我不确定对于那些缺乏总统那种矛盾天赋的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否可能实现:但我想，很多人会尝试。

我就说到这里。我已经尽可能详细地列出了我的分析可能被证伪的条件，但我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还需要再走一步。为了回答那位讨厌的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提出的问题，我需要把我的论文像煎饼一样倒过来。我必须提出一个“零假设”。

首先，我必须解释一下这句行话的意思。

* * *

假设我在本书中提交的证据是一系列随机的事故和巧合——声音和愤怒，没有任何意义。例如，我相信，2011年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是公众反抗和权威危机的一个阶段变化:但假设我完全错了。假设这些事件在任何方面都彼此无关。如果我认为是信号的结果是噪音，那么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会从我对世界的描述中逻辑地产生出来，*那就是*零假设。这是关于现状持续存在的理论。

我的故事的零假设描述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等网络怀疑论者所生活的世界的某种版本。(但请注意，它不能完全符合格拉德威尔的论点:我坚持认为，这些论点已被事件所证伪。)在这个世界上，等级制度仍然统治着不受挑战的世界。正确解读的话，2011年其实是一系列地方性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强大的精英们制造出来的，或者至少是被他们利用模仿战术所吸纳的。公众及其弱纽带网络可能会激怒现代政府，但绝不会对其权威构成严重威胁。

零假设的总体影响是，在工业时代的进程中，政治环境安全地根深蒂固。政府的行动和政策披上了权威和说服力的外衣，而政府的失败涉及到特定的政治家或政党，而不是整个系统。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应该期待政治生活的特点是连续性而不是破坏性。抗议活动时有发生，但它们针对的是具体问题，而不是系统性问题。公众舆论将会更加宽容——有时甚至会像在猪湾事件中对待肯尼迪总统那样温和。

第一级效应是反对派的本质:他们忠诚而不激进，与当权者分享许多基本假设，并舒适地坐在政治体系内。如果这是真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党和工党将轮流管理政府，公众将以一种沉闷但还算成功的婚姻的方式接受这种单调。在零假设的世界里，也许会出现职业鼓动者的反等级制度，但受博主、喜剧演员或Facebook页面启发的古怪政治组织，永远不会侵占权力金字塔。

零假设的一个关键的第一级效应与信息有关:信息属于机构，并有效地受到它们的影响。说服主要是由精英们实施的，他们的声音和短语在信息领域得到了公众的呼应。讨论的重点是“问题”和“解决方案”，而不是既定秩序的失败。你应该期待公众舆论与精英舆论保持一致，信息领域将成为体制的支柱，而不是颠覆体制的手段。

更高层次的效应将反映出工业组织模式的坚韧性。制度保留了全部的合法性:它们的统治没有争议。政府开始在国内外实施雄心勃勃的干预主义计划。公众及其所谓的爆发实际上是利益相关方的操纵，是内部人士在玩弄民粹主义。公众缺乏现实:它是一个幽灵，没有站在一边或反对的意愿。

在这种环境下，你应该期待对政府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很少泄露该死的官方文件，在政治纠纷中相互尊重和有限的否定。像现在这样，当每一种情况下的趋势似乎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你应该怀疑制度之间存在冲突，而不是假设是虚构的公众的反抗。

然而，即使在民主国家，首选的政府风格也将是命令和控制相结合的，对监督公众的兴趣降低。中国和美国政府将把民众的忠诚(至少是宽容)视为理所当然，并将把精力集中在投射权力上，以追求社会进步和国家利益。老牌政党将吸收新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倾向。他们将对事务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有时会受到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制约，这些领导人站在非常陡峭的金字塔顶端，实施雄心勃勃的计划。

这就是我的论文和零假设。如果事件类似于我对世界的描述，那么在任何最终意义上，我都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如果它们似乎被零假设更准确地描述了，那么我的论点就是错误的。这取决于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你来决定。
在你这样做之前，我还有一点证据希望你考虑一下。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THE FUTURE’S UNCERTAIN BUT THE PRESENT IS ALWAYS HERE

在大学里，我选修了一门关于拉丁美洲社会革命的课程，授课的教授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智利的书。教授对智利革命有一句口头禅。“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政府可能不会长久，”他不止一次地说，“但它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在他的书中，他将偶然性从人类事件中剔除。他爱上了“*不可逆*”*这个词*。那是秋季学期。那年9月，在课程开始一周左右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智利军队推翻了阿连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并彻底而永久地推翻了他们所有的改革，历史永远不会停止，这让我们可以判断。

我那可怜的教授的书在学术上遭受了相当于婴儿床死亡的折磨。

我学到了一个教训——一个与拉丁美洲社会革命毫无关系的教训。我学到了专家的盲目和预言的愚蠢。多年以后，菲利普·泰洛克在《*专家政治判断*》*一书中以学术的完整性诠释了这一见解*。在阅读泰洛克的数据时，我发现自己很着迷，但一点也不惊讶。

现在，我敏锐地意识到那堂课给我上了另一课。解释事件的书迟早会被事件伪造:你只是希望它是晚些时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带着一种非哲学式的超然，仔细审视着自己的信息流。

让我把信息流上的事件作为对我的论文和零假设的第一次粗略检验。出于必要，我将会简短而肤浅地进行说明。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我不想毫无理由地拖延下去。

但我不会忸怩作态。对昨天、今天、此时此刻的世界的描述，在我看来，与零假设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情况明天可能会改变，但我只能处理我站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

* * *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当选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退出了与欧盟的联系国条约。此举

这激怒了很大一部分乌克兰公众，他们一直将EU视为反对政府滥用职权和腐败的保障。同一天，比瓦埃尔·高尼姆(Wael Ghonim)大几个月的网络记者穆斯塔法·纳耶姆(Mustafa Nayem)在Facebook上发帖，号召乌克兰公众走上街头:“我们晚上10点30分在独立广场中央的独立纪念碑附近见面，”纳耶姆到达时，大约有50名抗议者已经在那里，但几天内人群就膨胀到10万人。最终，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甚至可能数百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

它后来被称为“亲欧盟运动”起义:三个月的抗议、政府镇压和政治暴力，在2014年2月22日达到高潮，当时亚努科维奇放弃战斗，逃往俄罗斯。我注意到，他是民选总统，但他的下台被叛乱分子认为是民主的胜利。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选举结果，而不是过程。

乌克兰的事件重复了第五次浪潮条件下公众反抗的模式。我对这件事的兴趣始于此，也止于此。

独立广场的抗议者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和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的抗议者相似。他们都很年轻，精通技术，属于一群意识形态相互矛盾、相互敌对的族群。例如，一些主要人物是会说俄语的。纳耶姆是一名出生在阿富汗的穆斯林。然而，反外国人的极右势力也给抗议活动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亚努科维奇将起义描述为一场“民族主义政变”。[3]

叛军团结起来反对亚努科维奇。起义在一个否定的平台上获得了力量:就像2011年的先驱一样，乌克兰叛乱分子希望摆脱政治现状，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取代现状。当他们取得胜利，政府垮台时，乌克兰的政治局势一如既往:四分五裂。在一位观察家看来，亲欧盟运动的唯心主义构成了“一场经典的民众革命”。对另一个人来说，其后果仅仅是“政治精英的更迭”。”[5]

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乌克兰似乎被冻结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

旧秩序和激进变革之间的午夜。

信息技术并没有导致乌克兰革命，但如果没有手机和Facebook、YouTube等数字平台，这场革命很难组织起来，可能会取得不同的结果。隆冬时节的巷战，激发了全球公众的想象力。政府煽动的每一起流血事件都进入了信息领域，对舆论的影响可想而知。当政府生活在怀念苏联式镇压的过去时，年轻的抗议者明白信息的速度和示威效应的力量。

> *这一代人很少看电视,他们在网上获取新闻和信息. . . .最近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就利用了这一点。Ustream和YouTube上的业余广播迅速传播了这一消息。独立的、众筹的广播和电视网络使用同样的低成本流媒体技术,在基辅的一个阁楼上直播内容。不受欢迎的别尔库特(乌克兰特种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被密切关注;支持者被动员起来保卫抗议者搭起的帐篷。*[6]

乌克兰是一个无脊椎的国家:它缺乏强大的机构，一个真正的中心。亚努科维奇政府以黑手党家族的方式运作。然而，即便如此，在特定年龄的人手中，行动也过于缓慢，等级制度太多，无法有效应对网络化的公众反抗。纳耶姆称政府领导层“太老了”。“如果你问亚努科维奇或其他一些人有关Facebook的问题，”他写道，“他们不会理解它能做什么。””[7]

反叛者想要根除现存秩序的愿望使他们与民主的关系变得矛盾。他们想要的是他们想要的:消除政府，以EU国家为榜样的民主和法治。他们只是在否定中取得了成功。亲欧盟运动并非如亚努科维奇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政变。这是一场宗派起义。参与者渴望民主理想的纯洁，但不愿将精力投入到民主政府的混乱细节上。他们发现乌克兰就离开，任由事态发展摆布。

这位新总理是独立广场上的领军人物，他服从了欧盟的命令

伴随着近乎虚无主义的绝望的经济改革。“我们是一群有自杀愿望的人——欢迎来到地狱，”他说。他的话以诚实著称。他的政治环境甚至使他无法假装指挥和控制。

* * *

2014年2月12日，在委内瑞拉，零星的抗议活动呈现出自觉的街头起义的特征。大学生挑起了这场事端，但很快反对党和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阶层也加入了进来。对犯罪、通货膨胀和糟糕的经济的具体抱怨加在一起，形成了对彻底变革的通常要求。抗议者希望总统Nicolás马杜罗政府下台。

与他的前任和导师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一样，马杜罗也是群众运动和自上而下控制时代的产物。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高位，街头抗议只能是“法西斯团体”煽动政变的行为。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对乌克兰发生的事件给出了相同的解释，这表明了等级制度塑造观点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妥协是顺理成章的。面对公众对变革的要求，马杜罗和亚努科维奇一样，选择了展示武力。据说大约有40人在随后的巷战中丧生。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杜罗仍在执政，如果他能完成任期，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结果。但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暴力和破坏仍在继续。委内瑞拉的事件与零假设毫无相似之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生存。这个国家在今天和明天之间徘徊。

《劝导》属于网络化的大众。查韦斯很久以前就迫使大众媒体保持沉默，但委内瑞拉人却深深沉迷于社交媒体，3000万人口中有1400万人拥有手机。抗议者使用智能手机对讲机应用Zello.[10]协调他们的行动，其他数字平台允许他们将大量反对派人群和政府暴力的图像淹没在信息领域。示威的效果是强大而有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54%的

委内瑞拉人认为他们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在另一项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不认为他们的政府是民主的。马杜罗保留了许多团体的支持，但冲突的核心在于他的政府的失败，委内瑞拉统治精英无法实现他们自己雄心勃勃的言论。

叛乱分子的人口结构现在应该很熟悉了。他们很年轻，其中很多是大学生，几乎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与全球有联系的中产阶级。“我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我是阿迪达斯眼镜在委内瑞拉的经销商，”一名抗议者告诉《*纽约时报*》。据《时报》报道，其他叛乱者包括“一名美甲师、一名医疗用品销售员、一名商人和一名五金店员工”。反马杜罗的起义属于我们在多个环境中遇到的富裕的网络化公众，而且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是由对现有秩序的宗派排斥推动的。

委内瑞拉可能是突尼斯、埃及或乌克兰。公众在行动。一个半专制的政府挣扎着保持对街道的控制。结果无疑会因国而异，但我相信，事件之后的结构是由同样的构造力量塑造的。

* * *

泰国最近的动荡遵循了一种可识别的模式。2014年1月，大批抗议者成功“占领”了政府大楼。在2月份的大选期间，人群还扰乱了投票站。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暴力导致24人死亡。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春天，似乎已经把泰国的政治体系推向了瘫痪的边缘。



10.2在推特上谈论委内瑞拉的街头反抗 --

我只对这一集的一个方面感兴趣。泰国的叛乱者再一次不是穷人，而是城市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事业不是社会革命，而是要废除政治现状。代表这一群体的候选人在选举中经常未能赢得多数席位

全国选举。对此的反应是对选举程序的拒绝。

抗议者要求成立一个不受选举影响的“人民委员会”来管理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成没有明确规定，但其目的却足够明确。人们期望它能实现民主无法实现的目标:清算执政党，否定既定秩序。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坚称，街头抗议活动将持续下去，直到“政权被消灭”。他说的是选举产生的政府。

把想要的政治结果看得比单纯的民主程序更重要，这自然源于公众对现有制度的蔑视。

在土耳其，我们的老朋友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与泰国政府相同。它不断赢得选举并失去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是因为与信息领域的破坏性关系。埃尔多安对他所说的社交媒体的“诅咒”感到愤怒。他已经驯服了土耳其的大众媒体，在他看来，公众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交流，显然是不自然的，是对神圣的践踏。但公众确实在Twitter、YouTube和其他地方进行了沟通，埃尔多安尽管抱有控制的幻想，但却成为了公众的目标。

2014年2月25日，一段电话录音被泄露到YouTube上，据称显示埃尔多安指示他的一个儿子在埃尔多安家中的保险箱中“取出”钱，并在腐败调查之前“解散”它。随后又发布了16个电话记录——罪责虽少，但对总理来说仍然不太讨人喜欢。埃尔多安的反应和你所期望的一样，他是一个身居高层的官员。他给儿子打了一个“捏造”的电话，对其他的不予理会，集中精力惩罚那些冒犯他的媒体，主要是YouTube和Twitter。对他来说，丑闻不是他在明显的录音中说了什么，而是对他尊严的侮辱，以及社交媒体在这一行为中的勾结。



10.3 2009年，奥巴马和埃尔多安在白宫

埃尔多安卷入了一场针对社交媒体的法律和政治战争。他发誓要“根除”推特，并在土耳其封锁了该平台以及YouTube。在推特的指导下，用户很容易绕过审查，这些指导是该公司在马杜罗政府实施禁令期间为委内瑞拉人发布的。在西方看来，曾经是穆斯林世界自由典范的土耳其政府，现在似乎成了“世界上最坚决的互联网审查者之一”。在土耳其国内，埃尔多安和他的政党继续轻松赢得选举，但街头抗议活动正在积聚势头:3月12日，超过10万人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了抗议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推特上被召集起来的。图[19]

在事实发生之前，答案是不可知的。然而，如果我的论文所描述的世界与现实有任何联系，我预计埃尔多安的行动主要是由政治生存的需要来指导的。在第五次浪潮的危险条件下，政府更多的是依附而不是统治。

在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和军方以人民的名义推翻了民选政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基本上放弃了合法性的伪装。他们转而把精力集中在镇压政治反对派上。数百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判处死刑，导致塞西吹嘘兄弟会“完蛋了”。就像埃尔多安威胁要根除推特一样，这段带有现代主义虚张声势的言论更多地说明了军事政权的妄想，而不是它的能力。

那些组织反穆巴拉克抗议活动的网民们发现，他们受到了来自新政权的巨大压力。博客Alaa Abd El Fatah在家中被人打耳光，随后被“20名男子”逮捕，其中一些人戴着面具，携带重型武器。瓦埃尔·高尼姆2011年的合作伙伴、“4月6日运动”Facebook群组背后的指导精神艾哈迈德·马赫也被拘留。高尼姆本人已离开埃及，他说：“埃及不再欢迎像我这样的人。[22]

从各方面来看，情况与2011年1月25日之前完全一样。表面之下，一切都不同了。*信息人*打破了埃及权威的神秘感。没有回头路可走——没有回到被动服从的文盲、地方村民的状态。公众知道这一点，政权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迫害网络活动人士背后的理由。

塞西渴望成为总统，他的命运将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主张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如果他能够按照纳赛尔和穆巴拉克的模式，通过压制进入一个稳定而持久的王朝，我的分析就会被证伪。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结果。未来——问问我的老教授就知道了——是未知的。

但是，当我从远处观察最近发生在埃及、乌克兰、委内瑞拉、泰国和土耳其的事件时，我承认我对民主的未来有很多疑虑，更不用说对公众的不安或权威危机的怀疑了。

旧的民主制度和新的信息结构

最后，我想以老牌民主国家:欧洲和美国作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在物质上的成功将其政府制度的声望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是在这里发明的，科学管理也是如此——由于高明的自上而下的计划，他们显然有能力超越前几代人的梦想致富。数字世界在这里诞生:信息海啸可以说发源于旧金山湾以南和以东那个不稳定的地震带。

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公众不只是乌合之众的理想在这里也最为强烈，是国内政治DNA的一部分。

20世纪见证了致力于摧毁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的兴起。每一场运动，都依次被击败到灭绝的地步。随着1991年共产主义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再也没有其他制度可以与民主制度相抗衡。它们以历史上罕见的完满程度取得了胜利。早在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就在他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可以推测出一个完全由民主意识形态主导的世界:

> *我们可能正在目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是战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这并不是说再也不会有事件填满《外交》杂志每年一期的国际关系总结,因为自由主义的胜利主要发生在思想或意识领域,在现实或物质世界中尚未完成。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长远来看,理想主义将统治物质世界。*[23]

—

在911恐怖事件之后，福山和他的思想被嘲笑为必胜主义的胡说八道。但他只说错了一半。黑格尔学派的福山认为，西方民主已经耗尽了“矛盾”：也就是说，缺乏民主

意识形态的选择。1989年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福山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没有矛盾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还有一种他没有考虑到的可能性。

历史很可能是由*否定*而不是矛盾推动的。它可以依靠对既定秩序的虚无主义的拒绝，而不顾其他选择或后果。这并非没有先例。罗马帝国并不是被所谓的“封建主义”所推翻的——它是在自己沉重的负担下崩溃的，这让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惊讶。这场灾难之后的几个世纪缺乏意识形态的形式。同样，建立在否定基础上的历史将是无形的、无名的:一个真实时代与另一个真实时代之间的阴影时刻，不管有多长。

福山在冷战结束时看到了民主的千禧年胜利，事后看来，这似乎是民主制度声望和合法性的高潮。一旦共产主义施加的外部压力被移除，民主国家就失去了内部凝聚力，开始缓慢地走向否定。当脱离了生死斗争的史诗画布，高度现代主义的失败就变得痛苦而明显。工业化的组织模式，加上对等级的军国主义式的尊重，使民主政府与被统治者相距甚远。由于缺乏共同的敌人和战争准备的紧迫性，公众和当局发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站在对立面。

随后，第五次浪潮席卷了政治版图，让公众坚持的否定获得了话语权、形象和说服力。其结果，如果我的分析有任何正确性的话，就是许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失血而亡。

欧洲最近发生的事件符合这种模式。以法国为例，连续三届总统选举都推翻了之前的授权，但差别微乎其微，共同点是失败。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当选总统不到一年，就爆发了针对其经济和税收政策的抗议活动，而奥朗德本人的支持率也创下了历史新低。[24] 2014年3月，社会党人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奥朗德解雇了他的总理。另一项授权似乎正在走向逆转。

既得利益政党的无能为力使宗派主义的公众转向了在谴责体制时不那么受约束的政治团体。从左翼来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等反叛政党一如既往地攻击资本主义和政治，从而增加了他们的选票份额。被《*经济学人*》称为“欧洲茶党”的右翼叛乱政党也在民意调查中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他们的反对范围从法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的反移民和反欧盟倾向，到希腊金色黎明党公开的新纳粹主义言论。

欧洲民主的病态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自己也普遍承认。这种疾病的毒性似乎不那么明显。部分困难在于，复杂的系统往往在崩溃之前看起来坚不可摧。例如，苏联和穆巴拉克政权就是如此。相比之下，欧洲的民主看起来*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它有一种既定宗教的感觉，每个人都因习惯的力量而归属于它，但在内心深处，很少有人再相信它。闲着去猜测怎样才能把它扫到一边。然而，记住历史总是有用的:就在不久之前，欧洲还是世界上反民主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主要输出国。

* * *

最近美国政治的主题再次是失败:具体地说，是新医疗保健计划的不顺利推出和奥巴马总统从后果中恢复过来的努力。

我已经提到了医疗保险网站的拙劣交付。以下是克莱·舍基对政府开发这个耗资4亿美元的网站的规划过程的看法:

> *在尝试任何新事物时,管理问题是“什么时候现实胜过规划?”对于监管Healthcare.gov网站的官员来说,答案是“永远不会”。每次有机会进行某种形式的公共实验,甚至只是对其方法和目标进行一些澄清时,当务之急就是不让反对派有任何可批评的地方。*

在当时,这似乎是一种避免早期失败的方法。但项目经理并没有避免这些失败。他们是在积累失败的经验。[26]

奥巴马总统以其独特的辩证修辞风格回应了批评者。一方面，他似乎愿意承担责任，并表示了某种程度的道歉。“我们在医改法案的推出上搞砸了，”他说。“我完全理解这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多么令人不安。”这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讲话。

但是，奥巴马这位与政府撇清关系、蔑视政府工作的宗派主义先知，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没有被直接告知网站将无法运行……我不认为我蠢到到处说这将像在亚马逊或Travelocity购物一样，在网站开放前一周，如果我认为它不会起作用。“联邦政府在很多事情上做得很好。”“它做得不好的一件事，”总统指出，“是信息技术采购。[27]

巴拉克·奥巴马的政治天赋在于谴责错误。当奥巴马竭力应对医改法案中出现问题的部分时，他显然对必须倡导一个积极的项目感到不安。“……我希望大多数人也认识到，”他抱怨道，“当你试图做一些像改善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这样的大事时，沿途会有问题，即使你所做的最终会让很多人过得更好。[28]

一旦新医保项目的注册人数攀升至800万，总统就断言:“废除医保的辩论已经结束，也应该结束。”这是一份了不起的声明，既有宗派主义的肯定，也有中间派的盲目。就像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伦敦骚乱后面对互联网和英国当局一样，奥巴马总统似乎也在寻找能让争吵不休的公众安静下来的开关。

他不太可能找到它。医疗保健计划仍然不受欢迎。不出所料，预计共和党会在中期选举中利用这个问题。积极政府的负担不会很快从总统的肩上卸下。

奥巴马总统最近的困境延续了第五次浪潮时代民主政治的两极化命运逆转模式。自2008年以来，美国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推翻之前的选择。我们在法国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在过去几年里，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从左翼转向右翼，或者从右翼转向左翼。可能只有意大利是个例外，该国年轻的总理被称为该国的“最后机会”，这些国家的选民对当前的当权者产生了腐蚀性的不信任。30

—

作为临别赠言，请允许我对怀疑论者提出警告:民主进程正处于自我否定的危险之中。公众的情绪波动是由政府的失败所驱动的，而不是对变革的希望。每一次失败都会使体制的合法性流失，侵蚀人们对民主机制的信心，并为相反的极端铺平道路。作为一种理想和意识形态，民主在今天缺乏真正的对手。福山确实说对了一半。但在某些历史时刻，存在着一种颓废，一种由内在动力推动的系统熵，在解体开始之前，不需要其他的理想或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失败成为最终的结果。

民主的失败在零假设中没有任何作用，而是在我的论文框架中成为一种可能性。叛逆的公众，脾气宗派主义，期望乌托邦，到处与默认统治和错误(似乎是习惯)的制度发生冲突。在一个被信息海啸席卷到地平线的世界里，工业等级制度不再能够成功地治理。崇尚平等主义的公众不愿在任何条件下承担责任。在这些不可调和的力量施加的压力下，民主所必需的混乱的半步和妥协可能会变得站不住脚。

民主并非注定要失败。作为一名分析人士，我拒绝把预言和命运当作交易的工具。读者，我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比你更清晰。但是，今天,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进程，如果继续下去，很可能导致一直以来脆弱的政府体系崩溃。

奇怪的是，这种可能性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讨论过——只是间接地谈到中国或停止一些政策辩论。我写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邀请讨论。我这样做的方式，就像一个人注意到一间上锁的房间的角落里有火在燃烧一样:我不想引起恐慌，只想让房间里的人就如何最好地扑灭大火进行一些理智的讨论。

章节注释

1 From Frank Talker, at http://weirdwhites.blogspot.com/

2 Mustafa Nayem, "Uprising in Ukraine: How It All Bega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April 4, 2014, http://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voices/uprising-ukraine-how-it-all-began

3 Timoty Snyder, "Ukraine: The Haze of Propagand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 2014, http://www.nybooks.com/blogs/nyrblog/2014/mar/01/ukraine-haze-propaganda/

4 Ibid.

5 Volodymyr Ishchenko, "Ukraine has not experienced a genuine revolution, merely a change of elites," *The Guardian*, February 28, 2014, http://www. theguardian. com/world/2014/feb/28/ukraine-genuine-revolution-tackle-corruption

6 Oleh Kotsyuba, "Ukraine's Battle for Europ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1/30/opinion/ukraines-battle-for-europe.html?_r=0

7 Nayem, "Uprising in Ukraine."

8 Michael Bociurkiw, "Can Ukraine's 'political kamikazes' rescue the country from collapse?", CNN, February 27, 2014, http://www.cnn.com/2014/02/27/opinion/ukraine-new-government/

9 "Police clash in Venezuela with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BBC, March 20,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26676806, and William Neuman, "In Venezuela, Protest Ranks Grow Broad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2/25/world/americas/in-venezuela-middle-class-joins-protests.html?_r=0

10 Loreta Chao, "Twitter, Other Apps Disrupted in Venezuela,"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1, 2014,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775504579397430033153284

11 See "Hercon: El 53.7% de venezolanos considera que vive en dictadura (gobierno raspado)," *La Patilla*, May 19, 2014, http://www.lapatilla.com/site/2014/03/30/hercon-el-53-7-de-venezolanos-considera-que-vive-en-dictadura-gobierno-raspado/

12 See "55% of Venezuelans think Maduro's gov't is no longer democratic," *El Universal*, March 31, 2014, http://english.eluniversal.com/nacional-y-politica/140331/55-of-venezuelans-think-maduros-govt-is-no-longer-democratic

13 Neuman, "In Venezuela, Protest Ranks Grow Broader."

14 From posted tweet, https://twitter.com/JorgeJelipe/status/442434719721209857

15 Thomas Fuller, "Thai Protests Turn Volatile as at Least 3 Are Shot Dea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2/02/world/asia/thailand-protests.html?_r=0

16 "Full transcript of voice recording purportedly of Erdogan and his son," *Today's Zaman*, February 26, 2014, http://www.todayszaman.com/news-340552-full-transcript-of-voice-recording-purportedly-of-turkish-pm-erdogan-and-his-son.html

17白宫工作人员照片。

18 Joe Parkinson, Sam Schechner, and Emre Peker, "Turkey's Erdoga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etermined Internet Censor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 2014,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626304579505912518706936

19 Charlemagne, "Another summer of unrest for Turkey?" *The Economist*, May 3,2014,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charlemagne/2014/05/turkeys-may-day-protests

20 "Egypt's Al-Sisi: Muslim Brotherhood Is 'Finished,'" Sky News, May 6, 2014,

http://news.sky.com/story/1255779/egypts-al-sisi-muslim-brotherhood-is-finished

21 Robert Mackey, "For Egypt's Rulers, Familiar Scapegoat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2014,

http://thelede.blogs.nytimes.com/2013/11/29/for-egypts-new-rulers-familiar-scapegoats/

22 Patrick Kingsley, "I'm no traitor, says Wael Ghonim as Egypt regime targets secular activists," The Guardian, January 9,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an/09/wael-ghonim-egypt-regime-targets-secular-activists

23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http://www.kropfpolisci.com/exceptionalism.fukuyama.pdf

24 Angelique Chrisafis, "François Hollande becomes most unpopular French president ever," *The Guardian*, October 29, 2013, http://www. theguardian. com/world/2013/oct/29/francois-hollande-most-unpopular-

president

25 "Political Insurgency: Europe's Tea Parties," *The Economist*, July 4, 2014,

http://www. economist. com/news/leaders/21592610-insurgent-parties-are-likely-do-better-2014-any-time-second-world

26 Clay Shirky, "Healthcare. gov and the Gulf Between Planning and Reality," Clay Shirky blog, November 19, 2013, http://www. shirky. com/weblog/2013/11/healthcare-gov-and-the-gulf-between-planning-and-reality/

27 "Full transcript: President Obama's Nov. 14 news conference on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4,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anscript-president-obamas-nov-14-statement-on-health-care/2013/11/14/6233e352-4d48-11e3-ac54-aa84301ced81_story.html

28 John Dickerson, "A Sorry Apology," *Slate*, November 8, 2013,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politics/2013/11/barack_obama_s_bad_apology_the_pr

29 Louise Radnofsky and Colleen McCain Nelson, "Obama Says Health-Insurance Enrollees Reach 8 Millio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7, 2014,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810904579507922881089460

30 Christopher Duggan, "Italy has one last chance with Matteo Renzi –or the clowns will be back in charge,"

《每日电讯报》2014年2月26日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italy/10662452/Italy-has-one-last-chance-with-Matteo-Renzi-or-the-clowns-will-be-back-in-charge.html

trump, brexit, 和 告别 to 所有 那

反思:

《公众的*反抗*》于2014年6月首次出版。我本打算用这本书来描述一场席卷全球、但大多数观察者却看不见的冲突。我认为，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我们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分类。强大的政治力量被释放出来，奇怪和粗鲁的参与者获得了优势，造成了许多混乱——但我们的思想被转向了错误的方向，所有的混乱不知怎么就在公众意识的地平线下消失了。因此，我用“*地下*”*和*“*构造*”这两个词来形容这场斗争。

文章发表后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总统选举，其效果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旧地位的支离破碎和支离破碎

现状。2016年6月决定英国脱离欧盟的“脱欧”公投也只是稍微少了一点震动。守旧智慧的人现在知道，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大错特错，即使他们太过茫然和迷失方向，无法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痛苦和愤怒的嚎叫之外，我在2014年发现的斗争的许多因素已经进入了普遍的讨论。

动员起来的公众、权威流血的精英、政府的失败和民主的灾难性崩溃:在特朗普之后，还有什么主题能吸引更强烈的关注吗?

事后看来，我对使用戏剧化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感到不安，这让我觉得很好笑。例如，我对虚无主义和*虚无主义*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这些术语符合我面前的证据。个人和群体是在冲突中产生的，这种冲突将对既定秩序的全盘否定与对随机暴力的偏好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对陌生人的大规模屠杀是一种进步。与此同时，在网络上阐述的一种修辞风格完全依赖于愤怒和否定，这使得每一次网络政治争端都有可能在一场个人虐待和死亡威胁的“屎风暴”中自我毁灭。

这就是本案的现实。但分析人士是有顾虑的:我担心把一个本身就充满戏剧性的话题搞得耸人听闻。

今天，每个人都是虚无主义者。特朗普总统多次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写过“特朗普的无脑虚无主义”，他把总统描述为“越来越疯狂地陷入非理性愤怒的力量”。尤金·罗宾逊(Eugene Robinson)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警告说:*“我们都将为特朗普的虚无主义付出代价。”[2]总统的前战略家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被指责助长了“愤怒失控的释放……这是虚无主义，是一种想把一切付之一炬，并为后果见鬼去的欲望。但特朗普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原来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至少有一位困惑的评论员(还是在《*华盛顿*邮报》上)宣称:“我们现在都是政治虚无主义者。””[4]

我也想知道，我是否夸大了自由民主的弱点，并且，通过反复强调否定的声音，我自己也为失去做出了贡献

对我们制度的信心。我本不必担心。自2016年选举灾难席卷精英阶层以来，站在屋顶上大喊你对民主失去信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比几周前更危险，”e·j·迪翁(E. J. Dionne)在2017年12月糟糕的那一周大声疾呼。蒙克(Yascha Mounk)指责特朗普总统“处于发动一场反对独立机构和法治的政变的边缘”。蒙克先前曾警告“美国多民族民主的叛乱”，然后扩大了灾区:“这不仅仅是特定社会的问题，而是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其他观察家认为这是一场由“反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驱动的“世界性危机”。”[8]

有人把今天的美国与产生阿道夫·希特勒的魏玛共和国相提并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前总统把目前的情况比作希特勒的“20世纪20年代末的维也纳”，他不祥地补充道:“然后有6000万人死亡。[9]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华盛顿邮报*》设计了一个新的、恰如其分的末日格言:“民主在黑暗中死去。”对于政界和新闻媒体的许多人来说，黑暗已经来临。

在民主问题上，碰巧的是，我的声音在人群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不确定的声音。

这一章的目的是将我的分析扩展到引起如此骚动的事件。除了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所代表的存在主义冲击之外，我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对一个充满麻烦的世界:法国和德国主流政党的崩溃，意大利和希腊受欢迎的年轻领导人的失败，欧盟的缓慢解体，黎凡特中心一个血淋淋的“哈里发国”的兴衰，恐怖主义的病毒式传播和随机屠杀。还有令人烦恼的民粹主义问题——民粹主义这个词的含义远远超过它所能解释的。

尽管书名上出现了“重新考虑”这个词，但我不认为——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有太多需要重新考虑的东西。总的来说，我在2014年提出的论点相当有力地站住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公众对权威的疏离和愤怒，比我想象的要多。精英们永远对事件感到震惊，在恐慌和道德义愤之间摇摆不定。机构

维持现状的机构正在它们周围分崩离析。粗糙笨拙的人物，缺乏对制度的忠诚，不耐烦地在翅膀上徘徊。在美国、匈牙利和菲律宾，他们在舞台中央获得了权力，昂首阔步。

民主国家的民选官员试图通过与民主进程保持距离来讨好公众。唐纳德·特朗普通过他的推特实现了这一点。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曾大声梦想成为奥运总统。不太稳定的民主国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蹒跚走向威权主义。委内瑞拉和土耳其虽然保留了自由主义的形式，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独裁统治。

这些制度的大解体比我在2014年想象的更快、更远、更深。这是我上面提到的例外:我重新考虑的分析。我想我大致确定了推动风暴前进的力量,但我没能估计到风暴前进的速度。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在短短的几年里，政治格局已经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派系的混乱。暴力和亵渎的语言经常被使用，这在2014年是不可想象的。由网络构成并赋予权力的重要利益群体已经堕落为纯粹为攻击而存在的网络暴民和战争团伙。虚无主义者、滥杀无辜的凶手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中间。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屈服于当下的厄运和绝望，以某种方式接受民主的消亡?这个问题将像幽灵一样，萦绕在本章的每一个思想和主题中。我相信，民主的命运与民主国家精英的命运密不可分。现在的精英阶层，失去了对信息的垄断，可能永远失去了合法性的授权魔力。民主的工业模式功能失调，信誉扫地。这就是当前的困境。前进的每一步都必须从这里开始。

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民主统治下的合法性条件。公众的反抗是公开的。分析的重点必须转移到已经感染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权威危机上——想想“假新闻”和“后真相”——并使我们的政治阶层陷入恐慌和瘫痪的境地。让每一个民主捍卫者激动不已的问题是:这种情况如何才能逆转?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如何

民主社会选出的*合法*精英?我想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对我们是好是坏，都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那个萦绕在心头的关于民主之死的问题。

是精英们的永恒惊喜，还是世界的天翻地覆

2016年11月8日，周二，1.35亿美国人参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仪式之一:新总统的选举。选举结果已经得到了罕见的预测。希拉里·克林顿是前参议员和国务卿，也是民主党的主要筹款人。唐纳德·特朗普不具备这些特质。作为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电视真人秀明星，他声名鹊起，但他在任何级别的政府工作经验加起来都是绝对的零。克林顿有钱，有支持，在每个州都有组织。特朗普缺乏所有这些优势。他与幕僚发生冲突，还解雇了他们，分裂了对共和党的忠诚，还想尽办法疏远能言善辩的精英——尤其是新闻媒体。《*纽约*时报》认为特朗普有15%的获胜机会。其他媒体给出的赔率更低。[11]



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几乎一致希望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成为下一任总统。选民们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因此，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对这些精英控制的结构造成的冲击是极端的。一年多过去了，这种平衡尚未恢复。特朗普的胜利实际上是一件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对当时和现在的许多人来说，这感觉就像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是对既定真理的暴力攻击。在宣布“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颠覆”时，电视上的评论员们结结巴巴地哭了起来。突然之间，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这种不可能的感觉由于这个人的陌生感而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是一个坐着金色电梯去第五大道顶层公寓的亿万富翁，但他声称自己是“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男女女”的代言人。尽管他很有名，但在国家舞台上，他一直是一个小角色。他缺乏政治联盟、意识形态上的追随者和机构关系。他的言行本该多次毁掉他的竞选。他是福音派教徒的最爱，尽管他已经结过三次婚，而且在一个毫无防备的时刻，曾吹嘘过“抓女人的阴部”。他的标志性议题是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但他的母亲和两个妻子都是移民。

即使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谴责他八年之后，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的看法仍是极其黑暗的。在就职演说中，这位新总统回顾了他接手的“美国大屠杀”：

> *在我们的内城,母亲和孩子们被困在贫困之中;生锈的工厂像墓碑一样散落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教育体系……这让我们年轻漂亮的学生被剥夺了知识;犯罪、帮派和毒品夺走了太多的生命,夺走了我们国家如此多未实现的潜力。*13

—

作为墓地的国家:来自白宫居住者的非凡意象。

在那些发自内心地敌视特朗普的人中——首先是精英和机构，还有民主党和左派，以及一些保守派知识分子——他的当选被认为是道德和政治上的不可能，是一种恶毒的荒谬，只能用谎言和阴谋来解释，其合法性必须被拒绝和“抵制”，不妥协，不惜一切代价。一些人呼吁承诺支持特朗普的选举人团成员转而投票给克林顿。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以各种理由弹劾和以无行为能力免职的说法。

反对派的指导原则似乎是，足够多的愤怒会冲掉选举结果，让现实恢复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的状态。选举结束后，数千人走上街头，愤怒地抗议“不是我的总统”。参与者高呼“唐纳德·特朗普必须下台”，尽管严格来说，他当时还没有上台。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全国数百万人参加了一场“女性大游行”，反对特朗普被认为的厌女症。许多示威者戴着女性生殖器形状的帽子——早期迹象表明，总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驱使他的对手做出比自己更奇怪的行为。随后的4月和5月发生了更多的抗议活动。每周都有新的愤怒和丑闻发生。每一天都是民主的末日。没有人觉得有丝毫必要和这个不可能的人妥协。

现实的破裂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我结束之前，我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强制性的宇宙问题: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如何解释特朗普总统，这个搅局者，如此多的恐惧和厌恶的对象?

我不相信对复杂的谜题有单一的答案:一场拥有1.35亿选民的选举，是沿着一条极其复杂的因果流旋转的。然而，在我看来，任何答案都需要两个要素。第一点很简单，也是公认的。第二种方法使第一种方法成为可能，但比较晦涩。

我说过，特朗普没有任何从政或从政经验的污点。他在意识形态上也没有任何形式——他的一名竞选工作人员慷慨地称他为“后意识形态”。例如，在他那个时代，他对堕胎既支持又反对。他所谓的民族主义，仔细一看，就会分解成

某些言辞上的偏好，以及美国从世界各国获得更好经济协议的模糊要求。

特朗普当选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对资格和政治方向一无所知的候选人，只能作为选民对统治阶级的最高否定姿态而当选。从始至终，2016年的总统竞选最能被理解为不满且高度动员的公众的政治主张。最终，特朗普被选上正是因为他明显的缺点，而不是尽管如此。他是公众乖戾和反叛情绪的看得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特朗普之于这些公众，就像特*鲁弗尔*之于现代艺术家:一件现成的工具，一根触手可及的棍棒，可以用来砸碎既定秩序。把他比作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像他的一些崇拜者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他比作大独裁者，就像他的对手不断做的那样，这将像在游乐场的镜子里一样扭曲现实。

对特朗普的正确分析水平，根本不是特朗普，而是赋予他激进方向和脾气的公众，以及被证明太过软弱而无法阻挡他的腐朽体制。

与世界各地的公众一样，美国公众正在经历一场从代议制民主结构向更宗派化安排的长期迁移。公众渴望意义和同一性。从它的角度来看，晚期现代社会，包括政府，就是为了挫败这种渴望而存在的。在非同寻常的个人期望与软弱但具有侵入性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碰撞中，民族国家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正在分裂成社会政治碎片，这些碎片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这样的人来说，从非常陡峭的金字塔的高处往下看，远处的特朗普支持者只能看起来像“一群可怜的人”。否则，他们根本无法解释。

曾经管理体制、防范这种自下而上爆发的政治专业人士，已经随风而逝。特朗普的参选通常被视为草根阶层对共和党建制派的反抗。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怀旧的虚构。2016年的初选表明，作为一个机构，共和党已经失去了连贯性和权威。共和党的“建制派”，不管用什么说法，早在特朗普到来之前就已经支离破碎了:只有这个词还像咒语一样。杰布·布什(Jeb Bush)对建制派冠军的明显模仿只证明了这一点

点。布什缺乏追随者，在民意调查中几乎没有脉搏，也不能像内部人士那样宣称自己的影响力。他已经卸任9年，“比1852年以来任何一位当选的总统(以及1924年以来的任何一位候选人)都要长，”一位敏锐的分析人士写道。”[17]支持他的共和党要人平均已卸任11年。如果说这曾经是共和党的建制派，现在则是一群政治死尸。

简而言之，对共和党来说，布什的竞选是一场死者之舞，而特朗普的胜利则成为一个启示和接受的时刻:与其说是一场反抗，不如说是一场埋葬。

民主党也经历了同样致命的权威丧失。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真正的建制派。八年来，奥巴马和他身边的人对民主党组织没有任何亏欠和忠诚。[18]在2016年的民主党初选中，超过40%的选票，以及所有的战斗激情，都落在了伯尼·桑德斯身上——一个又老又钝的白人社会主义独立派。他的许多支持者将克林顿和其他主流民主党人视为他们所鄙视的体制中的齿轮。

民主党正以比共和党慢一些的速度，分裂成几十个政治派别，每个派别都受到对意义和同一性的渴望的驱使，都以偏执狂的强度专注于一个特定的事业:女权主义、环境、反资本主义、支持移民，或种族或性别不满。这种分裂被对特朗普的一切普遍厌恶所掩盖:但我发现很难想象一个依靠部落主义和同一性战争而繁荣的全国性政党。

这就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原因。他是反叛的公众所选择的工具，没有既定的权力中心阻挡他。关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在需要提出一个有点不同的问题。在1980年、1990年，甚至2000年，特朗普的怪异轨迹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政治上是自杀式的。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然，信息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一代人以前，公众只能作为被动的观众而存在。信息是按照工业模式分发的:自上而下，一对多。那是日报和著名主持人以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为模式的伟大时代。数字平台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大众。人无处不在，自由自在

制度的纠缠，把精英们从信息领域的战略高地上推了下来。几乎立即，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伟大机构开始流血，权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过程现在已接近其中许多机构的终结阶段。

这就是我对公众反抗的论点。我在这里的主张是，它完全适用于2016年总统竞选的每一个阶段，并有助于解释古怪的特朗普为何能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如此轻易地践踏曾经权威的机构。在那个时刻，他是幸运的。当他像宴会上的幽灵一样，化身为共和党的领袖时，他遇到了制度真空和信息混乱。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网络竞选“压倒性地胜过”克林顿。“克林顿的报道集中在丑闻上，而特朗普的报道则集中在他的核心问题上，”来自同一来源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以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为首的新保守派数字媒体，对Facebook和推特上的谈话基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无论是作为候选人还是总统，特朗普自己对推特的迷恋都很不寻常，也很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在另一个背景下，我打算提供这一点。

然而，在这里，我希望把重点放在特朗普与主流新闻媒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上。

事实是没有争议的。特朗普花在广告上的钱比克林顿或他的共和党对手少得多，但他却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报道。奇怪的是，新闻界似乎痴迷于这个奇怪的人，对他的关注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是为什么。

答案对任何有眼力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美国政坛一群迟钝的秃鹰中的一只孔雀。他一生中一个明显的主题就是想要脱颖而出:成为全场最响亮、最丰富多彩、最具侵略性的人，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显然，他的成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媒体关注的数据说明，他是一个世界级的自我推销天才。[21]再说一次，不可能有

这让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脱颖而出。他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TV上的每个人都在谈论他。[22]谁能对泰德·克鲁兹说同样的话呢?

媒体人给唐纳德·特朗普的气球吹气，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他代表着高收视率和更高的订阅数。在新千年到来之前，新闻媒体一直控制着信息议程。他们可以根据某种精英标准来决定你应该得到多少关注。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信息环境中，被大量的信号和噪音所席卷，在报纸破产和更多的TV新闻频道中，每个新闻提供者都从生存绝望的角度来看待一个故事。特朗普理解这种饥渴，也知道如何喂饱这头野兽。[23]

矛盾的是，传统新闻媒体一致对特朗普抱有敌意，甚至放弃了自吹自擂的客观性。《*纽约*时报》的一篇头版文章指出:“如果你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有潜在的危险，你的报道就会反映出这一点。”[24] CNN也很乐意用“危险”这个词来描述特朗普的言论。[25]

记者在选举期间排队反对特朗普的例子可以随意增加——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开批评的问题。纸媒和广播媒体的知名人士都与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串通一气，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特朗普失败的可能性，这一点在希拉里竞选经理的电子邮件遭到黑客攻击中得到了揭露。的确，对特朗普最具破坏性的爆料不是民主党特工挖出来的，而是NBC新闻(NBC News)泄露给《华盛顿》(*Washington Post*)的

然而，更大的悖论是，特朗普几乎肯定从这些攻击中受益。他能够以某种公正的方式，把记者描绘成有资格、脱离现实的精英俱乐部中信誉良好的成员。公众对新闻的信任度一度跌至历史最低点——到2016年秋季，这一比例已降至19%。特朗普可以奢侈地反对一个不受欢迎的机构，这个机构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如果是负面的)宣传。当他辱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梅根·凯利(Megyn Kelly)时，他的支持者发出了赞许的吼声。

上世纪90年代，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观察到，挑选总统候选人的权力实际上已经从政党转移到了大众媒体。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2016年，许多历史悠久的机构都变成了昔日的废墟。新闻行业在废墟中占据突出地位。信息议程不能再由少数几家新闻机构通过与少数华盛顿显贵的亲密互动来控制。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新闻议程现在成了一个疯狂的战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政治新手，受到精英们的憎恶，他之所以能够赢得总统大选，部分原因是他比竞争对手更聪明地解读和驾驭了这种支离破碎的信息格局。

* * *

在2016年这个不太可能的年份，菲律宾选民把一位民粹主义者推上了总统之位，相比之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听起来就像一本礼仪书。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曾向媒体吹嘘，在担任马尼拉市长期间，他曾在夜间街头游荡，亲自射杀毒贩。所以，这位菲律宾新总统要么是一个认罪的杀人犯，要么是一个病态的说谎者(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样)。

我提起这个奇怪的故事是为了唤起我们的记忆:造就特朗普的这场冲突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参与其中的力量是全球性的，也是世俗的。

在欧洲，一系列的选举冲击重创了欧洲联盟和许多国家。这种困境被贴上了“民主危机”的标签——一位评论员将其定义为“精英与选民之间的鸿沟”。[30]然而，对许多思维正常的欧洲人来说，民主似乎正在自我否定。既然这个主题是我关注的中心，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反思一下欧洲民主的麻烦。

首先要从选举结果及其后果说起。

在2015年1月的希腊大选中，一个由共产主义者和反全球主义者组成的形形色色的联盟上台执政，他们组成了一个名为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政党，由40岁的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齐普拉斯是希腊现代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激进左翼联盟从2004年才开始存在，但在2015年，它主要凭借否定和否定的纲领赢得了胜利，而且大获全胜。该党坚决反对欧洲联盟、欧元、紧缩预算、债务支付、资本主义和财政紧缩

德国人、银行、“富人、市场、超级富豪、收入最高的10%。[31]

激进左翼联盟承诺了希腊选民想要的:不可能。现实介入了。到2015年9月，政府里的怪胎和顽固不化的激进分子已经被清除。希腊留在了EU，保留了欧元，忍受了紧缩，恭敬地向资本家、德国人和银行鞠躬。激进变革的承诺已经陷入停滞。在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齐普拉斯的领导下，希腊公众的处境与他的中年保守派前任领导下的情况相似。毫不奇怪，对激进左翼联盟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实验的支持已经崩溃，而齐普拉斯的支持率“暴跌”。[32]

2014年2月，经过议会的一次操纵，39岁的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成为意大利总理，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他属于主流的中左翼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但以局外人的身份进入国家政坛，曾任佛罗伦萨市长。他的任务是从内部推翻意大利僵化的政治体系。由于他的性格和使命，这位年轻的救世主被称为“*il rottamatore-demolition man*”。伦齐没有任何腐败的污点，并且认真对待这个头衔。“我正在清理沼泽，”他在2015年6月宣称，好奇地期待着特朗普

和齐普拉斯一样，伦齐的本意是对现状的否定。错综复杂的机构利益阻碍了他的行动:在意大利，游戏规则并不是为了促进改革而设计的。拆迁人伦齐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了改变规则上。他坚持认为，中央政府需要更大的权力，并呼吁在2016年12月举行宪法公投，作为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精英阶层一致支持这位年轻的总理。宪法改革得到了传统政党以及印刷和广播媒体的普遍支持，并且在广告上花费了更多的钱。

但反建制团体，如贝佩·格里洛的五星运动和马泰奥·萨尔维尼的北方联盟，这些民粹主义势力主导了社交媒体。被疏远的公众不信任中央集权背后的动机。反对改革的投票超过了60%，几天后伦齐就下台了。一位沮丧的观察家写道，这是“罗马的陷落. . . .”现状已经

won.”[35]

事实上，现状遭受了关键性的失败。2018年3月，伦齐的社会民主党在民意调查中惨败，而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明显的多数选票。意大利的民主已经被证明无力改革意大利的政治腐败和瘫痪，现在面临着从愤怒的民意碎片中拼凑出一个政府的任务。成功将使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落入对EU持批评态度的经济民粹主义者手中。[36]

对西班牙来说，2015年12月的大选标志着两党制向支离破碎和混乱的政治环境的过渡。执政的保守派虽然仍是第一大党，但失去了64个席位，失去了在议会的多数席位。这次挫折的原因有很多，但总的来说，选民们强烈反对。社会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表现。“我们可以党”(Podemos)位居第三，该党信奉2011年*愤怒者*街头反抗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之前的选举中并不存在。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召集多数来组建政府。经过10个月的瘫痪，2016年1月举行了新的选举。这一次，保守党的表现有所好转，但由此产生的软弱的少数派政府却陷入了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在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一系列的地方投票倾向于寻求脱离西班牙的团体。加泰隆尼亚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但是加泰隆尼亚人染上了同一性和否定的毛病，他们在反抗历史，并希望在目前的事物秩序中粉碎历史的后果。2017年10月，一场公投再次让分离主义者得手。地方当局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被迫派遣警察，接管加泰隆尼亚的事务，并将叛军领袖投入监狱。后者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西班牙，民主已经成为民族政治和民族国家解体的帮凶。

然后是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公投是民主产生令人困惑的结果的教科书式例子，也是公众暴跳如潮的例子。公投是由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发起的

部长，履行竞选承诺。然而，卡梅伦本人强烈反对脱欧倡议，反对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受人尊敬的新闻媒体、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以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为首的一长串外国元首也是如此。投票反对——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投票一样——成了*因为*而不是*尽管的问题*。英国公众受困于冰封的政治秩序，被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精英统治，他们选择打破一些陶器。那是在艰难的2016年5月。直到今天，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英国——“联合王国”——是一个有趣的国家。随着旧的尖锐的阶级差别减弱，其他一切差别都被放大了。英国机构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多元文化主义，颂扬多样性。这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民族同一性的分裂，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仍未和解。特别是穆斯林人口产生了国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暴行的肇事者——回想一下“圣战约翰”的可怕视频图像，他被斩首给哈里发，带着浓重的伦敦口音。[38]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退欧公投是针对圣战约翰和他的同类。这是出于对国家及其公民传统的热爱，还是出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立场。

虽然民意调查显示了激烈的竞争，但英国和欧洲的精英们对公投的结果感到彻底震惊。一名困惑的工党议员惊呼:“一千年来，我都不会相信英国人民会投票支持这一结果。”[这种]与公众的彻底脱节，甚至超过了移民或恐怖主义，有助于解释英国退欧公投中隐含的自下而上的反抗。之后，大众媒体描绘了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后悔自己愚蠢的冲动，或者困惑地问EU到底是什么。[40]但正是精英们对自己与公众的疏离抱着一种幼稚的无知:下次，他们肯定会再次感到惊讶。

酒吧和足球场的英格兰对英国的制度造成了冲击。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脱欧”活动人士的数量、发帖和精力都超过了对手。[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几乎是故意无视这种反抗策略，因此丢掉了工作。他的继任者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支持英国退欧之前一直反对脱欧。梅证明了

和卡梅伦一样不善于解读公众情绪。在“强大而稳定”的口号下，她呼吁在2017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选民们选出了一个悬浮议会，梅开始了她的第二个任期，领导着一个软弱、不稳定的少数党政府。

与此同时，边境利用英国退欧的胜利恢复了与中间派的冲突。苏格兰由一个致力于脱离英国的政党统治，就像英国现在致力于脱离欧洲一样。苏格兰首相坚持她的地区将留在EU，并承诺就退出英国举行新的公投。

与英国的命运一样，欧洲的命运正从愚昧的政治阶层手中滑落。英国退欧的更高含义可能是作为一个长期大逆转的指标。在全球范围内，机构已经进入了颓废和解体的时刻——EU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就像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它缺乏一个真正的中心和一个共同的存在理由。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所有人都撕扯着主要由惰性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我们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得到的最多是一个混乱的回答。现在的民主倾向于公众，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公众似乎都想退出。

* * *

2017年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选举中获胜，许多人认为这种分裂趋势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据说该中心征服并维护了两个最大的EU国家的秩序。特朗普当选后，绝望的精英们将默克尔加冕为新的“自由世界领袖”。马克龙也激发了同样夸张的热情——《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一张封面上，他真的在水上行走。[43]这两位在民主游戏中获胜的冠军，被寄予拯救欧洲之家免遭毁灭的厚望。

我认为这是对案件事实的误读。

说白了，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对政治现状来说是一场灾难。两大“主要”政党加起来勉强获得了50%的选票。默克尔的执政联盟下降到33%，失去65个席位。反对党社民党遭遇了其悠久而自豪的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其余的

联邦议院分裂为不可调和的猫和狗。选举四个月后，新政府仍未获得多数支持。如果德国的政治分裂程度还没有达到西班牙的水平，那么它正在向西班牙迈进。默克尔，慈禧太后，看着自己梦想的破灭，开始工作。她还能把政府拼凑起来，但她已经失去了控制，听任事态的摆布。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情况更加矛盾。如果说默克尔代表了疲惫的旧政权，特朗普代表了混乱的新势力的崛起，那么马克龙则试图跨越两者之间的鸿沟。在法国的背景下，他登上总统宝座的过程和特朗普一样疯狂而不可思议。他的政党“前进党”(En Marche)在大选日前不到一年就成立了。他的选民和积极分子都是第一次被卷入政治的普通人。在马克龙的语言中，萦绕着一个曾经辉煌的社会的愿景，这个社会可以再次辉煌:他喜欢“自信”和“重新发现”这样的词。在这一点上，他在精神上也比人们所承认的更接近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呼吁。
他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将公众释放的巨大政治能量与制度的目的性和持久性结合起来。答案是未知的。没有人尝试过这个实验。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可能的话，马克龙是否有能力和经验来完成这一任务。答案同样是不确定的，但欧洲政治神童最近的表现并不令人鼓舞。作为第五共和国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与齐普拉斯和伦齐有着同样不幸的血统。



11.2浑水上的救世主44 —

他的本能也与时代的风气背道而驰。比如，他是离心时代的扶正者。他曾说过，他渴望成为一个“朱庇特式”的总统——实际上是为了*增加*权力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他选择了凡尔赛宫，太阳王的洛可可背景，作为他第一次重要演讲的地点。虽然奥林匹克风格可能对戴高乐很有帮助，但在推特或Facebook上，这种风格不太可能被当真。马克龙显然是被腐朽帝国的王冠所诱惑:也就是说，被成为下一个安格拉·默克尔的野心所诱惑。在我看来，那样就意味着灭亡。

总而言之，这位新上任的法国总统成长为法国既有秩序和欧洲民主的救世主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谁能说得准呢?据说拿破仑曾说过“不可能不是法国人”，而上述分析的一个教训是，*现在*也不是。

俄国人来了，纳粹来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唐纳德·特朗普

随着民主的结果越来越不利于精英，精英们同样强烈地担心民主的失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引爆点是2016年。对许多有思想的人来说，唐纳德·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景象标志着我们政治制度的垮台。东欧和中欧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成功证实了最糟糕的担忧。野蛮人不仅在城墙内，还掌控着政府。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对代议制民主的能力，甚至合法性极度悲观的时代。最极端的悲叹每天都在涌现——这里随机抽取一个样本，是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对特朗普治下“美国民主的失败”的看法:

> *一种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一种对旧的威权主义权力关系的怀旧向往,现在塑造了一种治理模式,并使其合法化,这种模式产生了淫秽的不平等程度,扩大了腐败的立法者的队伍,把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热心的理论家放在了权力位置上,威胁要把反对者关进监狱,并对国内外不断扩大的国家暴力网络实施制裁。*

这就是全球精英阶层和其他许多人对我所说的公众反抗的解读:民主的死亡和独裁黑暗的堕落。政治动荡与新信息格局之间的联系如今已被广泛理解，但这个问题往往被框框为社交媒体为破坏性或不受欢迎的观点打开了大门。Zeynep Tufekci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这是言论自由(民主中毒)的黄金时代。

民主绝望的必然结果是对外国独裁者的有效性几乎有一种神秘的信仰。在所有人中，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已成为阴谋论的英雄和反自由主义的*解围*神器。俄罗斯“黑掉”总统选举以支持特朗普的信仰已经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根深蒂固:根据一项民意调查，超过5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与普京的交易要么是“非法的”，要么是“不道德的”。[48]精英们抓住了这种假定的俄罗斯干预作为对新总统的制度性反应的武器。根据来自联邦官僚机构的官方和外泄信息，2017年5月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候选人特朗普或他的圈子与普京勾结可能犯下的罪行。

我想把这种对民主现状的悲观看法，转化为一个分析*性*的问题:*事实上，在国内和国外，数字化授权*的*公众与工业时代*的*机构之间*的*斗争，是否推动了民主*的*毁灭，并使威权*冲动*“合法化”*?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的方法将是粗线条的、经验主义的。一个政府必须做*一些*被认为是威权主义的事情*:践踏制度检查，违反法律，滥用既定权利。我在找吉鲁所说的"国家暴力"的例子同样，驾驭当前信息环境的独裁政权，在追求自身利益或意识形态目标时，必须表现得更加自信或更具侵略性。

我的问题*显然*是关于民主的——实际上是关于权威的——但我发现首先转向独裁政权是澄清问题的。考虑一下:如果驯服社交媒体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办法，那么朝鲜或古巴不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榜样吗?我带着微笑用修辞的方式问了这个问题。金氏政权和卡斯特罗政权就像列宁在他的陵墓里，在一个

20世纪的木乃伊化版本。

所以，让我转而从最成功、最受欢迎的独裁政权开始:中国。

中国是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少。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物质繁荣，也带来了更现代、更无形的焦虑。人们总是说，社会陷入了一场“道德危机”，“仇恨压倒了同情”，金钱是“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赚来的——当然，这是无法量化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口正在迅速地皈依基督教，但无法得到实际的数字。我们确实知道，在习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场无情的“反腐败”运动，涉及到高级官员。在这里，道德危机与政治制度交织在一起:当涉及到以人命为代价的赚钱行为时，腐败始于高层。

中国的监督者称他们的政府形式为“人民民主专政”:对立面因此在一个短语中得到调和。等式的独裁一面吸引了某些对民主绝望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梦想出现一个开明的暴君，有能力结束当前的政治和信息混乱。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审查和镇压机构，包括一支据称有数百万人的“网络警察”。在习的领导下，对政治和媒体的控制变得更加严厉。例如，博客作者现在因批评政府政策而被判处长期徒刑。[52]名记者因泄露官方文件被判入狱。[53]名有抱负的党员在反腐运动中落网并落马。

问题在于，这样的策略究竟反映了这个政权的优势还是劣势。考虑到缺乏透明度，这很难说。我的猜测是，早已抛弃马克思的中国统治阶级，正在努力追求*某种*理想或原则，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就这一点而言，习显然是在以牺牲党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自己的权力。强硬的镇压可能只是这个体制的黑社会性质的一个因素。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中国消极进取的地缘政治姿态上。这些举动可能反映了中国内部的分歧和疑虑。

无论如何，开明独裁者的概念，加上恰到好处的镇压，都是知识分子的幻想。现实是糟糕的选择。中国政权靠经济繁荣生存，而经济繁荣要求信息自由流动。但迟早，经济会开始摇摆——信息应该被允许流动吗?习已经要求中国媒体“正确引导舆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我看来，他听起来就像一个处于守势的政客，处于旋转模式。每年中国政府都会承认数千起“群体性事件”和罢工:与我们其他人不同，习知道它们的实际数字。中国约有7亿人上网，其中90%的人通过最具颠覆性的设备——智能手机上网。中国的精英们正在骑着老虎，他们知道这一点。无论这种陈旧的权力结构未来会带来什么，它都不会比朝鲜或古巴更有可能在21世纪提供逃离自由民主的路线。

那么，俄罗斯的普京，这个据说有“摧毁西方的计划”，并且以惊人的(如果是猜测的话)展示权力和狡猾的方式操纵了从美国总统选举到石油价格的一切事情的人，又是怎样的呢?56

在分析普京的进展时，我承认我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我对这个人和他的国家背后的现实的感知与公认的智慧和许多学术思想截然不同。在我看来，阴影与对象完全不成比例。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于西班牙。人均GDP与石油市场同步下滑，2016年的排名正好排在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之后。俄罗斯人口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减少了500万，这是低出生率、高堕胎率和零移民的结果。男性的预期寿命与卢旺达相比也不尽如人意。在“普京出走”中，许多俄罗斯最有才华的人离开了这个国家。

普京指挥着包括核武库在内的庞大军事机构。他可以处置俄罗斯石油产生的财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狡猾而善于操纵的人，他不希望美国、欧洲或自由民主国家一切顺利。但我请求你，好读者，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种尺度感。本着这种精神，我将继续往下讲。选举黑客事件——普京谜题的核心——我将推迟到更全面地讨论“假新闻”和

“后真相”。在这里，我打算坚持我的问题:在当前的信息条件下，普京的独裁风格——我称之为第五波——是否比旧的民主国家变得更强大、更具威胁性或更具诱惑力?

可以说，普京的风格类似于黑手党教父。普京不是斯大林，但在反对他之后死于暴力的人的名单——亿万富翁、记者、政治对手——令人印象深刻。[57]这一切都是生意，而不是个人(或意识形态):而且涉及的金额是惊人的。2016年4月对一家离岸律师事务所的黑客攻击揭露出，普京的一位老朋友，一位收入不高的大提琴手，曾为总计20亿美元的秘密交易做过掩护。[58]

普京对自己的描述则截然不同。他属于一个我称之为*否定独裁*的阶级:埃及的塞西(al-Sisi)、土耳其的埃尔多安(Erdogan)和委内瑞拉已故的雨果(Hugo Chávez)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共同的线索是一种蔑视和更新的修辞。独裁者从一个凶残的掠夺者变成了一个孤独的英雄，与势不可挡的逆境抗争。面对他的恶棍是某种全球化恶意的大杂烩，而美国通常是幕后操纵者。

对普京来说，敌人是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联盟。这个阴谋集团的目的不亚于“瓦解和肢解”俄罗斯[59]“我们的对手希望看到我们分裂，”他在2007年说。“一些人想要拿走和分裂一切，另一些人想要掠夺....那些想要对抗我们的人需要一个软弱和病态的国家。普京的职业生涯始于苏联这个庞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他觉得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曾经是超级大国，而现在不再是。颓废和解体的幽灵，失去荣耀和伟大的幽灵，已经开始困扰那些远没有俄罗斯麻烦的国家的政治:在不同的背景下，它帮助特朗普和马克龙上台。普京的描述以美国领导的苏联解体开始，以俄罗斯的反抗性重生结束。

黑手党老大和俄罗斯伟大的复辟者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矛盾。两者都导致了对普京的美化和对权力的崇拜。俄罗斯过去几年的对外冒险，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析。

硬汉普京进入克里米亚、乌克兰和叙利亚，利用当地的弱点，展示出异常被动的巴拉克·奥巴马。普京帝国重申了历史上俄罗斯对黑海和东地中海的主权要求。其目的始终是吓唬和打动全球精英——迫使他们承认俄罗斯独裁者是世界历史的参与者。在美国总统大选过后的混乱中，这一愿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尽管他自以为是的残暴，普京仍然保持着令任何美国政治家羡慕的受欢迎程度和支持率。塞西和埃尔多安也是如此，Chávez也是如此。这种奇怪的情况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对国家媒体讲述的故事的控制。例如，俄罗斯媒体喜欢把骨瘦如柴的普京塑造成动作英雄的形象。埃及的记者可以不为塞西的“完美外表”和“强大力量”而脸红。[62]然而，对信息更加严格的控制并没有改善习近平和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我们这个模棱两可的历史时刻的关系。普京、塞西和他们这类人相信(可能是真诚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与外国精英主导的既定秩序进行殊死搏斗的战争。他们的目标是斩杀民族颓废的巨龙，终结这个不幸福的时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利用公众反抗所释放的爆炸性政治能量:俄罗斯、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普通民众对现状的愤怒和绝望。他们的斗争是公众的斗争，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对现状的否定，以及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废除现状的愿望。

虽然与公众的情绪是一致的，但对否定的独裁统治的最好理解是一系列的国家事件，缺乏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无法将自己转变为自由民主的严肃对手。例如，普京在俄罗斯为危机辩护的做法与埃及的塞西(al-Sisi)的做法完全不同，两者都无法出口。否定的推力也有一种逆行的性质。独裁者在现代政府中承担着等级制度的负担。他将被期望解决他不知道如何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为消息灵通和有争议的公众带来幸福。失败只能归咎于敌人这么长时间。



作为动作英雄的独裁者 —

我再次强调比例的重要性。俄罗斯和埃及的经济经常在神经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普京，这位动作英雄，受世界商品市场的摆布。塞西虽然有巨大的力量，却必须去乞求海湾石油王国的施舍。其中一个国家的未来可能类似于雨果Chávez在委内瑞拉留下的巨大残骸。即使前面的路不那么可怕，独裁统治的结构性现实仍然没有改变。威权主义恰恰夸大了那些公众所反抗的精英行为——而且它无法否定自己。普京和塞西注定要在虚无主义时代的漩涡中挣扎。他们既不是这个时代的主人，也不是剥削者。两人都渴望回到冷战的辉煌岁月:他们的未来已经成为过去。

所以，我不认为专制统治者在当前条件下会繁荣昌盛。2010年代与上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是对我问题中“海外”部分的明确回答。习近平可能会在亚洲秀肌肉，但是

他知道战争将释放国内的激情，这可能会摧毁他摇摇欲坠的平衡政权。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可能会在他摇摇欲坠的帝国边缘玩大国游戏，但他入侵欧洲的可能性并不比西班牙大。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假装是民主的竞争模式:事实上，它们是老式的工业时代等级制度，意图掠夺自己的人民。两者都没有被“合法化”。乘着数字风暴，躁动不安的公众，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对每一个大型权力集合体怀有敌意。在这场冲突中，首先被推翻的，是中东地区久经沙场的独裁者。

独裁主义*似乎*正在推进，因为民主国家有如此多的精英人士这么说。出于同样的原因，民主似乎正在黑暗中消亡。失望的根源是精英阶层的灾难，特朗普的当选:而分析的焦点现在必须转移到美国政治上，才能回答我问题中“在家”的部分。

* * *

2017年8月11日，白人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团结右翼”游行，反对拆除联邦纪念碑的计划。参与游行的令人讨厌的极端分子中，有与《每日风暴》(*Daily Stormer)*网站有关联的新纳粹分子、新南方联盟(new confederate League of the South)以及三k党的成员。按照纽伦堡的精神，火炬游行是预料之中的——但这是一场自带火炬的派对。“每个人都应该带自己的火炬，这些火炬可以从当地的沃尔玛、洛斯、家得宝等商店买到，”这是组织者的有益指示。“Tikki(原文如此)火炬就可以了。[64]

人群的规模很难重建，但抗议者可能有数百人。规模稍大的反抗议者人群包括反种族主义的教会和进步团体，但也包括工人世界党、黑人的命也是命和乡巴佬反抗的强硬街头战士。8月11日晚上，一场即兴的提基火炬游行没有发生严重事故。然而，第二天，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早早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来自六个司法管辖区的警察人数可能超过了这两个群体，但他们都没有受到伤害。下午1点41分，一名20岁左右的新法西斯同情者驾驶他的道奇挑战者(Dodge Challenger)冲入反抗议者人群，造成一名年轻女子死亡，多人受伤。在这个视觉时代，一如既往，整个恐怖被捕捉了下来

在视频和网络上传播。

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散漫的评估，内容包括:

> *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仇恨、偏执和暴力的恶劣行径。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真理:无论我们的肤色、信仰、宗教或政党如何,我们首先都是美国人。*[65]

对总统令人困惑的声明，几乎普遍的解读是，他把夏洛茨维尔的受害者与凶手放在了同一地位，并“向白人至上主义者眨了眨眼睛和点头”。几天后，特朗普又火上浇油，坚称并非所有抗议者都是“新纳粹分子和白人民族主义者”，还包括“双方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人”。[67]

对于那些认为美国民主在选举日已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现在公开成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纳粹的产物。塔-内希西·科茨写道:“他的意识形态是白人至上主义，充满了暴力和伪善的力量。鲍勃·伯内特写道:“特朗普现在拥有白人至上主义。”[69]在推特上写道:“特朗普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的周围基本上都是其他白人至上主义者。”[70]“数千万”特朗普的支持者是“默认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或者说，他们是被新纳粹宣传“招募”的。[71]

有一段时间，精英新闻媒体迷恋上了一个罕见的、正在消失的物种:美国纳粹。《*纽约*时报》讲述了《美国心脏地带的仇恨之声》(The Voice of Hate in America’s Heartland)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即将结婚的年轻人，他恰好是“隔壁的纳粹同情者，在可接受的政治活动的旧界限似乎在惊人地变化之际，彬彬有礼、低调低调”。自然，唐纳德·特朗普“为像他这样的人打开了一个空间。[72]年，几乎与此同时，《*大西洋月刊*》发表了《美国纳粹的形成》(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Nazi)，聚焦于《每日风暴报》(*Daily Stormer)最令人反感的撰稿人之一*。特朗普的名字出现了39次，比如，举例说明:“[H]正在写一些。

帮助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同样的焦虑和怨恨——主要是在白人男性中被认为失去了地位。[73]

如果说俄罗斯和普京是将不可能的特朗普送上权力舞台的那只隐藏的手，那么在精英们狂热的头脑中，纳粹就代表了这种操纵的可怕结果。

由学者、权威人士和纯粹*的灾难传播者撰写的*哀叹我们政治*制度衰落的*书籍*充斥着*市场:*《民主是如何消亡的》;破碎:参议院能拯救自己和国家吗?;能在这里发生吗?美国的威权主义;人民与民主:为什么我们的自由受到威胁俄罗斯轮盘赌:俄罗斯对美战争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内幕;《通往不自由之路》;*当然还有*《特朗普政治:美利坚共和国的腐败》。*这些书都*是*2018年出版*的。*可以引用大量更早*的书籍。*

我们该如何理解如此惊人的悲观情绪呢?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这种悲观情绪主要是由精英驱动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有同样的感受——但精英们拥有制度的麦克风，并发出巨大的噪音。如果特朗普对精英权威构成了生存威胁——如果他*被认为*构成了这种威胁——那么不难想象，那些长期管理和拟人化我们的统治机构的人，会把这种威胁投射到整个体系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意味着由最优秀的人统治。威权主义看起来像是野蛮人的入侵。

第二个观察是，这一切我们以前都听过。特朗普在就职前就是希特勒。从一开始，他就呼吁按照纳粹占领法国的模式进行抵抗。对于精英们来说，夏洛茨维尔和类似的事件是一种证实，而不是一种启示:特朗普，这个白宫的野蛮人，只是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

现在似乎是回到我的分析性问题的合适时机，这个问题是从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痛苦呼声中提炼出来的。简而言之:美国现在受到一个专制的独裁国家吗?如果不是，它是不是在朝着这个目标蹒跚而行?唐纳德·特朗普是推特版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三k党的大巫师?我们能否引用吉鲁指控的经验证据——新政府试图“监禁反对者”，并参与“国家暴力”？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既不支持也不抵制唐纳德·特朗普。我在进行分析。我将把总统的行动和政策与他的对手的指责和谴责进行比较。请注意，我也不是在支持或抵制等式的另一边。我想要的是一篇论文，解释特朗普在提高巨大的悲观合唱的分贝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有的话)。

我们的任期已经过去了12个多月。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特别检察官对与俄罗斯勾结的调查仍在继续。我不会预先判断这件事，只是要指出，作为通往独裁的道路，“弗拉基米尔·普京把我放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选择。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别的了。希拉里·克林顿没有被起诉。正如迈克尔·巴隆(Michael Barone)所写，“我们没有关押记者的政治监狱。[74].总统的旅行禁令仍在法庭上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本能没有安德鲁·杰克逊那么专制，更不用说墨索里尼了。他承诺在墨西哥边境修建的隔离墙仍然没有得到国会的拨款，这是一场彻底传统的移民争论的一部分，民主党在这场辩论中赢得了重大让步。“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尝试，在共和党这头头太多、矛盾声音太多的野兽的结构性现实下，失败了。

从证据上看，我看不出美国正踉踉跄跄地走向威权统治。但我想在这一点上展开论述。当我审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时，我发现很少有人支持这样的论点，即他们的政府正变得越来越暴力或专制。至少在老牌民主国家中，相反的情况更接近事实。民主政府害怕公众的不满。他们明白公众给政治带来的沉重的生存负担，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失败将被数字放大的确定性。他们的行为与威权主义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走向功能失调的趋势:走向瘫痪。

希腊的齐普拉斯和意大利的伦齐下台的原因是软弱，而不是权力意志。用“瘫痪”来形容西班牙政府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功能障碍”描述的是脱欧后英国的混乱、默克尔在德国的衰落、政党的崩溃、欧盟和民族国家的缓慢解体。在社交媒体时代，像法西斯主义这样的群众运动很难维持下去。普通的威权主义者

独裁需要不太可能的军事或安全部队的配合——这只有规模庞大且日益壮大的阴谋论者才能看到。

在目前的信息条件下，民主面临的危险不是上述任何一件事:而是虚无主义在公众中的传播，以及精英阶层的士气低落，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权威的任何要求。

2017年8月发生在夏洛茨维尔的事件符合这种模式。与选举后大规模的反特朗普抗议活动相比，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人数微不足道。他们和他们的“反法西斯”对手是公众逃到异国情调的同一性岛的例证:因此，他们是美国政治破裂的证据，而不是暴力群众运动接管的证据。然而，这些团体*确实*占领了夏洛茨维尔的街道。起因是当局的退位。该市的民选官员在反对种族主义抗议者的愿望和维护和平的职责之间犹豫不决。警察本可以压制任何骚乱，但他们觉得自己的存在实际上会煽动暴力。在发生汽车袭击事件的十字路口，只派了一名学校交警。由于担心自身安全，她很快就被撤职了。市政府委托对事件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坦率地指出:

> *8月12日,夏洛茨维尔市既不保护言论自由,也不保护公共安全。该市无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无法为许可证持有人的攻击性言论提供便利。这代表了政府核心职能之一——保护基本权利的失败。执法部门也未能维持秩序,保护公民免受伤害、伤害和死亡。*[75]

这就是权力的危机，只是程度不大。被民主精英们抛弃的空间，立即被宗派战争团伙占据。顾名思义，这些组织都不是按照老式法西斯路线组织起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性现实。据我们所知，在夏洛茨维尔驾车冲入人群的20岁男子并没有听从他的上司或其他人的命令。他的行为是出于一种冲动:杀戮和破坏的冲动。那些关心民主未来的人，与其追逐纳粹或其他历史幽灵，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年轻人身上:那个虚无主义者，他满怀激情地相信，毁灭和屠杀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 * *

虚无主义的*冲动*——*想*要摧毁一切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候选人，特朗普说了一些令人发指的话，做了一些令人发指的事。他践踏了每一个将总统选举过程神圣化的禁忌。这对他有利。他被认为是数百万“可悲的人”手中的一个有价值的俱乐部，这些人想要打击希拉里·克林顿、政治正确和统治精英。

问题是，当政的特朗普总统是否继续充当着否定的代理人和虚无主义冲动的载体。我们知道，这位总统是偶像的粉碎者和建制派的粉碎者。但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证明他在某种意义上曾动用国家的巨大权力来反对自己:以随意的放纵和不顾后果的方式，打击他所主持的机构。

答案将完全取决于你是在观察政府的行为，还是在分析总统的言辞。

一年过去了，很明显，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和政策，与泰德·克鲁兹(Ted Cruz)甚至杰布·布什(Jeb Bush)的竞选团队实施的行动和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从共和党和保守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行动和政策似乎完全符合主流。在移民和税制改革方面，在他的司法任命和反监管热情中，总统遵循的是他之前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习惯性认可的处方。

在外交政策上也大致如此。除了强烈倾向于保护主义之外，特朗普在北约和联合国(比如中国和阿富汗)问题上的方式与共和党的常规做法非常接近。他不像乔治·w·布什那样干涉主义，但却比巴拉克·奥巴马更具侵略性——比如在ISIS、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尽管有很多关于操纵的言论，但在他任期的这个时候，他对俄罗斯的态度可能比他的前任更强硬。[76]

反建制的特朗普之所以奉行传统的共和党保守政策，我们不必在这里赘述。我只是想

确定事实。要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引用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人士的热情洋溢的赞美——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就在我的脑海里——但我发现转向另一个来源更有说服力。“绝不要特朗普”是保守派知识分子在选举期间形成的运动。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家和精英阶层一样，对总统的性格深恶痛绝。许多“绝不要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大多数人仍然不甘心。

因此，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勉强证词是有价值的。

诺亚·罗斯曼(Noah Rothman)曾写过“特朗普大嘴造成的损害”，但他承认，总统“不是作为民粹主义煽动者，而是作为传统的共和党人”来执政。《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绝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的罗斯·杜特(Ross Douthat)有些惊讶地观察到，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接近于我对一位正常的共和党总统的期望”。[78]“绝不要特朗普”阵营的另一名成员里奇·劳瑞(Rich Lowry)承认:“很难想象一个传统的共和党总统会做得更好。”[79]

—

从这些评价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并不是国家自我毁灭的例子。这不是虚无主义在起作用。不管是好是坏，掌权的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

第二个观察与这些反特朗普知识分子使用的“正常”和“传统”这两个词有关。这些话令人震惊，因为从来没有人用它们来形容唐纳德·特朗普这个人——没有人用过，也没有人用过。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特朗普说过和做过令人发指的事情。他要求、也接受了不可能达到的高度的关注——他用不正常、不传统、不主流的言辞兑现了这种关注，事实上，这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位首席执行官的经历。

特朗普已经掌握了网络的虚无主义风格。在我看来，这是他与众不同的最重要因素。他的对手用行话和陈词滥调说话。他滔滔不绝。他攻击、侮辱、谴责，在错误的陈述上加倍下注，从不后退一步，从不道歉。他不喜欢的每个人都是骗子(参见“撒谎的泰德·克鲁兹”)，小偷(参见“狡诈的希拉里”)，“荡妇”，“花钱买来的”，相当于儿童猥亵者。这就是美国人

政治被描绘成最后的地狱:人民的背叛，来自人民的背叛，反对人民的背叛。从字面上看，这意味着我们机构的任何一根支柱都不应该屹立不倒。这句话出自一位总统之口，给人一种国家正在吞噬自己的感觉。

就在不久之前，这样的言辞攻击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今天，它们只有在作为我演讲主题的伟大斗争的背景下才能取得成功。回想一下，公众是本着否定和否定现状的精神动员起来的。他们对积极的改革计划不感兴趣。因为反抗的动力诞生于数字世界，它继承了网络特有的风格——在这个地方，每一次政治争端都以淫秽言论结束，而且经常以死亡威胁结束。公众已经接受了这种义愤填膺的语言。它也在大声疾呼。

特朗普的夸张言论似乎与这种环境非常合拍。但他也在玩一种政治策略。

被反建制浪潮席卷上台的政客们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困境。一旦进入政府，他们可以继续对体制进行抨击——但这将损害经济，进而影响他们的声望。或者，他们可以转向主流，与精英妥协——但这将破坏他们的信誉，疏远他们的支持基础。很少有人能找到走出迷宫的方法。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依次尝试了每一种方法，但都失败了。

特朗普政府古怪的精神分裂风格，作为试图摆脱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变得可以理解了。作为否定的代理人当选的特朗普总统，现在必须推行积极的政策和计划。他采取的任何方向都会疏远他的一些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否定而团结在一起的。对主流的偏爱会疏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统的声音响亮而粗俗，就成了政治战团集结的信号。争论的主题往往是与政策无关的精英行为:比如媒体上的“假新闻”，或者NFL球星在奏国歌时下跪。那些反对特朗普的人抵挡不住愤怒的诱惑。他们的回应往往比冒犯性的信息更大声或粗俗，有时甚至更暴力。[80]

另一边的团体，现在被煽动到大声咆哮的模式，条件反射性地团结起来为总统辩护。

我在其他地方描述过这个过程。这是一场争夺注意力的零和斗争，奖励的是最不节制的声音——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是这场游戏的大师。他肆无忌惮的语言动员了他的反精英追随者，即使他的政策吸引了更“传统”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

从政治上讲，这是一场没有网的走钢丝。特朗普从来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候选人。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总统。为了保住自己的选民基础，他必须激起反对派的疯狂厌恶。普通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把总统视为他所有咆哮的总和。对于我们那些对正在进行的游戏毫无头绪的困惑和士气低落的精英们来说，唐纳德·特朗普看起来有点像《启示录》中的野兽，是混乱的末日的标志。通常善于反思的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写道:“在咆哮的暴民面前滥用民主制度，从而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一点也不现代。这是有抱负的独裁者一直在做的事情。[82]

但独裁者不处理推特。特朗普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格: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与体制没有利害关系，对历史一无所知，对我们的政治习惯和传统不感兴趣，但却乐于抨击和打破旧的、珍贵的东西，以换取一点关注。

所以，我最后一次回到我的问题上来——只是现在的答案为危言耸听者提供了支持。然而，自由民主所面临的困境，既不是复活的希特勒主义，也不是操纵性的普京主义。它甚至不是特朗普主义，除非是一种温度计的读数。问题出在*我们身上*:我们随时准备从网络上归纳出与任何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都不相符的敌意和侵略程度。我的意思是说，通过大量接受特朗普，公众已经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愿意将社交媒体不受约束的关系强加于脆弱的美国民主形式。

假新闻、后真相，以及为虚无主义者开辟道路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可以说摧毁了知识分子

新闻业的基础。为了更崇高的事业，客观性的伪装被抛弃了。提供“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的说法，现在因未能把握竞赛的形式和结果而遭到驳斥。关注新闻的人都不了解其中的各种力量。没有人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除了娱乐或习惯，继续阅读新闻似乎没有任何正当化。

媒体界的人茫然不知所措，士气低落，他们随意地试图解释这场灾难。他们并不擅长这个游戏:一个真正处于广播模式的职业不应该被期望擅长自我审视。有些人希望通过对特朗普这个黑暗大陆的探险，重拾权威的外衣。《*纽约*时报》的公共版编辑在第二天早上写道:“随着《时报》开始一段自我反省的时期，我希望它的编辑们能认真思考一下它很少*报道的那*一半美国人。”其他一些人仍然不甘心。新闻学教授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在推特上写道:“我责怪我的职业未能告知它所服务的公众。”他绝不是唯一一个认为“信息”是“特朗普”的解药的作者。[84]

这种自我批评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选举结束8天后，*Buzzfeed*发布了一篇冗长而草率的分析文章，做出了以下断言:

> *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三个月里，Facebook上表现最好的假新闻比《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赫芬顿邮报》、NBC新闻等主要新闻媒体的头条新闻产生的参与度还要高……*

在前20条假新闻中，“除了3条外，其余都是公开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或反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假新闻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但确实发出了不祥的警告:“这些新数据说明了Facebook上假选举新闻的力量。[85]

四天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假新闻是如何走红的:一个案例研究》。[86]该案涉及Twitter上的一则虚假报道，该报道试图抹黑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反特朗普抗议活动。随后，媒体对假新闻的曝光异常频繁，其中大多数都暗示，虚假新闻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大选，但从未完全肯定过

大选获胜。《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一篇文章称，这篇文章揭露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这名操纵者在传播有利于特朗普的假新闻方面的作用。

> *追踪这一行动的独立研究人员表示,这次选举季的"假新闻"浪潮得到了俄罗斯一场复杂的宣传运动的支持,该运动在网上制作和传播误导性文章,目的是惩罚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帮助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并破坏人们对美国民主的信心。*[87]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被引述说:"这就像是俄罗斯在为特朗普的竞选运作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它起作用了。"

如果假新闻欺骗了大众，让他们选择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而憎恨民主的老练的俄罗斯人要为假新闻负责，那么2016年的一个解释已经找到，可以为新闻媒体开脱。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问到，*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假新闻，而不相信真实的新闻。人们对新闻作为一种制度的信任已经崩溃。新闻作为一种商业，是公众对工业时代等级制度攻击的第一个牺牲品。网络上的信息以一种自然状态存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是由模糊的算法优先级构成的。所有这些都清空了"新闻"作为一类信息的意义:但它们都不值得太多考虑。

谎言的盛行和俄罗斯在选举中阴谋的重要性成为了规范。新闻行业觉得有理由迈出最后合乎逻辑的一步:实际上，从调解的边缘跳到倡导的边缘。

在与网络主播的一次私下会面中，特朗普被问到，当上总统后，最让他惊讶的是什么。"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的报道，"他回答说，对媒体的关注一直很关注。"事实是，它从来没有变得更好。[88].他是对的。对总统的负面报道一直在90%左右徘徊。一项研究显示，2017年主流新闻媒体报道的首要问题是特朗普政府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之间的勾结。[89]报道的基调更加片面。当然，是媒体给了我们把特朗普讽刺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

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是媒体把每一天都变成了美国民主的最后一天。曾经垄断网络政治的愤怒——也毒害了总统自己的许多言论——现在从老式报纸的墨迹页上喷涌而出。

选择了一方:“美国的另一半”将被抛弃。至少在短期内，这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商业决策。特朗普总统喜欢在推特上谈论“失败的*《纽约*时报》”——但自从他当选以来，这份报纸的订阅量比前一年增加了十倍。有线新闻网的收视率在2016年出现爆炸式增长，2017年继续飙升，其中一些新闻网一直在努力寻找观众。这一点在各大电视台都是如此:福克斯、CNN、MSNBC。有一半的美国人是一个庞大的顾客群——而唐纳德·特朗普这个政治上的孔雀似乎总是很有卖点。人们对新闻的信任度甚至有所上升，从不到20%上升到27%左右，因为民主党人和特朗普的其他反对者认为媒体是一个可靠的盟友。92

但是新闻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媒体精英们和世界各地的精英们一样，被一种想要推翻2016年大选结果的狂热梦想所驱动。他们迫切希望回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的现状，他们愿意像特朗普一样，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抨击自己的标准，甚至民主进程。我看不出，从激进反应的姿态来看，怎么可能重新树立新闻媒体作为诚实的信息掮客的理想。当记者们批评特朗普总统真正具有破坏性的言论爆发时，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被独立的人当真。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用一种部落侵略反对另一种部落侵略，用虚无主义反对虚无主义。



11.4有线新闻与特朗普效应[93]

霍华德·库尔茨(Howard Kurtz)总结了这场冲突:“唐纳德·特朗普正在把他的总统职位押在摧毁新闻媒体的可信度上，就像他在选举中所做的那样;而媒体也决心为他做同样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可信度并不一定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总统和包括媒体在内的机构都把自己的权威剥掉了，只剩下一片愤怒和否定的遮羞布。“说到底，这是一场关于真相的斗争，”库尔茨总结道。[94]但这实际上是一场争夺统治地位的战斗，是在一片黑暗的平原上进行的，在那里，真理一旦遭遇，就被严格地当作武器来使用。媒体沉迷于俄罗斯和假新闻，以破坏总统的合法性。总统更擅长这类事情，他偷了这句话，现在把它随意地用在那些新闻媒体上——*纽约时报*、cnn——在他看来，这些媒体与他的政敌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想回避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即老练的俄罗斯人是否真的试图用假新闻操纵选举。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而且后果几乎为零。《*华盛顿*邮报》那篇文章所坚持的那种“复杂”——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完全是专业化和技术性的。比如，一篇关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身患绝症的报道就能获得大量点击。它与说服无关，与改变想法无关。尽管关于假新闻的声音和愤怒不绝于耳，但没有一丝证据表明它们影响了选举结果。

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对网络媒体选举报道的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尽管假新闻——捏造的、可核实的虚假报道——在选举期间是一种现象，但根据我们的发现，它对总统选举的媒体生态系统影响不大。”[95]

信息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但我们很少因为在网上读到的一个故事而改变我们的核心信仰。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都是如此。在影响力问题上，假新闻和真新闻的区别也趋于消失。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回答有关Facebook在选举中所扮演角色的问题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他，他说:“选民根据实际经验做出决定。[不出所料]，扎克伯格的这一言论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被迫收回了这一言论。

* * *

大选后对假新闻的恐慌很快就硬化为一种普遍的自我欺骗理论。该账户说，舆论已经脱离了现实，民主现在正蹒跚地进入“后真相”时代。这个短语在英国退欧后首次流行起来，并一直保持着浓郁的英国风味——《*牛津词典*》将“后真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但促成这一协议的，是美国总统大选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诽谤性言论。

《*牛津*词典》将后真相定义为“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的情况”。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字面定义。“后真相指的是明目张胆的谎言在整个社会中司空见惯，”一位学者解释说，“这意味着政客可以撒谎而不受谴责。[97]《*经济学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点名了那位政客:

> *……后真相政治不仅仅是被包抄的牢骚满腹的精英们的发明。这个词道出了新事物的核心:真相没有被证伪,也没有受到质疑,而是次要的。曾经,政治谎言的目的是制造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的谎言就不是这样起作用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说服精英,而精英是他们的目标选民*

neither trust nor like, but to reinforce prejudice. [98] —

看到这个词如此迅速地在我们惨淡的政治环境中找到一席之地，令人沮丧。对于代表自由派和进步团体的精英舆论来说，后真相成为了解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空翻当选总统之谜的最终答案。这些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假新闻转移成了虚假意识:于是就有了特朗普。“后真相的做法——不真实的断言堆积在不真实的断言上——帮助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露丝·马库斯(Ruth Marcus)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宣称*。“他说的谎言越多，他的支持者就越奖励他，因为在他们看来，他就是实话实说。[99] .我认为，这句话中发自内心的绝望，掩饰着一种解脱。2016年的精英灾难现在与经验现实完全脱节了。

对于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后真相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新闻媒体、娱乐行业和大学中由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主导的信息环境。这些人想起了《纽约时报》一个著名的标题——“虚假但准确”——关于一篇批评共和党总统的报道。他们坚持认为，“前真相”和现在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在是另一方提出了这个话题。[100]

所以后真相的意义本身就有待商榷。

一个公平的问题是，这场小冲突在我的故事中是否有一席之地。我想说的是，它确实有一席之地:后真相是一种社会轨迹的笨拙标签，它越过破碎的地形，通向虚无主义者和他的噩梦，再往下，通向决定当前精英阶层命运的有争议的领域。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我们大部分被调解的现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政治——已经沿着多条线断裂。我在上面说过，数字现实已经被喧嚣所吞噬，日常生活也越来越数字化。这是一个*真相者*、*否认者*、出生地质疑者的*时代*。我被我们不断提出“字面上”这个词的方式所震惊，就像一个破旧的盾牌——比如“特朗普实际上是希特勒”。我们不倾向于把我们的意志与世界分开。

一种深刻的道德和政治迷失把我们跌跌撞撞地推到了这个地方。问题是，精英们对后真相的抱怨是否有意义

解释。我们有英国退欧和特朗普的证据:因此，我们能说民主已经堕落为谎言帝国吗?这里有两个精英的说法特别有趣，值得深入思考:互联网是“后真相的最终载体”，以及以特朗普总统为先锋的某些民粹主义政客，现在用欺骗来传达一种对公众偏见的“残酷同理心”。[101]

让我们依次考虑。

从一开始，精英们就把网络视为一种生存威胁。老师们禁止学生品尝这种禁果。五角大楼不顾一切，封锁了大楼内的社交媒体。新闻媒体声称要在记者和公众之间插入一层层的编辑和事实核查员，他们经常把网络描绘成所有谎言的母亲。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并发表。散布谎言，即使是意向性的，也不会受到惩罚。

在网络的实际发展过程中，真假已经不如喜欢或不喜欢、加好友或取消好友、关注或取消关注那么重要了。伟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不遗余力地“收获你的注意力”——泽伊内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的说法——把你推向志同道合的人，告诉你你已经知道的事情，给你你一直想要的东西。[102] .用马修·德安科纳的话来说，其效果就是“在线聚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公众已经起来反抗现有的秩序，而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决心捍卫*部分*现状——某种同一性或自我认同的来源，这种来源是不容怀疑或改变的。无论其准确性如何，强化同一性来源的网络故事都被视为灵魂的养料。它们从外部确认了一种主观秩序。只有这样，特朗普才能真正成为希特勒。

这种发展在很多层面上都令人不安，但它不能用来解释激进的政治变革——例如，从民主转向威权民粹主义。网络的引力把我吸引到自己身上。社交媒体巩固了我的个人现状。我被鼓励对自己的观点感到沾沾自喜和确定:无论我消费什么谎言，我都已经相信了。改变需要我对以前的观点感到不满，需要我*离开*过去的自己。这在网络上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数字内容的愤怒和咆哮

预设了对机构权威的信任丧失，精英们关于后真相的想法似乎被合理化了。

在更广泛的网络谎言问题上，安德烈·米罗什尼琴科在他精彩的小书《*作为媒介的人*》中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米罗什尼琴科认为，一个永远在网上工作的“病毒式编辑”:一个“互联网的分布式存在，一种由每个用户组成的人工智能”，它执行许多与媒体声称的事实核查和审查相同的功能。米罗什尼琴科认为，数字世界并非对真理与谬误漠不关心:

> *如果一个谎言意义重大,它就会流传下去,直到它到达目击者和专家那里,他们会谴责它,因为他们知道真相。如果谎言微不足道,没有人会谴责它;但它不会流传。*
>
> *网络上每一个谎言的例子,其实都是这个谎言被揭露的一个例子。*[104]

这是我认为普遍有效的论点的有力版本。例如，如果假新闻成为2016年竞选活动的一个突出部分，它就会被曝光并爆炸。如果没有被曝光，那是因为它从未跨越公众的认知门槛。从政治上讲，这无关紧要。与网络相关的后真相描述了大量精心制作的谎言，但几乎没有欺骗，几乎没有影响。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捏造的同理心怎么办?总统站在后真相的漩涡中心——而且并非没有正义。他会说(或发推文)任何能让反对派震惊到愤怒的事情。当涉及到选民欺诈、他的支持者规模、失业率和谋杀率，以及其他很多很多话题时，特朗普都忍不住要把现实扭曲到他的主题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总统的谎言进行了统计——2018年1月，《华盛顿邮报》带着一定的兴奋报道称，总统已经突破了2000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的门槛。文章接着写道:“总统任职的时间越长，他就越频繁地兜售各种夸大、可疑或虚假的说法。[105]

然而，在精英的想象中，后真相涉及谎言“塑造”的力量

“迎合偏见”。我不确定特朗普的捏造是否符合这个计划。它们骗过的人很少，除了引起注意之外，效果从来都不讨人喜欢。在选举前后，大多数美国人对他持负面看法。在2016年5月的一项调查中，6%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喜欢他本人，只有43%的人认同他的政治立场。这些选民主要是受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敌意驱使。[106]对11月投票给特朗普的人的调查发现，他们的观点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在移民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的观点高度分化。候选人特朗普的谎言如何在如此多样化的群体中发挥作用，将很难确定。[107]

事实上，很难衡量欺骗对选举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论证这对2016年总统大选的影响很大，你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仅仅说，“但他撒谎了——而且他赢了”，虽然作为一种描述足够准确，但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

后真相时代的精英愿景最终建立在一个谬论之上。它假设，曾经有一段时间，选民根据某种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计算行事，不受“情感和个人信仰的呼吁”的影响。想想马修·德安科纳(Matthew d’ancona)对英国退欧支持者使用的策略的谴责:“这是最纯粹的后真相政治——保守党的胜利。
本能战胜了理性，看似简单的战胜了真正复杂的。但事情总是这样。所有狡猾的独裁者，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通过诉诸原始情感来说服别人的——但从伯里克利到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等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也是如此。人类的说服就是这样起作用的。

乔纳森·海特是当代美国心理学中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人之一，他用“大象”来比喻我们强大的激情和本能，用无助的“骑手”来比喻理性化的智力。然后，他总结了关于说服的最新研究:

> *大象什么时候会听道理?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改变想法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我们不善于寻找挑战自己信仰的证据,但其他人会帮我们这个忙,就像我们善于发现错误一样*

在别人的信仰中。当讨论充满敌意时,改变的可能性很小。大象远离对手,骑象人疯狂地反击对手的攻击。

但如果有感情、钦佩或取悦对方的愿望,那么大象就会向那个人倾斜,骑象人就会试图在对方的论点中找到真相……[109]

——

连支持者都不喜欢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的竞选中几乎没有机会改变选民的想法，无论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但这并不是我请海特来作证的目的。我的观点是关于精英阶层的。没有人对精英阶层有好感或钦佩之情。公众没有取悦他们的欲望:相反，他们在努力把精英们从高位打到尘土中。对于代表国家机构统治和发言的阶层来说，被剥夺权威——失去说服的能力——是一件令人痛苦和恐惧的事情。正如海特所料，精英们选择不质疑自己的世界观:相反，他们指责特朗普等民粹主义者的谎言。这就是他们的后真相观。

然而，我相信，这个词的含义可能比字典上的定义或精英们自私自利的否认要多得多。不过，为了梳理出其中的内容，我必须首先请你，读者，跟着我进入相当棘手的认知领域。

* * *

“什么是真理?”彼拉多问——但那是疯狂。事实从纯粹的柏拉图领域降临到我们身上，不受解释框架的污染，这种观念对现代想象力有着强大的控制力。例如，中央情报局(CIA)坚持认为，*它提供的是情报*，而不是政策。处理原始数据听起来更科学。但是，没有结构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呢?尼采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性主义的偏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理是一种阶级建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是权力的正当化。而柏拉图式真理之父本身就是“高贵谎言”的支持者。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里对真理的本质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千百年来的谜。我关心的是那些为政治生活提供必要的理由和解释的对现实的共同解释。我想说的是，a

权威危机必然会引发不确定性危机。公众手中过多的数字信息，活埋了许多曾经是我们共同意义源泉的宏大叙事。随着精英阶层的致命衰落，真相和其他很多东西一样，开始散架。

我想把我的条件说清楚。我不相信现实是可塑的、可变的或被建构的。现实就像警察的棍棒一样坚韧不拔。然而，与那个俱乐部不同的是，3.2亿人的*共同*现实是无法直接体验的:它是中介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精英们，甚至是他们管理的机构，一直是中介确定性和真相的仲裁者。政府处理社会“问题”，正确看待棘手的国家事件。新闻媒体挑选了一些话题和事件来引起公众的注意。科学机构就健康和其他专业问题给出了值得信赖的建议。

这些机构中的每一个都对自己领域内的信息拥有半垄断地位。他们是故事的守护者，这些故事向我们自己解释了我们。他们从上面说出权威的真理。

当调解人失去了合法性——当那些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故事失去了约束力时，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环顾四周:我们发生了。我们过去在世界上忠实地反映自己的一面镜子破碎了。伟大的叙事正在破碎成碎片。被认为是权威的东西正在转移到政治战争团伙和网络暴徒手中——也就是说，转移到民粹主义的突击部队手中，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被剥夺了解释事件和解决事实争议的合法权威，我们彼此疏远——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逃进了自己的头脑，进入了一种主体化的存在。我们拥有华丽而奇异的身份，并以曾经在凡尔赛戴过的巨大假发的方式来承担它们。

我相信，这就是今天如此盛行的不真实感或后真相感的来源。在对权威失去信心之后，公众转向了旧叙事和解释的碎片:那些否认所有其他真相的现实碎片，往往觉得它们难以理解。

让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审视一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谎。不出所料，他的对手谴责他是一个故意撒谎的人——事实也很可能如此。但特朗普的许多谎言似乎在政治上毫无意义。

他为什么要在自己赢的选举中抱怨选民欺诈呢?就职典礼人群的规模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另一个同样有问题的论点可以解释这种奇怪的行为。总统可能只是我们这个破碎时代的产物:他从特朗普式真理的碎片中主观上和象征性地说话。在那个世界和他的意志合而为一的浅薄的地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理由，来发表正义的咆哮。

至少总统要为他的2000条谎言负责。精英们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部分真相中，却似乎乐不可支地浑然不知。他们告诉我们特朗普是希特勒。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失败是谎言的阴谋。他们坚持认为，世界可以回到2016年11月之前的样子。最具破坏性的是，他们和特朗普一样，愿意摧毁本国制度的历史现实。例如，代理司法部长可以拒绝执行总统的行政命令。消费者机构的负责人可以否认首席执行官任命继任者的权力。一名无足轻重的外交官员可以写一封非常公开的信辞职，指示国务卿“止血”或“跟着我滚出去”。[110]

—

如果举着反对特朗普的黑旗，任何行为都不会太奇妙。在电视直播的格莱美音乐奖上，希拉里·克林顿被邀请朗读一本书，书中声称特朗普总统本质上是精神错乱的。一名女喜剧演员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她以伊斯兰刽子手的风格，拿着一个看起来像总统被砍下的头的东西。

真相，对于精英们来说，已经意味着民主将在黑暗中死去，除非民选的总统被某种方式推翻。

极端主义的疯子和怪人总是喜欢疯狂的阴谋论，而不是枯燥的现实。随着中介人阶层的崩溃，这种有毒的心态正在渗入主流。当*《风暴报》*的新纳粹分子看待美国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场针对白人的“种族战争”和控制政府的“肮脏的犹太恐怖分子”。那是一种伪装成真相的疯狂偏执。但是，当精英们看待新纳粹分子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小群渴望获得关注的偏执者:相反，他们看到的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掌权的可怕后果。纳粹变成了对特朗普的一种象征性判断——就像对特朗普来说，选举舞弊是对他的敌人的一种象征性判断一样。即使客观上是错误的，但这两种主张都体现了*应有*的真理。一旦那扇门打开，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开始发生了。非常自由的新闻媒体大肆渲染新纳粹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对他们的关注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让令人毛骨悚然的边缘人物看起来像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媒体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指出，大学里的真相越来越屈从于社会正义。对于“反法西斯分子”——自封为反法西斯组织的年轻成员——*来说*，现实世界是由一场*V字仇杀队*式的压迫与复仇情节剧构成的。反法西斯分子一直认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当代美国人的生活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一丝丝真理。在网络和战争乐队的圈子里，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

与精英阶层不同的是，反法西斯分子已经把对特朗普当选的抵制归结为合乎逻辑的结论:他们宣称，暴力必须以暴制暴。

> *不!以人类的名义——我们拒绝接受一个法西斯的美国!*
>
> *我们认识到,特朗普/彭斯政权是非法的,因为它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制止法西斯主义,这意味着必须带领数百万人民群众起来,把它赶下台。*[112]

这种革命的幻想还没有发生——但是已经发生了真正的暴力。蒙面黑衣的反法分子袭击了亲特朗普和右翼的集会。大学里的保守派演讲者被逼得沉默。2017年2月，伯克利发生了一场反法骚乱，目的是让一名这样的演讲者闭嘴，结果导致至少6人受伤，属性损失10万美元。



11.5对伯克利大学的反法观察113

真相的拆散使得民主事业的开展变得更加困难。随着我们飞得越来越远，我们只有在尖叫时才能听到彼此的声音。其结果(我重复一遍)是民主政府的瘫痪。在几乎每一次挑衅和暴力事件中，各级民选和任命的官员都选择扮演沉默的观察者的角色。在伯克利骚乱中没有人被捕。在夏洛茨维尔，经过一天的街头斗殴，几乎没有人被捕，而且大多数都是“醉鬼”。我相信，这就是后真相的模糊概念获得俱乐部般的现实的地方。民主合法性的承担者和民主法律的执行者对自己的实际权力变得不确定。那些宏大叙事、宇宙真理的守护者，似乎无法找到正确行动的道路。他们机构里的精英们被自我怀疑吓呆了。

在政治左派中，对反法暴力是鼓掌还是谴责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做出生死抉择的当局更关心的是，不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在后真相时代，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没有人愿意被视为*反反法西斯者*。

* * *

2015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Emmanuel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一名年轻人从查经会上站起来,掏出手枪,开始射击。在场的13人中有9人被谋杀,其中包括牧师、87岁的唱诗班成员和一名州参议员。所有死者都是黑人。21岁的凶手是白人,自称是"白人民族主义者",但受害者并不认识他。据报道,当他在祈祷时将死亡降临到人们身上时,他说:"我必须这样做……而你必须离开。[115]

2016年6月的一个凌晨,一名年轻男子进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同性恋夜店Pulse,开始用半自动武器有条不紊地向那里拥挤的顾客射击。在几分钟内,49人被谋杀,58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凶手今年29岁,是一名阿富汗裔美国人,受害者不认识他。在给一名警察调度员的电话中,他"宣誓效忠"ISIS,这个伊斯兰教派最近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枪手说,美国对ISIS的轰炸"触发"了他的大规模屠杀。[116]

201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91号公路丰收音乐节(Route 91 Harvest Music Festival)的最后一幕,从俯瞰庆典的曼德勒酒店(Mandalay Hotel) 32楼传来枪声。十分钟后,58名音乐会观众被谋杀,数百人受伤躺在地上。凶手今年64岁,退休了,很富裕,在自杀前与他所折磨的人完全断绝了联系。他对自己的暴行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被确认。

我相信，我们支离破碎的现实与虚无主义者的兴起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虚无主义者和团体认为破坏和大规模屠杀是一种进步。虚无主义者潜伏在支离破碎的真理中，无法辩论或反驳。在那里，他体验到绝对的委屈和对制度的绝对否定，对现存的一切和他遇到的每个人的否定。他认为，不仅是政治，整个人类都必须得到净化和更新。作为最后一个正义的人，虚无主义者的目标是在随机陌生人的血液中实现这一目标。他将许多人在网络上口头或虚拟的暴力行为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是复仇者

后真相的天使，他的咆哮变成了肉体。

即使民选官员看着自己的权威在不确定的迷雾中消散，虚无主义者却以绝对的信念犯下了自己的罪行。被强迫——“被触发”——的保证使他免于承担任何责任。在死亡和屠杀中，他觉得自己像羔羊一样无辜。他的罪行的罪责必须落在社会秩序的头上:他只是一个正义的工具。“我必须这么做……而你必须离开。”奥萨马·本·拉登，这类人的先驱，在一段臭名昭著的视频中，当他讲述9/11事件中数千人死亡的故事时，咯咯地笑了起来。

而今天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则更为认真。他抛弃了大量的宣言和判断。“不幸的是……“我很着急，”查尔斯顿的枪手写道，“我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实际上大部分都必须被遗忘，永远消失。[117]他活了下来，在监狱里又发表了一篇宣言。这些文件令人生疏而抽象，在语气、逻辑和比例感上与暴力脱节，但却与公众反射性的否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虚无主义者血淋淋的世界图景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风景。他对*深刻的叫嚣*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日常的否定。不知何故，大量公民开始像他一样相信，这个制度已经失败了，社会秩序必须被打破。可以这样说，美国总统也在其中。虚无主义者，那个正义的怪物，似乎是我们的一个相当忠实的相似之处，处于道德败坏的更高级的状态。

随着2014年伊斯兰哈里发国的出现，这种盲目的破坏冲动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一大片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土地被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分割出来，由一个崇尚死亡的教派统治。“我发誓，我们是爱喝血的民族，”一名ISIS的巴勒斯坦信徒在视频中吹嘘道。“我们来屠杀你们。那个诺言实现得太多了。ISIS所犯下的令人憎恶的罪行与20世纪最可怕的恐怖事件相媲美。受害者被斩首、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笼子里活活烧死。奴隶制复活了。被囚禁的妇女被当作性奴隶，如果她们拒绝这个角色，就会被淹死。数以十万计的妇女被屠杀。数百万人背井离乡，不仅在地区，而且在民主世界，掀起了一股绝望的移民潮和恐怖浪潮。

然而，犯罪者——大多是年轻人、男性和精通媒体的人——认为自己是人际关系中童贞的恢复者。他们渴望纯洁、真实的生活，期待着过去的污点被鲜血洗净后的纯真时代。比起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队，或者西方，他们的敌人是历史。以下是哈里发国的哈里发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 *事实上,穆斯林在他们的哈里发政权垮台后就被打败了。然后他们的国家不复存在,所以不信仰者能够削弱和羞辱穆斯林,在每个地区统治他们,掠夺他们的财富和资源,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通过攻击和占领他们的土地,让他们奸诈的代理人掌权,以铁腕统治穆斯林,并散布令人眼花缭乱和具有欺骗性的口号,如:文明、和平、共存、自由、民主、世俗主义、复兴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
> 119

2015年2月，伊斯兰哈里发的爪牙进入摩苏尔博物馆，砸毁了那里的雕像。这一行为似乎比任何大屠杀都更让西方精英们感到恐怖。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称其为“野蛮”，是对“人民、历史、记忆和文化”的攻击。这正是战略目标。就像斩首一样，ISIS展示了它的破坏。在网上发布的一段5分钟的视频中，胡子粗壮的男子气喘吁吁地把这些古老的偶像拉下来，拿着大锤和手提钻砸向倒下的雕像。这种狂热有时会以慢镜头呈现，以达到浪漫的效果。这是一场政治戏剧式的破坏行为，是为了陶冶世人而表演的。教训很简单。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人类就陷入了无法无天和道德混乱之中。隐含的解决方法同样简单。ISIS并不是要改变历史，而是要终结历史。



11.6ISIS向历史宣战

简而言之，视频的观众被邀请用手提钻的方式通往乌托邦。

尽管伊斯兰国(ISIS)的追随者用晦涩的神学术语说话，但渴望摆脱历史的束缚并不是穆斯林或宗教特有的。我们以前也曾偶然发现过这个主题。加泰罗尼亚人认为，过去剥夺了他们的国家地位。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梦想着把俄罗斯从苏联的尸骸中拯救出来。唐纳德·特朗普谴责我们的“美国大屠杀”。波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府规定，提出波兰与纳粹战争罪行合作的话题是非法的。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左倾城市之父们把哥伦布日变成了“土著人民日”。

对历史的否定——实际上是对我们当前现实的否定，因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否定——是推动公众反抗的最强大动机之一。这是通往虚无主义的捷径，也是死亡崇拜合乎逻辑的正当化。在一个多产的孤独杀手的冗长宣言中，“历史”这个词重复出现了510次，就像一个仪式诅咒。122

ISIS的信息引起了数千名西方国家民众的共鸣

加入哈里发国许多人只懂几句阿拉伯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非穆斯林血统。他们选择了野蛮而不是无聊，成为世界末日戏剧中的演员，而不是家乡的软件程序员。

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抛弃了该地区，野蛮的宗派分子可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由于在伊拉克的失败而士气低落，西方精英们开始相信，对中东的干预只会使糟糕的局势变得更糟。他们认为瘫痪是最好的政策。结果，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席卷了整个大陆。当代表秩序和民主的力量撤退到安全地带时，混乱和暴力的力量进来了。最后一批美军于2011年12月撤离该地区。奥巴马总统坚称，他们留下了一个“主权、稳定和自力更生的伊拉克”。但在2014年6月，ISIS武装分子在摩苏尔击溃了伊拉克军队，大踏步前进。不久之后，哈里发国宣告成立。

考虑到可怕的后果，有很多责任要分摊——但这不是我在这里的目的。这个故事的重点是，瘫痪并不是不可逆转的。面对一个恐怖主义民族国家的严峻现实，美国和许多欧洲民主国家被鼓动起来采取行动。精英们意识到了形势的*真相*，并采取了恰当的行动。奥巴马总统尽管不信任干涉主义，但还是在2014年11月将美军调回伊拉克，作为打击ISIS的协同行动的一部分。同样对海外冒险行为嗤之以鼻的特朗普总统加速了这一进程。2017年7月，ISIS被赶出摩苏尔。去年10月，伊斯兰国在对该教派具有重要宗教象征意义的拉卡(Raqqa)被击败。曾经与英国面积相当的伊斯兰哈里发国(Islamic Caliphate)如今已被击溃，四处逃窜。哈里发巴格达迪(al-Baghdadi)已经深入地下，没人能确定他是死是活。

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统治精英承担了责任，而不是逃避责任。现实生活中的结果或多或少是他们想要的。民主国家积极行动并取得了胜利。虚无主义的载体被粉碎了。在后真相时代，好消息可能很难解读:但这里有值得思考的东西。

公众对现有秩序的叛变，引发了许多猜测和担忧。但公众，一直都坚持认为

反抗的是精英阶层。至少，这是我的判断。正是在第五次信息浪潮的背景下，精英的失败推动了变革的车轮开始转动:我想以精英的选择，包括改革工业式民主的可能性，来结束我的故事。



11.7温斯坦与朋友分享欢笑125

工业精英的命运与自由民主的不确定未来

在2009年接受《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采访时，有影响力的电影制片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对他的机构发表了以下言论:“好莱坞拥有最好的道德指南针，因为它有同情心。我们是为“9·11”事件受害者进行电视筹款的人。我们在那里为911事件的受害者
卡特里娜和任何世界性的灾难。温斯坦的个人身价高达数亿美元，最贴切的形容是精英中的精英: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朋友，对民主党和进步事业的慷慨捐款人，电影明星的缔造者和破坏者。后一日

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温斯坦参加了在犹他州圣丹斯举行的妇女游行，抗议新总统的性别歧视观点。

但2017年10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报道称，温斯坦在过去几十年里性侵犯或性骚扰了数十名女性，其中包括著名女演员。其中一些事件是暴力的身体攻击。另一些则暴露了古怪反常的行为。所有人都没有受到惩罚，因为受害者不敢公开反对这样一个冷酷无情、人脉广泛的当权者，而温斯坦的机构——电影行业——把道德指南针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媒体的爆料打破了这种沉默。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公开自己的不正当行为，温斯坦在好莱坞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摇摇欲坠。10月8日，他被自己的公司解雇。

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当之无愧的倒台，引发了精英阶层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突然之间，女性开始公开谈论有权势的男性过去的掠夺行为。很多被指控的人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政界、新闻媒体界的大腕，当然还有娱乐圈的大腕。大多数人都被玷污得无法修复，或者被迫退出公共生活。阿拉巴马州的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虽然备受青睐，但在性行为不端的报道浮出水面后被击败。他是宗教右翼的旗手，但他被指控与未成年女孩发生性行为。性丑闻迫使明尼苏达州的一名民主党参议员辞职。据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他曾被拍到摸女人的乳房，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几名众议院议员的不当行为被曝光后，宣布离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一位著名的早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因性行为不端而被解雇。《*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被“停职”，有关骚扰的指控正在调查中。

与温斯坦的情况一样，大多数涉案男子都受到所在机构的保护。他们都是结构性腐败的例子。当腐败降临时，牵涉到的远不止是有缺陷的个人。

我提起这个肮脏的故事是有原因的。

真相的恢复需要可信赖的权威的恢复。目前，这还遥遥无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当前是否

精英阶层能否恢复这一功能。否则，目前处于瘫痪阶段的权威危机将继续扭曲和破坏这个阶级长期管理的自上而下的自由民主模式。

工业精英们能找到救赎吗?ISIS的失败表明，当精英们对跨越党派和社会界限的事业充满信心时，他们可以轻松驱散野蛮的战争团伙。现代政府仍然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和财富。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今天，精英权威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任何特定的运动或团体，而是来自公众无情的强烈否定:这种立场是条件反射式的*反政府*、*反体制*，有时甚至是*反民主*。这种情绪是由一种几乎普遍的对高层失败的感知所驱动的。毕竟，ISIS之所以需要被对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伊拉克、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中犯下了一连串的政策灾难和对真相的逃避。

要想扭转这一趋势，精英们必须用积极的愿景——共同的冒险——来对抗否定，这一愿景包括公众，并能说服公众。政治家们必须讲述一个能激发选民想象力的世界故事。高层人士必须把公众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然而，在这一尝试中，他们将与他们所代表的制度的社会要求发生正面碰撞。自由民主的工业模式在结构上并不是特别民主。这是一种只在广播模式下运作的陡峭的等级制度。顶层和底层之间的*距离*非常大。不信任的鸿沟将很难跨越。随着精英阶层对公众的恐惧和厌恶加剧，他们对距离和孤立的渴望也在增加。

今天的精英们不知道该如何与公众对话，也不知道该对公众说些什么。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尝试的兴趣。负责克林顿竞选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公众舆论完全漠不关心:他们相信大数据。一个昵称为“艾达”的算法向竞选工作人员提供了“模拟”意见。艾达是精英们所希望的那样的公众:安全、干净、只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这个活生生的选民显然被这群人视为一个外星人和可怕的野兽。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可悲的。这种距离的扭曲自然带来了选举日的冲击。

去年被爆出性丑闻的男人们用距离来衡量他们的成功。他们利用自己非凡的才能来

超越了评判普通人的规则。伟大的制度保护和纵容他们。与公众的身体接触被仪式化了。其他精英不断奉承他们。在你自己看来，你成了一个卓越的人道主义者。你是那些在你下面的人的榜样。你可以是强奸犯，但也可以是这个国家的道德指南针。

由于他们所处的高度，这些人觉得自己无懈可击——而且他们离目标也不远。

统治民主国家的精英们对跨越鸿沟与公众接触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们似乎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从高层看，民主危机暗示着一种数字信息格局，它把具有破坏性冲动的公众带到了可怕的距离。这种反应是一种政治上的幽闭恐惧症——比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Twitter上的胡言乱语就经常引发这种恐惧症。对假新闻的狂热是这种病态的一部分。它促使Facebook和谷歌设计不透明的过滤算法——这可能是将信息领域转变为只讲喜事的机械娃娃Ada的一小步。129

我的意思是说，工业精英们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赖以繁荣的那种破旧的模式捆绑在了一起。他们的政治计划寻求恢复距离，而不是权威。他们的希望是让公众保持沉默，而不是说服公众。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总统时承诺，要让那些可悲的人安于现状。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坚持执政，是为了压制每个德国选民内心的纳粹秘密。欧洲的仇恨言论法禁止冒犯精英阶层的对话。我们自己的联邦政府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极端安全和警务措施，以使公众保持安全距离。

我无法预测自上而下的民主是否会持续下去:但过去十多年来发生的事件的势头正在推动民主世界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首先，工业时代的伟大等级制度正在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党处于解体状态，甚至民族国家的大块也在分裂。这个时代即使不倾向于解体，也倾向于分裂。第二，现在的精英阶层已经丧失了改革体制的资格。他们对接受这项工作毫无兴趣，即使尝试，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精英们，比如伊卡洛斯，

似乎满足于在大众之上滑翔，直到为时已晚，无法避免崩溃。

最后，在围绕既有秩序的多方争斗中，政治距离问题已成为决定性因素。与掌权者接触的民主原则与工业时代由遥远的、无私的专家统治的理想发生了冲突:我们的代议制太过破碎，无法调解解决问题。目前的世俗趋势促进了距离的缩小。因此，秘密的堕落已成为公开的丑闻。围墙正在向那些被玷污的维持现状的人逼近——我认为，可能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足以让人进行一些猜测。

* * *

要想消除政治距离，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结构性现实。愤怒、民粹主义和在奇怪的时间发推文，只不过是一种风格上的姿态。最终，金字塔必须被压平。典型的民粹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选择了一个相对“局外人”的内阁，而不是通常的建制派。这不会改变对距离的感知。局外人现在已经爬上了他们的高位，与公众的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下面的多层内部人。这种距离保持不变。因此，政府的每一次失败，都将继续被疏远和无情的公众复杂化。

至于特朗普总统，我怀疑他脑子里是否有过让联邦机构扁平化的想法。这是一个在政治上追求“大”的人，喜欢用自己的名字给高楼命名。

尽管如此，2016年的选举可能是这方面的关键时刻。我们政治生活的支离破碎变得不容忽视。震惊的精英们开始谈论“分裂的美国”。[131]本着这种精神，民主党的州政府和市政府宣布他们对选举结果的蔑视。“我们有科学家，我们有律师，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宣布。在选举前，布朗曾开玩笑说，如果特朗普获胜，他将“在加州周围建一堵墙”。到2017年10月，在一个进步的崇拜者看来，他似乎已经在他的州建立了一个“与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平行的宇宙”。[134]在移民、税收、环境和许多其他问题上，布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与联邦政府截然相反。他甚至采取了一种脱离传统的外交政策，选择访问梵蒂冈来驳斥总统对全球气候政策制定的重要性:“特朗普因素很小，确实很小。135

特朗普高高在上的命令必然会与布朗在加州的墙发生冲突，希拉里·克林顿以300万票的优势赢得了这个州。直接的结果是冲突——共和党州长对奥巴马政府发动的游击战的镜像版本。举个例子:布朗签署了一项法案，免除了州执法部门协助联邦移民机构的责任。特朗普政府高调高调地就此事将加州告上法庭。这场冲突是当局分裂成相互敌对的碎片——最终陷入瘫痪——的又一个例子。

然而，与公众与精英之间更大的争吵相比，这场党派之争似乎孕育着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在一个片面的真相和愤怒的政治战争集团的时代，联邦政府自上而下强加的重大国家“解决方案”很可能引发激烈的否定，如果不是反抗的话。巴拉克·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医保法案就是这样。反对党催生了茶党，茶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摧毁了奥巴马联盟。特朗普的“大而美的”政策也是如此，其中许多政策被杰里·布朗等人牵制或推翻。距离，这片笼罩在当代政治上的毒云，被公众认为来自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个特定地址。在2016年大选前后，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大政府”是对国家的最大威胁。137

如果说联邦政府现在是分裂和两极分化的代理人，那么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某些私人实体，可以成为社区的集结点。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必然意味着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向城邦下放权力。

城市精英和媒体精英，这些中央集权的老信徒，已经重新发现了联邦制和国家权利的优点。安德鲁·库莫，纽约州州长

他在选举后不久宣布，纽约人的道德和政治原则与特朗普对美国的看法“根本不同”：“我们尊重纽约州的所有人。”库莫接着说:

> *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和我们是谁。但这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我们通过的法律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无论全国发生什么。我们不会允许一个攻击移民的联邦政府在我们州这样做。*[138]

左翼和右翼人士可以通过接受所谓的“地方主义”来保持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库莫的“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是谁”。既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山谷中，我们就应该在符合民族团结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赋予它们权力。在一个可能的未来，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将成为瑞士。

分裂的民族国家的各个部分将拥有扁平的等级制度，公众与权力之间的距离将大大缩短。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公众会更加强烈地反对近在咫尺的地方行政官，地方利益也会在国家决策中显得更大。我们可以通过看看意大利来了解这是如何运作的。2016年，新当选的罗马市长、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成员扼杀了该市申办2024年奥运会的计划。被激怒的意大利国家奥委会主席称这一决定是“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他住在一座宫殿林立、等级森严的城市里——他是市长，是垃圾清除和污水处理的罗马。

地方权力的崛起将使以爱沙尼亚为模式的数字化政府成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这是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无法企及的。爱沙尼亚的人口刚刚超过一百万。它的模式适用于美国的城市和县，也许也适用于较小的州。尽管如此，这个波罗的海小国正在尝试重新设计现代生活，这种模式有可能扩展到全球:

> *E-Estonia是当今科技治国之道中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因为它囊括了政府的所有成员，并改变了公民的日常生活。政府参与的正常服务*

在立法、投票、教育、司法、医疗、银行、税收、警务等方面,都通过一个平台进行了数字连接,连接了整个国家。[141]

如果实验成功，政府的活动和信息将被扁平化到网络的水平，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水平。那时，我们的个人身份和官方身份将开始一个同步的过程，达到自19世纪末“大众”进入历史以来几乎难以想象的程度。

从这些思辨的高度，我们可以窥见更为广泛的变化。一旦政府走向数字化，就有可能改变其结构，甚至改变其目的。正如冰岛海盗党(Pirate Party of Iceland)所设想的那样，政府可以更像一个交易平台——部分是Facebook页面，部分是亚马逊市场——而不是无所不知的问题解决者。政治期望将会大幅调整。信息与权力的关系也将如此，最终扭转第五次浪潮的病态失衡。以全民公决形式出现的直接民主将被定期援引，无论目的是好是坏。

要问为什么这些变化没有发生，就等于回到了对话的开始。高层的人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改革或适应。与底层的距离保护了精英们不受自身惰性和颓废的影响。如果像证据表明的那样，这种距离正在迅速减少，那么整个统治阶级，以及一种熟悉的处理和谈论政治和权力使用的模式，都面临着灭绝的可能性。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可能会如何发生。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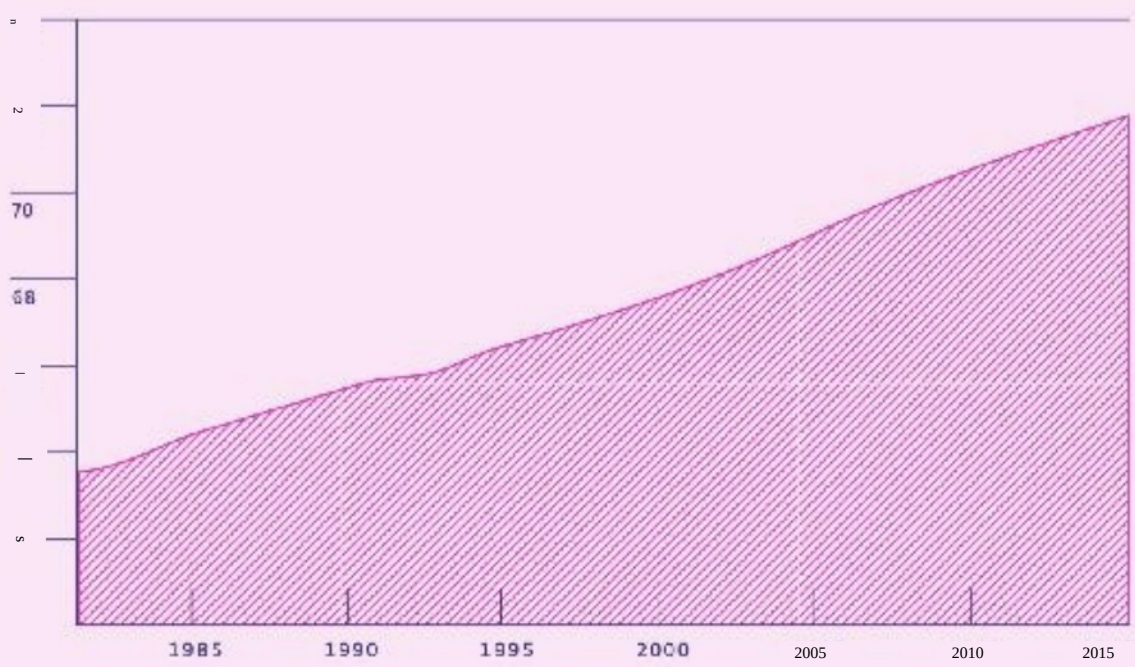
公众的反抗*并不*一定会迎来一个专制时代。它也*不一定*会催生民粹主义。它*不一定*会破坏自由民主。在我的设想中，公众的反抗是一种由技术驱动的新人群和新阶级的搅动，是信息和噪音的扩散和混乱，是乌托邦式的希望和虚无主义的愤怒，是全球化和解体，发生在网络难以忍受的个人接近中，发生在与政治权力的致命距离上。每一种秩序结构都受到了威胁——

是的。整个社会层面的虚无主义，就像ISIS那样，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但没有哪个特定的制度是有利或不利的——也没有什么是命定的。

人类福利的许多方面都伴随着公众的反抗而蓬勃发展。在过去的一代人里，亚洲有数亿人实现了非凡的飞跃，摆脱了祖辈的贫困，过上了数字生活方式。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倒退的国家，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2000年至2015年间，全球人均寿命增加了5岁。在非洲，预期寿命增加了9.4岁。[142]同样的技术，破坏了社会和政治关系，也将数十亿个人和家庭联系起来，提供信息和娱乐。万维网最初发布28年后，在线人口估计在30亿至40亿之间。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接近50亿。世界上一半的人口确实在移动:2017年，有40亿人乘坐飞机前往某个遥远的目的地。

经济通常被描绘成步履蹒跚和不平等，因此是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实际上表现得相当不错。尽管2008年的危机对中国经济体系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但随后的几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缓慢但稳定的增长，然后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对于北美和欧洲的民主国家来说，2017年是繁荣的一年。EU经历了十年来最强劲的增长。失业率很高，但迅速下降，接近2008年之前的水平。[德国]尽管在组建政府方面经历了种种困难，但仍然是一个经济强国，失业率低于4%。西班牙经济在2008年的崩溃粉碎了该国的政治共识，但到2017年，西班牙经济已经反弹至危机前的繁荣水平。[145]就连经济停滞了20年的意大利，也再次走上了发展之路。对于大多数EU人口来说，物质生活是甜蜜的。

Er: - wατι πAI



GLOBAL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1985–2015

11.8 Not the worst of times[143]

310z-8002 a1⊠HIMo2 da9 3 0n3



το: π 4 τΑτ τς



BLACK UNEMPLOYMENT RATE SINCE JAN 2008

uaag seu m☒

)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2008–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0
00 00
00
06
oo5

持续了七年。失业率创17年来新低。即使像制造业这样落后的行业也在蓬勃发展，招聘也在增加。尽管人们一直在谈论不平等，但经济繁荣的好处已经深入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例如，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2017年，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相同:3.7% [146%]。黑人和西班牙裔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老式的美国智慧重塑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降低了所有人的能源成本。

试图用经济困境来解释公众的反抗似乎与这一庞大的数据相矛盾。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层出不穷。主流观点认为，“全球主义的失败者”——对社会经济落后的人的简称，他们大多是白人和男性——已经向进步宣战，同时要求回到某种想象中的过去。这是希拉里克林顿对2016年大选的理论。2018年3月，克林顿观察到，她的选民来自“乐观、多元化、充满活力、不断前进”的地方，而特朗普吸引的是那些“不喜欢黑人获得权利……”不喜欢女性获得工作……我不想看到印度裔美国人比你更成功。这[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隐含意义。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小英格兰脱离欧洲的原因。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可悲的人在投票中一直领先于他们的优秀者。

我发现，支持这种经济解释的证据相当缺乏。公众对政府和政治阶层管理经济的能力完全缺乏信任。精英失败的感知显然延伸到了经济领域。但我相信，这是一种更普遍的权威危机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更广泛的失败。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在几个关键州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但他在蓬勃发展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以更大的优势获胜，而不是在落后的宾夕法尼亚州。一项对特朗普选民的深入分析发现，他们更有可能是“财政保守派”或“自由市场主义者”，而不是克林顿所说的倒退派。[148]另一项详细分析表明，“富裕的共和党人”在初选中为特朗普提供了核心支持。而在总统选举中，特朗普的选民中“约有三分之二”“来自经济中较富裕的那一半”。[149]

英国脱欧选民无视经济灾难的预测，一方面，他们并非不成比例地是男性、工人阶级或穷人。在意大利2018年的大选中，富裕的北方支持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贫穷的南方支持另一个民粹主义政党。选出令人发指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菲律宾人关心的是犯罪和腐败，而不是经济问题。在这里很难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不用说原因了。

因此，我谈到了定义我们的困境的持久的悖论。一个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度互联的公众正在反抗这个给予他们所有这些恩惠的制度。这场反抗的巨大动力不是对经济的怨恨，而是对距离和失败的愤怒。日常生活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从约会到叫出租车，大多数社交和商业交易都是以光速进行的。这种生活方式不断地与我们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笨重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最重要的是，现代政府在制度上无法认识到，它已经失去了对政治现实的垄断。它表现得好像欺骗和堕落永远不会被发现:但在数字时代，一切都被发现了。公众习惯了近在咫尺，却发现权力的行使远离了一个不可能的距离:理由永远不会给出，问题永远不会得到回答，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这个历史时刻的漫长而肮脏的咆哮。

反抗的直接目标是一个按自己的方式持续失败的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曾经披着权威的外衣，交付着宏伟的国家项目，但现在公众对他们太了解了，他们只能嘟囔、结巴，士气低落。他们厌恶公众对他们的羞辱。政客们已经失去了对服务理念、对共同利益、对某种普世事业或意识形态的推广的信心:他们存在，在办公室里，仅仅是为了生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被视为生存，为了吸引大众和社交媒体的注意力。现在的情况是，总统是从电视真人秀的演员中挑选出来的。政治演员越来越像好莱坞的真人演员，他们与真人演员为伍，似乎有着共同的反常偏好。

在抵抗的口号下，精英们正在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机构反应，反对公众决定的选举结果:民粹主义。反击是无情的，而且是在多条战线上进行的。如果精英赢了

他们的赌注，那么民主，最终，将是真正的争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如果精英们被击败，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自由民主在工业世界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也在为生存而挣扎。它必须以蛇蜕皮的方式，摆脱过去150年的许多形式和修辞，原因是一样的:为了成长。数字宇宙带来了一个过度活跃的公众群体，其数量在人类经历中是前所未有的。必须以某种方式为其找到政治空间。当前的精英阶层可能无法，也肯定不愿接受这种转变。在公众看来，精英阶层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功能，因此也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

然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民主是不能没有精英的。这是当前形势的残酷现实。这比需要专业或深奥的知识要复杂得多。今天的品味可能倾向于平等主义，但纵观历史和文化，组织人类并完成任务的唯一方式，一直是通过某种程度的正式等级制度中的命令和控制。我们可能天生就会对这种模式做出反应。金字塔可以变得更平坦或更陡峭，非正式网络的矩阵总是覆盖在它上面:但结构上的必要性是成立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教会的主教。在治理政府或管理公司方面，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分配确定性和真理方面，这一点同样适用。

如果我的分析有什么地方接近正确的话，那么自由民主的重塑和真理的恢复，必须等待一个*合法*的精英阶层的出现。

* * *

在金字塔顶端，一个群体如何取代另一个群体?关于经济因素的首要地位、对少数群体的剥削和解放、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兴衰等等，对社会变革的研究背负着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幸运的是，我缺乏渊博的知识，无法对这些重大课题中的任何一个表明立场。取而代之的是，我将回归到一个古老的分析技巧，提出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合理的等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在1921年出版的《*无脊椎的西班牙*》一书中，伟大的西班牙思想家约瑟夫·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这种等级制度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奥尔特加观察到，在生活的每一个群体和场合中，总有一些人显得令人钦佩。由于他们的感情、行为和表达的正确性，这些人成为“榜样”——他们被大多数人“选择”为人类的楷模。今天的心理学家称之为“社会模仿”或“镜像”:房间里占主导地位的人的肢体语言往往会被其他人无意识地模仿。奥尔特加坚持认为，这种动态超越了单纯的模仿。这不是发型或服装时尚的问题。他声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重新定位。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最高概念都体现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而不是抽象的原则。许多希望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人，都渴望在某种程度上像这些少数优等者那样。[152]

——

因此，等级制度产生于一种自我完善的自然冲动，当它几乎以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被“选择”时，它是合法的。

奥尔特加认为这一过程是历史的驱动力。他写道，“大众与特定少数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每个社会的基本事实，也是其向善或向恶演变的动因。”奥尔特加的群众，我们现在称之为公众。他所说的“精选的少数群体”指的是令人钦佩的少数人:精英们，在他们最好的时候，把他们的创造力投入到努力维持和丰富当代生活的结构上。这些人是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技术专家、传教士和政治家。

在精英与公众的正确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榜样。他们体现并活出了大师叙事。我们可以把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独立战争后回到他的农场作为一个显著的例子。在童年小木屋里的亚伯·林肯和追求完美灯丝的汤姆·爱迪生也符合这一类型。这些历史人物本人是什么样子，是可爱还是混蛋，几乎都不重要了。他们的生活轮廓显示出令人钦佩的卓越品质，前几代美国人同意奥尔特加的观点，即榜样的力量可以将人类生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这种品质使真正的精英与众不同，使他们的行为具有权威性

表达——不是权力、财富、教育，甚至不是说服力。而是生活和工作中的*正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这样的模范人物纯粹是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吸引公众的。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普通人渴望模仿非凡的人，这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根本的，因为他们希望分享更优秀的生存或行为模式。奥尔特加总结道，良好的社会是“完美的引擎”。

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模范的力量被颠倒了。精英们寻求奉承和模仿公众。他们展示大众的品味和态度，即使他们躲在保镖和金属探测机器的路障后面。当然，这就是我所说的距离:一种道德上的疏离感比结构上的鸿沟更强烈。

奥尔特加断言，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精英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公众挑选出来的。如果我们要问这种选择是如何运作的，奥尔特加会回答:通过愿望。当精英们未能通过模范性的考验时——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他们排斥而不是吸引——他们就*没有被选中*。他们被剥夺了合法性和权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真空，奇怪的新原型将试图填补这个真空。正如唐纳德·特朗普从他的特朗普大厦电梯到白宫的瞬间传送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变化可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

然而，特朗普总统是公众否定的囚徒，是试图将一个狭隘的象征性框架强加于不断扩大的现实的囚徒。我在上面说过，总统是从一个断裂的地方看待世界的。这是另一种说法，他的生活表现出了正直的反面。他并不是我们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合法性依赖于对事件的共同解释:而为了被分享，为了被矛盾的观点平等地感知，一个故事必须轻量化对象征性幻影的愤怒，而支持可论证和具体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奥尔特加准确地描绘了通往精英合法性的道路，让我们得以一瞥前进的道路。

当前需要的是体制的重组和权威的恢复。民主的实践必须适应一个庞大的、超级固执己见的公众的存在。政治行动必须接近速度

在数字媒体上生活、工作和购物的选民所期望的接近程度。这种变化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生，但从我的立场来看，有一些残酷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风格是上个世纪的遗留物，如今即使是真诚的，也显得虚伪和欺诈。扩大社会距离作为对政治成功的奖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如今，领导我们伟大机构的精英们固守着自上而下的控制，与乌合之众保持着越来越远的距离。他们的抵制将使必要的变革难以实现。

作为公众的一员，我们——我指的是你，读者和我——并非无能为力。我们不是惰性的。我们拥有选择和取消选择的权力，而且我们不断地运用这种权力——不仅在我们的政治参与、我们的投票和捐赠中，而且在我们读的书、看的电视、参加的演出和购买的产品中。如果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奥尔特加的合法性框架大体上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用另一个更值得我们向往的精英阶层来取代一个失败的精英阶层。根本性的变革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和平而迅速地实现。这是好消息。

最大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一个“精选的少数人”，既能体现引领民主进入数字时代所需的一系列美德，又能通过榜样的力量吸引公众向这些美德靠拢。在这方面，政治动荡可能会助一臂之力。例如，特朗普和马克龙带来了一大批新面孔，他们是以前脱离政治活动的普通公民。两位总统都喜欢宏大和奥林匹克般的距离，但从新人群的行列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典范，他们可以教会公众如何在没有否定或虚无主义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其他人可能会出现在搅动我们社会生活的新人和新模式的巨大骚动中。创新的闪电可能会击中新的领域:宗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影响。精英的选择在本质上似乎是半达尔文式的。很多人被召唤，但很少有人会被选中。

确切地说明在自由民主的新体制下需要*什么样*的美德，可能会更有用。不用说，这将使我们脱离猜测的领域，进入纯粹的观点。既然我的故事快结束了，我将很不自信地提出我的观点。

现代政府的原罪是骄傲。它是建立在自夸之上的——它可以

解决任何“问题”，即使是解决人类状况，它也只能忍受乌托邦式期望的病态饮食。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认识。自苏联解体以来，我们已经明白，即使是最残酷的武力也无法拯救人类的命运。就在那段时间里，民主国家的选民实际上生活在谎言中——后真相时代尽管有各种奇怪的病态，但只是一个二级效应。

我想在精英们身上寻找的品质是*诚实*和*谦逊*,*让政治摆脱这台跑步机*:老派的美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民主共和国机器背后的活精神，尽管现在几乎消失了。民主的改革者必须学会大声说出来，让所有人都能听到，“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们不确定后果”，甚至“我错了”。民选官员必须具备科学家和商人的能力——就此而言，也必须具备普通家庭的能力——识别失败并继续前进。诚实意味着与真理的关系，在人们看来，比野心或党派利益更重要。谦逊意味着金字塔顶端的人将公众视为自己将回归的家园，而不是一个可以躲避的食肉动物。真理必须说出来，即使它伤害了演讲者或听众。距离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即使冒着身体上的危险。

所以我想从《*绿野仙踪》中*再借用一个美德:勇气。

这个场景现实吗?谁知道呢?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感染会刺激自身的特异性抗体。后真相和咆哮的时代可能会引发对简单诚实和谦逊的强烈要求。我并不是在预测圣徒的统治会很快到来。这是不必要的。我也不期待出现革命性的转变，比如美国总统穿着睡衣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执政。历史不是这样运行的。启蒙民主的形式和理想在工业模式中仍然存在。这种模式的许多方面将在未来民主的任何迭代中生存和发展。如果我们要克服我们的困境，关键的一步不是转型，而是*重新定位*，转向远离自上而下的控制，官僚权力，以及对距离的高度评价作为政治成功的奖励。在我看来，这样的重新定位是完全可能的。

最终，一切都取决于公众:取决于我们。如果奥尔特加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怒斥我们的统治者的权利。相反，我们必须着手这项工作

选择他们的继任者。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和精力完全花在那些似乎不愿撒谎、不愿简化或不愿歪曲事实的政客身上。我们可以识别并鼓励那些拒绝攀高枝的人。这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岔路口，另一个则通向虚无主义。不管怎样，选择权在我们自己。

章节注释

1 Andrew Sullivan, “Trump’s Mindless Nihilism,” *New York Magazine* (October 13, 2017), at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7/10/andrew-sullivan-trump-mindless-nihilism.html

2 Eugene Robinson, “We Will All Pay a Price for Trump’s Nihilism,”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7, 2017),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e-will-all-pay-a-price-for-trumps-nihilism/2017/11/27/2be5d924-d3b1-11e7-95bf-df7c19270879_story. html?hpid=hp_no-name_opinion-card-f%3Ahomepage%2Fstory&utm_term=.1794f9c0be5c

3 Harriet Sinclair, “Steve Bannon Says Trump’s ‘Insurgency’ Will Rid Republican Party of Its Cronies,” *Newsweek* (November 19, 2017), at http://www. newsweek. com/steve-bannon-says-trumps-insurgency-scaring-mcconnell-action-716267

4 Peggy Noonan, “The Nihilist in the White Hous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1, 2014), at https://www.wsj.com/articles/peggy-noonan-the-nihilist-in-the-white-house-1416533660 , and Aaron Blake, “We’re All Political Nihilists Now,”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2017),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04/06/were-all-political-nihilists-now/? utm_term=.c140b82029be

5 E.J. Dionne, “Our Institutional Crisis Is Upon Us,” *Realclearpolitics* (December 11, 2017), at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7/12/11/our_institutional_crisis_is_upon_us_135736.html

6 Yascha Mounk, “The Real Coup Plot Is Trump’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2017),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20/opinion/trump-republican-coup.html

7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End-Times for Liberal Democracy?” Interview by Zachary Laub, Yascha Mounk, Interviewee (December 28, 2016), at https://www. cfr. org/interview/end-times-liberal-democracy

8 Sohrab Ahmari, “The Worldwide Crisis of Illiberalism,” *Commentary* (June 16, 2016), at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 com/articles/illiberalism-worldwide-crisis/. See also Human Rights Watch, “The Dangerous Rise of Populism: Global Attacks on Human Rights Values,” *World Report 2017* (2018), at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dangerous-rise-of-populism

9 CNN, “Obama Invokes Hitler Era in Warning to America,” YouTube (December 9, 2017),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_FWptVoBWg. See also Richard Cohen, “The Echoes of Weimar Germany Should Not Be Ignored,” *Realclearpolitics* (December 6, 2017), at https://www. realclearpolitics. com/articles/2016/12/06/the_echoes_of_weimar_germany_should_not_be_i

10 AP photo. John Minchillo, photographer.

11 See Josh Katz, “Who Will Be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16), at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upshot/presidential-polls-forecast.html, and Natalie Jackson,

"Huffington Post Predicts Hillary Clinton Will Win With 323 Electoral Votes," *Huffington Post* (November 7, 2016) at https://www. huffingtonpost. com/entry/polls-hillary-clinton-win_us_5821074ce4b0e80b02cc2a94. The Huffington Post piece placed the odds of a Trump victory at 2 percent.

12 Quote is from Shane Goldmacher and Ben Schreckinger, "Trump Pulls Off Biggest Upset in US History," Politico (November 9, 2016), at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6/11/election-results-2016-clinton-trump-231070

13 "The Inaugural Address: Remarks of Donald J. Trump,"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16),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the-inaugural-address/

14 Andrew Prokop, "The last-ditch push for the Electoral College to stop Trump, explained" *Vox* (December 19, 2016), at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6/12/16/13920444/electoral-college-trump-hamilton-electors

15 James Hohman, "每日202:特朗普的民意调查专家说他进行了一场'后意识形态'竞选，"*华盛顿 Post* (December 5, 2016),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werpost/paloma/daily-202/2016/12/05/daily-202-trump-s-pollster-says-he-ran-a-post-ideological-campaign/5844d166e9b69b7e58e45f2a/?utm_term=.c19bf393fb98

16 See, for example, M.J. Lee, "Donald Trump vs. the Republican establishment," CNN (October 26, 2015), at http://www.cnn.com/2015/10/26/politics/donald-trump-republican-establishment/index.html

— 17大卫古里，"候选人来自什么时候?"第二部分:当支持者来自"琐碎"时分析(2016年2月3日)，网址:https://trivialanalysis.wordpress.com/2016/02/03/when-do-the-candidatescome-from-part-2-when-the-supporters-come-from/

18参见Donna Brazile，《希拉里·克林顿秘密接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幕》，《政治报》(2017年11月2日)，网址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11/02/clinton-brazile-hacks-2016-215774

19 Rob Faris, Hal Roberts, Bruce Etling, Nikki Bourassa, Ethan Zuckerman, Yochai Benkler, "Partisanship,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Online Media and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August 16, 2017), at https://cyber.harvard.edu/publications/2017/08/mediacloud

20 See, for example, Nicholas Confessore and Karen Yourish, "$2 Billion of Free Media for Donald Trump,"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16),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6/03/16/upshot/measuring-donald-trumps-mammoth-advantage-in-free-media.html

21 Adrienne LaFrance, "Trump's Media Saturation, Quantified,"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 2016), at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6/09/trumps-media-saturation-quantified/498389/

22 Eric Boehlert, "All Trump, all the time: The Donald dominated the airwaves in 2015," *Salon* (January 16, 2016), at https://www. salon. com/2016/01/16/all_trump_all_the_time_the_donald_dominated_the_airwaves _in_2015_partner/

23 In The Art of the Deal, Trump had stated: "One thing I've learned about the press is that they're always hungry for a good story, and the more sensational the better . . . The point is that if you are a little different, or a little outrageous, or if you do things that are bold or controversial, the press is going to write about you." Donald J. Trump with Tony Schwartz, *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87), p.

56.

24 Jim Rutenberg, 《特朗普正在测试新闻客观性的规范》,《*纽约*时报》(8月7日), 2016), 网址:https://www.nytimes.com/2016/08/08/business/balance-fairness-and-a-proudly-provocative-presidential-candidate.html

25 Stephen Collinson, "为什么特朗普关于操纵投票的言论如此危险", CNN(2016年10月19日), 网址:http://www.cnn.com/2016/10/18/politics/donald-trump-rigged-election/index.html

26参见杰克·谢弗, "维基解密和石油华盛顿出版社", *政治报*(2016年10月18日),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10/john-podesta-emails-wikileaks-press-214367

27见大卫·a·法伦霍尔德(David A. Farenthold), "2005年, 特朗普被录下了一次关于女性的极其猥亵的谈话, "《*华盛顿*》(2016年10月8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recordedhaving-extremely-lewd-conversation-about-women-in-2005/2016/10/07/3b9ce776-8cb4-11e6-bf8a-3d26847eeed4_story.html?utm_term=.40ee72eca553和莎伦·韦克斯曼, "《走进好莱坞》是如何找到特朗普录音带的, 以及为什么NBC新闻可能泄露了它(独家)。" The *Wrap*(2016年10月7日), 网址https://www.thewrap.com/how-access-hollywood-found-the-trump-tape-and-why-nbc-news-probably-leaked-it-exclusive/

28 NBC新闻/华尔街日报调查, 研究#16804(2016年9月16日至19日), at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324821200/16804-NBCWSJ-September-Poll-9-21-Release?secret_password=gKkeD7pKqo5rYoSPNmfU&content=10079&ad_group=Online+Tracking+Link&campaign=

29 Thomas Patterson, Out of Order: an incisive and boldly original critique of the news media's domination of America's political process (Vintage Books: 1993).

30 Mike Wooldridge, "BBC民主日:欧洲'面临政治地震'", BBC(2015年1月20日),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0864088

31 Giorgos Christides, "Greek radical left Syriza prepares for power under Tsipras," BBC (December 14, 2014), at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0481307

32 Helena Smith, "Alexis Tsipras: 'The worst is clearly behind us,'" The Guardian (July 24, 2017),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ul/24/alexis-tsipras-the-worst-is-clearly-behind-us

33 Jane Kramer, "The Demolition Man," *New Yorker* (June 29, 2015), at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06/29/the-demolition-man

34 See Jamie Bartlett, "How Beppe Grillo's social media politics took Italy by storm," *The Guardian* (February 26, 2013),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feb/26/beppe-grillo-politics-social-media-italy and "Most famous ten politicians in Italy as of November 2016, by number of Facebook page fans," Statista: The Statistical Portal, at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590340/top-politicians-on-facebook-in-italy/

35 Gianni Riotta, "The Resignation of Renzi, the Fall of Rome,"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5, 2016), a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12/05/the-resignation-of-renzi-the-fall-of-rome/

36 Stephanie Kirchgaessner, "Italy: Five Star and League parties likely to form governing alliance," *The Guardian* (March 25, 2018),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mar/25/italy-elections-five-star-movement-and-rightists-strike-deal-to-elect-speakers

37 Anushka Asthana和Rowena Mason，《巴拉克·奥巴马:脱欧公投将使英国“排在贸易谈判的后面”》，*《卫报》*(2016年4月22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apr/22/barackobama-brexit-uk-back-of-queue-for-trade-talks

38例如，参见“媒体点名的伊斯兰国斩首视频中的‘圣战约翰’杀手”，YouTube，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btxp9SsVs

Steven Erlanger，《英国投票退出EU;《卡梅伦计划下台》，*《纽约时报》*(2016年6月23日)，网址https://mobile.nytimes.com/2016/06/25/world/europe/britain-brexit-european-unionreferendum.html?_r=0&referer=http://www.powerlineblog.com/

40参见*《独立报》*(2016年6月25日)网站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brexit-anger-bregretleave-voters-protest-vote-thought-uk-stay-in-eu-remain-win-a7102516.html上Lizzie Dearden的《脱欧选民称他们认为英国将留在EU》和Alina Selyukh的《脱欧公投后，英国用b谷歌问:“什么是EU?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2016年6月24日)https://www.npr.org/sections/alltechconsidered/2016/06/24/480949383/britains-google-searches-for-what-is-the-eu-spike-after-brexit-vote

41 Vyacheslav Polonski，“社交媒体对EU公投结果的影响”，*《EU公投分析2016》*(无日期)，http://www.referendumanalysis.eu/eu-referendum-analysis-2016/section-7-social-media/impact-of-social-media-on-the-outcome-of-the-eu-referendum/

42 Sunny Hundal，“安吉拉·默克尔现在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不是唐纳德·特朗普”，*《独立报》*(2017年2月1日)，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angela-merkel-donald-trump-democracyfreedom-of-press-a7556986.html

43参见埃米尔·辛普森，“征服者马克龙”，《外交政策》(2018年1月18日)，网址: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1/18/macron-the-conquerer/，还有这个:https://beholdisraelblog.files.wordpress.com /2017/06/unknown.jpg?w=219&h=236

44封面为2017年6月17日的*《经济学人》*。

45例如，参见皮埃尔·布里安帕拉松，“马克龙的‘朱庇特’模式不太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政治》*(2016年6月16日)，网址: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mmanuel-macron-jupiter-model-unlikely-to-stand-test-oftime-leadership-parliamentary-majority/

46 Henry A. Giroux，《特朗普美国的黑帮资本主义和怀旧威权主义》，*Salon*(2017年12月3日)，网址https://www.salon.com/2017/12/03/gangster-capitalism-and-nostalgicauthoritarianism-in-trumps-america/

47 Zeynep Tufekci，《这是言论自由的(民主中毒)黄金时代》，*《连线》*(20018年1月16日)，网址https://www.wired.com/story/free-speech-issue-tech-turmoil-new-censorship/

杰西卡·泰勒，“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俄罗斯的行为要么是非法的，要么是不道德的”，NPR(2017年6月6日)，https://www.npr.org/2017/07/06/535626356/on-russia-republican-and-democraticlenses-have-a-very-different-tint

49关于中国道德危机的性质和含义有大量的文献，我承认我没有读过其中的大部分。我的引文来自《中国的道德危机》，CHINASCOPE分析丛书(2011年12月)，网址:http://chinascope.org/wp-content/uploads/2012/01/CSA20111224.pdf。关于引发中国大众和社交媒体反思的事件类型，请参见张丽佳《我如何为我的中国感到骄傲?